广州红旗派的兴亡

刘国凯

史学的价值源于自由人性的真实

——为刘国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人民文革丛书卷二)序

作者：袁红冰

人的历史是意志的展现过程；史学的价值在于真实地讲述意志外化为社会现实的过程。

在专制政治之下，构成历史的意志可以分为独裁者的意志和体现自由人性的意志两类。然而，由于专制权力几乎垄断了一切，所以，官办史学便成为独裁意志的记录，真实的历史在史学中也因片面的记录而虚假——片面的真实，是比完全的虚假更虚假的“真实”。

自司马迁之后，除个别例外，史学家的实际地位只是专制权力的文奴，他们存在的价值只表现为以溢美之辞，记录独裁者的意志。中共建政之后，将专制政治发挥到了极致，包括史学在内的所有人类精神领域，都处于专制铁幕的沉重阴影之下，独裁者的意志和专制的利益，成为精神创作的唯一价值取向。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建政后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迄今为止，御用文人撰写的《文化大革命史》基本上变成毛泽东等得势的独裁者群体的意志展现史，和刘少奇等失势的独裁者群体的苦难史，属于自由人性的意志和苦难则被忽略。

另有为数不多的独立于中共官方的《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者，虽然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文化大革命”，可惜由于他们所依据的研究资料，绝大部分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于官方，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同御用文人的研究成果相比，并没有更多值得被历史记住的价值。

刘国凯先生提出的“人民文革”的概念，是中国史学价值体系内的一次精神大革命。“人民革命”的概念试图冲决专制政治和独裁者意志对史学的桎梏，从属于自由人性的视角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史》。起点决定目标。以“人民文革”的理念为出发点，其结果必定是属于自由人性的意志，取代独裁者的意志，成为史学的中心。

这种变化意味着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中国史学，开始呼唤全新的价值和研究取向。仅凭此点，刘国凯先生的著作，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有人或许会说《人民文革丛书》不是专业研究者的作品，并以此为理由怀疑作品的价值。我以为，所谓专业研究者主要是指那些靠研究“文化大革命”为生的人。“专门研究”当然会很专业化，不过，正由于需要以研究为生，所以“专门研究”者常会受制于诸多世俗的实用主义考虑，并因而显得浮躁，流于浅薄，甚至远离真理——世俗的实用主义乃是真理的杀手。

刘国凯不靠研究“文化大革命”为生；他是在用心灵来研究，用生命和血来写作。正由于此，他的研究才会超越一切世俗的实用主义考虑，而直指属于自由人性的真实。

真实是史学之魂，属于自由人性的真实则是史学之魂的核心——这正是刘国凯先生著作价值之所在。我相信，刘国凯先生的努力，将为“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开拓出一个全新的更接近真理的意境。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日

第一章、六八年盛夏——大镇压狂潮

小引

文化大革命发动至今已三十年了。它对当今的青年一代似乎已像太平天国的故事那样遥远。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曾以自己的青春投入其中的人来说，它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岁月的尘埃并不能模糊我们的记忆，相反会促使我们产生把这些尘埃抹去的冲动。

文化大革是何时结束的呢？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于二十年前，即 1976 年结束的。然而对此，我总心存疑义。在我记忆中，1968 年盛夏，广州发生了一场大镇压。所有群众组织都冰消瓦解在这场镇压之中，从此再也没有群众运动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在我心目中就此结束了。结束在 1968 年的夏季大镇压中。我对这场大镇压留有极深的记忆，它就像用刀刻在我的脑际和心扉。现在我向大家讲述广州文革的故事，也就从那时开始吧。

第一节、七.二一表忠大游行——红旗派的绝响?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广州红旗派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集会游行。参加者有学生、工人、机关职员。人数达十多万。集会地点在广州文化公园及园外的街道。游行队伍沿人民路北上，再转入中山路东行至东校场，全程约七、八公里。当队伍前列已在东校场解散时，园内尚有队伍未轮到出发。

一年多来，广州红旗派举行过许多次集会游行。有的旨在反抗军区镇压群众，有的是抗议保守派——总派的挑衅屠杀，有的是庆祝某次斗争如“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胜利，而这一次集会游行的名义与以往各次都无雷同。它叫作“表忠大游行”。即使是从表现形式上也看出区别。从前的游行示威，或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或欢欣雀跃、锣鼓喧天。而这次集会游行人们情绪饱满而深沉，激昂而凝重。从前游行的队列往往较自由随意，不同单位的队伍会互相交错参差，但这一次，各游行单位的队伍排得相当整齐，一个一个方阵，保持着明显的间隔，各以自己组织的红旗为先导，迈着整齐的步伐，在领队的带领下整齐地呼喊着口号向前进发。队伍中弥漫着一种大难来临共赴危难的悲壮气氛。

数公里的街道两旁都有市民围观，有的地方围观人群甚重，但围观者的反应也与以往不同。没有喝彩，亦没有咒骂。人们大都只是以各种目光默默地注视着那行进的队列。“表忠大游行”向谁表忠？当然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表忠。为什么要举行这样一个游行？是因为社会上有股强大的势力强加于红旗派反“三红”，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重大罪名并予以镇压屠杀。

屠杀其实在七月上旬已经展开。七月十三日，广州警司某部前往市二十九中执行任务——拆除学生用桌椅构筑的工事。十几名徒手的学生不让士兵进入。稍经争执，一名班长从肩上卸下冲锋枪，突然在近距离向学生们扫射。刹时间学生们全倒在血泊之中，五人当场死亡，余者皆受重伤。开枪之后，这队军人亦不作善后，扬长而去。

惨案的发生使红旗派极为震惊。其领导机关广州"红司"、"红联"的头头都急速派员了解惨案的具体情况，写成报告，一方面向省市革委会反映，要求查清事实真相惩办凶手，另一方面以大字报、传单告诉全市民众，提出反迫害、反镇压、反屠杀、反复辟的口号，以求得到广大民众的声援。省市革委会高官接此报告后不理不睬，漠然置之。一般市民看到传单后大多也只是父`（？）私语，或默默无言。虽有自发的义愤和声援但并不强烈。

形势今非昔比了。去年三月份军方也对造反派进行过镇压，但那时还没动真枪真炮。一年多的恶斗下来，矛盾和仇恨不断加深激化。军方和"新生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要实施革命的权威，处处追使红旗派就范。红旗派的头头们不甘民众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果实轻易丧失而尽力抗拒，从而又招至军方和革委会更大的压力。敬酒不吃吃罚酒，一场大镇压在所难免。更何况入夏以来，广东北部某些县份和邻省广西的全境已开始对造反派民众大举围攻屠杀。被杀戮后投入西江的广西造反派的尸体随江水漂流而下，沉浮隐现于广州市珠江波涛之中。因此，现在广州警司开枪毙伤二十九中学生实在是小事一桩，不足为奇。果然，不但呈上去的报告毫无下文，开枪屠杀事件还接二连三地发生。

七月十五号晨，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北京路丝绸商店。该旗派据点由一支素质相当高的中学造反派组织（广州二十一中东方红公社）驻守。该部已先期得到消息及时把枪支弹药全数转移。军队来搜查时一无所获。军官令他们立即撤出据点。他们以此处并非武装据点，而且正在办学习班为由拒绝撤出，空气骤然紧张。军队动粗，二十六名学生视死如归，面对枪口手挽手站成一排，不为所动。该时围观民众如堵。学生们大声呼吁："这里没有一枪一弹，只有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二十六颗红心。"并高唱革命歌曲。僵持之中，围观群众对军队发出嘘声。军官恼羞成怒，命令士兵开枪。由于近在咫尺且学生全部徒手，只持"红宝书"，士兵实在下不了手。至晚间，"红司"总部通知他们情况险恶，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立即撤离。他们才整队离去。在对峙的一天里曾有民众给他们送水送面包。其中一年青人还因此与军队发生争吵。军队查明他系附近眼镜店李占记的学徒。次日晨一班军人敲李占记的门说要搜查。该学徒开门让他们进入。由于尚未开店营业，店中只学徒一人。不久，街上群众听到店内响了几下枪声。旋即学徒的尸体被拖出 ，军人向街上群众称，此反革命分子抗拒搜查，还袭击解放军，故已对其严惩。

七月十六日，一连杀气腾腾的军队包围长堤轻工大楼的"工革联"总部。"工革联"为广州红旗派工人的联合体，下属包括"工联"、"红旗工人"、"广州工人"、"工人红司"、"八一战斗兵团"等多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革联"是六七年九月由周恩来提议成立的，其大旗由广州军区馈赠，故当时许多人认为警司未必敢对"工革联"总部下手。但他们估计失误了。在没有碰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军队突然盲目开枪，乱射百余发，四名无辜群众被流弹击毙。当时有大批群众在附近马路两旁围观。有人气愤地指责军队压制曾得到中央

肯定的革命群众组织。一名军人听了大怒骂道："他妈的，谁再替反革命讲话老子毙了他。"一位血性青年挺起胸堂说："我们是革命群众，不是反革命，你敢开枪！""砰！"枪声响了，青年胸前的血喷射出来，当场身亡。其它围观群众吓得一哄而散。一名印度尼西亚华侨在五楼阳台被流弹打死。事后，有名军官去对其妻说：你的丈夫是被反革命暴徒开枪打死的。我们解放军去清除反革命分子的据点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安全。

七月十七日军队包围中山六路"工联联络部"，也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开枪滥射，四名路人被流弹击毙，另有一人说了句："解放军不应开枪。"即被追杀。此人逃至附近一间云吞面店里，躲在桌子下，仍被拖出枪杀。

在这几天里，市区内大多数红旗派组织的总部都被军队踏平。而所有总派的据点则由他们自己慢条斯理地拆除。红旗派的头头们终于明白，大镇压来临了。诉说、反映、请求都不再有丝毫的作用。彻底摧毁红旗派的组织，扼杀红旗派的社会能量是军方的既定方针。但是，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我们一再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停止了揪"广谭"，我们不计旧仇与保守派实行了联合，我们对保守派新的挑衅屠杀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为什么还要压制、镇压我们？红旗派悲愤异常。难道我们就此束手待缚？不，我们要抗争，要让镇压者看到我们的意志和反抗力量。于是红旗派的头头们密锣紧鼓地筹备了这次表忠大游行。在那个时代，他们也许是不了解，而更可能的是不愿去捅破那一纸窗扉，去接受这一可悲的事实，即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组织的存在。

表忠大会筹备之间，有消息传来，广州警司正在市区某些制高点布置机枪火力。集会游行队伍只要稍有异动，就开枪扫射，彻底镇压。一时间有的头头犹豫了。在当时军方已把开枪杀人不当一回事的情况下，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可能发生，然而经过讨论后，头头们还是一致决定集会游行依期举行。一方面要求全体集会参加者绝对徒手，并不设纠察队，坚持和平集会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作出为此流血牺牲的悲壮心理准备。

红旗派表忠游行的队伍整齐地、情绪高昂地、沉着地行进在广州南北、东西两条最主要的大道上。呼喊着"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反迫害、反镇压、反复辟"的口号。与市区游行队伍进行的同时，"珠江红司"的船队也在珠江上游行。一时间汽笛长鸣，与陆上队伍遥相呼应，蔚为壮观。广铁总司由于中央早有明令，铁路文革与地方脱钩，故他们没参加文化公园的集会，但也同时在铁路局内举行集会，以表达对市区红旗派战友革命行动的支持。当时广州市区有???万人口，除小孩和老人外，有社会活动力者约以百万计。而红旗派的集会游行队伍竟达十多万，而且是在红旗派组织已备受摧残和极为严峻险恶的形势下，可见红旗派在广州市的社会潜力之大。红旗派的头头们内心忧中也有喜，看看如此众多的人群，听听那雷鸣般的口号，要彻底把红旗派镇压下去，真的就那么轻而易举吗？

游行圆满地完成了，没有意外，没有暴力。红旗派向当局显示了他们的力量，表达了他们反抗政治迫害的意念，而且是以和平理性的手段表示出来，这确实体现了广州红旗派的成

熟和水平，体现了在那个个人迷信深重的年代，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失时机地使用民主权利，反抗政治迫害的高超斗争艺术和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确实可作为后世民主斗争的范例。

中共当局也并非不了解这一点，在获悉集会游行的实况后，军区副政委孔石泉就拍桌大骂："什么表忠游行？根本就是向红色政权示威，向省市革委会施加压力。哼，妄想!"

孔石泉的咆哮不无道理。红旗派的表忠大游行名曰表忠，实则向广州军区显示民众的反政治迫害的意志和力量。六八年七月与六六年七月或六七年七月相比，红旗派成员中的盲目忠毛分子即使还有，也已减少了很多。在当时的形势下，红旗派已不可能举行矛头直指广州军方的游行示威，否则肯定会立即招致枪林弹雨，而打着向毛主席表忠的旗号来表达对军方镇压的愤慨和反抗，乃是一个非常策略的斗争方式。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在下文马上会看到，广州军方仍然向他们抡起了屠刀。

确实，红旗派在以往近两年的斗争中积累了很大的能量。即使现今其势力已远不能与其全盛时期相比，但仍有着不可低估的社会潜能，用强力把他们镇压下去，当然无谓不可，但若要在政治上、心理上将其摧毁却甚费周章。幸亏中共最高层很快找到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利器给予广州军方，使之得以迅速地把红旗派置于无以翻身的死地。红旗派的"七．二一"表忠大游行也就成了它被彻底镇压前的绝响。

第二节、红旗派全线崩溃——"反共救国团"超级假案

鉴于六八年春末夏初广东局势愈来愈不利于红旗派，其头头们商议向外省寻求支持。同时他们也获悉北方许多省市的造反派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于是"红司"头头武传斌率一班人北上进京，打算一方面向中央呈递有关材料，一方面串联外省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召开一个会议，旨在今后相互密切联系，交流情况，声援支持。

七月四日，武传斌一行到达北京，即展开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会议迟至七月十七日才在北京航空工程学院召开。与会的有全国著名的学生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和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黑龙江"炮轰派"，辽宁"八．三一"等二十几个组织的代表。武传斌为会议主持人。

会议无非是交换各省情况，建议设立全国造反派的通讯网，还决定把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写一个报告呈送中央。但实际上这个报告并没有写，会议也没有就任何问题作实质性的有效果的决定。然而武传斌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个会议给自己和给广州红旗派乃至外省的一些造反派组织招至极大的灾难。

中共中央最忌惮民众成立全国性的组织。毛为了发动群众为其政治大清洗火中取栗，他允许各省市成立群众组织，其矛头可指向省、市、中央局一级的高官，但决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为此在运动初期，六六年底就不惜把所有的全国性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即使是主要以经济诉求为目的的组织也不例外，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这里有一个很关键而又?显露的要点是，你成立全国性组织矛头对准谁？若说对准刘、邓等人，那北京市的造反派就足够用了。于是这就有了个潜在的可能，全国性的造反派组织将会与毛的中央产生摩擦。现时毛中央及其工具中央文革是以指导者的身份与各省市造反派打交道，那难道今后中央文革将平起平坐地与全国性造反派组织打交道吗？那成何体统？即使全国性的造反派组织一时还没膨胀到这样的地步，那密切联系起来的全国各省市的造反派组织也更难驾驭了。故此毛中央绝不允许全国性群众组织的出现，稍一露端倪便要将它扼杀于摇篮之中。更何况当时已处于毛中央打算以强制手段结束动荡局面的敏感时期，武传斌等人的作法无异于给了广州红旗派，乃至全国造反派一纸催命符。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等在北京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这次会议气氛异常，各巨头一边倒地对广西“四．二二”?劈头盖脑地大骂，犹以康生最为突出。责骂之中，周恩来与康生都说两广地区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广西有分团。有的红旗派头头做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他们都还点了武传斌的名，斥责他召开“黑会” ，并厉声问道“要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吗？”

令人颇为不解的是这次会议江青竟没有参加。难道她知晓这次接见系宣判造反派，尤其是两广造反派的死刑而不忍心出面？因为在表面上造反派是为中央文革所支使的。兔死狗烹的局面她毕竟未能坦然面对。如果真是这样，那江青也算比不上周、康等人的心肠铁硬。

七月二十五日接见会的消息传来，广州军区，广州总派的头头骨干们如获至宝、欢欣若狂。广州军区三军联委报大量印刷传

单四处张贴散发仍嫌不够，甚至用飞机撒下。

广州市民们接到此传单后极为惊愕震撼。须知在那个年代，两派相争互相骂为“反动”“反革命”，乃至军区把某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都不足为奇，也并不必死无疑，唯独是以台湾国民党为背景的“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是杀而无赦的。现“反共救国团”的总团设在广州，有的旗派头头做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此话若出于总派，或广州军区都未必可信，但现在是出于周恩来和康生之口，能不相信吗？于是乎几天之间，广州旗派的军心全线崩溃，政治上，精神上彻底瓦解。仅一个星期前，红旗派还能组织那等规模宏大，气势雄壮的集会游行，而现在则迅速支离破碎，兵无斗志，只等任人宰割了。

红旗派的许多骨干头头并不信服周恩来康生的指控。因为这指控太空泛，没有提出确切

的证据。其中思想敏锐者还认为，在如此之大的群众运动中，旗派的成员参加了地下的反共组织即使有，也很个别，根本不能代表旗派的主流，丝毫左右不了红旗派的具体行动。然而虽则如此，他们亦无法挽救全线崩溃的局面，无以稳定一般红旗派成员的军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厦倾覆而无力回天。

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经此六八年大镇压后又继有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七?年的“一打三反”，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广东始终未能查出大规模的“反共救国团案”，也没有证实哪一个旗派的头头做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因此，出自周恩来、康生口里的那些话，完全是捏造和诬陷，所谓“反共救国团”完全是硬扣在红旗派身上的一个超级假案。而当局就是靠了这个超级假案才得以迅速地把顽强的两广造反派群众组织彻底打压下去，结束文革群众运动的局面。

第三节、诬陷、搜捕、屠杀

从六六年起，每个盛夏都是跟血腥恐怖联系在一起。六六年有血腥的红八月，贵族红卫兵们任意殴打、虐杀“黑五类”。六七年七、八月，广州总派对红旗派实施突然袭击，红旗派死伤惨重。后红旗派愤起反击，总派也付出代价。六八年的盛夏，经过近两年的反复缠斗，曾经取得虚幻胜象的红旗派终于又沦为刀俎上的鱼肉，军方和前总派骨干分子们向他们抡起了棍棒和屠刀。

在踏平了红旗派市区各据点，并以“反共救国团”超级假案为利器彻底瓦解了红旗派的阵线后，就是具体收拾红旗派的头头骨干人物和铲平城郊红旗派的最后几个据点，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山大学。

约七月底八月初，广州市街头出现了许多游行队伍。准确地说是游街队伍。大批的“工纠”、“人纠”押着一群群戴着高帽子的人游街。高帽子上写着“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伪军官”等等。他们低头弯腰，步履踉跄地走着，不时挨几下“工纠”“人纠”的棍棒。有的游街者还被绳索一个个地牵连起来，仿佛一群牲口似的地被赶着行进。起初这些队伍都是由街道组织的。红旗派虽然在社会上一度拥有了那等强大的声势，但街道始终是他们最薄弱的环节。中共的户籍保甲制——居委会，居民小组成功地保存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细胞。在大镇压中，这些细胞最先恢复功能，把第一批经典的“阶级敌人”押上了祭坛。这也象广东某些县份里和广西一样在镇压屠杀造反派之前先拿传统的“阶级敌人”开刀。

两年前（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全社会的虐杀狂也是从街道开始的，被虐杀者也是经典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历史真是会开玩笑，社会动荡绕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起点。高等数学里有格林公式，绕一圈的积分为零。用于物理学上就是用力运行一周，做功为零。造反派的行动本是要冲破旧有的社会秩序，但没料到这场政治运动乃有一个超级的力量在控制，造反派的两年苦斗到头来只是画了个做功为零的历史怪圈。而且这怪圈并化为绞索，下

一步就要套在他们的颈项上，勒绝他们的气息。当然社会并不等于数学与物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他们也并非做功为零，但这是后话了。

游街的队伍迅速地从街道发展到工厂、机关。游街者已从经典的“阶级敌人”变成新生的阶级敌人。其名称具体为“坏头头”、“阶级异己分子”、“打砸抢分子”、“大黑手”之类。他们的高帽做得比经典阶级敌人更沉重得多。他们往往双手甚至全身被墨淋黑。他们有的在批斗会上已被打得半死，根本不能站立，便被押上汽车由几个人在旁边硬撑着游街示众。毫无疑问这些新生的“阶级敌人”都是前红旗派的头头骨干和某些倾向旗派的中共干部。而批斗虐杀他们的人则是前总派的头头骨干，当然他们此时的身份已是新生红色政权的工人纠察队。两年前的血腥狂潮中，其肆虐者是十几岁的血统论红卫兵，而此时则是政治质量好的成年人。

原“红旗工人”的头头，省革委会付主任刘继发被戴上二十几斤重的铁帽子，反复批斗。他由于名气大，内部有令，不能在批斗中打死。而其他散布在各单位里的中、小头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打断肋骨，腿骨的比比皆是，被当场打死者也屡见不鲜。只是此时已没有社会监督机制进行统计，无法取得具体的数字。

在反复的批斗游街之后，就关进牛栏——各单位私设的牢房，进行所谓的审查，实则是继续以各种方式进行肉体和精神虐待。例如，珠影东方红的头头孙效林在遭受严酷的轮番批斗后自杀身亡，但他的战友们后来一直否认自杀一说，认为是他杀。

原保守派的头头骨干们对这些新生“阶级敌人”的仇恨要比对经典的“阶级敌人”深千百倍。当然这也是很可理解的。经典的“阶级敌人”其实对他们毫无冒犯，而这些新生的“阶级敌人”在两年来的缠斗中屡次令他们陷入困境，颇失颜面。他们自恃是共产党政权的宠儿，决不能忍受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妄自尊大，扰乱纲纪。一肚皮气忍了两年，现在才得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发泄出来，他们怎不能狂暴异常？

广州保守派的头头骨干们与造反派的头头骨干们之间的矛盾带有较明显的阶级矛盾色彩，因此前者对后者的镇压也就有阶级镇压的成分。或许，从表面上来看，他们都是机关职员或工厂工人，但一旦向社会深层追究会发现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关于这些将在本文的其他章节中详细探讨。镇压的残酷性由此导出，而个人和群体间的复仇，则居于次要的地位。

在社会各单位造反派头头骨干被彻底清算同时，“新生红色政权”于七月三十一日派遣一支庞大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执行荡平红旗派最大据点中山大学的任务。广州中学生最大的造反派组织——红卫兵广州兵团的一名头头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一支军人、工人、农民组成的工农宣传队，进驻广州地区学生运动的中心——中山大学。

这天上午，号称三万人的工农宣传队，包围中大，封锁道路，几部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在全副武装的“工纠”护卫下，缓缓地从正门开进中大。这支万人大军，本可肆无忌惮地实现他们“踏平中大”的夙愿，但在此机缘，他们却行动迟延，一步三探，仿佛他们悉获旗派在校园里布满地雷的情报。

这几天，想逃难的人已经走了，留下的人则抱着“看你们敢把我怎么样”的想法，听天由命。这些已经消极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要反抗这三万人的进攻。

大约在中午，宣传队开始深入校园腹地。他们沿途扫荡红旗大楼，造反大楼，没有遇到任何波折，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壮，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抵达教工俱乐部，遇到“红三团”总部的抵抗。总部人员不让他们入屋搜查。局势马上因此紧张起来，宣传队破门而入，要狠狠教训这些胆大包天的家伙，结果总部里的人夺路逃生，有两个被抓住，押到省柴油机厂囚禁。这两个人在被抓时，被乱棍打昏，流血不止。当晚我派人到现场侦察，发现总部地上有滩可怕的淤血，人们还以为他们死了。事实上他们没有死，可是他们经历了这场拷打后，得了终身疾患。这种遭遇，在旗派是很普遍的。

这天下午，宣传队开始搜查学生宿舍。这里是旗派的最后避难所。陈家吉等旗派头头都住在这一带。第一幢失陷，他们便转移到第二幢。他们是属于“警司”通辑的人物，奇怪的是他们不去逃难，他们准备这样挨下去，挨到落网为止。陈为“红三团”的我等人出了一条“妙计”。他建议带几天干粮，藏到天花板里面去。我没有理会陈的胡说，决定挨到晚上，借夜幕掩护突围。

黄昏时分，我集合“红三团”总部的残兵，绕道潜回总部。万幸的是，白天宣传队在忙中，竟没有全面抄查，这使总部的资料尚完整无缺。大家将资料包扎起来，准备带走。

晚上十一点，探路的人回来报告，说中大码头尚未封锁，“珠江红司”的“红卫二号”船仍停在江面，可先撤到船上，天亮后再设法脱离险境。这个办法被采用了，我派两个水性好的游近大船，与对方取得联系。“红卫二号”的水手放下舢板，将十多个逃亡者接上大船。第二天中午，他们联系了一艘快艇，将逃亡者送出广东。

以军方、十七年旧官僚、保守派头头骨干们三位一体的“新生红色政权”并不满足于他们用暴力，用超级假案从组织上、政治上荡平了红旗派，他们感到还应在声名上、形象上把它搞臭。因为在此之前，广州两派的斗争中，红旗派占尽舆论优势，市民中的主流意识是“主

义兵"、"地总"不讲道理，动辄使用暴力，而红旗派则相对文明得多。为了改变这一主流意识，"新生红色政权"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举办所谓"群众专政展览会"。展览会址设在三个旗派的据点：登峰南路六十号，沙河中南局公路机械工程处和市郊三元里。这些展览会无非都是展出一些枪支弹药、粮食用品。官方说旗派中的坏人就是用这些武器来杀伤革命群众的。那些粮食用品都是抢来的。这些其实都不足以引起轰动，因为前不久两派都拥有枪支弹药。旗派人员据守在各总部，自己煮饭开伙，粮食用品当然应有所贮存，也未见得是抢来的。而能够刺激人们神经的则是官方在上述几处摆了许多刑具，如老虎凳之类，说旗派在这里关押拷打革命群众，类似于从前国民党在重庆搞的残杀共产党人的白公馆渣滓洞。登峰南路六十号还有一个地下室改制成的水牢，把革命群众关在黑暗的水牢里。旗派并在那里杀人吃人。证据是墙上写了一句话："我要吃肥佬肉。"还有一句"阅尽人间春色，还是土匪好。"就这样，旗派被描绘成不折不扣的暴徒、土匪、杀人犯。

各单位的民众被各单位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组织起来，一队一队地参观这几个展览会。仅一、两星期之间世界已为之大变。此时再也没有质询没有疑问，更没有辩解，没有反驳。人们都必须相信这一切，起码在表面上是如此。在官方的强势宣传下，戈培尔效应亦于某一程度上出现。文化水平有限、分析力缺乏的人们——这在当时的中国民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渐渐相信，旗派中的坏人真是此等残忍凶恶。还有些人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扭曲自己的灵魂，强使自己去相信。

就像旗派的头头做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是天方夜谭一样，这些展览会所罗列的旗派罪行也纯属子虚乌有。说旗派人员用老虎凳之类的刑具拷打和用水牢关押残害革命群众，还杀人吃人肉。有什么根据，人证何在？此后经过了那么长时间对旗派的反复清算，官方也从来没能再具体地对此加以说明，诸如吃人者是谁？谁被人吃掉？谁被下过水牢，谁被上刑拷打，伤残状况如何？等等。可见，这一切都是极端卑鄙无耻的诬陷。

直到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期，旗派的残余分子才得以有机会向社会，向当局道出这些冤情，但到头来也只是不了了之。而在当时，这些诬陷就构成了在形象上名声上把红旗派彻底抹黑的极有效手段。

在红旗派被彻底镇压下去的同时，共产党的原有秩序也迅速地重建起来。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机关都很快恢复功能。各级官僚除中南局，省市高干某些属于陶（铸）赵（紫阳）黑班子的和文化革命黑手（即同情、倾向红旗派）外，都得以官复原职。保守派中的一些头头、骨干也得以升官加爵，从普通工人或职员提拔担任某些基层领导职务。

然而也正因为这样，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广州红旗派为什么会遭到如此残酷的镇压？为什么总派不但不被镇压，反而倍受当局青睐宠爱？这两年多里红旗派究竟干了些什么，使之与军方、新生红色政权水火不相容？它们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及红旗派与总派之间的矛盾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矛盾？红旗派一而再，再而三地奋起反抗挣扎又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斗争？

尽管这一切都过去了许多年，但为了昭雪沉冤，褒扬正义，谴责罪恶，辨清是非曲直，揭示中共专制政权的一贯反人民本质，并给当今中国民主运动以借鉴，我们都应该对这些问号探索出准确的答案。

欲实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把检视的镜头往历史上溯，从六八年盛夏回溯到六六年春夏之交。从那时开始检视这两年多一系列不平凡的历史事实。答案将来源于对事实的尊重和深刻的思索。

第二章、六六年夏——灾难扑向民众

第一节、刘邓在京城的作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达，标志着毛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命名的政治大清洗运动正式展开。六月二号《人民日报》刊登北大聂元梓等人矛头指向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并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不管黑帮“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们“彻底摧毁”。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局面由此发端。

此时，刘邓一班中央大员是否洞悉毛的清洗意图呢？如果说这些在中共官海沉浮几十年的老奸巨滑们至此仍懵然不知，那纯属欺人之谈。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会上检讨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眨　思乙舱 f 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这些话无非是半泄愤，半为自己开脱。当然刘邓们或许未能很精确地猜测到毛的具体清洗目标和程度，但也会明白自己已处危境。彭真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被踹掉，而《五．一六通知》还要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联系起六五年九、十月间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刘邓怎么可能对险恶的局势毫无警惕呢？针对这种情况，刘邓施展了他们的手腕，事实证明他们的作为是令人齿冷的。

相对于刘邓，彭真要有气魄得多。世事真凑巧，他与彭德怀同姓。

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当其冲的是《海》的作者、北京副市长吴晗。彭真应该是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头，因在六六年九月毛就问过彭真:“吴 晗可不可以批判？”这句话问得怪异，到底是指吴晗的观点是否谬误，应不应该加以批判，还是指吴晗此人系中共高干，颇有根底，能不能加以批判呢？这让听者自己去琢磨吧，毛语中用词模糊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彭真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个答案也颇具功力。它的潜台词是，可以对吴晗口诛笔伐，但不应进行惩处，这无异于给毛碰了个软钉子。待到上海方面率先祭起批吴旗帜时，彭真竟敢于对抗，拒不转载姚文，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加编者按转载，力图把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并为吴设置保护网，强调吴的政治清白。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与彭真、康生等谈话，彭真对毛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与彭德怀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在这期间，邓拓曾对彭真说：“吴晗很紧张，他知道这次批判是有来头的。”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你是什么人，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直至六六年二月八日彭真等人到武汉向毛汇报《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时，毛两次问彭：“吴晗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都不作正面回答。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真是难能可贵。在中共高层的斗争中，一旦面临毛龙颜不悦，明哲保身是上上策。既然知道是毛要整吴，而自己充当吴的保护神，难道彭没有想到这样做会把祸水引到自己身上？为自保计，彭真完全有理由把吴抛出去，任由毛宰割，而自己求得平安。彭没有用上上策，他挺身保吴，究竟是出于义愤还是出于对当时党内局势的错误判断，过高地估计了刘邓的能量？这些，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了解到的是，彭尽力保护了吴，而在毛要踹掉彭时，却绝无人保护他。说来，吴晗含恨九泉亦应感到欣慰的是，他有那么一个为保护他而把自己也赔进去了的上司。

三月中旬毛决定把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一锅端。他大骂北京市 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从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发表，到此时已四个月，整吴一直整不下来。而三月中旬毛决定要整彭，仅一个月就把彭押上了祭坛。四月中、下旬，中共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彭与罗、陆、杨一起被整掉，并指控他们组成了反党小集团，撤消他们一切职务。

刘邓与彭截然不同，他们绝对奉行明哲保身之上上策，把彭真等抛出任毛宰割以求自身安康。但是这次他们的上上策没奏效，毛终究把大棒抡向了刘邓的天灵盖。

颇为值得探讨的是，刘周邓们能否团结一致，去保住彭，继而也保住自己？从中共党内形式上的票决民主程序来看，刘周邓们是有可能在政治局内取得多数而否决毛的某些动议。但这在操作上有一大困难，就是由谁提出与毛相反的意见并付于表决呢？谁也不敢率先提出，因为谁都不敢担保在自己提出动议后，其它人会随之跟进。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有事先的沟通，就像赫鲁晓夫搞掉贝利亚那样，但是在当时的中共高层，谁也不敢充当这样的角色。因为贝利亚根本不可与毛比拟，出于各种考虑，你所串连的对像都有可能把你的举动向毛汇报。

暗中组织反对党中央主席的小宗派是会死无葬身之地的。暗中串连既有危险，单独发难又毫无胜算，于是乎在中央最高层，即使很多人心中对毛的作法都不满甚至反对，但却都不敢正面表露出来。

然而从前中共高层是有人对毛单独发难的。那就是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彭的发难得到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的跟进。他们之间事先毫无联系，纯粹是发自内心。那时正是毛把经济搞砸了的年月，亦是一举请毛放弃权力的大好时机。没想到刘周邓等人不但没有帮彭一把，反而协助毛把彭打下去。从客观上来说他们是错失了良机，从主观上来看，他们是为了取宠于毛而从此卖掉了自己的人格和灵魂，也从此在毛的面前站不起来。

中共巨头们各怀鬼胎，根本不可能团结起来。如果说在五九年他们尚不敢支持率先站出来的彭德怀，那么在经过几年也有他们一份的造神运动后，毛的神威已耀眼眩目之时，他们何以敢出来与毛对决？

既要顺从毛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要保护自己，那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什么呢？是抛出一个又一个的同僚去挨宰割，是把毛撩起的火引向无辜民众身上烧。

为此，他们抛出了彭、罗、陆、杨，抛出了北京市委，抛出北大、清华党委，事情发展下去他们肯定会抛出更多的部下。直至把火往群众身上烧，那就是搞第二次反右运动。

准确地说，这个第二次“反右”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把敢于反工作组的师生打成“右派”，二是把大量无辜的知识分子、机关职员、工人群众打成“右派”。

随着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再加上该报又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社论，北京各大专院校和一些中等学校的师生激烈地行动起来。他们纷纷把矛头指向本校党委或党支部。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校园。内容无非是指控本校党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反毛泽东思想，党组织里有黑帮之类，甚至召开批判党领导的大会。针对这种情况，六月上旬，刘邓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各校，领导运动。这个决定显然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 尽管许多下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都会被刘邓们陆续抛出作牺牲品，但那必须是由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抛出，不能让学生去乱冲乱斗。二. 学生们的乱冲乱斗不但会打乱他们的计划，任其发展下去还会产生难以控制的局面，会危及另一些并不准备抛出去的党内要员。三. 出于中共政权的本能，他们绝对敌视、憎恶这类自发的不在他们领导之下的政治行动。

由北大校党委的倒台所产生的骨牌效应，使各校的党组织都抵挡不住来势汹汹的学生。而工作组就不同了，它是党中央派来的，它具有护身符和权威。工作组要把局势控制起来，要把学生们批前党委的行动纳入它所规划的形式和轨道，并以中央八条（内外有别，不上 街，

不游行等）作为约束学生具体行为的规范。

这样一来，矛盾就出现在激进学生和工作组之间了。前者指责后者“制造条条框框”，“束缚革命师生的手脚”，“压制革命”。校园里出现了攻击工作组的大字报，个别院校甚至发生了赶工作组的事件。对此，刘邓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他们遂立即责令工作组展开“反干扰”运动。

“反干扰”运动的具体作法就是把敢于反对、攻击工作组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刘少奇说：“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就定了调子。刘邓们还认定：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面目出现，兴风作浪，遂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反击。

“反干扰”运动于六月下旬展开，工作组的强势回击是激进学生无可抵挡的。工作组组织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激进学生压下去，声称“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甚至还组织了游行示威，召开斗争其为首分子的大会。这一切以清华大学最为典型。激进学生的为首分子蒯大富（以后成为闻名全国的人物）被斗争后甚至在校内关押起来。斗争口号竟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刘少奇对激进学生切齿痛狠。他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毕竟，占多数的学生是跟着工作组走的，因为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的。

就这样，在近一个月的“反干扰”运动中仅北京高校就有数千名师生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

关于后来毛否定了派工作组的作法，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嗣后撤出工作组，这些都不值得详述了，而有必要探讨一下的是，如何看待有那么多的激进学生攻击校党委和工作组？

激进学生的这些行为来源于一种政治变态心理，这种心理是中共政权一手造成的。文革前几年间，中共对学生们大量贯输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解放全人类”、“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等等。再加上“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不做温室里的花朵”那一类文学语言的熏陶，使青年学生在思想上产生一种将有大任降于身，将可为革命事业大显身手的潜意识。然而从这种翱翔的理想回到现实，他们发现自己的一切言行其实都处于深重的束缚之中。现实的生活是那么的平凡枯燥。尽管党也号召他们做螺丝钉，但这个号召则难在他们心中引起共鸣。干一番大事业才是他们的响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心中存在着苦闷、不满、期待和躁动。这些心态对现存社会秩序具有反抗势能，而且这势能随着时间的延伸在不断地积累中。它在左右窥伺，寻找突破口和爆破点。

终于，这一天到来了。六月初《人民日报》的一系列动作点燃了导火索，火药桶爆炸了。中共政权尝到了由他们自己酿造的苦酒。

尽管成年人对青年学生的行动持保留态度，因为前者对九年前发生的“右派学生”攻击党而遭到严厉惩罚的事情记忆犹新，但此时的青年们并不以九年前学长们的遭遇为戒。事实上，学长和学弟们的言行也确有不同。前者是明明白白地攻击党的不民主，而后者则是指控党委还不够革命，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然而这个区别在刘邓们眼中并没有原则的不同，都必须予以打击，顶多把前者视为正规“右派”，把后者名为“假左派、真右派”罢了。激进学生们在高呼“革命”口号的同时却遭到党的革命铁拳的重击，他们也在品尝自制的苦酒。

究其实质，激进学生的六月行动，就其主流而言（亦有学生从右的方面攻击党）并不具备积极意义。那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表演欲的大爆发。其用以攻击校党委和工作组的理论是中共政治理论中最荒诞的部分，被其攻击的校党委其实是中共政权中最少体现专制实质的一环。六月十八日北大激进学生自行设置“斗鬼台”，对前校党委书记陆平等六十多名“黑帮”进行批斗。批斗中使用暴力，揪发撕衣，拳打脚踢，戴高帽，淋墨汁。首开文革暴力先河，可见这些激进学生当时的行为与民主理念追求和民主斗争方式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说刘邓们把激进学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是事出有由，甚至可以说是激进学生们咎由自取，那么刘邓们在全国铺开、指导各级党委在无辜群众中大抓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则完全是中共政权一贯性暴戾行径的又一次展现。

在一般的机关、工厂、事业单位里，并没有民众敢于攻击本单位的领导和党组织（除非是党组织的头头之间有隙，各自动员自己的人马去攻击对方），因此并不存在反击的必要。但为了搞文化大革命，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刘邓们还是决定把良民百姓赶上阶级斗争的祭坛。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掌握在党领导的手中，他们组织先进分子们去揭发批判本单位里由他们内定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内定的依据是所谓出身不好，有政历问题，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与本单位领导关系紧张之类。而揭发批判的内容则是他们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言行举止。在此过程中，捕风捉影，夸大事实，无限上纲等整人手法都广泛出现了。被揭发批判的人明白此次运动领导是要把自己拿去交任务，得知大难临头，可怜惶惶不可终日。其本人乃至家庭都沉陷在惊惧恐慌的气氛中。

关于文革初期刘邓干的这个恶行，多年来中共及其御用文人都讳莫如深，仿佛由于刘邓在文革中被毛肃整，并遭到虐待，便应将其恶行一笔勾消。中国大陆官方所有文献中都不将历史中的这个章节独立叙述，也不单独统计在此期遭到迫害至死亡和伤残的人数，致使现在我们每个文革过来人尽管都对本单位的第二次“反右”留有记忆，但对全局却缺乏了解。

在许多非中共官方人士的文革著作中，也往往对刘少奇的遭遇抱以甚多的同情，而对成千上万的第二次“反右”的牺牲者漠然视之，不置一词。这种对贵族和平民的双重标准至今

仍通行于世，想想也真令人寒心。

刘少奇值得责备的地方其实很多。四五年中共七大，他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将它写入党章、党纲。毛的个人迷信，个人权威首开局面，他有头功。故此也受到毛的宠信，地位逐步上升。论资历刘与周都是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共，但论业绩功劳，刘实在差周甚远，但至八大，他地位已在周之上。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刘对彭德怀大加斥责昧着良心，不顾事实，戕害忠良。再看他在文革初期的作为，更令人齿冷。即使是从语言上我们也可以悟出他与毛本质上的相同。毛动不动就骂资产阶级，把一切他视为劣质的东西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如指责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而刘在痛骂一个小小的蒯大富时也说：“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区区蒯大富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这就是中共国主席的水平。毛刘在思想上、语言上何其相似乃尔！

第二节、中共广东大员控制局势的措施

实事求是地说，五、六月间来自北京的消息使中共广东大员们茫无头绪。这次运动与以往各次确有不同，从前上头总有具体指示和计划安排。而此时往往要靠自己揣摸和理解，不过，虽然如此，他们仍有一个明确的信条，就是尽力控制局势。其具体措施无非是仿效刘邓的那一套，抛出一些下级同僚交差和把火往群众身上烧。

北京四、五月间，批判邓拓、廖沫沙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记》，广东大员便组织批判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秦牧及其散文集《艺海拾贝》，批判广东文联主席，作协广东分会主席欧阳山及其一系列作品。

北京五、六月间，中央主管政治宣传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倒台，中南局于六月中旬决定撤消中南局宣传部长、省委候补书记王匡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在中南局和省委多次开会批判他，指控他“一贯阳奉阴违、瞒上欺下，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在理论、教育、文艺、新闻、广播等各方面，顽固执行他的后台老板周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是广东省宣传文教战线上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头目。”同期北京抛出了陆平等人，改组了北大校党委。七月初，中共广东省委也揪出了中山医学院的所谓“柯麟黑帮”，撤销该校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柯麟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被抛出的还有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并宣称：“对这个黑帮的罪恶活动，广东省委早有察觉，并对他们进行了多次的批评斗争。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省委……自始至终放手发动革命的师生员工，对这个黑帮进行彻底的揭露和不断地斗争。”

以后陆续倒台的还有广东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田蔚，广州市宣传部长王澜西和市文化局局长华嘉等一些党内主管文化宣传的官员。

中共广东大员在此期间整群众的情况缺乏全面的统计资料。不过我们仍可从某些具体单位的情况推想全局。

《广州日报》系广州市委机关报。由于该报社党委受到批判，工作队遂于六月中旬进驻该报社。开头，工作队罢了报社几名领导的官，接管文革和业务大权，接着便将矛头指向一般报社工作人员，按档案材料把他们分成左、中、右三等。中、右两部分人只作内部掌握，左派则公开指定，并让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随着运动的发展，挨整群众愈来愈多。编辑部被划为斗争对像的有四十八人，占其总人数的一半。一般干部受大字报围攻者有七十几人，占其三分之一。这些人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新闻权威”、“反动文人”之类，其中许多人被戴高帽批斗。

《羊城晚报》社也有工作队进驻，大整报社工作人员。“假左派、真右派”和“三反分子”一类的帽子满天飞，其中黄伟经受迫害案可以说是一个整群众的典型事件。

黄曾于五十年代末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与苏联友人通信，信中谈及国内经济困难和中苏分歧。这些信遭到中共警方截获，并对他暗中进行调查监视。文革开始后，黄立即被工作组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最佳人选进行揭发批判，并关押在报社牛栏内。中共广东大员把黄视为一个大猎物，力图把他定为敌我矛盾，彻底整死以证明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业绩。“十六条”下达仍继续迫害黄，直到六六年十一月黄才在北京南下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干预下，获得从牛栏释放回家。

在省市各机关单位中，大量的一般机关干部被围攻批判。据后来一些造反派红卫兵的小报披露，各机关挨整的人数大多占三分之一以上，约十分之一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省直机关中被打成“右派”者达千多人，而各级当权派则少有被触动。这样，造成了一种无辜群众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工厂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里，绝大多数领导都是趁此第二次反右的大好时机，卯足全力去整平时不听话的群众。有时为了凑数，出身黑类，有政历问题、犯过错误的人，当然都是在劫难逃的。

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的学生不似北京的激进，故局面不太激烈 。但官方对其中敢有异动者一样给予严厉打击。这其中的典型事件是华南工学院的《北京来信》。六六年六月下旬，华工学生高翔等人贴出《北京来信》。信上说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外，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都可以怀疑、批判。这封信在中共广东大员和学生们中都引起极大震撼。省委立即决定此信是反动的大毒草，并由学院当局连夜组织大批大字报予以围攻，指控《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板”，同时布置人力对高翔等进行监视跟踪。省市公安机关也展开对他们的侦察，其侦察范围扩展为与此有关的学生，教师，一般职员达二百多人。

广州中等学校里的文革运动也很能说明中共大员们把火往无辜群众身上烧的恶劣行径。

刘少奇曾作指示："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文化大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老师要集中交待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六月十一日广州市委召开全市中学教师大会，要求教师们行动起来，同学生们一道，横扫教育界的一切牛鬼蛇神。这次会议预告中学老师的噩运将临。不久，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各校，矛头就是整教师，即刘少奇所说的"审查教师队伍。" 中学教师的遭遇比机关、工厂里的群众更惨，因为他们面对敢于肆意妄为，不考虑后果的中学生。中学教师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比率比机关和工厂更高，所受的待遇也更恶劣。学生在批判斗争他们时，往往进行体罚和人身侮辱，这使在学生面前一向师道尊严的他们犹难忍受，这也造成中学教师在文革初期的自杀率最高。

广州四十五中学的事件生动地展现了中共广州大员的统治权术。

六月初该校初三学生刘肖芳（女）串联同学组织"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五四'战斗小组"，并贴出大字报批评校领导阻止学生向老师提意见，从而更受到校领导压制和组织其它学生加以围攻。后 刘肖芳向市教育局投诉。广州市委获悉此事后，经过研究派工作组进驻该校，并宣布该校党支部书记蔡三坚为"反革命分子"，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还由共青团广州市委授予刘肖芳"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在报纸上报道她的事迹，号召全市青少年学生向她学习。

把刘肖芳与高翔加以对照可以悟出其中的奥秘。高翔是党员。刘肖芳是团员，按说高比刘有更多的政治保险系数。但由于高 的《北京来信》是号召怀疑除党中央外的一切党组织，即省市委都在可以怀疑批判之列，而刘只是反本校党支部，在受到压制时向市级党组织求援。因此，在中共省、市大员感受上，高、刘完全不同。他们立即作出压高捧刘的政策。压高用以保省、市委，捧刘亦可以此塑造抬高省、市委一贯正确，支持学生革命行动的光辉形象。只是可怜蔡三坚成了牺牲品。他作为一个中共基层官僚，熬到中学党支部书记的职位也不容易，按惯常法则他的做法也并无不妥，但没想到情势突变，老皇历不合用，他仅仅因禁止一个十几岁的初中女学生冲撞师道尊严，便被强力从书记的宝位上掳下来，并扔进"反革命"的深渊。想必在他看来世事真是荒诞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中共广东大员们为控制局势手段之狠毒狂乱由此亦可见一斑。

然而，尽管中共广东大员在控制局势上，竭尽全力，使出全身解数，但毛泽东神威在上，刘邓尚无力抗拒，他们又何能挽回局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蔡三坚的今天即是他们的明天。当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是会否极泰来，有光明的后天。

第三节、贵族红卫兵的“业绩”

刘邓与中共各地大员搞第二次反右给无辜民众带来的灾祸还没有过去，另一场更暴戾的灾难又扑向无辜民众。这就是贵族红卫兵搞的“红色恐怖运动”。

贵族红卫兵组织萌芽于六六年六月间北京的几间中学，其中清华附中为首开先河者。该校红卫兵于六月二十日、七月四日和七月二十七日抛出了“一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内容除了政治狂热的叫嚣外，丝毫没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开头，这些组织受到工作组的压制，并强令其解散，但很快，毛获悉这一情况，于八月一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对他们表示热烈支持。狂热的红卫兵运动由此轰然炸开。

一党专政的中共政权，绝对不允许有任何自发的政治组织产生，即使参加者是中共干部子弟，即使所打旗号是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也罢。工作组是按照常规惯例把红卫兵组织视为反革命活动。然而毛此时的思维已大异常态。他就是需要煽动起青少年更多的个人崇拜来为他的政治清洗效力，故此他不但容忍、还不惜以一个党主席之尊写信给十几岁的小孩力表赞赏。果然，他的心机没有白费。

八月十八日毛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把青少年对毛的狂热崇拜推向更新的高潮。本来，青少年们的这些狂热情绪若不危害正常社会，倒也无关紧要。就像八、九十年代让球迷、歌迷、追星族们自己去叫个够，跳个够好了。但是当年的贵族红卫兵狂潮一形成就立即扑向无辜民众。

红卫兵狂潮的第一波行动是“破四旧”。对此，林彪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因为他在八月十八日的大会上号召红卫兵起来“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当然，从当时气氛看来，没有林的这番讲话，红卫兵运动也会走上这一步，但林的讲话至少起了催化、加速、鼓励的作用。“破四旧”经过多年来所有文革研究者毫无异议的一致谴责，其内容早已为大众所熟知。它主要还是毁物没伤人，从改街名店名、院名到取缔“资产阶级”发式，服饰，击毁带有封建色彩的历史文物。这一切固然对社会生活带来极大困扰纷乱，对社会遗产造成极大损伤，但终究没危及人的生命。然而，只短短的一、两个星期左右，“破四旧”迅速地演变为残暴的虐杀人身的“红色恐怖运动”。

“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运动”主要是中学生所为。而“红色恐怖运动”则是中学生中贵族红卫兵的业绩。“血统论”以“鬼见愁”对联为前锋急速膨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七月二十九日出现于北航附中，几天之内风靡北京全城。以革干革军子弟组成的贵族红卫兵自视出身高贵，理应叱咤世界，他们不满足于对物的毁损。革命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应是人而不是物。故此随着“鬼见愁”对联的疯狂叫嚣，“破四旧”升级为“红色恐怖运动”。不久前与他们一起去“破四旧”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被他们扔掉，黑类出身的

同学则更是遭到他们的辱骂、殴打。

“红色恐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抄家、关押、游街、殴打。其对象是“黑五类”、“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抄家是查抄从前的“吸血鬼”所收藏的金银珠宝，“变天账”，妄图进行反革命暴乱用的枪支弹药。（文革前的不少文艺作品凭空描述有许多地富、资本家暗中藏有地契、账单和武器。）关押是在学校里设立的“牛栏”，把捉来的“牛鬼蛇神”监禁起来。

“血统论红卫兵”的暴行是极为令人发指的。它应该受到人间正义的永远谴责。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有什么理由要对与自己无仇无怨、毫无反抗力，匍匐在脚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这种万分野蛮的行径是古斯巴达人和希特勒党卫军都做不出的。据以后的统计数字，“红色恐怖运动”中北京有?，???人被打死，当有许多倍于此的人被打伤。这么多人，用枪击毙也颇须时辰，而用棍棒打死那将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血腥过程啊！这个“业绩 贵族 红卫兵做出了。

四人帮倒台后，有人把这一切的主要责任推在谢富治在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勿庸置疑，谢确有很大罪责。然而就算是谢暗示共警把街道黑五类的资料透露给红卫兵，但具体打死人还是 贵 族红卫兵的自主行为。

从法律角度着眼，打死人是行凶者的个人罪责。从政治和社会制度上考虑，这完全是中共专制政权孕育出来的罪孽。多年来，中共对在校学生大量贯输千万不要忘记 阶级斗争的教育，毫无根据地极度夸大从前的对立阶级成员对中共政权的仇恨和反抗，同时又极力渲染赞美中共革命的艰难与辉煌。这就养成了中共官僚子弟血统优越感和骄横心态。以父辈的光辉成就骄傲，又对“阶级敌人”有无端的刻骨仇恨，并以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身份自居，渴望自己也为革命事业立下功勋。国民党政权远在台湾海峡对岸，那么向谁来发泄对阶级敌人的仇恨？通过向谁实施革命手段来继父辈之后建立自己的革命功绩？只有向眼前能捕获到的“黑五类”了。他们把敢于活生生地将“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殴打至死看成是“阶级立场坚定”，“革命精神强烈”的具体表现。

中学生打人远比大学生残酷，这里面除了从人性恶的角度考虑，16-19 岁的青年身上较 20-25 岁的青年具有更多人性恶的因子这一次要因素外，（全世界的刑事案件统计资料表明 19 岁以下的青少年暴力犯罪尤为严酷，并具突发性）主要的还是当时大学生里高干子弟十分有限。中共官僚阶级除元老级外，大多数“土地革命”时期和 长征抗战期间参加的干部，其子女此时都还就读于高、初中或小学。

广州的“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运动”也于八月下旬展开。若以北京作参照物，广州“红色恐怖运动”的严酷性轻得多，但若以正常社会生态对照，贵 族 红卫兵的暴行也是惨绝人

寰的。他们在学校里殴打老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同学。在社会上到街道居民组里按派出所提供的数据，抄“黑五类”的家，并肆意殴打，再把他们押送原籍。打人最凶的学校也就是高干、军干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如六中、铁中、七中、八一中学，二十一中。二十一中地处市区北部边缘。学校操场后面便是山丘、乡村。该校 贵 族红卫兵从附近村庄里抓了地富分子回校关起来轮番殴打，并不给食物和饮水。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地主很快被打死，另一名中年富农熬了几天也终于带着遍体伤痕赴往黄泉之路。贵族红卫兵把打死人根本不当一回事。当被打死的地富的子女象幽灵一样一声不响满脸惊惶地来搬走尸体时，贵族红卫兵们还在附近骂骂咧咧：“他妈的！把这些黑五类都打死才好！”

除正牌“黑五类”外，中学教师、文艺界人士的境地也极惨。他们之中极高比率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剃阴阳头，挂牌，游街示众。有许多人白天被赶去做重活，晚上关押在“牛栏” 。贵族卫兵动辄殴打他们，罚跪煤渣，强迫学牛叫，不从者施以毒打。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罗家宝等都被剃阴阳头，关牛栏，罚扫大街。 广州在“红色恐怖运动”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死或打伤至残，当局不作统计，或 许是统计后不予公布。因此，难以掌握具体数字。但从笔者所知的几间中学里都打死了人，可见这类暴行也是相当普遍的。

中共大员们推行第二次反右，戕害大量无辜民众。其子女则大搞“红色恐怖运动”，更凶残地虐杀无辜民众。他们两代人对人民对文明共同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文革结束后，有许多文艺界人士谈及那段恐怖的岁月，心有余悸也愤恨万分。他们一致痛斥红卫兵、造反派的凶残暴行。这真令人困惑万分。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红卫兵有贵 族红卫兵和平民红卫兵之分？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一般的社会造反派在那时还没有出现？广州以非红五类子弟为主体的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在那时还被“血统论红卫兵”骂为“骑墙派”、“狗崽子”，甚至受到殴打，根本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他们也是“红色恐怖”的受害者。这些人士把石头扔在无辜者，甚至是与自己同是受害者的身上，难道不觉得心痛？深究一层，这里面另有隐情。因为当年推行第二次反右的中共大员们，几经起落，终于有了“光明的后天”，他们官复原职，权势有加，接着便是由他们来给当年的文艺界人士平反补偿，从复职到补薪，配给宽敞住房，安排良好的疗养条件等等。这当然使后者对前者感激有加。文艺界人士亦属干部编制，文艺某级可以参照行政某级享受特殊待 遇 ，并且他们两者在文革期间又都具有被贬的经历。凡此种种，恍然间，后者似以前者为自己的同类。于是乎，后者在回忆起昔日的惨痛经历时，便刻意不去指证真凶-前者的子弟，而把满腔怒火倾泻在无辜者身上。呜呼，中国文化人的风骨气节何在？

第三章 六六年秋冬——风云激荡的年月

第一节、批“资反线”——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初步形成

毛花了很大气力，做了许多动作，力表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其目的是希企以红卫兵为先锋在全国营造对他持久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从长远来看，这个气氛有利于他的绝对权威长存，从当时来看有利于进行清洗。因为一旦这种气氛形成，就会烘托出一股虚假的但又是极为强大的民意压力，这压力会使清洗对象精神趋向瓦解，也会使持有不同意见的非清洗对象噤若寒蝉。独裁者打民意牌在本世纪已是常事，毛之前的袁世凯、毛之后的邓小平，还有希特勒、金日成之流都精于此道。

当然，光有气氛还是不够的，气氛运载的民意还须体现为行动，即要形成这样一个现实，就是清洗刘邓及其体系并不仅是毛的意向，更主要的是人民的要求，是人民群众对刘少奇等人的“罪行”义愤填膺，用各种具体行动在表达他们要把刘从共和国主席的职位上拉下来的强烈愿望。

从实际运作上来看，要清洗刘体系，不借助民众的力量也是难以奏效的。有许多人认为，以六十年代中期毛的威望，清洗刘体系毫无困难，根本不需要搞那么大一场群众运动。这种分析太流于表面化。实际上，当时毛在社会上的神化地位与他在党内权势并不成正比。否则彭真就不会敢于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了。若简单地以党内高层斗争的方式来清洗刘邓，就势必涉及一个组织程序问题。在正常的政治生态下，它必须经过一个动议指控和票决的过程，即首先应有人出来指控刘犯了极严重的错眊瑧　枇Ｔ职，然后在党中央的某一级会议 上（政治局或中央全会）表决。具体操作是由某个人（譬如由康生或林彪、或陈伯达）出面指控刘。但鉴于刘的地位和实力，这个指控很难预期得到通过，即使许多人知道指控者的主使人是毛，也同样可以不跟指控者合作。如果由毛直接出面指控刘，那产生的震动将大很多，但毛会觉得这种方式太突兀，不利于自己的形象。而且说到底，刘在治理国务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纰漏，能够提出些什么有力的指控呢？而且即使硬要指控，刘亦可用一而再，再而三的检讨，自我批评和辩解来缓冲打击，争取同情和谅解，以屈求伸。在这种情形下，或许可以弄出一个决议对刘的权力有所限制、削夺，但彻底把他清洗掉就未必能实现了。然而自从在六五年一月的中央会议上，刘打断毛的讲话后，毛就决心要把刘去掉。要干就彻底干，毛决不想拖泥带水，半生不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毛才决心借助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完成他的高层清洗。于是他相中了红卫兵作先锋。

然而毛失算了。那些有恃无恐，最先敢起来闹，并自诩为毛的红色卫兵的青少年都是中共的高干子弟。他们以为他们的红司令毛是要带领他们向传统的“阶级敌人”开战，顶多加上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校领导。为此他们疯狂地发动了“红色恐怖运动”。然而很快，他们省悟到，这场运动可能是冲着他们父辈而来的。于是困惑与愤怒主宰了他们的每一条神经。他们仍然具有从“红八月”留下来的巨大能量，并利用这个能量去压制其它敢于向共产党干部发起攻击的同学。而“血统论”是他们手中一个犀利的武器。高干子弟中的大多数不为毛的政治清洗效力，又用“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来打击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使他们在政治上处于遭贬辱的地位，遑论有所作为了。毛利用青少年的狂热为其政治清洗冲锋陷阵的设想卡了壳。

另外，从社会整体上来看，虽然刘邓指示全国各地大搞的第二次“反右” 虽已煞车，但其政治结果业已造成，就是广大群众全都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不继续搞“反右”，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就真是谢天谢地了，谁还敢异想天开地去冒犯中共的各级领导？

面对这种局面，毛不得不另起炉灶，其具体做法是，抛弃那批最早对他山呼万岁的贵族红卫兵，重新在一般工农子弟和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生中寻找“革命闯将”。同时，不仅仅停止刘邓的第二次“反右”，还要把具体执行“反右”的各级领导推上受批判的地位，以求广大群众也敢于行动起来。

十月初，《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斗批改的关键。”而“十六条”的措施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见，毛已深刻意识到不先把整群众的作法（他命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否定，人民群众是难以起来为他的政治大清洗效力的。与发表《红旗》社论的同时，毛指示中央文革直接出面支持当时还处于少数派的北京红卫兵三司。

十月六日，“三司”召开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是文革进入批资反线阶段的主要标志。会议的这个横额有一个极重要的变更，就是革命师生一词代替了红卫兵。这决不是即兴之作，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内容它显示了持血统论的贵族红卫兵已经失宠，革命师生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开始在毛的青睐下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而且为了平民使造反派红卫兵能在政治上站得住脚，毛及他的中央文革允许在一定程度内批判“血统论”。

比誓师大会更具体的措施便是于十月五日中央军委发布紧急指 示，指示说：“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指明 黑材料要当众销毁。后考虑到此指示局限于军事院校和一般学校，工厂、机关、事业单位的领导仍可拒不执行，故于十一月十六日又发布“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强调关于平反和销毁整群众的档案材料的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

为配合以上一系列行动，毛于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指责刘邓“压制群众，反对革命，”“另搞了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会议还批评了各级领导干部未能放手发动群众的错误，力图排除来自他们对运动纵深发展的阻力。

批“资反线”的原子弹于十月上旬在北京引爆，其冲击波到达广州约是该月下旬，从那

时开始，广州的学生和工人、职员才开始有较激烈的行动。

广州大专院校里由于高干子弟人数很少，“血统论”和“红色恐怖”都搞得不太严重，学生间的斗争主要围绕着对校党委或工作组的态度和评价展开。平民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产生得较早，大多在八月中、下旬，如中山大学于八月三十一成立红旗公社，该组织在以后的广州文革中举足轻重。广州医学院于八月三十日，其它华工、华师等也在差不多时候发难。由于工作组撤离前夕已扶持亲工作组的多数派学生组建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备革委会，上述造反派的学生组织大多乃处于不同程度的受压地位。至十月中、下旬，他们在以北京南下的造反派红卫兵的鼓动下开始了新的抗争动作。

大学里批“资反线”，毫无疑问会首先把账算到工作组身上。除了用大字报加以抨击外，有的大字报还责成原工作组的领导回来接受批判。他们被指控执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的火力虽然集中在工作组身上，但烟硝气浪当然也会波及原工作组的班底——现文革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的人们。于是学生中的两派日见明朗化了。即使从名称上也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亲工作组的一派大多沿用红卫兵一称，而造反派组织则大多叫红旗公社，东方红公社，井岗山之类。出于大学生的政治敏感及青年人的好动天性，他们大多体认到“保”毫无意义，去叫去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才会使生活充满彩虹。故此，筹委会体系很快式微，造反派组织迅速壮大。至十一月间，“中大红旗”、“华工红旗”、“广医红旗”、“中山医东方红”，“中医学院 301 战斗队”等已成颇具规模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主导着学校里的局势。

广州中等学校里有一定数量的高干子弟，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的机关全都设在广州。它是中南、华南数省之中高干密度最大的城市。那些年龄大多在四十岁至五十几岁的高干们的子女大都就读于初、高中或小学，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广州中学里“血统论”和“红色恐怖运动”搞得比大学里凶得多。故此中学里的造反派组织要想成长 壮大也就遇到了更多的阻力，甚至是暴力压制。

广州有好几十间中学。只有初中部的中学，由于学生年纪小，运动缺乏声色。即使是完全中学，有些学校由于学生质素的原因（小市民子弟多，政治热情低，学习质量较差）气氛也显得平淡。只有在那些干部子弟多，知识分子子弟也多的学校，浪涛才会翻滚得激烈。

广州中学生的造反行动其实比大学生来得还要早。六六年六月五日，就有华师附中的高三学生写大字报攻击校党委，并由此带动全市中学进入一个高潮。他们都是高干子女，政治狂热并有恃无恐。这批小贵族的造反并不持久，他们大多（也包括前述的那个刘肖芳）在日后的变动中被工作组收笼，做了筹委会体系的台柱。

广州中学生中还有零星的被世人普遍忽视的真正造反行动。他们攻击的不是校党委的什

么“修正主义路线”而是把矛头指向真正的社会弊端，或敢于进行深层思索。如铁中有位姓王的学生写大字报抨击近几年来大学招生中过于偏重政治条件（家庭成分，本人是否团员）而轻视学习成绩。他认为这样会造成学习质量下降，造就不出先进的科技人才，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学生也不公正。他的大字报犹如捅了马蜂窝，全校一下炸开了。因为当时以小贵族为领袖的造反是指责校领导用分数卡干部工农子弟，忽视学生的政治质量，悉心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而王同学竟然唱起截然相反的论调，真使小贵族们大吃一惊之余怒不可遏。他们立即把王同学打为右派学生进行批斗。同学中其实有不少人赞同王的观点，但慑于小贵族的威势，都噤若寒蝉。王绝对孤立，精神上、身体上都遭到严重打击。所幸事情发生在六月，发生地是广州。否则他一定会象北京六中对“血统论”表示异议的王光华那样被活活打死。尽管他侥幸避过了大难，但“右派学生”的阴影一直跟随着他，以至该校造反派组织都对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如二十一中有位学生，也是姓王。他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于是被打为“反动学生”挨批斗，并与他有政历问题的父亲一起押送回乡。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这种造反绝对只是以卵击石，只有接过毛的口号，在毛容许的框架内动作才会有活动空间。当时毛的口号是批“资反线”，并允许在某一程度内否定“血统论”。广州中学生的造反派组织是在批“资反线”的旗号下，把“血统论”作为“资反线”的具体内容之一，加以抨击，经过了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才翻过身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子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血统论”的第一轮火力打击落在“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头上。他们的反应只能是俯首就刑。第二轮火力打击落在非红亦非黑类出身的学生头上，其中就有知识分子的子弟。他们曾作过某些抗争，但瞬息被压制。他们愤愤不平，但无法正面对抗。当中央文革倡导批“血统论”的消息传来，他们欢欣雀跃并很快付诸行动，致使他们与红五类学生，尤其是高干子弟的矛盾甚为尖锐。文革前，知识分子及其子弟的处境已险象毕露。大学招生要注重考生的政治质量。知识分子已比红五类低一头，其中父母有若干政历问题者，更是离“黑五类”只有一步之遥。为考上大学，搏个出路前程，他们勤奋学习，努力表现，争取入团。但有时也免不了被指责为“白专道路”、“个人奋斗”、“伪装积极”。愤懑与彷惶积郁于他们胸间。

文革前的社会政治生态使知识分子子弟与红五类，尤其是与高干子弟之间已存在若隐若现的裂痕。而“红色恐怖运动”的戕害和批“血统论”的争斗更把这种裂痕推向明朗化、尖锐化。在持续的斗争中，知识分子子弟周围集聚起愈来愈多的其它非红五类子弟，如小商贩、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中农等等。并由于中央文革的倾向性表态使筹委会一系加速式微。一些工农子弟离开了红五类红卫兵，剩下的坚定者亦难以维持昔日如虹的气势。

然而，中学毕竟不同于大学，尤其在几间高干子弟较集中的学校里，高干子弟和部分工农子弟始终把“血统论红卫兵”的大旗坚持举下来。他们的队伍没有溃散，人数虽较全盛时期少些，但始终保持一定的力量，而且一直继承着“红色恐怖运动”时期的暴力传统，并在此后广州的一系列文革暴力事件中担负主要角色。他们组织的名称就是恶名远扬、在广州家喻户晓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

六六年八月间，广州一些中学里已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九月间，他们酝酿成立全

市性的联合组织。这一行动得到广州军区的大力支持。除了在政治上大肆吹捧他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优秀的革命后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云云外，还对他们作了实质性的支持，供给他们自行车、摩托车、军服及大量款项。“主义兵”临时总部成立时，中南局、省、市委的头面人物及广州军区首领詹才芳、陈德等都出席大会，并戴上“主义兵”的袖章，力表对他们的支持。并且，很多高、军干的子女操纵了“主义兵”总部的实权。如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之子黄春明；副司令员杨梅生，詹才芳之子杨邱元、詹和平；广州市长曾生之女曾克南；中南局后补书记王德之女王继欧等等。以高、军干子弟为核心，维系着一批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于是乎，在大学里的保守派已呈瓦解的情势下，中学里的保守派——“主义兵”仍然在纵横驰骋，从而与中学造反派频频发生冲突，结下难解的仇结。

广州大、中学里的造反派组织并不把批“资反线”限制于批工作组和“血统论”，他们还着手“解放”被打入“牛栏”的老师，摘除强加在他们身上种种罪名，拆除筹委会时期设立的牛栏。并且有些能量较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还把触角伸到社会上的一些地方和单位，推动那里的批“资反线”和平反工作。如前述的《羊城晚报》黄伟经，直到六六年十月还被关押。中南局书记吴芝圃、金明仍然坚持对黄的处理没错，认定即使黄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也起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可平反。后清华“井冈山”、哈军工“红反团”、“中大红旗”等组织获悉后，进驻《羊城晚报》，展开调查，得出结论，黄既历史清白，也不算“里通外国”，其遭遇属于政治迫害，应予平反。经过学生造反派的强力运作，黄伟经得以于十一月底获平反释放。

学生造反派在批“资反线”的高潮中，使用了一个非常措施——抢“黑材料”。这“黑材料”是指工作组和筹委会在整群众（学生及老师）时，收集编写的揭发、批判及被整者自己的交待等一类书面资料。本来毛的中央已明令把这些东西都当众销毁，但许多单位的领导或人事保卫干部却阳奉阴违，或大打折扣，转移或复制这些材料，以备日后再用之需。当某个单位主事者的行迹败露后，立即遭到造反派的怒斥和攻击，并引发了抢材料的行动。还进而发展为即使有关人员把材料都交出了，造反派也不相信。在这个行动上，学生造反派远比工人、职员造反派勇敢。他们冲进人事部门、机要室翻箱倒柜，甚至打烂保险箱，搜查窝藏的黑材料。黄伟经的案件得以解决也全仗学生们敢去抢。因当局已把黄的有关档案资料转移到中南局宣传部，学生们得到线索后，坚决去抢了出来，从中找到被工作组定为“里通外国”的私人信件。经检视，发觉信中并未涉及国家机密，“里通外国”一罪不能成立，由此坚定了他们为黄平反的信心。

至此，我们可以明了批“资反线”的性质了。就毛的本意而言，批“资反线”是为了扭转文革运动被刘邓拉离了他预想轨道的局面，为政治大清洗排除阻力，廓清道路。但广大民众踊跃投入的批“资反线”运动则是一场反政治迫害的民主运动。这个性质系由它的实际体现决定，并不以毛发动它的动机为转移。在这里与其说民众响应了毛的号召，勿宁说利用了毛的号召，尽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未必认识到这一点。

有不少人认为民主运动系与专制政权、独裁者正面对抗，以实现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及民选行政长官的社会制度为诉求。而批“资反线”算什么呢？如果照这个观点，四五

天安门运动，七九民运，八九民运都谈不上是民主运动了。其实民主运动会有不同的层次，从极端专制体制演变到完善的民主政体总得有个过程，即使是象辛亥革命那样用暴力实现了政权的转移后，按孙中山的设计也还有个从军政到训政、宪政的过程，更遑论用非暴力手段了。在专制体制下，任何能打击或削弱这个体制的政治运动，任何保障、争取人权的诉求都具有民主斗争的性质。

批“资反线”系中共执政以来，中共各级官员第一次被推上审判台。从前敢想不敢言的民众得以向这些官员发出质询和斥责，感受到了十七年来从未品尝过的轻松畅快。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恍然间似乎有乾坤颠倒之感。批“资反线”在客观上打击了中共政治架构，反对中共官员对民众进行政治迫害本身就包含有争取人权的政治意义。批“资反线”的高潮时期，造反民众搜查黑材料比在批判会上怒吼更具震撼力。当办公大楼里还保持往日的秩序气氛时，一队经过密谋策划的造反民众突然闯进来，直奔人事保卫部的机要密室重地，责成有关人员打开所有柜子让他们检查。在社会结构中尚未定位而无后顾之忧的学生们更为干脆，遇到有关人员拒绝合作或推诿搪塞时，当即打烂桌、柜，强力查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五六年的布达佩斯。这些在匈牙利事件中被列为反革命的行为，此时称之为革命行动。基于为打开政治清洗局面的考虑，毛中央不得不暂时容忍了造反民众的这些举动，但也免除不了中共官员对此的切齿痛恨。三十年来造反派被斥之为打、砸、抢，其中砸抢指的就是这些。然而，这砸与抢难道不是反政治迫害的正义行动的组成部分吗？

中学里的批“血统论”也洋溢着民主斗争的气息。“主义兵”虽标榜红五类子弟都可以参加，但居主导地位的都是高干子女，他们自恃血统高贵，穿着军装，扎紧武装带，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任意辱骂殴打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他们的红卫兵袖章也分等级，以其父亲官职的高低而区分确定袖章的宽度，强烈表现出一种封建等级观念。中学造反派批判它尽管是援引毛的语句，并限制在某一程度内，但其追求平等的精神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他们毕竟击破了这一封建狂潮，使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的人格尊严有了基本的保障，不再遭受“血统论”狂热分子的肆意欺侮，并得以在社会政治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为争取人权所进行的艰苦卓著斗争功不可没。

在十一、二月间批“资反线”的高潮中，工人、职员里出现了群众组织，而在此之前只有官办的单位内“红卫兵”。一般的工厂、机关、事业单位不同于学校，那里大多还是由党组织或它钦定操纵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筹委会之类的官办机构主持运动。它们在大整群众的同时，还成立了单位内的红卫兵。由出身成分红的青年组成。此“红卫兵”不介入社会，不与学校里的红卫兵发生联系，只在单位内活动，俨然成为单位领导的私人卫队，用以威慑群众，拱卫领导。批“资反线”高潮兴起后，这类单位内红卫兵全都冰消瓦解。其参加者另行成立组织并有分化的迹象，而造反派群众开始登堂入室。

如前述，六六年六、七月间学校里的反右与一般工厂、机关里的不同。前者是把敢于攻击工作组的师生打成右派，而后者则通常是把单位内政治等级最低的人打成“右派”。这些人大多没敢于反抗单位领导。又一个不同是批“资反线”时，学校里的“右派”学生亢奋异常，而单位里的“右派”多数并无激烈行动。那么一般工厂、机关里的造反派是怎么形成的

呢？

我在“文革”中的亲眼所见使我感受到当时老百姓之所以造当权派的反，主 要是由于多年来中共官僚对民众多种形式和各种内容的压迫所致。

人们常常以为中共对人民的政治迫害主要表现于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其实并非如此，这一迫害经常存在于各种社会活动中，只是程度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在那几个大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已被中共虐待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即使在文革时期也不敢大张旗鼓地造反。倒是其它受过较轻迫害的人在“文革”中奋起了。请允许我回忆一些往事。

六六年夏，“文革”狂飙骤起时，我在广州市郊区税务局做税务助征员已近两年。时间虽不长，但已观察到一些社会矛盾的积累。

六四年秋，局本部有几个干部被强令调往远郊税务所工作。原因是这几个人家庭出身不好，平时衣着又颇讲究。政治办公室主任认定他们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严重，应着重进行改造，故把他们调动。此举不但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而更重要的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打着“革命工作需要”的旗号的惩罚性调动。他们身处全都出身于贫下中农的农村干部群中，受到了种种白眼、排斥，精神上蒙受着极大的压力。

六五年初，沙河税务所、钟落潭税务所都有干部被局政治办公室定为漏网地主、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干部队伍并遣送回乡。我曾亲眼见过沙河税务所的那名被清洗的干部曾与所长兼党支部书记激烈争吵。他俩年龄相仿都约三十多岁。一个是从工人提拔上来的根正苗红的干部，一个是中共政权在“解放”初期吸收的青年学生。他曾在学校里集体加入过三青团。由于长期受到所长的歧视、压制、刁难，有一天他终于忍无可忍地反弹了，大骂所长横行霸道。所长咆哮道：“你这个三青团骨干，要向党进攻吗？”并要挥拳打他，但被副所长等人劝阻。

六五年夏，局政治办公室组织一个工作组到黄埔税务所搞小四清。我是工作组小通信员。工作组与所领导 串通一气，大整所里几名平素颇为调皮的干部。硬要他们坦白贪污税款的行为。什么个别谈话、小组帮助；什么互相揭发，政策攻心，各种骗供、逼供的手段都耍出来了，搞得他们又惊又气。更有甚者，把其中三人定为反党小集团重点审查，以致其中一人跳楼自杀身亡。跳楼时他还高呼“毛主席万岁！”

六六年秋批“资反线”展开后，局系统的造反派组织不但批判局领导执行“资反线”整群众的错误，还把账算到“文革”前。有人提出六五年被开除干部队伍并遣返回乡的几名干部是遭冤枉受迫害的，应予复职。我也看到这几个人回来与局系统造反派联系。黄埔税务所三人反党小集团的两名幸存者已成为造反派的中坚骨干。他们大声疾呼要为他们在“小四清”

中所受的迫害平反，要为死者昭雪。那几名调到远郊税务所的干部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

除以上所叙述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局系统有一股很强的造反势力，系由一批于六三年间由公安局调往税务局的干部组成。这批人有的是出身成份较差，有的是与领导关系不睦，被从政权的要害部门清洗出去。调来税务局后，往往又继续被调到远郊税务所去从事最艰苦辛劳的农村税收。这种境遇，自然使他们内心深藏不平。批“资反线”时，他们不但造税务局当权派的反，还结合在一起，并串联更多调往其它单位的原公安干警浩浩荡荡地去造市公安局当权派的反，一时间，热闹非凡。

六七年夏，我们几个年轻的税务助征员自行请调到广州有线电厂做工人，藉此，我又亲身了解到工厂的“文革”状况。

这间工厂有三百多人。其中两百多没有正式参加群众组织。保当权派的群众组织近百人，明显都是当权派的红人或一向靠拢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而那二、三十个反当权派的人除七、八个爱闹爱动的小青年外大都明显与当权派有过节。如一位女工委员曾为女工的生活福利问题与厂长发生争执。厂长指责她拉拢群众，打击领导威信，并否决她的入党申请。在下届女工委员选举时把她弄了下去。有位六二年分配到该厂的华工毕业生，个性恃才傲物，不随全厂主流意识对厂长表示崇敬，因而受到厂长的白眼排斥，故意抬举另一些靠拢党组织的技术干部，刻意处处贬低打压他。又有一名中年技术员曾在反右时内定中右，长期以来很受当权派歧视打击。最为尖锐的是六五年间厂里出现一条所谓反动标语。厂当权派全力追查，锁定某技术工人为重点侦破对象。对其施加压力。后因证据确实不足而不了了之。此事使该技工对厂长愤恨万分。“文革”时，他成为厂里最激烈的造反者之一。另外，于六四年间从北京调了一批技工来该厂工作。这批人颇受该厂原有技术骨干的排挤。厂长有意偏袒后者，压低他们。这遂使他们悉数加入造反派组织。

我所看到的这些情况当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冰山一角。它广泛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机关、工厂，只不过具体的“故事”情节大同小异罢了。

事实表明，“文革”初期民众起来造当权派的反，主要是由于一向以来共干对民众的压迫。这其中主要是政治性的，有时也渗有个人恩怨的因素。我所讲述的这些情况既可解释造反民众为何要造反，也可以用以说明造反派的形成。没有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压迫使民众中潜藏了很大的反抗张力，是不会在毛一旦开启闸门时，立即形成涛涛洪流的。我所陈述的那两个单位里领导压迫群众的情况与其它许多单位相比其实还是算轻的。

如果说大学里两派学生组织的最初形成基因主要是对工作组的态度。中学是除此以外更重要还有围绕“血统论”对联引起的纷争。那么工厂、机关、事业单位里，基因则来自与单位领导的关系。与单位领导关系良好，较好的人很自然地聚在一起，反之，关系恶劣和较差的人们也会渐渐互相靠拢起来。前一批人是所谓高政治质量者，也是文革前社会秩序下的受

益者。其中出身红类的人当然占多数，但也不乏出身较差的。这些人是经过了一番艰苦的“自我改造”过程，“背叛”了原来出身的阶级，为党组织所信任，有的甚至加入了中共。后一批人是所谓低政治质量者，也是文革前社会秩序下的受损者，其中出身非红五类的人多，但亦有出身红五类者，甚至偶有党员。他们本是中共政权的阶级基础，应与单位领导关系很好才是，但由于某些较特殊的原因（个人冲突，单位内派系倾轧）使他们与单位领导关系恶化。前一批人对批“资反线”只是虚晃一枪，走走过场。后一批人则真拳实脚地干。因为他们之中一些人在“资反线”时期，或在以往的日子里都曾领教过单位领导的手段。

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布《工业十条（草案）》。广州工人、职员中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将出来。各单位都成立了五花八门名称繁多的战斗队、造反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只要稍一定神，就可发现，这些数量巨大的小组织最终都可以归入两大类，基本势态是亲单位领导和反单位领导的。毫无疑问，前者由高政治质量的人群组成，后者由低政治质量的人群组成。

随着形势的发展，斗争的需要，两大类群众组织首先在单位内自发地实行联合。保守派与造反派两大阵营也就日益明朗化了。由于强大的社会政治惯性，更由于六六年十一、二月间虽经过批“资反线”，但旧有社会秩序尚未打破，单位领导的各类下属部门仍基本运转如常，故此由人事、保卫、政工、工会、共青团为主导的保守派能裹胁着大量的一般群众组成表象势力十分庞大的群众组织。而造反者尽管斗志昂扬，但人数确实有限。因此，首先往社会上发展，力求取得外部支持的是造反派。这也就造成社会上首先出现的群众组织联合体是造反派。其中主要有“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 部”、“红旗工人赤卫队广州总部”和“八一战斗兵团”。

在广州众多的造反派组织中有一支奇兵十分引人注目。它产生之后很快就投向社会，参与发起社会上许多重大事件，但又不与其它造反团体作组织上的联合，却能以其单独名义与社会上大型组织联合体并驾齐驱。这支奇兵名叫“珠影东方红”。

“珠影东方红”在三年文革中的兴亡，本身就是一出感人的故事。它经历了几段典型的迫害与反迫害的过程。要把这出故事详实细致地描述下来，想来非其参加者莫属了。其它人顶多只能作点综合概述。

六六年六月初，珠江电影制片厂里张贴出一些矛头指向厂党委的大字报，要求展开大民主，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声言“党委书记莫福枝应立即向群众交待问题。”厂党组织大骇，立即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对大字报发起围攻，高唱中共社会秩序下既得利益者的一贯调子“反厂党委就是反中南局”（因珠影由中共中南局直接领导），“反中南局就是反中央”，并进而把写大字报者指为“右派”。

旋即，中南局闻讯派工作组进驻珠影，展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近百人被陆续批斗

并关进“牛栏”，厂党委书记莫福枝也被工作组抛出。说来，在六六年六、七月间的风潮中，文教、艺术单位的中共领导是很倒霉的。省、市级的中共大官为了保自己，显示自己的革命性，总是把他们抛出去挨刀箭，做替死鬼。

“ 红八月”里，珠影厂亦成立了单位内的血统论红卫兵——“主义兵”。他们在用“血统论”压制非红五类出身的造反者的同时，也把持了文革领导小组。该小组对工作组持拥护的观点。

约九月中旬，“红岩革命串联会”成立，第一次汇集了反工作组的力量。虽然受到厂内“主义兵”和“领导小组”的压制，但由于大气候开始转变，又有“中大红旗”等学生造反组织的支持，遂得以发展，并于一个多月后以“红岩串联会”为基础扩大为“珠影东方红” 。

“珠影东方红”约有九十余人，而其对立派“新珠影”有三百多人。（其前身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队”）这完全符合非学校的单位内保守派人数大大超过造反派的规律。还有另一个规律也很符合，就是人数很少的造反派比人数很多的保守派具有大得多的能量。并由于珠影厂的造反派又不同于一般的工厂造反派，它的成员多为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思想敏锐，能写会讲，活动能力极强。故此在此后广州地区的文革运动中很具影响力。六七年三月它被军方取缔。四月复兴后，更为勇敢。直至六八年八月被彻底镇压，其头头之一孙效林被迫害至死。另一头头满清海四处逃亡，颠沛流离达十年之久才得以回广州现身。

第二节“一月夺权”的纷争

于六六年十一、二月发动批“资反线”，排除了运动的阻力，又于六七年初依靠上海“工总司”压制了曾瞬时席卷全国的工人们自发的经济斗争。毛觉得在全国展开他的正式蓝图是时候了。

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通过《红旗》评论员文章传达了他的旨意：“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于是从一月下旬到二月上旬全国各地均沉浸在夺权的亢奋之中。

毛没有讲明哪一级和哪一些机关、部门、单位应予夺权。这就使人们理解为任何一个独立的单位都可以夺权，即从省到一间区科级的小厂。然而从毛的政治清洗本意上来考察，他的侧重点当是放在省市级，因为刘邓体系的成员只会在那样的高层里。厅、处的官员本不在清洗之列，遑论小小的县科，区科级了。不过为了不束缚群众的革命手脚，自诩为人民救星的毛又一次以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来处置治国大事。

几乎所有的文革研究者都把对一月革命的探讨放在省市级的夺权斗争上。他们都忽略了基层单位的夺权斗争对强化两派群众组织的分歧，并引发更激烈的派别斗争所起的催化作用。而这些基层单位里的分歧和斗争才最准确反映文革派别斗争的实质，也为社会上大组织间的分歧和斗争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单位里的批“资反线”，使单位党领导第一次遭到群众怒涛的冲击，这无疑会使干群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也使党领导的亲信们被浪花溅湿，从而导致两部分群众之间的嫉恨加深。但若事情就到此为止，也有可能引出不太差的效果。群众吼完后，气出了，情绪略趋平静，党领导心里也明白自己的确曾做得不大妥当，今后凡遇到此类整人的差事不要操之过急，即使上头有什么指示也要一步看一步地慎审执行。领导们的亲信助手们亦会告诫自己，日后做事还是“逢人留一线，日后好见面”为上。

但是“一月夺权”的号召打烂了人们苟安的设想，把他们推到一个尖锐的议题面前。毛主席号召夺权，你响不响应？夺不夺？在批”资反线”的斗争中积累下的政治惯性使造反派无可却步，他们必然要奔赴新的战场，然而这次当权派们就不能任由摆布了。在他们看来由于从前把一些群众打成“右派”，向你们道道歉，听你们吼几声那还可以。但让你们夺我的权那可没门。毛主席说的是夺走资派的权，我是走资派码？让你们夺权岂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夺了权之后，我的位置怎么放？今后分分钟得看你们的脸色？当权派的亲信助手们也不答应，嘿，怎么能让你们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夺权做领导？给你们平了反，不再整你们也算不错了，如果让你们这些出身成分、政治表现都大有疑问的人来掌权，那还算是共产党的天下吗？于是气氛陡然紧张，局面急速激化，情形使当权派与其亲信迅速结合起来。

当时在各基层单位里的夺权有三种模式。一是当权派的亲信势力强大，搞个假夺权。局势基本稳定，此种情形居多数。二是造反派力量强大，夺权后，造反派头头组成监督小组进驻办公室。此种情形居少数。三是两派力量不相上下，斗争胶着，夺权无实质性进展；或一派夺后，另一派再夺，互不承认。这种情形亦有相当数量。以上三种基本模式也都是暂时的，随着社会上大气候的变化导致本单位两派力量的此消彼长，形势会随之有所变更。

单位内的夺权斗争带着民主运动的色彩。因为它在客观上是要否定旧有的社会秩序，让处于受压制地位的群众参与权力结构，打破党员干部独霸权力的局面。然而这场 民 主斗争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造反派之所以可以起来向党的干部夺权是由于有毛的号召这个尚方宝剑，但毛其实压根儿没打算把这些基层的厂长、处长、主任们赶下台；没打算要党组织退出企业，事业单位；没打算让普通群众自己来实施管理。毛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独裁者，以独裁者的空洞号召作凭借来致力于基层单位的权力民主化根本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收获。独裁者随时可以变更他的号召，也可以在他的号召中增添一些实际内容，以限制群众的行动，或将其已实施的行动予以否定。毛的独裁统治之所以能够维持，就在于数量庞大的基层单位的当权派及其亲信势力构成他坚实的社会基础。他有理由要撤换掉省市高层里的刘邓系高官，却没有丝毫必要去抛弃基层的厂长、主任。六七年中以后的一系列事实证明了这一切。造反派因他们的夺权行动而又不知急流勇退终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我们却不能藉此否定那场

斗争的民主色彩。那是一群政治上不成熟的人们在蒙昧的中国土地上趁着特殊的历史契机向中共政权所作的冲击。他们无可避免地失败了，他们的行动结不出果实，但是结不出果的花仍然是花。

广东省的夺权发生于一月二十二日。而约一个月前的封“红卫报”风潮为之作了气氛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红卫报》原名《羊城晚报》，为中共中南局机关报。该报在中共庞大的党报群中，面目清新，独树一帜。它于传递中共意识形态的同时，开辟颇具文艺性、知识性、趣味性的各栏副刊，并连载一些甚受欢迎的小说。故此很得一般民众的欢迎。造反派红卫兵为打开广州运动的沉闷局面，以《红卫报》长期散布“封资修”毒素为由提出要把它封掉。由此受到广州市民的普遍反对。更由于主持封《红卫报》的多为外省学生组织。六十年代广州市民中固有的排外情绪添加进去催化了反封行动的火药味。

十二月十三日封《红卫报》行动在丰宁路《红卫报》报社门前展开。“珠影东方红”的孙效林起草了“告全市人民书”并张贴和散发。但许多工厂工人在工会的组织下前往表示坚决反对。其后反封行动陆续扩展，直至于下旬发生多起暴力事件。赞成封《红卫报》的组织都明显亮出社会造反派的姿态，如“红旗工人”、“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反对的则有所区别。在工会组织下，高喊“保卫中南局首长，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口号的大多成为了日后的保守组织“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毛泽东思想广州红色工人总部”的成员。高喊“中南三省人民要看红卫报”的多出于对《羊城晚报》三性的喜爱。而高喊“反对封《红卫报》的暴烈行动”多出于自“红八月”积累下来的对“血统论”红卫兵的憎恶，并移植到造反派红卫兵的身上，或许其中还渗杂有广州人的排外成分。这后两部分人在组织上的归属则是因人而异的。

封《红卫报》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它完全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行径，反映了造反派红卫兵政治上的幼稚及中了毛的毒素。然而热化广州气氛的目的，他们是达到了。并且组织上的分野已显端倪。六七年一月二日，“地总”成立，其后不久，“红总”也成立，这两个工人组织被造反派红卫兵视为保守派。从而为接踵而来的广东省夺权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由于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于六六年六月上调中央，并任中央文革顾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排为第四号人物，致使一般人认为广东省委地位较稳。但不料元月初风云突变。元月四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点了陶铸的名，说陶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陶瞬 即倒台。由此，广东省委境况急转直下。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一发表，广州的学生造反派立即着手商议夺广东省大权的行动。

一月十九日“中大红旗”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商讨夺权事宜。此后连续两天四处串连、

联络人马。“广医红旗”、“中医三?一”、“红旗工人”、“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及“珠影东方红”表示赞同，但“华工红旗”、“三司” 始终认为时机未成熟，反对仓促夺权。

一月二十二日清晨夺权行动开始。夺权学生向省 委 第 一 书 记赵紫阳宣读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的“夺权通令”（赵在此之前已由学生把他从省委带往中山大学）。从二十二日零时起，由造反派接管省委大权，并要他指示林李明等交出省委、省委办公听、省文革办公室三颗大印。经过一番争执，林李明等又打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未获明确答复，遂同意交出三颗印章，并草拟“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表示接受革命造反派的夺权。

参与“一．二二”夺权的造反派组织共有十七个，本地组织有八个，外地组织驻穗联络站竟有九个。夺权后“省革联”成立了一个勤务小组和两个监督小组，前者是领导核心，后两者一个负责监督书记处，另一个负责监督盖印。

“一．二二”夺权不但受到根本被排斥在外的“地总”、“红总”的攻击，还受到来自造反派内部的指责。拒绝参与夺权的“华工红旗”、“三司 ”固然严辞责难，参与了夺权的“红旗工人”因权力分配不均也争吵不休。夺权组织中，外地组织占了一半以上亦使许多人甚有微词。对公安局“一．二五”反夺权的评判分歧之大更加深了内部裂痕。发展下来，甚至发生了造反派组织间互砸总部的事件。至二月中旬，“红旗工人”竟宣布退出“省革联”。

“一．二二”夺权时是兵分三路，一路往省委，一路往省公安厅，一路往公安局。公安局的造反派从内部合作，迅速占领公安局机关大楼，并立即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监督小组。公安局多数派不服，恰又得到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政法公社”邹力志等人的支持，遂于一月二十五日实施反夺权。要把监督小组赶出公安局，“省革联”闻讯即派“中大红旗”、“广医红旗”大队人马赶到。经过一场混乱推搡以至打斗，反夺权队伍败退。此后“省革联”把“一．二五”反夺权称之为反革命行动。而反夺权派也顺势成立自己的联合组织，并命名为“一．二五”总部。该组织深受“中大红旗”等学生造反派的憎恶，却又与“华工红旗”、“三司”、“红旗工人”关系颇佳，成为广州造反派内部长期的分歧焦点。

“一．二二”夺权与各基层单位的夺权不能等量齐观，尽管后者是前者的带动下产生的。“一．二二”夺权算不上是民主斗争，尽管它使一班中共大官失去了令牌，但却没有真实地冲击中共统治的基础。省级高官在毛的清洗范围之内。毛和他的文革派系都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把省级高官统统改变成，或改造成自己的人。正常的罢官任免方式已被抛弃，代之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夺高官的权，让其统统“靠边站”，然后再遴选合适的人去担任该职。当然不排除有的省份被群众夺了权的高官，经毛派系审视后觉得仍可官复原职，或易地任命。因此学生造反派所搞的省级夺权充当了毛的清洗工具。

从实际的技术角度来看，“一．二二”夺权与基层单位夺权也大异其趣。假定毛真的允

许这些夺权都可以自行建立权力体系去领导所属机构的运作，那些学生们真的有能力指挥全省的各项事务吗？当然不行。而基层单位大多却可以。一般的工厂企业、事业单位里，造反者对本单位各方面的情况都熟悉，他们的综合知识和技能完全可以有效地运转本单位的经营和业务。文革前各单位的领导大多数都是吃政治老本，不学无术的人物。造反者中比他们能力强得多的人完全不难寻觅。

不过，“一．二二”这类省级夺权却也扰乱了中共的政治神经脉络。这对于毛来说，是为了实施清洗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于民众来说，却是得以有了打击削弱中共统治秩序的大好机会。省级高官即使未被正式罢官免职，其心理状态和垂直指挥的灵敏度也都大打折扣，并将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部分权力真空，这些对基层的民主斗争都是大为有利的。因中、下层的共官都将无从得到上级的面授机宜和悉心庇护，而都不得不各自为战了。民众对中共官僚的斗争却由此得到鼓舞。

“一．二二”夺权从两种意义上来考虑，它都是失败了。由于它没有为毛派系认可的高官参与夺权，如上海、黑龙江那样，故不被毛体系承认。从扰乱中共的统治神经，支持基层民众的斗争这一点来看，它也没有作出本来可取得的成效。当然，当时的红卫兵们并没有想到这些。前一点势所难免，后一项则纯属自乱阵脚而至。这就是“华工红旗”、“红旗工人”等组织对“省革联”的杯葛和拆台所致。他们所言“夺权时机不成熟，太仓促”云云都是幌子，实则是不甘心被“中大红旗”掌握了夺权的主导地位，完全是一种政治风头主义、权力欲在作祟。当然反过来，如果是“华工红旗 ” 掌握了主导权，说不定又会轮到 “中大红旗”指责它“仓促夺权”。类似情况在其它省份中都有发生。

“一．二二”夺权后，“省革联”的处境日益艰难。“地总”、“红总”、“华工红旗”、“三司”、“中山医东方红”、“红旗工人”都对它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和丑化。“广医红旗”、“中医三?一”等也陆续退出“省革联”。二月间广州街头许多地方都吊起写有“省革联 ”字样的稻草人，直至三月广东实行军管，“省革联”败亡。

“省革联”的失败对广州基层的造反运动有极大的抑制延缓作用。固然，从全国大局来看，广东在三月间必定会有一场镇压。但若造反派内部没有分裂，“省革联”即使未被毛中央正式认可，但如果它团结一致，力量强大，广州军区的三月镇压就有可能轻缓一些，造反民众会少受一点迫害。从这个角度来看“华工红旗”等是应该受到责备的。

若单纯从写史的角度下笔，自不必涉及这些，但若从民主斗争的参加者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就应认真挖掘历史事件中所隐藏的人性痼疾。这些痼疾不但在昔日的文革大波中给民众带来了损失，也在当今的民主运动中一再造成纷争，并且还一定会给将来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带来困扰乃至伤害。

第三节、“二．八”冲军区

六七年二月初，广州造反派的部分组织做了一件对此后广州文革形势有深远影响的事情，那就是“二．八”冲军区。

六七年一月底二月初，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民众冲击军区的事件。著名的如杭州“一.二三”冲军区。原因是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获悉省委将一些文革初期整群众的材料转移到军区，便调动人马前往索取。但被拒绝，并受到军方及对立派群众的压制，遂引起激烈冲突，伤者甚重。从这个典型事件可以了解民众冲军区具有相当的正义性，是批“资反线”、反政治迫害的民主斗争的继续。

六十年代，中共军方高级将领几乎都是原几个野战军的纵队或兵团司令员。师、团级干部，甚至有些营级干部亦都在“抗日”或“解放“战争中已任中、下级军官，并大多立有战功。这些不但握有武力，而且使用过武力的、为中共政权的建立在战场上拼过生死的军人对民众的越轨行动有着本能的厌恶。更何况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必然参加“主义兵”一类组织，他们的夫人若在地方工作，由于既无专长又妻凭夫贵故多任职于政工、人事、组织部门，于是又必然成为机关单位保守派组织的骨干。故此，军方首领的配偶和子女从地方上给他们带来的讯息更会大大加深他们对造反派的憎恨和仇视。对原有社会秩序持维护态度的社会群体中，军干们是最坚决最有力的维护派。无论军干对毛的清洗持何种态度，只要面对人民的造反行动，他们就会有本能的镇压冲动，故造反派会认为军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军干与造反派之间的敌意，只要有一条细细的导火索，就会立即燃点为激烈的敌对行动。

广州造反派冲军区，其源头可追溯到六六年八月间广州军区内部的一些事变。八月中旬广州军区内部开展“四大”，有人揭发黄永胜、温玉成有经济问题。此行动得到政治部主任湘炜（原少将军衔），副主任江民风（原大校军衔）的暗中支持。十五日出现一张题为“打倒小霸王温玉成”的大字报。一些人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并在军区内游行喊出要罢温的官。全军总政治部获悉此事后，立即致电广州军区指责军内游行是错误行动，林彪亦指示，温若有错误可批判，但不可就此罢官。形势即刻逆转，“八．一五”行动被打成反革命事件，由军区第二政委刘兴元负责调查处置。湘、江二人都受到处分。有些级别较低的人被免职和逮捕。广州军区内的第一波造反行动归于失败。但由于湘、江与广州军区实力派裂痕甚深，故政治部属下的军事学院、文艺团体的造反行动（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中，一般军事院校和军队文艺团体都可开展“四大”）逐步坐大并四出与地方造反派串联力图取得外部支持。

当时军内最活跃的造反派组织有“广州部队战士歌舞团?千钧棒’战斗队”，（简称“千钧棒”，其骨干活跃分子只有十几个人），“海军卫生学校红卫东”，“军体院总部”等。一月二十八日“千钧棒”会同其它外地军事院校的造反组织前往军区追查“黑材料”，与军区警卫部队发生激烈冲突，受到士兵的殴打。“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立即表态，支持“千

钧棒”的革命行动，谴责军区对军内造反派的压制。这使由于军区对”省革联“持不支持态度而造成两者之间的敌意迅速加深。

“一．二二”夺权时，军方对广播电台实行军管。后一月二十四日“地总”对广播电台实施反夺权。军方竟又宣布支持“地总”的行动，并压制电台的造反派组织“红色广播兵”，从而引起造反派的不满。

二月初“中大红旗”、“广医红旗”、“中山医东方红”、“中医三?一”、“省直联络站”、“珠影东方红”等十几个造反派组织进行频频商议研究并取得共识：陶、赵黑势力渗透军区，军区是最大的保皇派，不炮轰军区的一小撮，广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无法进一步开展。会议确定炮轰军区的大标语为“挖出陶铸在广州军区里的黑根子”、“广州军区一小撮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二月七号凌晨一时，冲击军区的行动展开，至二月八日晚间结束，长达四十多小时。冲击行动一波接一波，一波比一波更激烈。冲击范围包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司令部。

七号凌晨，军区卫校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首先冲击后勤部，要求后勤部批准军区医院开展“四大”，并于当天中午把医院的院长、政委等抓到后勤部礼堂进行批斗。又于下午冲进后勤部办公室搜查“黑材料”。军区调动部队对冲击者实行压制。地方造反派闻讯后前往支持。事态迅速扩大，形成二月八日的大规模行动。冲击人群呼喊着“炮轰广州军区党委”，“援救军内造反派”，“打倒黄永胜”，“抗议军区武装镇压革命群众”等口号，像浪涛一样冲撞着由广州部队官兵所组成的人墙。双方进行激烈的徒手推打。八日中午，军区发布“广州军区公告”，措辞相当严厉，称：“我们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犯中央军委命令的坏分子，坚决实行了纪律制裁，如果有人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但造反组织并不退却，也以广播号召士兵们“不要阻拦学生们的革命行动”，“不要当炮灰”，“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指挥员，因为他们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招来了更多的造反派群众参与冲击。中南局干部闵一帆、白端民等人也在人群之中，他们说：“军区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军区有什么了不起？”甚至质问军方：“军区和中南局是什么关系？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军区向中央军委告急。中央军委很快就表态支持广州军区，并于八日下午五时半发布命令，称：“昨晚所发生的事情，纯属军队内部的事情，请你们不要介入……立即离开军队营区。” 命令广播后，冲击人群不相信，说是广州军区造谣，或说中央军委偏听偏信，队伍仍不见散去。至八时半，中央军委再次发布命令，其中有很严厉的措辞：“现再命令你们立即撤退……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至此冲击波涛才逐渐减弱、终止。

“二．八”冲军区是广州文革史上一个极重要的事件，它使造反派与军方的矛盾公开化。

双方从此结下了难以解脱的仇结。此后广州的文革运动基本就在军方（连同得到军方支持的保守派）的迫害镇压和造反派的反迫害、反镇压中滚来滚去达一年半之久，最后以造反派被军方彻底镇压来画上休止符。

以学生为主体对军区的冲击是一个很值得称道的勇敢行动，具有鲜明的民主斗争色彩。出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指责军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这文革中典型语言并不降低他们实际行动的意义。因为军方的确是顽固堡垒，是整个中共政权的顽固堡垒。他们冲击军方，其实也就是冲击了中共政权的基石。尽管他们当时未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其实际效果是客观存在的。冲击军区需要极大的勇气，这跟炮轰省、市委不同。地方各级党委已在毛中央明确认可炮轰之列，而军方非但未被定为攻击目标，毛中央还于一月十四日发布过“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又于一月二十八日发布以不准冲击军队为主体内容的“八条命令”。在这种情势下，仍要冲击军区，明显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可见文革中的造反派并非只是消极地去充当毛的“政治清洗工具”。无论是军内造反派要冲到军区机关里去搜查“黑材料”，也无论是地方造反派要冲进军区援助被抓捕的军内造反派，这对于在数千年封建伦理的束缚下，受尽迫害而不敢犯上作乱的汉民族主体意识来说，对于受中共十七年的欺骗和高压已习惯于逆来顺受的当时中国民众来说，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 “二．八”冲军区中还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一批中共地方干部开始公开走到群众之中，施展他们的影响力。这固然反映了中共官僚阶级内部的分歧和权力斗争，反映了部分官僚有借群众运动的力量来实现他们扳倒对手确立自己地位的企图。当这些企图掺合在文革大波中无疑会给群众运动蒙上阴影。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存在。但有幸的是广州的运动与外省都不同。部分中共官僚的影响始终未能主导形势。广州造反派反抗政治迫害，冲击旧有社会秩序的主旋律始终回荡在它的队伍中。

第四章 六七年三月——黑风滚滚

第一节、“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压”的区别与关联

“二月逆流”是中共官方评述文革事件的一个政治名词。它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六七年仲春之后，这个词以被否定的形态出现，至七九年以后它变成了饱含正面色彩，令人刮目相看。

六七年二月中、下旬，全国各地都发生了镇压造反民众的事件。造反派将其称之为“二月镇压”。其最残暴的镜头发生在青海西宁。二月二十三日，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竟下令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开枪扫射，当场打死打伤数百人，事后还展开大逮捕。

然而中央文革惯用的词却是"二月逆流"。它说二月间这场全国性的镇压革命群众的黑风是谭震林首先在北京刮起的。此说激起了全国造反派对谭震林的极大愤怒，把他视为二月镇压的罪魁祸首，并把本地二月镇压的主使人（均为各地方军方头目）称为谭震林。如武汉陈再道被称为"武老谭"，广州黄永胜被称为"广谭"。

在这股反击浪涛中，北京的谭震林当然首先倒台，但各地"谭震林"的结局则大异其趣。这就很自 然使人应该产生一个疑问，中央文革所称的"二月逆流"与造反派所称的"二月镇压"究竟是不是一回事？

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文革派中的另一派系汪东兴、华国锋等人用阴谋手段搞掉（世人大多以为是叶剑英等的"功劳"，其实并不确切）。此后，文革中的许多事件都逐渐被重新解释。"二月逆流"也在其中。

文革期间，"二月逆流"被叙述为一班老帅、老将在六七年二月间的一些会议上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但很快由于毛支持后者，并对前者进行了批评，形势迅速明朗。老帅、老将中跳得最高的谭震林首当其冲，被集中火力修理，气焰大挫。后来，中央文革派向外界扩散北京高层的这场斗争，称之为反击"二月逆流"的胜利，并号召各地造反派都起来与"二月逆流"的种种表现形式作斗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云云。

七九年以后的许多文章对六七年二月间的这场中共高层的争执作了详细的描述。具体时间、地点、人物及各人的动作、语言、表情都有细致刻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所谓"二月逆流"是老帅老将们对"四人帮"作的一场正义的斗争。

对中共高层内争权夺利的斗争作出谁正义、谁卑劣的评判当然不会是民主运动参加者关切的重点。不过，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严重的事实，就是在一片为"二月逆流"翻案、恢复名誉的声浪中，"二月镇压"没有了。仿佛由于谭震林等在怀仁堂斥责中央文革派是正义的，其在农林口所主导的压制造反群众的事件也是正义的。至于全国各地军方在二月间镇压乃至屠杀民众的作法是否正义，这些文章，甚至有的大部头文革史书都不予涉及。而在"造反派听命于四人帮"这一概念经中共官方的强势宣传已成为主流意识的情形下，军方"二月镇压"的罪责也无形中被一笔勾消。青海西宁的那些冤魂（其中有许多是十几岁的女孩子）将永远游荡荒野了。

如果把"二月逆流"的内涵确定为二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的争执，那么可以说"二月镇压"与"二月逆流"是两回事。因为没有这场争执，各地军方头目一样会对本地造反民众实施镇压。这场镇压的心理因素是前面已讲过的军方对造反民众的敌意，镇压的凭据是中共中央的一月十四日"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镇压行动的直接借口往往是造反民众冲击了军事机关。这些都与怀仁堂的争执不相关。二月间，即使是中央文革派的一些人也讲过有利于军方实施镇压的话，如陈伯达等曾

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区不能冲击，对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而且在二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也下达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知"。并于二月二十四日由北京卫戍区出面捕人。被取缔的组织有九个："全国红色造反团"、"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农林战士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造反团"、"全国革命军人革命造反联合部"、"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第一线第一战斗队"、"全国兴无灭资军造反团总部。"

然而，当"二月镇压"产生了很不利于毛实施政治清洗的局面时，他感到应扭转形势，让民众重新起来为之火中取栗。为此，中央文革派把"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压"联系起来，其作用可一石二鸟。一方面把民众的怒火引向谭震林，使这个最为桀骜不羁的老将从此就范，同时，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在扭转局势的过程中，造反派民众对军方采取激烈行动。故此在中央文革派的语汇中只有"二月逆流"而没有"二月镇压"。

这一历史事实被七九年以后的中共巨头们所利用。既然中央文革派对"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压"不加区分，那么他们也可因势利导地不加区分。中央文革派这样做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整垮谭震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则是为了否定"四人帮"。另一个目的两者之间有交汇点，就是中央文革派部份地为军方开脱，七九年后的中共巨头则全面为军方开脱。它给人以这样的启示，如果说谭震林等掀起的"二月逆流"是正义的，如果二月间各地军方的行动是"二月逆流"的延伸，那么又有什么可谴责的呢？故此在当今中共巨头的语汇中也只有"二月逆流"，而没有"二月镇压"。可见他们与中央文革派这两个势不两立的中共派别之间还是不乏共同之处的。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压"还是有关联的。在文化革命中，关于"二月逆流"的说法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前面已叙及的，但那个版本多为小道消息。中央文革并不喜欢把自己在高层会议上一度受挫的情形公诸于文字，故出自中央文革派之口的正式版本是谭震林在农林系统大肆扶植保守派组织，压制造反派。如果从这个版本去探讨，那么可以说，谭震林在农林口的作为，与各地军方的作为出自于同一种理念——压制造反者，维护原有社会秩序。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关联。又有不同的是谭震林是副总理，手中没有武力，他的"二月逆流"是用非暴力手段去压制，而握有兵权的军方头目的"二月镇压"表现为血腥的屠杀。

这个"关联"指的是两者属于同一性质，并非说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或从属关系。谭震林二月间在北京农林系统的所作所为，只是全国镇压行动中不算严酷的组成部分而已。

在"文革"结束 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欲对"文革"作深入的探讨，当不应沿用中共文革派与中共复旧秩序派的语汇体系和思维逻辑。六七年二月怀仁堂的那场争吵以及谭震林在农林口的作为都不应是我们着墨的重点，我们的精力应放在二月间全国普遍发生的军方镇压。这个行动表明了军方继刘邓之后又一次以更凶狠的态度和手段来对待人民。刘邓的第二

次反右是把民众打成“右派”，进行批斗，而军方头目则是把民众打成“反革命”，予以逮捕下狱甚至直接了当地屠杀。后者比前者凶狠得多。造反民众指控军区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当时，他们无论是出于认识水平和政治条件的限制，都只能这样讲。而今天，我们完全应该判定，“二月镇压”是中共政权中最顽固、最反动的势力对人民的镇压和血腥屠杀。是中共政权反人民性的集中表现。中共党军的这一性质在二十九年后的今天也基本没有改变。

第二节、广州的“三月镇压”

广州军方的镇压行动比外地各省慢了一个节拍。它正式于三月初展开。然而镇压的各项准备工作则是在二月下半月已开始了。组织准备，材料收集，行动计划这一类秘密进行的事项，外界无从得知，但军方为镇压所作的舆论准备则很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省革联”夺权的前夕，《南方日报》（原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里的总派组织行动果断，迅速夺了报社的权，并与军区建立良好关系。在此以后军方与造反派，尤其是与造反派里“省革联”一系的斗争中，充当军方的舆论阵地。军方除自行印发小报《毛泽东宣传员》，大量刊登指控“省革联”和“二．八”冲军区的文章外，更主要的是通过销售量极大的（各单位均公费订阅）《南方日报》来实施它的舆论准备。广州地区另一份报纸《广州日报》（原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报）曾一度为“省革联”派掌握，但不久也被军方势力所控制，至三月初，军方已操纵主要舆论机器。

军方舆论攻击的重点有两个，一是“二．八”冲军区，二是“省革联”。军方的喉舌说：“‘二．八’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和阶级敌人反夺权的激烈斗争的反映，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份。”

“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这是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阴谋、新反扑。……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敌人罪恶阴谋的大暴露。”

“当前右派往往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喊着极‘左’的口号，拉大旗作虎皮，蒙蔽群众把水搅混，组织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行动，你造反，他也‘造反’；你联合，他也‘联合’；你夺权，他也‘夺权’。真真假假，真假难分……我们革命同志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不要把这些打着红旗打着红旗反红旗泠认为是‘左派’。

“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展开大决战的新形势下，是拥护还是反对人民解放军，是区分真左派和假左派，区分真革命和反革命的一个试金石。”

军方的喉舌还说："黑龙江等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成功经验已证明，有当地驻军代表参加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是无产阶级大联合的核心。"这个论调表明军方一方面以"反革命""阶级敌人"的大帽子压向造反派外，同时也以"省革联"没有敬请军方头目参加而否定它的法理性。

此外，军方也着手与总派建立更密切的结合，以组建它的群众基础。二月下旬，《南方日报》刊登关于"地总"、"红总"两个工人组织的调查报告，盛赞这两个组织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造刘邓陶的反，造旧省市委的反，有纪律有政策水平，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

在这一片喧嚣之中，除军方任主号手之外，"地总"、"红总"也紧紧跟上，在街上刷大标语，吊起身上写有"省革联"的稻草人，并在《南方日报》上发表大篇文章"我们工人就是反对省革联。"

不但军方和保守派如此作为，甚至一些造反派组织也参与围攻"省革联"。二月下旬"新北大"刷出题为"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大字报，全力批判"省革联"。军方喉舌《南方日报》如获至宝，大量翻印。"红旗工人"竟也发表"铁证如山，不容抵赖——省革联有组织，有计划冲击军区的铁证"一文。二月二十一日，以"广州红卫兵一司"、"三司"、"红旗工人"为首的十一个组织及外地造反派驻穗联络站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数万人大会，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这样一来，造反派的内部分裂公开形成，使"省革联"——造反派中较激进的一翼，更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

一切准备妥当，镇压行动开始，首先在军内开刀。广州部队战士歌舞团的"千钧棒战斗队"挨了第一刀。二月下旬，"千钧棒"的六名骨干被捕，其余成员皆受审讯。

三月一日清晨当广州市的居民走出居所，又要开始一天的劳作时，他们骇然发现街头贴有许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署名的取缔反革命组织"八一战斗兵团"的公告。人们默默地看完又默默地离去，他们心里都明白形势骤变了。

其实在三月一日凌晨，全城还沉浸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取缔公告也未贴出，大逮捕行动已经展开了。横街窄巷里的许多简陋的民房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门被撞开，凛冽的五更寒随着气势汹汹的人群冲了进来，被捕者有的戴上手铐，有的五花大绑，推出门外，踉踉跄跄地走过一段黝黑的街道，再被扔进预先已停在马路上的囚车，疾驰而去，留下恐惧万状的亲属和惊讶不已的邻居。一夜之间逮捕人数达两千多。

参与大逮捕行动的是广州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主要为"一. 二五"总部成员），各公安分局，还有"主义兵"也参与其中。在逮捕时常常未持逮捕证 。遇到被捕者质问，竟

说:“什么逮捕证？我的帽徽、袖章就是逮捕证，还有这样东西”说着用手指指身上的配枪。

大逮捕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反复抄家，批斗，刑讯、殴打。关进监狱者自然承受中共监狱里的非人的待遇。未被逮捕或被捕后不久被释放者也受到很严酷的对待。自首、交待、坦白、认罪开除工职、调离工种、扣发工资等等。据后来争取平反的“‘八一战斗兵团’被迫害情况的调查报告”称，三月间被迫自首登记和挨批斗的“八一战斗兵团”成员达一万六千多人。有一成员被捕，孩子只有六、七岁，其妻已病故，孩子无人照看，每天到垃圾堆里捡东西吃，境况十分悲惨。有位老工人，参加“八一战斗兵团”并无具体活动，也被关押一个多月。广州实验中学一名学生参加“八一战斗兵团”仅几天，就被抓去坐牢两个多月，并被押回全校批斗 。继“八一战斗兵团”被取缔后，三月五日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又取缔了“珠影东方红”，把它打为“非法组织”。

五号凌晨，又是在黑暗之中，大队经过严密组织的人马扑向珠江电影制片厂。其中广州警司两百多人，公安局“一．二五”总部几十人，而“地总”竟有六百多人。到达珠影后立即按原计划首先占领珠影外围各制高点，封锁所有路口，设立重重岗哨，务求任何人无以从珠影厂逃逸。接着，通令珠影所有员工到珠影礼堂开会。带队的警司头目在会上宣读取缔非法组织“珠影东方红”的公告，并立即当场逮捕其五名头头，但曹征和另一名头头已先期潜逃赴京，只捕到另三名。其它所有未被逮捕的成员都受到监视，骨干成员则被批斗。不久该厂保守组织的联合体“新珠影革命委员会”（简称“新珠影”）成立。趾高气扬的“新珠影”贴出公告，勒令原“珠影东方红”成员不准出厂，不准互相串联，不准看大字报，认真交待自己的罪行等等。

其它被陆续取缔的“非法组织”，还有“中山大学红旗工人赤卫队”、“红农友”、“电台东方红”等等。有许多人是被以所谓“群众扭送到公安局机关”的方式捕入监狱。

军方虽对纯学生组织没有直接动手，但也下达通令，命“中大红旗”头头张尔纲、黄意坚、武传斌、陈家吉、蔡登望等五人立即向广州警备司令部投案自首。

经过军方这一连串的打击，造反派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许多基层组织瓦解或濒于瓦解。许多人退出了组织，即使是较坚定的学生组织其声势也非常微弱。活动陷入停顿。

在造反派式微的同时，保守派的力量却得到极大的发展。“地总”、“红总”、“主义兵”、“一．二五总部”开着宣传车到处叫嚷，还贴出许多大字报、大标语，其内容都不外是坚决拥护军区取缔反革命组织，坚决镇压反革命之类。保守派的头头、骨干们弹冠相庆、喜气洋洋。受了半年的窝囊气，今天总算得以尽情发泄。那班造反的家伙曾那么气焰嚣张，妄自尊大，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无产阶级的江山是你们反得了的吗？我们这些根正苗红一向听党的话的先进分子凭什么要受你们这些不三不四的人的气？省委、市委里有走资派当然应该要反，但你们反和我们反根本不同。你们是打着红旗反红 旗，你们骨子里反的是共产党，是反社

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批“资反线”放过了你们，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宽大，但你们竟以为时机已到，可以变天。毛主席真是英明的。他老人家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最后不是讲“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吗？嘿，现在应验了，处理你们的时候到了。

的确，经过三月这场镇压狂潮，运动已呈收尾状态。造反派固然已偃旗息鼓，保守派在吆喝了一阵，要够了威风，出够了气之后，也心绪平定下来，回到单位里去领功邀赏去了。街头变得冷冷清清，再也没有辩论，没有争吵，往日热烈的气氛被一片肃杀所取代。

在广州的三月镇压中，军方把“珠影东方红”选定为开刀的主要对象之一是很自然的。“珠影东方红”人数有限，但能量极大，它的大标语、大字报在街头占有相当分量，它的宣传车到处吼叫。它是“一．二二”夺权的发起组织；它参与“二．八”冲军区；它是坚定的“省革联”派；它的成员的政治背景大多不硬；它在珠影厂内是少数派；它在广州所有非学生组织中最具知识水平和活动能力……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的迭加，使军方感到甚有必要也可以给它特殊的“礼遇”。

然而军方选定“八一战斗兵团”来开刀就使人感到有点费解了。“八一战斗兵团”以复退转业军人为骨干。这些人本是共产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属于政治上红的一群，而且又曾是袍泽，何以向他们下那么重的手？不过细想一下，也就释然了。第一，中共中央曾有指示，复退军人不要成立单独的组织。第二，把此类组织加以取缔已有先例。黑龙江省军区就曾把一个名叫“荣复军”的组织取缔。中央也曾把“中国工农红旗军”、“全国军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加以取缔。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八一战斗兵团”又不是单纯的复退军人组织，尽管它的头头多为复退军人，但大量的一般成员却是工人，甚至是一些地方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小厂里的工人。这些人的出身背景和政治面目都相当复杂，因此又不必把它视为单纯的复退军人组织而手下留情，从轻发落。

从“八一战斗兵团”的实际作为来看就更有必要对它动大手术了。“八一战斗兵团”在工人组织中的声势当时虽不及“红旗工人”和“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但属于坚定的“省革联”一系。在二月间“省革联”风雨飘摇、备受攻击之时，“八一战斗兵团”竟举行了“支持省革联、打倒赵紫阳”的万人大会并游行示威。其所属各分部、各单位基层组织在一月夺权中表现相当激烈。

“八一战斗兵团”的总头头，莫竞伟曾参军从事卫生防疫工作，五八年转业到越秀区卫生局任武装干事。因与局当权者关系不睦，以至官运不佳。其经历背景与王洪文相似。六六年六月间率先造反。攻击局党委，贴出题为“卫生局长期以来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大字报。因此而受到围攻，被打成“右派”。他并不畏惧，坚持斗争。八月间成立“八一战斗组”，几经分合，后于六七年一月间成立“八一战斗兵团”，莫任头头。该组织在一月夺权中发展极快，在被取缔前夕已达七万人，远远超过了“省革联”的台柱工人组织“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总部”。

从广东省军区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公告也可了解到它的造反精神。尽管军方的文告与事实会有出入，但我们把夸大的因素扣去，也应赞叹这些底层民众的勇敢。公告称：

在广州海珠区革命组织联合夺了区人委的权后，他们纠集一些人进行反夺权，夜间突然围攻夺权的革命群众，非法绑架，扣押其负责人，抢区人委印鉴。在荔湾区各革命组织联合夺权时，他们又趁夜冲了进去，抢先夺权，夺去全部保密柜钥匙，抢走区委八枚公章。他们还在一些街道猖狂地进行捣乱破坏，公开煽动“一切受害者联合起来，夺权翻案……公然叫嚣要平‘冤狱’，声称过去市公安局所拘捕的人都是‘受害者’。”

在文革前十七年之中，中共各级官吏和公安机关戕害民众是家常便饭。人民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怒火郁积在心中，直到批”资反线“和“一月夺权”之际才敢爆发出来。在工人阶层中，小工厂、街道工厂里的工人又是工人阶层的下层，他们受到的剥削比大工厂更盛。而小工厂里统治力量较弱，那里的造反派起事比大工厂里要容易得多。“八一战斗兵团”既然致力于在区办企业和街道企业中发展人员，那军方公告所称是完全有可能的。并且，这又从另一角度证明广州造反派的基本群众是中共社会秩序下的受压迫者，他们在文革期间起而反抗是正义的，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以公开进行的民主斗争。

当然，有些单位里的“八一战斗兵团”分部是货真价实的红牌子。他们之加入“八一战斗兵团”是基于一种复退军人的荣誉感优越感，而且也不大了解其它分部的“越轨”行为。至镇压来时，他们就纷纷声明退出并揭发其它分部的反动言行。从而免受追究，仅仅解散自己的组织，或者只改一个名称就了事。

广州三月镇压中，有一样很值得注意的是，保守派参加了具体的捕人行动。难道是省军区，广州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的人手不够？当然不是。这里面有广州军方头目的精巧构思。它是要通过这一作法使总派更紧紧地靠在它身上，同时也营造它具有群众基础的形象，而总派乐于接受军方的指派也正说明了它的政治本质。军方头目是有眼光的。尽管“红旗工人”、“三司”、“华工红旗”等从“一. 二二”夺权一开始就跟“省革联”闹摩擦。后来在“二. 八”冲军区事件上也极力责骂“省革联”，甚至不惜成立“省革筹”正式大闹分裂，但军方都没有对它们摆笑脸，仍然只对“主义兵”、“地总”等情有独钟。显然军方是依毛的经典阶级理论对广州各群众组织进行过一番调查审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系以他们的子女为头头骨干 的组织自不待言。“地总”、“红总”以一些大型工厂的群众组织联合而成。在这些大厂里，原有社会秩序的张力极强，尽管原党委大多已不在前台发号施令，但武装、保卫、人事、组织、政工等部门的人员们牢牢地控制着厂里的局势。他们大多也就任群众组织的头头、骨干。尤其是武装、保卫、人事部门的人员与军方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就是军方在地方单位上的分支机构，譬如从省军区到各市、区武装部再到各工厂的武装部，从市公安局到各主管工业局的保卫科都是一条线贯下来的，有着公务上的领导关系。因此军方对这类群众组织有着天然的感情和信赖。更何况这些组织里党员、先进分子的比率极高。

以珠江电影制片厂为例（该厂从人数上来说不是大厂，但以级别来说是大厂，其级别相当于一个市级的工业主管局），在取缔“珠影东方红”前，广州警备司令部就通过市工交武装部与该厂人事科联系，取得“珠影东方红”成员的档案材料。在实施取缔的前夕，主持具体行动的工交武装部邱部长又与厂保卫科钟科长取得联系，令其配合行动，密切掌握目标人物的行踪去向。保卫科、人事科的大员们也就是珠影厂的保守组织“捍总”和日后“新珠影”的核心人物。

因此无论“华工红旗”怎样对“中大红旗”责难不休，无论 “红旗工人”怎样对“省革联”声色俱厉，但军方在对它们进行了一番“阶级分析”后，亦认定它们都非我族类。区别顶多是对“省革联”必须予以重重打击，对“省革筹”则嗤之以鼻。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更由于人性中痼疾的作祟，造反派内部纷争不休乃至公开分裂，从而使军方的镇压行动更加游刃有余，这是深为值得省思的。

相对而言，保守派内部比造反派团结得多。难道他们的情操都那么高尚，摒弃了人性中的痼疾？当然不是。这是由于另一种更有力的因素在起作用。

保守派的骨干头头们大多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中居优势地位，他们往往任有某级职务，（又不算是当权派）或者拥有种种荣誉称号，这些都为他们带来了许多实际利益。文革大波骤起之后，他们挺身而出保这保那，最本质的是要维护原有的社会秩序，保持他们在那个秩序下的既得利益。在文革斗争中，他们并不特别期望去力争什么。如果说也设想在击倒了造反派，保对了领导干部后会有所收益的话，那也只是在胜利之后由上至下 按 共 产党组织 原 则的提拔晋级、入党升官，而自己则不应过分刻意追求。这份“革命情操”的确立也真不枉共产党多年的谆谆教诲。故此，即使在文革大波暂把旧有的社会秩序冲垮之时，嵌在生活深层的社会序列和政治伦理仍在发生作用，这使他们不会想入非非，并把他们凝聚起来，团结奋战，不会陷入彼此的纷扰互斗之中。

而造反派就大异其趣了。他们大多是平头百姓，有些甚至是原有社会秩序下不同程度的受损者。他们投身文革大波是要去得到些什么，因而富于进取性。他们批判“血统论”，欲得到平等的人格待遇；他们批判“资反线”，控诉当权派飞扬跋扈，欲使自己人身安全得到保障，这些都是正义的。然而在“一月夺权”风潮降临时，瑰丽的光彩真使他们之中一些人眼花撩乱。这些大多连车间工段长、生产班长都未当过的人们突然发现从前是那么遥远，那么高居云端的省、市级官职竟然有垂手可得之势，这不能不使他们极为亢奋，然而纷争也就由此产生了。究竟谁人或哪一些人才有资格、有能力攀上权力的峰巅呢？暂没有更高一级的权威来钦定，自己去奋力搏取是可能的成功之道。崎岖狭窄的山路上攀登者太多，势必会引起争端。只有在社会的权力结构不再似金字塔形而呈平面网络布局，只有在公权力真正与物质利益脱钩，权力争夺才会成为史迹 。而这谈何容易。莫说在二十九年前的中国，就算在当今的一些民主政体的国家里也未能办到。再看看八、九十年代中国海外民运，与政治权力还未正式挂钩，就纷争迭起，故此我们的确不应对当年造反者的作为订太高的标准，换言之，

不应苛求他们。因“一月夺权”的纷争而导致造反派内部反目成仇暴力相向的省市比比皆是。然而极为有幸的是广州的造反派没有走上这条邪路。否则今天笔者也难有心情为广州红旗派两年的历史讴歌不已了。

那么这一点首先应归功何人呢？应归功广州军方头目，因为它旗帜鲜明地拥抱了保守派“地总”、“红总”、“主义兵”，而把“省革联”系和“省革筹”系的造反派都踩在脚下或扔在路边。

在社会结构中尚未定位的学生对权力可以衍生利益的诀窍并没有切身的体会。当时他们那么激昂地投入“一月夺权”，主要是为政治热情或说是政治狂热所驱使。夺权风潮于一月初起于上海瞬即席卷全国，毛中央见诸文字的号召则是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和一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广东“一．二二”夺权的策划者们也要致力于联合。这表现于“中大红旗”对“华工红旗”一再联络，极力争取它共同起事。但后者始终以夺权条件未成熟为借口而坚拒。当时的社会状况风起云涌，须臾万变。“中大红旗”等从策划到具体实施只有几天时间，谓之仓促也不为过。不过从当时的斗争形势来看，若被“地总”等捷足先登，先入为主，取得名份，造反派再实施反夺权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故仓促也有仓促的道理。当然，深究这一些没有多大的意义，而应该赞许的倒是“中大红旗”等没有就夺权事宜向广州军方示好求援。

这里有两个可能性，较大的可能性是军方基于它的阶级分析论和政治感情不接受这示好求援，但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是军方基于一种政治投机会考虑接受，并通过一系列权谋措施把夺权结构铸成它需要的模式。如果是那样的话，广州群众组织的分野将会发生极大的紊乱。这种情况并非臆测。湖南长沙的高司就是例证。

故此，我们有理由把功劳还归于“中大红旗”等一批青年学生。不管他们是出于何种考虑，终归 都没有去向军方示好求援。这一事实就避免了军方插手的可能，从而保持了广州造反派与保守派营垒的分明，保持了广州造反派反抗中共旧有社会秩序的一贯性。

三月镇压中，广州的保守派不再仅仅是用语言文字攻击造反派，而是在军方的指挥派遣下直接地对造反派进行镇压，从参与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等大动作到把一些造反派的头头骨干“扭送”公安局，军管会，或在本单位揪斗。于是，两派之间的深仇就从此扎根。面对顽强的造反派，保守派更紧紧地抱上军方的粗腿，在日后造反派极力谴责“三月镇压”，称之为“三月黑风”的时候，他们则高叫“三月东方浩荡，军管成绩辉煌”，并自称“东风派”，而把造反派贬称为“黑风派”。从此，广州造反派面临与军方和保守派两面作战的艰难局面，直到最后被军方和保守派连手彻底镇压。也正因为这样，广州造反派两年的历程才谱写了一出悲壮的反政治迫害的战歌。

第五章 六七年春末夏初——重现生机

第一节、周恩来的广州之行

从二月中、下旬到三月，由军方主导的对造反民众的全国性镇压，已使运动呈收尾状态。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曾说过“运动可能要再搞五个月”。从六六年十一月算起，“再搞五个月”就是到六七年三月，看来，文化大革命真的是到结束的时候了。然而，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毛及他的中央文革派断然扭转了这种收尾状态，并促使运动继续发展。他们之所以作此抉择，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毛的政治清洗尚未完成，刘邓等仍未被最后定案，中央局、省、市级中的刘邓分子亦未被完全清除，还需要群众运动为之效力。中央文革派的大员们欲在文革大波中建功立业，大大提升自己在党内的权势和地位，这一目的也未曾实现。从六六年十月到六七年初，造反民众的行动，虽有某些过火的行为，?如抢黑材料）但基本还没越出毛意定的框架，此时毛并不打算惩罚他们。而军方的镇压行动过于严厉，如果对此予以认可，那必然会失去相当一部份民众对自己的崇敬和拥戴。毛的宏伟意向是不但要拥有绝对的权力，还要拥有这份敬仰爱戴，故此他感到不能认可军方的擅自行动。除了对赵永夫那种级别不高而又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的军方头目予以惩处外，对有一般镇压行动的军方（如广州军区）也应予劝戒。

毛中央扭转运动方向，重燃文革之火的第一个信号弹是三月二十四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内称：“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并首先开枪”，“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 数百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赵永夫隔离审查。”

如果说这个决定是具体针对青海而言，那么四月一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发（??）???号文件〉则声称：“这个文件提出的政策规定，望各地参照执行。”该文件中强调说：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的批准。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捉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责备他们……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第三，……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能用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第四，……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

‘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作法是极其错盏摹　澜　俳琛　偡础　　x（乱码，未校），镇压革命群众。”

随后还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四月十三日），“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四月三十日）等等。在毛中央下达一系列文件的同时，其喉舌也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最重要的是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说：“革命小将的英雄业绩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他们不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始终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也有少数干部因为革命小将对他们的错误进行过批判，就对革命小将抱有抵触情绪，怀疑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和他们对抗。如果坚持这样做，矛盾的性质就可能会转化。”

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军委还发布“十条命令”。其内容除重复???号文件的“关于不准轻易捕人”内容外，还强调补充：“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是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明白，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对群众组织“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等等。

很明显毛中央基本已站在庇护造反民众的立场上，对军方的二月镇压持斥责态度。这当然不是即兴之作，而是毛中央经过一个月的搜集信息和考虑斟酌所作出的抉择。

四月上、中旬，短短的十几天里，社会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已沉寂的社会气氛很快变得热烈起来，街头传抄和欢呼这些文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几何级数增加。学生组织首先恢复活力，频频举行集会游行，戴上袖章，高举大旗，齐唱毛的语录歌，精神无比激动亢奋。接着，工人、职员的造反派组织也呈复苏，并得到发展。

如果说六六年十月，毛中央扭转运动方向，强力推动批“资反线”，下达“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十月五日）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十一月六日）是把民众从第二次“反右”的恐怖中解放出来而得到许多人的感激的话，那么这次毛中央又一次把民众从更恐怖严酷的军方镇压中解放出来，就得到了更多人由衷的感激和拥戴。“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此时发自许多人之口已不是只具形式的官样礼节而是成千上万民众心声的溢露。然而这里隐藏了个大问题，就是毛中央推动批“资反线”，其逻辑结论和实际结论是一致的——打倒“资反线”的制造者刘邓。有这个“一致”是正常的。然而此时毛中央责难军方压制民众是否同样也具有那个“一致”性呢？事实表明这一次不正常了。因为毛心中没有发动群众去打倒军方头目的意向，可是被镇压的民众从血泊中爬起来后，其逻辑结论就是要向军方算账。毛的意向和民众行动之间的严重歧异为一年多以后的大镇压埋下基因。

倘若从二月镇压中解放出来的人民能处处体会毛的意向，按毛的旨意办事，这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那么他们的结局大概不会太差。然而他们的可爱之处正在于没有处处遵从毛的旨意，而执意卯上军方，使其行动带上鲜明的反政治迫害的民主斗争色彩。这在广州表现得尤其典型。

鉴于各地二月镇压的烈度不一，还由于各省市军方头目在毛及中央文革派心目中有不同的坐标，故毛中央除发全国性的文件之外，还视各省市的具体情况分别再予以解决。应该说毛中央对否定二月镇压会引起的反应是有所预料的。四月二十三日毛在一个四川报告中的批示说：“现在另一种思潮来了，那里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了台，灰蒙蒙的。”为了防止军方与造反群众之间再起冲突，毛中央针对各省市下达专门文件，派员接见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对广州表现得相当重视。负有使命的周恩来于四月十四日到达广州，既为广交会事宜，更为处理广州问题。周恩来在广州逗留了几天，数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并有军方头目黄永胜等在场陪同。周的讲话以四月十八日接见会上的最长。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个小时。虽然其中言不及义的行话、废话连篇累牍，但也就许多方面的问题作了表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广东“一．二二”夺权定评判基调。周说：“广东‘一．二二’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实际上这个大方向是抽象的，实践的结果证明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参加夺权的只有两个学校的革命左派组织，一个工人联合组织，一个机关的造反组织，加一个珠影，就是五个单位，加外地四个单位来支持，九个单位。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方式，就是一个要印，一个让印，就是让权。这种形式是不足为训的，不可效法的，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大方向正确”用以保障“省革联”派不再受攻击，夺权形式“是错误的”用以说明“省革联”为何不受毛中央认可。

二．保护广东军方，使之免受造反派攻击。周说：“二月份以来，军区拘捕了一些人……在全国来说，广东捕人并不多，而且放得快……也没有打死人的事情……广东很谨慎的。当然总不免搞过了一些。……我们感觉广州军区在这个问题上，从黄永胜同志起，领导还是负责的。这一点，主席、林副主席是寄予期望的，信任他的，我应该肯定地告诉你们。”

三．否定“四大事件”之说，既为庇护造反派，也为军区开脱。周说：“所谓四大事件就是“一．二二夺权”，“一．二五”公安局反夺权，还有个冲广播电台，最后一个就是二月七号、八号冲军区。……如果军区的正式文件中拿出四大事件作为革命、反革命的标准当然不妥啰。”“在军区还找不到这样的文件……至于军区底下的干部和执行军官的个别人说过这样的话，那他自己负责，应该批评他，他应该检讨错误。”

四．安抚一度受镇压的造反派，对气焰嚣张的保守派略施抑制。周说：“三个‘红旗’是革命左派，这就是‘中大红旗’和‘八．三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但不仅仅是这三个‘红旗’是革命左派，其它都不是。如果这样传出去，那我就提倡宗派主义了，要犯极大的错误。”“在工人中，我觉得我所发现的，首先要承认‘工联。它经过一个发展然后又

缩小，由四、五万人，曾经在三月中旬缩小到三千人，现在又发展到一万人，现在看来它是坚持革命造反精神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承认它是一个革命造反派。”“‘广州工人’原本是一万多的，现在是六千人，广东‘红旗工人’现在是一万人左右，他们还是坚持……这两个组织我们看起来现在它这个情形也应该看成造反派。”

“‘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比如说，‘主义兵’吧，你们不去教育他们，他们就会滑到犯严重的反动思想。……对‘主义兵’我觉得现在还要做一段工作……并且鼓动他们应该站在毛主席的红旗下，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在北京，‘联动’找也找不到，因为它是反动的。这里‘主义兵’到处都是，怎么能叫反动组织呢？……即使是有一小撮是‘联动’，也要对他们教育批判。”

五．压制中共内部广东地方派系翻案的努力。周说：“在广东省是有一股暗流的……就是我刚才指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两个暗流。一个是并没有被彻底批判的领导广东十五、六年的陶赵这个暗流。另一个就是地方主义复辟的暗流。……还要严防地方主义的翻案。过去广东陶铸以前的领导犯过地方主义错误。这个是中央讨论了的，定了案的。……如果说地方主义要翻案，这就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六．周的长篇讲话中，有一小段确实值得留意的是，他对保守派的形成作了些许剖析。他说：“有些人对于过去的旧领导确实有些留恋，这不单是对中央的刘邓，也不单是对广东的陶赵，或者其它，就是你单位的领导中有保守的，你跟他站在一起，也就偏于保守了嘛！有点留恋了嘛！对旧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有点留恋，不敢打破成规，不敢大破大立，闯出一条革命的规律来，这就是保守了嘛！”“保守派有它的短处，它以遵守纪律当先，这次主次颠倒了。你得先有革命精神，你才能有创造性；你有科学性，才能掌握政策；然后才是组织纪律性。所以，常常保守的，所以犯错误，站错了立场，就是因为它偏重于组织纪律。”“但不要紧，这比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就要小一些嘛！就是维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改嘛，你肯改了，就回头了嘛！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你就站在正确的路线上说话了嘛！”

从周恩来在广州的活动及讲话的关键内容来看，毛中央的意图是扶植自二月镇压以来已处颓势的造反派组织，使对旧秩序，旧领导有留恋的保守派不致一支独秀，以有利于尚未完成的政治清洗继续进行。同时力求稳定广东局势，务求恢复发展起来的造反派不致与军方作难。因为在广东军头中并没有毛中央要清洗的人物。不过毛中央也希望军方作出些对造反派示好的表示。

然而，可以说周恩来此行旨在稳定的目的基本没有达到，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或军方都没有按周的意图去做。每人都对周的讲话各取所需甚至曲解去维护自己攻击别人。局势的发展与稳定背道而驰。

毫无疑问，周的到来有利于造反派的恢复和发展。三个“红旗”成了名牌革命造反派。“华工红旗”与“中大红旗”旧有的龃龉也由此得以淡化。“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广州总部”（经周恩来提议已改名为“工联”），和“红旗工人”也成为工人组织里的革命造反派。省革联系和省革筹系的两系造反派组织从此联合起来。尽管他们心中都仍存蒂芥，但三月黑风的记忆，以及一个强大保守派的存在使他们不得不修补彼此的裂缝，共同对敌。从此广州的造反派自称“红旗派”。他们还把周恩来所言的“三个红旗”改动了一个字，成为“三面红旗”。这个量词的改动深藏玄机。三面红旗本是中共政治行话中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统称。这三样事物虽在实际上已被否决，但却仍然保持着响亮的名称和正面形象。红旗派有“三面红旗”为骨干和象征，它的革命性当无可争议。在保守派自称“东风派”的同时，红旗派则简称它们为总派。因为他们的主要组织是“地总”、“红总”（工人组织）和“省直大联总”（机关职员组织）。

周的某些讲话的确对总派的气焰有所抑制，虽则在总的精神上仍是庇护他们的，但这已使总派相当不满。他们表示过去太守组织纪律，没有打、砸、抢，成不了左派，以后也要干干这些了。果然，四月二十二号，地总和它的中山医学院分部调动数千人马，以中山医宣传车事件为借口，对“中山医东方红”进行打、砸、抢，砸了“东方红”的总部，殴打“东方红”成员，造成轰动全市的中山医“四．二二”事件。

综观六七年初广州两派正式形成以来的派别斗争，可以发现总派总是斗争的挑起者，红旗派是被迫应战的一方。之所以如此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红旗派反抗的是原有社会秩序，他们很自然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原有社会秩序的代表和象征——各级当权派和军方。总派的头头、骨干们是原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很自然地对造反派深抱嫌恶。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明了对社会秩序采取明保的方式是不合时宜的，于是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以打击对旧有社会秩序的冲击者来实行暗保。当他们洞悉军方根底硬，不似省市委的头头岌岌可危时，他们便全力对军方进行明保，并以军方作倚仗处处与造反派作对。四月份红旗派复苏后，总派对它的打击也日益增加。这情况有如保守派是狗，当权派或军方是为富不仁的狗主人，造反派则似不服强权欺侮的汉子。当这汉子反弹为富不仁者时，即遭到狗的狂吠、抓咬。广州文革运动的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那汉子被狗及其主人彻底咬倒踩平为止。

第二节、“五．三”绝食

广州红旗派的四月复苏中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红司”的成立。四月二十二日，在广州医学院的大操场上举行了“红司”成立大会。其最初成员是“中大红旗”、“广医红旗”、“暨大东方红”、“红卫兵广州兵团”（中学生组织）等。“红司”成立以后，其组织发展很快。以后陆续有“工人红司”、“机关红司”、“珠江红司”的产生。“红司”系的红旗派明显是以过去的“省革联”系为骨干，区别于“华工红旗”的非“省革联”派，它的斗争性尤强，格外令人瞩目。 “红司”成立后其核心人物武传斌（中大红旗）、林凡（广医红旗）、吴子伟（广州体院）等认为当务之急是掀起大规模的平反运动，这是发动广大群众起来的关键。如果三月黑风中大量的受害者还关在狱中，或在单位里受着重重压制，那文化大革命根本不可能进行。于是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又成为广州红旗派活动的主旋律。在这个旋律中有一个高亢

的音符就是“五．三”绝食斗争。

在众多的被捕战友中，红旗派选择了原“省革联”头头之一，亦是机关职员造反派组织“省直联络站”负责人之一的项明为突破口。他自三月初被捕至此时尚未获释。红旗派为争取项明获释而爆发了一场绝食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原红卫兵广州兵团的一个常委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号下午，“中大红旗”、“革命钢杆”、“北航红旗”、“哈军工”等组织十多人，前往公安厅交涉关于释放项明的问题。（项明是“省直联络站”负责人之一，在三月被捕）。群众组织代表的意见遭到官方强硬的回绝，谈判成为僵局。为打开局面，代表向附近学校求援。邻近公安厅的二十一中首先得到消息，我即往现场咨询，并与主事人研究。当时人们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冲公安厅监狱（即劫狱），一是主张绝食施加压力。经讨论，后者获胜，因为这样做，会减少自己犯错误的机会，又可以事态的严重，迫使中央表态，使局势迅速明朗化。

五月三号凌晨，一支只有十来人的绝食队伍赶来。他们在公安厅大门贴出第一号绝食宣言，并在门前的空地席地而坐。

为了扩大绝食的影响，在黎明前，这支小队伍开到烈士陵园前门的大广场上。清晨，“二十一中东方红”的大部队率先抵达，他们兵分两路，大约八十人参加绝食，其余人开始从事大规模的宣传工作。上午八时，我串联到的广州兵团属下组织源源开到。消息传得很快，整个上午都有大队伍相继赶来，到上午十一时，绝食的群众已经使若大的广场有“人满为患”，估计人数两千余，大部分是中学生。

在绝食的圈子之外，宣传攻势正在迅速开展，大标语、传单、宣传车遍及广州每个角落，到是日下午，烈士陵园前的绝食及项明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这天黄昏，一批广船工人的队伍也开到了。“向工人学习”和“向革命小将致敬”的口号此起彼伏，绝食者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对这次行动充满信心。

“五三绝食”的“火线指挥部”是在绝食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后，才在“红司”司令部的主持下，仓促建立起来。指挥部分两班人马，一班是谈判团，负责与军方接触，他们以眼下的大规模绝食运动威胁军方就范，另一方面想方设法与北京保持联系。另一班人马负责宣传，他们必须随时把绝食的情况告诉市民，争取广大的同情，他们还要把谈判的情况向绝食者报告，鼓动人们的斗志，不使出现低潮。为了胜任这个宣传任务，美院学生李正天及“革命钢杆”的一批学生，组织了一个通讯部。开始时，这个通讯部人数不多，然而在几十个小时之中，竟奇迹般的发展和健全起来，在绝食结束时，它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有系统的机构。鉴于这个临时通讯部的效能和功劳，绝食后“红司”把它收编入司令部，遂成为著名的红司的情报和通讯组织——五三通讯社。该社出版的“五三通讯”是广州旗派的一份重要

的内部刊物。?当然在“红司”和“三司”内战期间，“五三通讯”在原则上是对三司封锁的。）

翌日中午，有几位女生在烈日的暴晒下晕倒，被送到中山医学院急救。这几位天真幼稚的绝食者在苏醒以后继续绝食，她们“不释放项明，决不复食”的山盟海誓使守护的医生和护士感其坚贞无不流泪，他们只好在病人再次晕厥之际，灌输葡萄糖以续其生。通讯组把这些感人肺腑的事绩编成独幕剧、歌曲、诗歌、快板，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宣传。这些应景之作虽然粗糙，却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第三天，绝食者接二连三地晕倒。指挥部负责人黄意坚（他也是绝食者）把体弱者转移到树荫底下喘息，由于饥饿，现场气氛渐转沉闷和消极。黄昏时分，数以万计的市民涌向烈士陵园，为绝食者助威。

军方对绝食的群众采取强硬的态度，他们拒绝释放项明，任势态发展。到五月五号，绝食告急，随时会出人命，但军方仍然固守立场，对步步紧逼的谈判代表不作丝毫妥协。军方认为虽然军区在三月中有错误，可是逮捕项明是正确的，因为项明是坏人。

群众代表则认为，如果军区拒绝释放项明，无异坚持其错误。

在当时，项明问题是两军必争的堡垒，倘若旗派攻破，则会得寸进尺，举一反三，大可干一番直捣黄龙的事业。军方对旗派意向已有明察，所以他们固守成命，决不开这个放人之先河。绝食途中，军管会副主任陈德曾到现场观察，要求旗派复食，放人之事于复食后协商。绝食者坚决回绝了军方的提议。势态至此，已成僵局，除非得到北京表态。

两千余名红旗战士生命垂危，但没有一个人动摇退出。十几辆救护车不时发出急促的钟声，把休克的绝食者送到医院急救。绝食现场成为整个广州的关注中心，军方不顾民众死活的举动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谴责。在旗派驻北京代表的敦促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中央终于出面斡旋。

五月六号中午，“中大红旗”接到周恩来总理拍来的电报，主要内容是：一．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二．抓错了人应该放；三．群众有意见，可派代表与军方协商。来电既经军方证实，项明马上获释。下午三时许，刚从公安厅监狱出来的项明，在烈士陵园的前门出现。饿了八十多个小时的绝食者和成千上万的群众欢呼雀跃，像欢迎英雄归来那样欢迎项明。历时四天的“五三绝食”，至此已告大获全胜。

第三节、力争“八一战斗兵团”平反

四月中旬，周恩来的广州之行已替“珠影东方红”平反，五月初经过红旗派的卓著斗争项明得以释放。在这有利形势的鼓舞下，广州红旗派又开始为“八一战斗兵团”的平反而努力。但这一行动也遭到军方顽固抗拒。

“珠影东方红”只是被打成“非法组织”，人员涉及也少，故平反阻力不大。“八一战斗兵团”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两千多人被捕，现如果平反，当证明军方三月间所作一切彻底错误，而且会带来种种不测的后果。故军方坚拒为它平反。虽然释放了一些人，但头头骨干仍然关押狱中。“八一战斗兵团”名义上还是个“反革命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营救狱中战友，红旗派中最勇敢的组织“红司”曾考虑过进行劫狱。四月下旬，“红司”总部曾召集多次会议，商讨冲公安局和劫狱的计划。“五．三”绝食后，六号晚上，军方和红旗派的代表按中央来电的精神在珠江宾馆举行会谈。红旗派代表提出释放在押旗派成员，被军方以拖延的方式予以拒绝。于是劫狱一说又被提起。旗派获悉军管会已把一批“犯人”移往郊区某监狱。据一位“公安红旗”介绍，此监狱防守严密，墙高，电网密布，瞭望塔上架有机枪。高墙外还有开阔地带。在通常情况下，劫狱如做梦。但考虑到此正是中央三申五令期间，军队未必敢向大批无武装群众开枪扫射，故有可能用人海战术冲进监狱，营救战友。但是这个计划实施起来有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果真正的犯人也乘机逃走怎么办？在一片混乱激烈的气氛中，这是很难控制的。这样，事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受到中央的否定甚至惩处。在反复的考虑之中，这些计划被一再搁置。显然，劫狱的动议是值得赞赏的，它反映了红旗派反政治迫害斗争的坚决。而没有真正付诸实施也是正确的。否则，红旗派会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甚至广州文革史也会因此而重写。

六月间，红旗派要求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呼声已形成高潮。有关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街头，一些红旗派的大组织还组成平反调查组，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如被捕人数，“八一战斗兵团”的成员构成，做过一些什么事情，用以说明它是革命群众组织却遭到军区错误的对待。

在红旗派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六月二十三日广东省军区发布了“关于‘八一战斗兵团’的说明”，坚持认为“八一战斗兵团”被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所操纵，在运动中干过许多坏事，证据确凿，确实是反革命组织。并声称取缔它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此外，“说明”也降下调子，表示军方已区别对待“八一战斗兵团”的一般成员和极少数坏头头，并摆出一付和善面孔说“八一战斗兵团”的受蒙蔽群众精神上不要有负担，应振作起来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云云。

军方的“六．二三说明”立即受到红旗派的批驳和揭露。与北京高层有联系的“中大红旗”已获知，军方把“八一战斗兵团”定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事先并未获准于中央。这使红旗派更敢放开手脚干。街头一波一波的大字报都严厉谴责军方制造谎言。

“红司”系统的“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红色暴动”、“工联中南林分部”冲得最前。他们发表“关于‘八一战斗兵团’的严正声明”，强烈驳斥军方，并要求军方立即公布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的数据，看站不站得住脚。在一片同仇敌忾的气氛中，有的红旗派组织已断言，“八一战斗兵团”非平反不可，而且军方还须为它的错误承担责任。实际上，不等到正式平反，许多基层单位的“八一战斗兵团”已恢复其组织，亮出旗帜，戴上袖章。军方对此已无可奈何，但仍顽固守着它的败瓦颓墙。

六月二十九日，“红司”、“工联”、“新一司”、“红旗贫下中农”等组织数万人在体育场自行召开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大会。会议气氛极为热烈激昂，旗帜招展人潮汹涌口号声震天。“八一战斗兵团”的代表上台发言并宣布重树“八一战斗兵团”大旗。

七月间红旗派的斗争声势不衰，一些很具份量的文章不断出现。如“红色暴动”的“历史宣判‘八一战斗兵团’无罪”，“暨大东方红”的“八一战斗兵团十大功绩”等等，使平反斗争形成持续高潮 。

在红旗派为解救无辜受迫害的民众而努力奋斗时，总派在一旁干着它们的拙劣表演。红旗派“五．三”绝食时，他们仍用宣传车大叫“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绩辉煌，”“绝食只能触及肚皮，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饿死活该!”等等。此时红旗派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而呼喊时，总派除继续弹“三月东风浩荡”的陈词滥调外，还声称为反革命组织“八一战斗兵团”平反是反革命复辟的具体表现。气势汹汹地责问，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总派的这些行为充分地表现出文革中的保守派完全是中共原有社会秩序的卫道士和中共政权中最凶残顽固一翼的打手爪牙的特质。这些爪牙打手在未能用语言文字把红旗派压下去的情势下，再加上军方的暗中唆使，终于使用了暴力手段。

总派的武装压力并没有使红旗派放弃平反的努力。七月下旬，由于武汉军区的垮台，一方面给广州军方头目带来若干心理的压力，一方面武汉的造反派纷纷南下广州，援助广州的造反派战友，使红旗派声势更振。七月二十九日，自行恢复的“八一战斗兵团”竟发出“关于敦促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迅速改正错误的声明。”措辞极为严厉。声明若不为“八一战斗兵团”彻底平反，立即释放其领导人莫竞伟，将在适当的时候，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军方负责。八月三日，军方在造反派的强大压力和全国范围对军方不利的气氛下不得不释放莫竞伟。

八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广州红旗派代表。有代表对周恩来说：“‘八一战斗兵团’被打成反革命，至今未得平反。”周恩来听后立即说：“好，现在给它平反。”说着拿起一支红铅笔在“八一战斗兵团”的名单下面划了一条红杠扛，并说：“我给你们划上红的，好了，‘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了。”全场掌声雷动。消息立即传到广州，红旗派士气更振。九月十八日广东省军区终于不得不颁布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公告，承认“八一战斗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取缔它是错误的，并向它的全体成员赔礼道歉。十月十四日在越秀山体育场

召开为“八一战斗兵团”彻底平反大会。大会有二十万人参加，是广州红旗派一年多的奋斗历程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真正是人海、旗海、心海。人群的欢呼声、口号声山摇地动。至此红旗派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斗争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显然，“八一战斗兵团”得以平反，系有赖于两个缺一不可的因素——民众的强烈争取和毛中央的支持。毛中央并不主动责令军方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故若民众不作强烈要求，此案也会维持原判。但若无毛中央的支持，手握重兵的军方决不会屈服于民众的呼喊，民众也无力强迫军方就范。

针对这种情况，或许有人会质疑，依靠毛，这个中共专制政权的最高主宰来反对地方上的次级主宰是否值得称道？或简言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否有正面意义？

诚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社会的发展从专制制度到民主政体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认为民众的抗争行动必须指向“皇帝”才值得赞扬，这是很不现实的看法。中国当代的“皇帝”有两个，一是毛本人，一是中共政权，在那个时代这两个“皇帝”都是决不可以反的。且莫说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觉悟水平还未到反“皇帝”的地步，即使是很少数有这个觉悟水平的人也不敢表露出来。因为一旦暴露，就会被剥夺生命。对极少数荆柯式的英雄人物的壮举，当然可以表示赞叹，但不可要求广大民众去效法他们。而且那些壮举大多并无实效。“荆柯”们被秘密抓捕又被秘密处死。“皇帝”的威势丝毫不受冲击和削弱。然而利用“皇帝”与贪官之间的嫌隙，利用官僚统治阶级内部产生裂痕的历史契机去接受“皇帝”的庇护，打击贪官乃是在某一程度上争取民众利益和削弱“皇帝”社会基础而又可尽量减少民众自身损失的最佳途径。现今，第一个“皇帝”毛因自然原因早已永离人世，第二个“皇帝”的威势也相当式微。这正是多年来民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累积效应。当第二个“皇帝”式微到一定的程度，觉悟水平已够的民众便会起来终结它。而且不会因实施这个终结行动付出太大的代价。再则，如果民众连反贪官的意识或行动都没有，或如现在某些人那样，认为只有好官，并无贪官，那么他们又从何去谈“反皇帝”呢？

即使我们暂抛开这些宏观道理不谈，就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红旗派的行动也完全是正确的。“八一战斗兵团”的许多头头骨干还关在大狱里受苦，大量的一般成员还背着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的黑锅。“阶级斗争”的利剑随时会掉下来斩向他们的头颅。这个时候是应该去反具体迫害他们的次级主宰，还是去反并不直接迫害他们，甚至在某一程度上庇护他们的最高主宰？答案不言自明。否定文革中的造反派依靠最高主宰去反对次主宰的正义性是一种最不顾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的高调空谈，对中国民主事业也是极为有害的。

相对于造反派，保守派则是既不反“皇帝”也不反“贪官”。岂止不反，还充当“贪官”的辩护士，乃至打手、爪牙，助纣为虐，去打压敢于起来反那些次级主宰的造反民众。他们的这些行动毫无疑问，是非正义的。然而令人极为错愕的是，他们几乎不受谴责，一些人责难的唾沫总溅到造反民众的身上，难道历史瞎了眼睛？

说来广州红旗派也有比其它地方造反派幸运的地方。那就是当年迫害、镇压过他们又受到他们激烈反对的广州军头黄永胜、刘兴元、孔石泉、黄荣海等人都因与林彪体系有瓜葛而倒台。红旗派总算少背一份迫害中共好干部的罪名。武汉的造反派就不同了。把武汉“钢工总”打成“反革命”的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因行动过于鲁莽，开罪毛中央，而受惩处。但七六年毛归西，四人帮倾覆，及至邓小平复出后，陈等人重获正面评价。虽因年岁大未官复原职，但也荣耀有加。于是陈再道们的对头“钢工总”等武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就更多了一份罪名。王绍光先生所著《理性与疯狂》一书对武汉造反派大加挞伐，直至把武汉造反派称为四人帮的“走狗”。不少人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多为软骨病患者，看来也不尽然。王绍光骂起造反派来，不是筋骨强劲，腰脊挺得很直吗？或曰王先生长居海外，当不属为中共豢养之辈。然而世间之事常为雾里看花，外人何以能洞悉个中奥妙，深究这些也毫无必要了。

第六章 六七年盛夏——血肉横飞的日子

第一节、几次大型暴力事件概述

从暮春平反中恢复并发展壮大的红旗派与总派的摩擦日益尖锐。其情形就是前文所比喻的狗和主人与汉子。春末夏初，总派已数度使用暴力，除前文已述及的四月二十二日“地总”、“主义兵”攻击 “中山医东方红”的事件外，六月十五日，广船“地总”也围攻该厂“工联”打伤二十多人。五、六月间，六中、铁中、二十八中、四十六中等校的“主义兵”突袭各校的旗派学生，被袭者伤员累累。至七、八月间，广州发生了多次大型的暴力事件。现将它们作如下的简述。

一．“七．二?”华侨糖厂惨案

七月十九日，数名旗派学生到座落在广州西郊的华侨糖厂串联，并写支持该厂“红旗工人“的大标语。该厂总派进行阻拦，并唆使一班十几岁的农村小孩上去捣乱。双方由辩论而至冲突。混乱中一小孩受了点轻伤。二十日，总派挑动当地农民围攻该厂“红旗工人”，砸了“红旗工人”的总部。这些农民属 “广州郊区贫下中农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简称“郊贫联”)。“红旗工人”几十名成员撤出总部，退守临江大楼。人多势众的“地总”遂对临江大楼予以包围、封锁、断水、断电、猛攻，并动用了长短枪。二十一日市内各旗派组织闻讯前往解围，但遭“地总”、“主义兵”截击，多人受伤。旗派欲从水路接应厂内被包围者，也被“地总”的巡逻船截击或撞翻。至二十一日下午，被包围的红旗工人才得以在支持下突围而出。在这场暴力事件中，旗派有八人死亡，其中一名是该厂支持旗派的副厂长。另有三十多人受伤。

二.“七．二三”中山纪念堂惨案

总派的“七．二一”暴力屠杀，激起了广大红旗派成员的极大愤慨。各旗派组织议定于二十三日下午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死难者追悼大会。开会的公告于二十二日广为张贴于街头。“主义兵”获此讯后，决定予以阻挠。在此之前“主义兵”已拟定二十三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总部成立大会（以前的是临时总部）。中山纪念堂位于进入越秀山体育场的必经之路。于是“主义兵”决定在召开总部成立大会，人员集中的有利条件下给旗派一点颜色看看。二十二日夜间，“主义兵”已运进大量砖头、贮放在纪念堂内草地上。二十三日上午数千“主义兵”陆续集结在纪念堂围墙内并携带有匕首、长矛（锯尖了的水喉管）、木棍、小口径步枪、军用步枪。

中午参加追悼会的旗派队伍陆续到达。他们大多在纪念堂东侧的道路上稍事停留，整理好花圈，再集队进场。而这时早有预谋和准备的“主义兵”便上去寻衅，并大打出手。旗派自卫还击，但由于没有武器，仓促间很快遭到杀伤。第一位死难者是“红旗工人”吴振华，被“主义兵”一刀刺破颈动脉，鲜血喷射而出，立即身亡。旗派的开会队伍系各单位自行前往，人数有限。故每一次冲突，“主义兵”都可集中优势人力来杀伤他们。还有许多旗派被抓入中山纪念堂内杀害。下午三时许，旗派各组织源源到达。“主义兵”遂收缩于围墙之内。旗派想冲入院墙内救出被捉战友，遂发动冲锋。而他们手中所持武器只是临时拆大字报棚弄来的竹杆，故每次冲锋都被“主义兵”用贮存在院墙内的砖头和步枪击退。旗派并又添死伤。下午五时许，闻讯而来的旗派愈来愈多，也有了一些水管长矛之类的武器，他们把中山纪念堂团团围住，形势开始对“主义兵”不大有利。这时，一直袖手旁观的广州警司则派兵到达现场把“主义兵”和旗派隔开。傍晚，“地总”开了许多卡车来把纪念堂内的“主义兵”接走。

“七．二三”惨案中，旗派死伤人数比“七．二一”更多。有五十多人被杀。受伤需住院治疗者达四百多人。其它轻伤不计其数。“主义兵”把他们在“红色恐怖运动”的狂暴加倍发泄出来。杀人手段凶残无比。如“暨大红旗”的林财源被刺数刀，倒地后仍被刺杀，肚破肠流而死。广钢工范炎祥被用刀刺入胸膛，再顺势一拉，创口达一尺多，如剖腹一般，鲜血喷射出来，即刻毙命。被抓入纪念堂内的旗派被吊死，用飞刀刺死，割耳朵。现场在化装室和地下室。事后，旗派进入地下室，发现仍有多处血迹和寻获十一只被割下的耳朵。后这些耳朵被送往中山医。笔者曾到中山医看见这些保存在药水瓶内的耳朵。

根据当时的传单披露，“主义兵”还把抓进纪念堂的旗派女学生轮奸，割去乳房。但由于未列出受害者具体姓名、所在单位、故不知是否确实。

三.“八．一一”德宣路惨案

八月十一日，十七中井岗山二十多人乘一辆汽车经德宣路省人委门前，突遭“地总”伏击，弹如雨点，五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其中有“井冈山”常委王希哲。其后又有多部旗派车辆在通过该地段时被“地总”伏击。“工联”死两人，“中山医东方红”死三人，伤多人。其中“中山医东方红”的熊德光被抓入省人委后被吊死。

四.“八．一三”珠江惨案

八月十三日，二十一名无武装的旗派人员乘一小艇，欲上“湛江???”号船联系事务，但找不到接头人，便驾船离去。此时附近几艘“地总”控制的船上警铃声大作，有人大叫“打劳改犯”，接着机枪就扫过来。二十一人齐叫“我们不是劳改犯。”但枪弹仍如雨点，许多人当场中弹身亡，艇被打坏翻沉。落水后受伤者在沉浮之间仍遭射击，如打活靶一般。最后的结果是二十一人中，十八人被击毙，仅三人游上岸生还，但亦负重伤。

“八．一一”、“八．一三”惨案与“七．二三”不同点是事件经过较简单。旗派遭伏击屠杀的皆有姓名和所属单位可查，十分确切。

五.“八．一八”省总工会事件

省总工会大楼位于海珠桥附近的珠江河畔，当时是该地区最高建筑。此制高点被“地总”占领，构筑了巩固的工事。八月间广州市中心地带均为旗派势力。对于这个插在心脏的总派据点，旗派欲除之而后快，更何况总派常常从这里向附近的旗派据点打冷枪，旗派屡有伤亡，不胜其扰，终决定以全力拔除之。

八月十八日晚间，旗派集中力量向防守坚固的省总大楼强攻。一声令下，各种枪支一齐开火，似暴风骤雨一般，然后实施火力掩护下的冲锋，一层一层地往上攻。此外，还从省总大楼旁边的二轻大楼（早已为旗派占据）搭梯攀入省总大楼的窗户，施行飞兵突击。“地总”告急，正在北京谈判的“地总”代表向周恩来告状，周电令旗派停止攻击。旗派一面应承，一面准备以火攻最后解决。危急之间，广州军区派兵赶到，保护总派困守者彻出。省总工会大楼遂为旗派掌握。此事件是六七年夏一连串大型暴力事件中唯一由旗派发动的。事件中互有伤亡。

六.“八．二?”大惨案

八月二十日晨，旗派许多组织都接到“红司”或其它总部的电话通知：立即到石井海军仓库搬枪。那里枪多，而且防卫松，可以搞到很多枪。各旗派组织接此讯后，纷纷集结人员，乘车分批前往。但不料一出广州市，从三元里建航电池厂到新市一线长达五公里的地段都是

“总派”的伏击区。“地总”、“主义兵”、“郊贫联”、“春雷”早已布置人马火力。有旗派车队经过，立即开火伏击。即使有的旗派车辆冲过了前一个伏击区，后面还有第二、第三……个伏击区，怎么也逃不掉。显然，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安排的。

一位“八．二?”惨案的幸存者，铁路中学红旗公社红卫兵向我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六七年八月二十日清晨，我们几个人正在东山铁路文化宫附近的小食店吃早餐。这时突然有个同学跑来喊道:“快点,‘红司’总部打来电话,叫马上集结开车去石井海军仓库搞枪。”我问他,“消息确实吗？”他说:“保证确实。总部还说多带人少带枪。”“什么意思？”我问。他说:“少带枪去才能多背些枪回来嘛，这还不明白？”很快我们集结了五十几人，有铁中、十八中、女中的，分乘两辆“解放牌”前往。我在后面那辆车。车上的人兴高采烈，都以为这次一定大有收获。全车二十几人只带了一支冲锋枪。

行至三元里温泉，突然随着一阵激烈的枪声，子弹从温泉建筑物里射过来。前头那辆车立即失控翻倒路旁水沟里。我所乘坐的那辆车加大油门冲过去。身后枪声仍响个不停。事后得知那辆车上三死十几伤。我们那辆车沿公路北上，两旁不断有枪声响起。我明白伏击线相当长，势态严重，因这一带全是总派“郊贫联”的势力。车驶至棠溪斜坡弯道时，右边山坡上枪声骤响，我车的发动机和轮胎全都打坏。我右边坐的两人全都负伤，流血不止。车箱里也有人中枪，一片慌乱。由于火力主要在右侧，于是我叫大家放下车左边的挡板跳下车卧到路边的水沟里利用死角掩护。但不料身后又有枪声响起，又有人中弹呻吟。我想完了，像这样给人当活靶打，今天这二十几人全都会死在这里了。当时确实紧张万分，心跳得像打鼓，头皮发麻，死到临头的感觉可不是闹着玩的。突然，绝境之中，我心生一计，叫大家立即将所有旗派的袖章、证件都丢掉，然后我用普通话大叫:“喂，我们是主义兵，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开枪打我们？”我喊了一阵后，枪声稀疏下来，接着听到一个乡下口音的广州话在叫，“大队有令，停止射击。”然后向我们叫，如果你们是主义兵，就排着队走过来。由于诈称成功，我们的胆量壮起来，操着普通话骂个不休，要他们立即开车把重伤号送往医院。这时我突然有一个想法，看来还是政治感情比地域情绪强。记得前几年我们铁中、铁小的北方籍子弟经常跟附近农村的居民起冲突。起因都是他们寻衅，那时我已深感广州的地方主义排外很利害。但现在看来两样了。我们的北方人相貌和普通话救了我们的命。

当然乔装“主义兵”不能持久，“郊贫联”也很聪明，一方面招呼我们吃午饭，一方面通知铁中“主义兵”来领人。正牌“主义兵”一出现，我们这班冒牌“主义兵”立即露馅。各人少不免挨几下拳脚。所幸重伤员已送去了医院，挨打也值得。稍后，“主义兵”把我们押送去北站“春雷”据点。路上我们都被蒙上眼睛，跌跌撞撞地走着。半路上我左臂被匕首刺了一刀，留下永远的伤疤。在“春雷”据点关押了两天。据说由于旗派的北京谈判代表力争，周恩来责令总派立即释放“八．二?”惨案中的被抓者。二十二日，我得以安全走出“春雷”据点。但钱守廉等人已于二十日被枪杀，遗体并被扔入水溏。三天才浮出水面，全身肿胀，五官走样，几不可辨认。后来我曾问过那位通知去石井搞枪的同学（他也受伤）。他回答说，电话是千真万确。不过后来查询，“红司”总部说根本没有打过这类电话。其它接电话前往的组织在事后的查询中也得出同样的结果。因此，那些电话很可能是一个大阴谋的组

成部份。目的是把旗派的勇敢分子诱入伏击圈加以消灭。

“八．二?”惨案与“七．二三”一样，也是情形极为混乱纷杂。旗派遭此伏击，伤亡惨重，一片悲愤忙乱，以致未有精确的死伤统计数字。有的统计说死一百五十几人，有的说死七、八十人。伤者人数的多少不大重要，因若伤愈，生命仍存，死者则永远告别人生，坠入无边的黑暗了。

七．“八．三一”水厂事件

广州西部边陲的水厂两派为“地总”和“红旗工人”。前者占据解放大楼，后者占据造反大楼。西村地区总派占优势，它早已想把旗派势力逐出。经过策划于八月三十日夜向造反大楼发起猛攻。一声令下，轻重机枪、冲锋枪一齐开火。“红旗工人”不及防备，十分危急，遂对外广播求援。但在密集的火网中，两名广播员均中弹，其中吴耀辉当场死亡。

“广铁总司”闻讯派出几辆车前往解救，但“地总”、“主义兵”封锁了路口，无法通过。其中一辆自制装甲车强行突入后，却被“地总”成排的穿甲弹击中，车内五人当场死亡，另有六人重伤，但其后也不治身死。三十一日旗派组织力量反击。以中学生的“红卫兵广州兵团”为主力，还有“八一战斗兵团”、“广铁总司”、“中大红旗”、“三司”等组织配合行动，遂一举击败事件的挑起者，解救被围困的“红旗工人”等，并顺势拔除“总派”在西村的一些据点。“八．三一”水厂事件的特点是在“总派”挑起暴力事件后，已奉行“文攻武卫”的旗派再不像“七．二?”、“七．二三”惨案那样被残杀，而是有力量予以反击，并取得胜利。

八．“九．二”太古仓事件

位于广州河南的太古仓为旗派组织“红旗革联”所掌握，但它四周均为总派势力。情况与西村水厂类似。“总派”也早就处心积虑要拔除这个旗派钉子。九月一日，“地总”和“主义兵”向太古仓发动猛攻。“红旗革联”武装和人力都十分薄弱，遂退出总部，坚守另一较坚固阵地——八仓。“总派”此时已拥有六?炮、平射炮、加农炮。它猛烈轰击，太古仓一片火海。大量的粮食、货物毁于战火。九月二日，旗派终于不支，在市区旗派的支持掩护下，退出了太古仓。

九．“九．一一”惨案

九月十一号，总派成立“工革会”，以对抗旗派工人成立的“工革联”。当“总派”的队伍乘车向越秀山体育场结集时，已与市区沿途的民众发生冲突。当时有个普遍情况是，许多

居住在市区，而在郊区工厂工作的工人慑于厂内总派势力，便加入总派做个挂牌成员，或不参加任何组织，做逍遥派，但当他们下班回到家里，便恢复其旗派观点，故市区里旗派占极大优势。总派成立“工革会”的游行队伍要在市区招摇过市，就很难不与市区民众起冲突。当总派队伍途经中山路一带时，既有群众从附近楼房上向他们仍垃圾，也有人群自动汇集起来堵塞道路使其队伍不能通行。“地总”和“主义兵”们见状大怒，用车撞向人群，并开枪射击，丧心病狂地向人群密集处投掷手榴弹。致使民众十三人死亡，一百五十五人负伤，须入院留医。这一次由于已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旗派的善后工作做得相当完备，死亡和受伤人数都有精确的统计。不再像“七．二三”、“八．二?”那样只有个大概数目。

在人性中最恶劣因素和中共阶级斗争毒素双重作用下铸造出的“主义兵”暴力分子犹如嗜血的野兽。除了以上一些大型暴力事件外，总派还干了许多血腥的勾当，其中多为“主义兵”的杰作。如八一中学“主义兵”董某等人从市一宫驾车外出兜风，发现路边有两名戴袖章的学生。由于天已薄暮，看不清是什么组织的袖章。董问旁人：“是旗派，还是我们自己人？”答曰：“在这个地区怎么会有我们自己的人？”“好，他妈的，干掉他！”董??抡起冲锋枪，一梭子扫过去，那两人全都倒在血泊之中，一死一重伤。

有一蒙姓旗派中学生，（是个体弱的文斗派，被一群不相识的“主义兵”随兴抓到，并殴打一顿后拉去郊外枪决。车开到郊外，“主义兵”对蒙着双眼的他说：“放你走，滚吧！”小蒙下车，趺趺撞撞地跑，这时枪声大作，他感到右臂如被人打了一拳，头一炸，就失去了知觉。

半夜凉风把他吹醒，遂忍着剧痛向附近一间有灯光的房子爬去。这是一间仓库，仓库守夜者恰是“红旗工人”，他们把小蒙送往医院，救了他一命。半年后，笔者见到了小蒙，查看他头上的伤疤，是一条切线沟。当时头骨是打裂了，但幸未伤内脑。“主义兵”大概见他两处中弹，而且有一弹击中头部，鲜血直冒，当必死无疑，便没有上前补枪，开车驶去。小蒙得以捡回一条命，而他始终也未知道杀害他的是何校的“主义兵”。

这样一类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第二节、总派使用暴力的原由和实质

广州地区的派别间暴力事件与其它许多地方一样，都系由保守派一手挑起。这一事实已无可置疑。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保守派为何要使用暴力？

从四月中旬以来，红旗派不但组织上迅速恢复并发展壮大，其舆论上也愈来愈占有优势，享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同情。五月间，市区的大字报、大标语以表达红旗派的观点为主，到六月份，表达总派观点的宣传品已十分罕见。对此，具有政治优越感的总派十分愤怒。但他们无法打破这个局面。在语言文字上，他们根本不是红旗派的对手。

大学生中，红旗派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中学生里，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结合一班工人子弟而成的“主义兵”在文革前的课堂上已乏善可陈，而以知识分子子弟为骨干的造反派平民红卫兵，文革前许多人都是学习上的优等生。写文章对他们不是难事。机关、文教科研单位中，尽管逍遥派多，但造反派仍比保守派占优势。工厂里，较有知识文化的人群中，也以参加造反派的为多数。从舆论宣传的内容来看，红旗派有许许多多的题材，控诉当权派执行了“资反线”迫害群众；揭露了中共高官奢华的特权生活；要求为无辜被害民众平反的呼声；申诉个人所受的迫害；关于“三月黑风”中群众所受镇压的调查报告，抨击军方及保守派在“三月黑风”时期的所作所为；披露中共党内斗争的秘辛；传抄中央首长讲话及各类简明快讯、小道消息；还有继续批判“血统论”，以新的角度来解释党的阶级路线的文章，等等，真是五光十色，五彩缤纷。反观保守派，他们讲来讲去就是那么几句“三月东风浩荡”，“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陈词滥调，令广大民众闻之生厌。以上这一系列因素加起来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红旗派排山倒海的大字报、大标语前，总派是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是六七年春夏，是中共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向最为毛戒备的社会知识群体受到毛及中央文革派的青睐。因为后者想利用前者。这个群体对中共原有社会秩序早具不满。当其与劳工群众中的一部分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对旧有社会秩序的极大冲击力量。而毛及中央文革派把他们想清洗的省市级高官视作旧秩序的代表。于是这上、下两股斗争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的力量形成了暂时的联合。

以旧有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为骨干裹胁着一部分劳工群众所形成的保守派，此期间暂时受到毛及中央文革派的冷落，因为它们在这场政治清洗中起不了什么作用，有时甚至是阻力。周恩来四月十八日讲话中的一些内容对此已有明显表露。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使总派不但在舆论上处于绝对劣势，甚至在政治上也占不了优势。

一向以根正苗红自居，甚具政治优越感的总派头头骨干们不能接受这一现实，他们愤懑以至狂怒。他们要改变这一现实，要打下红旗派的气势，要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用语言文字无从实现这一目的时，他们很自然地倾向了暴力，而他们之中最凶悍的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则充当了先锋。

二．保守派为何敢于使用暴力？

这有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两方面在起作用。保守派自恃出身好，成份红，政治等级优越。

他们对造反民众有着极深的阶级歧视和政治歧视。他们认为造反无好人，好人不造反。造反的都是些出身成份差，一贯表现落后，犯过错眨瑢　h 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家伙。这些人就算不是正牌的黑五类、阶级敌人，也差不多少了。另有一些人即使出身成分不差，但个人主义严重，或是个人野心家，与那些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的坏家伙同流合污了。六六年秋冬以来，政治形势在他们眼中变得有点怪异。他们亦感迷茫和焦躁，但内心仍怀着一个信念，共产党的江山不会垮，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变色。他们仍然是这个江山的捍卫者，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基础。故此当他们使用暴力来对待造反者时，心里很坦然，感觉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确正义的事情。武汉地区的保守派"百万雄师"在这方面表现得最鲜明。当他们头戴蓬帽，手持长矛，刺向手无寸铁的造反者时，其战斗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造反者和地富反坏右在他们眼中全都是一样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显然他们这些共产党江山的捍卫者去杀戮那些牛鬼蛇神时，是用不着犹豫手软的。

物质因素则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保守派有纠集起首先使用暴力的能力。武汉地区六月间发生的一连串暴力事件，说明武汉地区保守派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潜能。而广州与之有所不同。广州总派同样能纠集起暴力队伍，但主要成员并不只是工人。武汉地区保守派组织的头头可以用欺骗、挑动、操纵等手段，驱使一些同样是身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劳工群众去向自己的阶级兄弟砍杀，并且他们还会在受到反击而产生的报复情绪的催化下，迅速陷入毫无理性的政治意味淡薄的纯暴力行动 中。然而广州总派的头头却较难办到这一点。

武汉与广州两地工人的构成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相当一部分是居住在郊区，其中很多是由征地转变成工人的前农民。后者的工人几乎都是世居在市区的市民。故此广州工人比武汉工人有较高的文明水平。更兼广州人的性格冷静、实利，不似武汉人毛躁，这就使广州总派想在工人组织中网罗大数量的暴力分子确有困难,。广州"红总"基本不使用暴力。"地总"使用暴力的能力也有限。它可以拉出几万人的队伍去游行示威，但在一次战斗中想拉出几百人去作战（尤其是在使用枪炮之后）并非易事。于是在广州地区总派对红旗派的屠杀中，十六、七、八岁的"主义兵"的武功并不比工人老大哥"地总"逊色，甚至锋头更劲。

广州"主义兵"在政治意识上是北京"联动"式的组织。即自恃红五类血统高贵，歧视非红五类，尤其欺侮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六六年八月广州的"红色恐怖"运动就是他们所为。故在广州大多数市民心目中臭名昭著。大半年来他们的组织日益涣散。甚至有少数人成 立"红革会"，站到红旗派一边来。但是相当数量仍坚持其意识形态的败瓦颓墙。在学校里无法立足的情况下，便下厂下矿走所谓与工人（地总）结合的道路。而其中少数人为失败的狂怒所驱使，迅速走向暴力一途。

"主义兵"与"联动"又有许多的不同。"联动"是纯高干子女组织。"主义兵"虽以高、军干子女为头头、骨干，但也有许多工人子女参与其中。"联动"公开攻击江青、中央文革，冲击公安局，甚至高喊"刘少奇万岁"，而"主义兵"没有这些作法。究其因，"联动"成员

中许多人的父辈已被清洗，而“主义兵”则不然。这样就导致“联动”与“主义兵”有不同的命运。“联动”被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主义兵”则仍受广州军方的袒护、纵容、支持，而一直存在。六八年大镇压后，几乎所有的中学生（从文革前夕的初中一到高中三）全都下乡做“知青”。但仍有不少“主义兵”留城分配到工厂。另有少数军干子弟参了军。他们大多数很受工厂党组织的青睐，宠爱，得到栽培。八十年代以后，他们更作为“第三、

第四梯队”被提拔重用，目前身居厅、局级的不乏其人。

“主义兵”号称万人，据悉实际数目为六、七千。但即使其中只有十分之一为暴力分子也就非常惊人可怖了。这些正处于人生中最敢于蛮干的年龄层的“斯巴达”少年，在向“希洛人”开战时，下手是极为残忍的。广州总派有“主义兵”正弥补了广州总派工人暴力分子较武汉“百万雄师”的不足。

除“主义兵”外，总派还有号称三十万人的大组织“郊贫联”。这是一个比“地总”、“红总”、“省直大联总”等更为纯粹的官办组织，是由从郊区（相当于县级建制）到公社，再到各大队，生产队的武装部，武装民兵营，民兵排为骨干于三月份在极短时间内突击组织起来的。旧有的社会秩序没有丝毫的变动。当时郊区约有四十多万人口，所谓三十万，当是把凡属贫下中农成份的八十老翁和一岁婴儿都包括进去了。这个“郊贫联”的确是总派的后盾.。他们也介入暴力事件，如“八．二?” 惨案。只是由于广州暴力尚未彻底展开，他们的武力也未完全用上。而像广西，“联指”之所以能把“四．二二”彻底打杀，原因之一就是靠了保守派里的“农民 军”。

物质因素的第二个方面是军方对总派的具体支持。当总派对红旗派下手得逞时，军方袖手旁观，任由其杀戮。红旗派请求他们调解制止，则诸多推搪，如“八．二?”惨案。若总派处于不利形势，则积极为之解围。如在“七．二三”事件中，当遭到突然袭击的红旗派反应过来，增援队伍陆续到达后，军方即派兵把中山纪念堂包围，不让红旗派人员冲进去。又如“八．一八”事件中，由军方派兵护送镇守省总工会大楼的“地总”、“主义兵”离去。

物质因素的第三个方面是总派首先获得武器，并继而获得相对红旗派更优良的装备。当红旗派还是赤手空拳时，总派已装备了长矛、铁棍、砍刀。当红旗派开始制造这类冷兵器时，总派已从各大工厂的武装部门中取得了枪支。当红旗派很艰难地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才抢得一些枪支时，保守派已拥有了机枪大炮。

三．保守派使用暴力的实质

保守派首先使用暴力杀戮造反派，后者在遭受惨重死伤后起而自卫。多年来人们一直把这一情况称之为“武斗”。其实这种讲法并未能说明事情的实质。“武斗”一词含义模糊，它

仅是指双方用武力互斗，既没有说明暴力由谁挑起，更没有肯定防卫者的正当权利。从保守派敢于使用暴力的心理因素来看，这决不是什么“武斗”，而是维护原有社会秩序的保守势力对造反民众的镇压和屠杀。典型保守组织（如武汉“百万雄师”、广州总派）的骨干是中共官僚统治阶级的延伸和中共专制政权的社会基础。在这文化革命的非常时期，在各省党政组织暂时瘫痪而军方又暂不便直接出面的情况下，镇压“反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重担便落在他们的肩上。当然，具体在暴力现场杀伤造反派的保守派成员，大多仍是普通的劳工群众，其社会地位与造反民众相同。但这并不改变暴力的性质，因为性质决定于暴力的主使者，正如当年湘军与太平军拼杀的战场上，双方的士兵大多都同是贫苦农民。但这并不改变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本质。（这里暂不涉及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

从许多暴力事件的具体过程来看，也可清晰表明这是保守派对造反派的镇压和屠杀。因为这些事件大都是保守派对造反派施行突然袭击和伏击，是在造反派赤手空拳和缺乏戒备的情况下对其施予暴力。“七．二三”、“八．一一”、“八．一三”、“八．二?”都是如此。在探讨文革暴力事件中，仅仅以事件展开后，双方都以武力相向为根据就笼统谓之为“武斗”，各打五十大板，而妄顾暴力事件的挑起者与防卫者之区分，不深入探究暴力行为之实，那是十分肤浅的、不负责任的。而且在法理上也完全站不住脚。

第三节、“文攻武卫”辩

多年来，许多文章一谈及“文攻武卫”就痛加伐挞。理由无非是，这一口号系由江青提出，大大加剧了武斗。

事实并非如此。江青是在七月二十二日提出这一说法。那时由保守派挑起的暴力事件已很严重。四川有“产业军”大肆开枪屠杀无武装的民众。在武汉有“六．六”、“六．八”、“六．一三”、“六．一五”、“六．一七”、“六．一九”一连串暴力事件。由于武汉军区公开支持“百万雄师“（广州军区是半公开或暗中支持总派）杀伤造反民众，武汉钢、新两系造反派已呈危局。及至“七．二?”事件爆发，物极必反，武汉军方头目陈再道等及“百万雄师”垮台。江青在这种情况下，有感于全国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均在保守派的打杀下伤亡惨重而发“文攻武卫”一说。

“文攻武卫”的口号完全合乎法理。任何人在受到攻击伤害时可以实施自卫行动，此即所谓“正当防卫”。在攻击者已使用了武器的情况下，赤手空拳根本无可自卫，故用武器抵御攻击，完全属“正当防卫”的范畴。何罪何错之有？难道在保守派的杀戮面前，造反派只有引颈受戮或望风而逃，举手投降才算正确？

挞伐“文攻武卫”的第二个理由是，此口号系由江青提出，江青是坏人，故此口号也坏。

一个口号的正确与否，当以它自身的内容是否符合法理来考虑，不可因人废言，更何况关于对江青此人的评判，目前由中共复旧秩序派所诱导出来的社会主流意识极不公允，彻底

弄清这些当可写成一本专著，此处只作简单涉及。

江青在文革中做了两件大坏事，使之背上骂名，一是大整中共元老，二是大整三十年代的上海艺术界名人。前一个大整是既为毛的清洗效力，也发泄这些元老多年来轻视、压制她的怒气，并期望整掉这批元老，以形成许多权力真空由 她的势力去填充。后一个大整是为了洗刷掩盖她在三十年代不光彩的历史。说来这两件只有后一件才能算是大坏事。江青大整中共元老其动机当然并不高洁，但其实质也只是中共统治阶级高层内的争夺倾扎。假如你不是站在元老们的营垒上，又何必对此义愤填膺？这些中共元老是什么货色？如果说在六、七十年代仍看不清晰的话，那到了八、九十年代其嘴脸还不一目了然？如果说在中共第二代"革命者"中，还能找到胡耀邦、赵紫阳、胡绩伟这样少量愿意向社会进步潮流靠拢者，那么在元老辈中则绝无一人。无论是较为宽厚的习仲勋或横蛮粗野的王震，无论是貌似廉洁的陈云还是骄奢淫侈的叶剑英全都视民主为异端邪恶。其总代表邓小平在八一年彻底镇压了七九民运后又于八九年大肆屠杀人民，则集中表现了中共元老辈的本质。说来我们不但不应该谴责江青在文革中大整中共元老，而应遗憾她没有力量整得彻底。英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受封建贵族势力的反抗远较法国革命来得少，其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封建贵族阶级在长达几十年的红白蔷薇战争中自相残杀得元气大伤。试想，如果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派与中共元老派之间也发生一场红白蔷薇之争，那对于中国的民主事业将是一个多么大多的福音。可惜江青还没有这个能耐。

中共元老派当然明白整治他们的元凶是毛，江青等只不过是前台打手而已。他们内心对毛极为怨恨，但却不敢正面否定毛。因为他们更明白面对厌恶中共政权的广大民众，他们与毛的恩怨是内部事务，不可把这内部矛盾过于公开，让当代中国的罗伯斯皮尔，或马丁. 路德们有可趁之机。说到底，毛仍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像征。公开地直接地全面否定他，势必会危及中共政权的本身。故此，中共元老们不得不忍下这口气，而把怒火全都倾泻在江青的身上。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评述者，当有起码的良知和责任心，不可做中共元老派的应声虫去杜撰历史，误导后人。文化大革命中，毛、林、周、刘、邓、陈伯达、江青、康生、王洪文……各有各的账，一切都该物归原主，不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可叹中国当代的士大夫们也像他们前辈一样为当朝权贵所豢养。高薪良宅，倍受礼遇，替中共专制政权辩解说项尚不遗余力，在文革问题上，适应元老之意作种种歪曲之笔更是小事一桩了。

顺便提一句，江青的秉性虽不可取，但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宣判会上，当法官念到"判处死刑"，并稍作停顿之时，江立即大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不休。直至押解她的女警说："江青你听清楚没有？是缓期两年。"她才安静下来。可见江的确以为大限已到。生死殊途，天人永隔，这对任何人都是莫大的精神负荷。江青竟能承担得起，不但未两腿酥软，瘫倒在座椅上，还能如此大声疾呼，实属难得。从苏共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审判到中共党内历次肃整，在全世界共产党体系内的恶斗中，失败后乞求饶恕者比比皆是，更遑论江式的倔强了。有些文士竟以鄙薄、讥讽的字句来描述江的这一表现，实在是令人太难理解。如果说毛在世时，江青对中共元老们颐指气使系倚仗毛的天威，那而今毛已归西，自

已沦为阶下囚之时，又有何恃呢？如此看来在江乖张的性格中不是尚有值得称道之处吗？

广州保守派对造反派施予暴力除六七年夏外，六八年夏又施予一次，并就此把红旗派彻底收拾。不过稍有不同的是，六八年那次是由总派摇身一变成"工宣队"、"工人纠察队"再去执行的。

时光荏苒，星移物换，世事都在变动之中。当时握枪持刀的双方勇士们或已淡化昔日之大恨，当年指挥各自队伍的某些头头们已于七四年批林批孔高潮中在广州洞天茶楼上开宴聚餐"一笑泯恩仇"。但是这一切都无可改变六七年夏用人血写成的历史，都改变不了广州和全国凡是典型的保守派组织向典型的造反组织首先使用暴力的性质，是维护中共政治秩序的势力对冲击这个秩序的造反民众进行镇压和屠杀。

第四节、红旗派武装抗暴的性质

如前所述，造反派中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的比率远较保守派高，文革风云变幻，运动内容庞杂使其文字语言能力大有发挥的余地，更兼自暮春平反以来在舆论宣传愈来愈占有优势，故此他们完全没有诉诸暴力的必要。即使在保守派动用武力之后，他们也往往惊愕退让，不知所措。只是在屡遭对方袭击，而且下手太狠，自己损失惨重之时，他们才考虑自卫反击。一位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对笔者说：五月以后，他们学校的主义兵在校内的大字报栏上一败涂地后恼羞成怒，经常成群结队地埋伏在学校周围的街道里，遇上单个或少数的红旗公社成员便包围毒打。在发生过许多次这样的事件后，红旗公社的成员才结队离校，并作好打斗的准备。"在日后激烈的打斗中，红旗公社这些原来文质彬彬的学生中，竟锻炼出了一班骁勇善战的队伍。

造反派不尚暴力还有一种与保守派同源异向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面对现实，造反派不能不承认保守派里红五类成份多，党团员多。因此他们只可认为保守派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走资派"欺骗蒙蔽的群众，而决不能像保守派对他们那样，把对方视为"反革命"、"牛鬼蛇神"。按中共经典理论，受欺骗蒙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是应给予批评，并争取其转变，而不是打击，更不是肉体打击。所以红旗派极少主动向总派动武。即使在总派动武后，他们拿起武器准备予以还击时，心里也不无犹豫。

广州红旗派以武力保卫自己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决心是在"七. 二一"、"七. 二三"连续两次遭到总派大规模的残酷屠杀以后才确立下来。七月二十五号，红旗派在东校场举行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参加者达两万多人，人们情绪沉痛激愤。会后举行了武装抬尸游行。红卫兵广州兵团的中学生队伍走在最前面。其它中学生组织、大学生组织，工人组织源源不断，队伍整齐，同仇敌忾，但武装十分简陋，大多只是棍棒之类。只有广州钢铁厂的红旗工人的装备较好，每人都配备一条五尺左右的铁水管。管头锯尖，成利于突刺的矛头状。

暴力冲突一旦全面展开，以前束缚着造反派的心理因素便告解除。更由于看到自己的战

友被总派伏击杀伤甚至捕获后任意枪决，复仇情绪使红旗派中尚武者勇悍非常。八月下旬以后，红旗派的武装反击已使总派日见吃力。可信，只要广州军区仍不直接支持总派，而且中央又未下令制止，任由两派打下去，总派将在广州市区全面败北，只有退守郊区一途。红旗派的伤员在市区任何一家医院都可得到抢救，总派的伤员则大都载往军队医院。从这里也可看出人心背向，看出社会同情在哪一方。我们还可以依稀窥见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如果只让民间拥护和反对原有政治秩序的两派力量对决，后者将稳握胜券。这也就是中共为什么要保持一个强大镇压机器的原因。

从六六年秋冬至此，造反民众已经有了三次反政治迫害的斗争经历。第一次是反刘邓的“资反线”迫害无辜民众。第二次是反军方的“早春镇压”（三月黑风）。这两次均是在毛中央的号召、支持下取得成效。而第三次则是六七年夏反保守派的政治性屠杀。这次纯粹是在红旗派自己的决心和奋斗下争得一定的成果，维护了自己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从法理上来看，红旗派的这一行动属于正当防卫，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则是前两次反政治迫害斗争的继续。

多年来，中共政权都在大骂造反派打、砸、抢。某些对历史事实一知半解的人们也随声附合。对此，有必要予以驳斥。如果说砸，抄对方的总部，那两派都有。如果说砸组织科、人事处的档案柜，抢黑材料，那只有造反派才会干，但是，这难道不是正义行动吗？至于打，经过本章的叙述，业已明了，造反派的“打”从整体上来说是被迫的正当防卫，无可厚非。

当然在暴力行动逐步升级后的暴戾的气氛中并为复仇情绪驱使，某些旗派成员也做过非理性行动。如广州兵团在捕获“主义兵”张金贵后予以枪决。张身负几条人命血债。他在“八．二?”事件中枪杀了几名抓捕到的红旗派中学生，确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未经正式法律审判，径行枪决张，毕竟不妥。又如工读兵团某部捕获一名地总干将邓某（女），在开车押送到某一旗派据点时，据点守卫不让他们进入，双方激烈争吵。邓大叫：“我是工联，他们是主义兵”，企图使争吵双方伙并。幸双方原已认识未上其当，而该班工读兵团则因此大怒，把邓载往郊外枪决。

事实证明非理性暴力行为，红旗派不及总派十分之一。六七年夏季的大规模暴力事件的性质当由其主干部份决定，零星的事件不能反映整体本质。

第七章 六七年金秋——各有收获的季节

第一节、广州军方以退为进的有效策略

北来的秋风驱走了粤地的暑气，吹黄了岭南的原野。经过了一年苦斗的各方人们似乎得

到了一点喘息的机会，得以回过头来检视一下自己的收成。然而最后结局并未见分晓，鹿死谁手，还须假以时日。

六七年早春几乎全国各地的军方都以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本性，既是必然的，又是不合时宜的镇压了造反民众。毛对此颇感不悦。毛和中央文革派遂上前扶了已被军方打倒在地的造反民众一把。不料，从血泊中重新站起来的造反派向军方猛扑过去，其动作比六个月前批刘邓“资反线”更猛烈。军方陷入困境。军方将领的威严使他们决不向造反者低头认错，但又不能严厉打击之，只好或半公开或暗中支持保守派去压制造反派。但这似乎不是长久之计，事情总得有个结局。这时有个人出来为众将领解了围，其代价是他自己人仰马翻。这个人就是武汉“七．二?”事件的当事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

“七．二?”事件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这真是让中共政权的拥护者亲自尝了一次中共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

武汉地区的六七年早春镇反比广州来得严酷。暮春以后受到造反派的反弹也更为强烈。武汉军方头目遂半公开，甚至公开支持保守派“百万雄师”，六月间“百万雄师”连续几次首先使用暴力袭击造反派，造反派死伤甚众，并有在此血腥屠杀下瓦解的迹象。中央文革派对此甚感焦虑。

毛发动文革大清洗借助了林的力量，而他反过来说林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其实他自己正是这样。文革清洗是三股力量的勾结，都是为了打鬼借用另两方。一是毛自己，二是林，三是中央文革一班人。这三方心目中的“鬼”不尽相同。毛心目中要打倒的鬼是刘邓及被其认为是刘邓在线的党政要员。林心目中的鬼是除此以外还有某些与之素有不合的军方元老及各地不属他山头的军方实力派。因林若要坐稳第二把交椅，并于将来接班后能有效地主宰全国，就必须及早清除异己。中央文革等人心目中的鬼更多，因他们的根基甚浅，为了制造更多的权力真空，让自己去填充，他们务求干掉更多的原有官吏。

性情暴躁的陈再道十分不识时务。他不是四野的人，不属林彪的山头。在这场诡谲阴森的斗争中本应稳扎稳打才是上策。而他竟大动作，支持“百万雄师”大肆杀戮。毛对此不悦。那时他尚不愿看到造反民众如此结局。林彪也不愿看到非自己山头的人巩固权势。中央文革派们更不愿看到武汉的造反派被压垮。如果对此认可，那各地群起效仿，文革清洗就别搞了。这三股力量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后，七月中毛、周、谢富治、余立金、王力等人云集武汉。毛指示，必须为“工总”平反，陈应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铡F咴率　巳站髲娮年愣芎轩　鹍 x 见毛。诚服于毛的天威，陈已打算遵旨照办。不料其不了解内情的部下得知谢富治、王力来武汉支持“工总”派，大怒。十九日大批“百万雄师”和二十九师、独立师的官兵乘上百辆卡车和消防车呼啸冲向军区找谢、王。并于二十日清晨把王抓到后游街示众。此时更多的“百万雄师“和士兵加入。数千辆卡车排成几路纵队行驶在市区街道。士兵们荷枪实弹，并上了刺刀，杀气腾腾，耀武扬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中央若不过问，武汉造反派一定会被荡平。

“七．二?”事件显然不是陈主使，但既在他管辖之区发生也就难辞其咎。林彪和中央文革派则窃喜。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毛已不止是不悦，而且是愠怒了。于是林和中央文革派们便可放开了手脚。从前林就表示过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办法”。现在“七．二?”一闹，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部队解散，“百万雄师”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更重要的是陈等羁押北京，武汉军区改组。林得以在该军区筹建自己的人马。林在七月二十五日的群众大会上说：“武汉问题不止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作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作文章。”

几天之后，“文章”迅速地作出来了。这就是《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的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其基调就是号召“揪军内一小撮”。对于林彪来说，就是把军队中不属于他的体系的军头干掉，换上他的人马。

八月上旬，在“社论”的鼓动下各地受过军方镇压的造反派更猛烈地把矛头指向军方。在广州就是大张旗鼓地提出揪“广谭”，即广州的谭震林。（武汉的陈再道率先被武汉造反派称之为“武老谭”谭”。）并且发布“炮轰黄永胜”动员令。社会上还传言四起，“广谭”也会像武汉陈再道那样搞兵变。

毛发觉了中央文革派的作法，大为震怒。各地军方头目根本不在毛的文革清洗之列，毛心里明白，即使是鲁莽倔强的陈再道大胆胡为其实也不是反他。他只是希望军方对不合时宜的早春镇反有所认识，并没打算要惩罚军方头目，更不愿把军方头目逼到狗急跳墙的地步。否则，即使不致有失天下之虞，也会弄得十分麻烦棘手，自己的尊严威仪亦会受到损失。于是毛严厉斥责《红旗》杂志十二期社论，否定“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要追究这一切的责任，以向军头们表示领袖对他们的善待。中央文革派一下慌了手脚。《红旗》杂志社论由关锋主持起草，王力审定，陈伯达签发。实际上江青、康生等也绝非不知情。至于“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林彪送毛审阅的文件中一再提及，均被毛划掉，并批示“不用”。可见，闯下此祸他们都有责任。但丢卒保车，或丢车保帅是组织斗争、权力角逐中的常用技巧。关锋、王力、林杰（《红旗》杂志副主编）遂被抛出作替罪羊。根基浮浅的中央文革派在与军方交手中初尝败绩。可叹二十几天前，王力从武汉回到北京时受到凯旋式的热烈欢迎，真是浮光掠影，昙花一现，一杯庆功酒尚未喝完，就去吃囚徒粮。从被自己的人捧为英雄，到被自己人打为阶下囚，中间只有那么短暂的时日。中共党内斗争之残酷无情，由此可见一斑。

八月二十日《红旗》杂志迫不及待地发表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社论号召革命派“热爱解放军、拥护解放军、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帮助解放军”，这无异于向军方公开道个大歉。从“七．二?”到“八．二?”演了个对军方前倨后恭的活报剧。这里面有陈再道的贡献，他以自己的翻船为众军头解围。而根正苗红充满政治优越感，动辄把他人视为“反革命”的“百万雄师”也尝到了被人打成”反革命“的滋味。????部队的一个副师长曾狞笑着对“工总”说：“杀了你们的头来肥田，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知道不？?这回，无产阶级专政的巨轮倒是把他也绞

进去了。

陈再道触礁，引导广州军方航向绕道，避过险滩，稳步向前，获得毛、林、中央文革三股力量的信任。“七．二?”事件及其后的变 故，对广州军头有双重的积极意义。

广州军头眼见中央对“七．二?”事件的处理，明了对早春镇反不作个象样的检查是难以过关。关于这一点中央对他们早已有暗示，但他们心存侥幸，尽力拖延。而且他们认为如果能把旗派压垮，清除了来自社会下层的冲击，上面的“暗示”也会自然消失。但不料旗派斗争顽强，不但未被 总派 暴力压垮，反而更有声势。“七．二 ??后“揪军内一小撮”呼喊甚嚣尘上，鉴于陈再道前车之覆，于八月二十日，黄永胜，刘兴元终于代表广州军区正式向中央呈递“关于在广州军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可信，这份检查的开始着手撰拟，应是在八月初。五月间广州军区也曾向中央呈交了一份“关于前段支左工作中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毛在上面批示有：“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但直到六、七月间，广州军方还拒绝为“八一战斗兵团”彻底平反，可见“七．二?”事件的结局对他们有相当的触动作用。

广州军区的检查说：

……在支左工作中，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有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一月二十二日，《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对旧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我们没有首先肯定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只看到了他们由于斗争经验不足而犯了一些错误……公开指责了“省革联”。后来在组织临时生产指挥部和各级临时生产领导班子时，又把参加过“省革联”的群众组织排斥在外。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月份，我们又错误地取缔和解散了“八一战斗兵团”等军内外一些群众组织，错抓了一些人。与此同时，我们还压制了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和《八．三一战斗团》等革命群众组织的活动。……尤其是对“八一战斗兵团”的问题，虽然革命造反派一再要求为他们平反，但我们仍然强调这个组织存在许多严重问题，迟迟不予平反，致使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在很长时间里受到压制。

……我们重申：对过去被我们取缔和解散的军内外革命组织一律平反；过去所发布的有关取缔和解散革命群众组织的公告、布告、“罪状”等，一律作废。被拘捕的人员，除个别有现行罪行、证据确凿的坏人，应当按照中央规定依法处理外，其余一律平反。在这里，我们特向被错误地取缔和解散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被捕的人员，以及由于我们的错误而受到压制

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道歉。同时，有些群众组织在我们影响下犯了某些错误，其责任在于我们。

应该说，广州军区的这份检查，毛中央和旗派都会感到满意的。总派心里则不大是滋味，但广州军头为自己能站稳脚根，也只得让小伙伴受点委屈了。

除一方面草拟“检查”外，广州军方还采取收缩战术，避免与红旗派作正面冲突。自从五、六月间红旗派的力量日益恢复壮大后，部份中共地方官僚对造反民众的斗争发生了兴趣。他们大多是在中共官僚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早在一月夺权期间，就有在五十年代被打成“地方主义”的一批粤籍高干企图借批陶、赵之机，并通过向旗派示好，借用民众的力量，重登广东政坛。但由于三月镇压骤然而至，还由于四月间周恩来抵穗后，明令“地方主义”不可翻案，他们的希望化成了幻影。春末夏初另一批高干又把他们的政治前途押向当时的派别斗争，这些人大多是与军方实力派素有不合的原中南局干部。更兼中南局文革后肯定会被撤消，为仕途计，必须移职省、市。在这方面，军方肯定会是阻力，所以他们也急欲借用民众力量冲垮军区。其代表人物有闵一帆（八级高干）、车学藻（九级高干）、张天淘（九级高干）等。此外军区内也有素与黄永胜、刘兴元、温玉成等不合的将校，他们也希望黄刘倒台，取而代之。其代表人物是湘炜（少将，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江民风（大校，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内战时期的塔山英雄团政委）。

六七年七月十一日，“广州批陶联合委员会”成立。这个组织由“中南局联络总部”控制。闵、车、张等一班高干是其首脑，并且它又把广州所有的红旗派组织都收在旗下，名曰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实则壮其声威。老奸巨滑的广州军头当然明了由地方高干主持的“批陶联”和由草莽之辈领导的“工联”、“红旗工人”是有多么大的不同。一旦广州的造反派都为“批陶联”的头头们所利用，其冲击力是不可低估的。

除心腹大患“批陶联”之外，八月初又成立了由北京、武汉、长沙、南京、安徽等许多名牌造反派组织赴穗人员所组成的“战广州兵团”，其斗争目标是广州军区主流派。这些人中有些是颇有背景的。有的与中央文革有直接联系，有的系军方杨成武系的高级将领的子弟，广州军区的失势将领文年生中将（后自杀）之子文戈夫也在其中。他们摩拳擦掌，大有非把广州军区翻个底朝天的气概。

八月中、下旬，“批陶联”和“战广州兵团”在社会上大造“广谭”即将兵变的舆论，以把民众造反力量纳入其轨道，并向军区发起了两次直接冲击，目的想抓获刘兴元等，瘫痪军区中枢，或换取军区开枪镇压，把广州军方逼成“陈再道第二”。然而广州军方老谋深算，消息灵通。它及早作好准备，藏匿首要人物，坚持不发一枪。即使是军队干部被打也不作剧烈反应。致使“批陶联”和“战广州兵团”的预谋落空。不过最为重要的是，这类行动已远离红旗派底层民众的切身要求。两次参与冲击的人数都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数量。

广州军区的收缩战术使它安然地渡过了那个短暂的危险期。八月下旬，否定“揪军内一小撮”的钧旨不断从北京传来，王、关、林的倒台使“批陶联”、“战广州兵团”打击军区的行动嘎然而止。

没有陈再道的“七．二??，就没有“揪军内一小撮”；没有“揪军内一小撮”，就没有八月下旬以后的对军方大唱颂歌。陈再道的翻船使其它 地方 的军头两次受益。第一次收益是教会他们暂作晦韬。第二次收益是八月下旬以后局势向越来越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公布“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给予广东军头以正统的地位。决定称：“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某些地方的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有改正，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至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黄永胜任主任委员，孔石泉任第一副主任委员，黄荣海（广州警备区司令员）、阎仲川（广州军区参谋长）、邱国光（广州军区后勤部长）均任副主任。广东的大权终于落入广州军方的手中。

而在六七年早春和六七年夏希望借助民众的力量抗衡军方，谋求自己仕途的两批地方官吏都自食其果，终于在一年后红旗派的倾覆中同遭到军方惩治。犹以第二批人下场最惨，甚至是家破人亡，如车学藻自杀，子女流落街头。当然，黄永胜等一干人也在七一年倒了大霉，不过那已是三年文革结束后的续篇了。

第二节、红旗派虚幻的声威

从六七年夏季暴力狂潮中走出来的广州红旗派精神抖擞，意气洋洋，因为他们不但在宣传舆论上而且在政治上、声势上都占了优势。

广州市区分成四个行政区，珠江以南的海珠区呈两派势力犬牙交错的状态。江北的荔湾区、越秀区、东山区几乎成了红旗派的一统天下。总派只有位于市中心的市一宫和市区西北角的东风路人汽???总部几个孤立的据点。有消息说旗派本想拔除市一宫据点。从武力上来看足够，但考虑到市一宫周围民宅密集，火力强攻，势必伤及无辜民众，遂作罢论，只派出几部人马驻扎在市一宫附近的几处制高点上，监视其动静。

市区街头触目可见的都是旗派观点的大字报、大标语，许多高楼上飘扬着旗派组织的大旗。一些工厂、单位里过去没有与社会上大组织挂勾的组织也纷纷加入红旗派。甚至有些在本单位内持保守观点的组织也加入旗派。不过他们大都选择红旗派的右翼——“红旗工人”或“省直红旗”。甚至“地总”里也杀出个赞同旗派观点的“新地总”,“主义兵”反出个“红革会”。就这样，红旗派的人数也得以大增。

从八月十四日到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等在北京先后十四次接见广东群众组织的代表。其中有五次单独接见红旗派的代表。在多数场合下，周恩来的神情、语言都明显偏向红旗派。

八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工联”、“红旗工人”、“红司”、“三司”、“新一司”等代表七十多人，明确表示“八一战斗兵团“应立即彻底平反。再次肯定“三个红旗”，及“三司”，“红司”,“新一司”,“工联”,“红旗工人”是革命造反派。同时已开始婉转地批评“揪军内一小撮”。

八月十六日再次接见上述人员，建议“工联、红旗工人、八一战斗兵团、工人红司等组织最好联合起来，形成优势。并说：?过去建议你们叫工联，就是叫你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意思。”

八月二十二日，总派代表也奉召抵京，当日周恩来接见两派代表，红旗派五十三人，总派二十六人。正式否定“揪军内一小撮”，说：“武汉七月二十号叛乱事件后提了抓军内一小撮，这是我们在宣传工作方面出了点毛病，伟大统帅批评了这件事。”在着力把军方赞扬了一通后，周的话锋涉及到广州两派的斗争，其态度有明显的倾向性，如强调要追查“八．一三”珠江血案，说道：“这个案件无论如何要追，追到底。这是犯法行为，掉下了水不救，怎么还能开枪打呢？”又如“主义兵”的代表说：“据我所知，我们总部从来没有参加武斗，有些主义兵不属于我们总部，我们管不了。”周听后即说：“你们管不了，就不要用主义兵这个名字嘛。你们为什么要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个名字呢？……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反正主义兵这个名字不好。”再如批评“新珠影”跟“珠影东方红”闹对立。“珠影东方红”趁机告上一状，说：“他们（指新珠影）说什么谁给我们平反谁就没有好下场。”周立即责问道：“珠影东方红是中央平反 的，难道中央也没有好下场吗？”周还斥责广州铁路局的军代表高德田公开支持铁路局系统的总派组织“春雷”，对高 说：“你要采取公正的立场，不能站在一边。”

当红旗派告了“郊贫联”一状后，周便对“郊贫联”代表说：“农民要搞好生产，不要进城参加武斗，”并责令其立即打电 话回去，扫清堵塞公路的树木障碍，收回枪支。

这次接见，两派遵照毛中央的旨意，签定了一个停止抢枪，停止武斗，封存枪支，释放一切被扣人员等四项协议。协议文书中的签字形式是旗派各大组织及负责人签名在前，而总派则签在后。

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又只接见红旗派代表及解放军报记者。再次催促各旗派组织联合起来，并表示可以对“地总”、“春雷”实行分化瓦解，使之成为少数。

八月下旬，在毛中央的敦促下，广州军方开始转向支持旗派，其派驻各工厂、机关、学校的“支左部队”、军代表奉命陆续表态支持各单位的旗派组织。当然这一“表态”大多是低调的、含糊的、敷衍的。

八月三十一日，广州“工联”、“红旗工人”、“广州工人”、“工人红司”、“八一战斗兵团”等工人旗派组织成立了联合组织“广州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工革联”）。广州军区第三政委孔石泉出席了成立大会。由于黄永胜、刘兴元已赴京，故孔是当时广州军方最高领导。孔代表广州军区赠给“工革联”大旗一面。这标志着军方的公开表态。从八月三十一日的“工革联”成立大会到十月十四日的“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大会集中地在政治上，声势上体现了旗派的优势。但事实终将证明这个优势只是表面的。

九月一日，周恩来、黄永胜、陈郁、王首道、赵卓云等接见两派代表。内容主要是敦促两派停止武斗，封存枪支。

当日，两派代表签定了“关于‘拥军爱民’和制止武斗的四条协议。”其内容基本与八月二十二日的四项协议同。

九月四日又签定“关于贯彻执行‘拥军爱民和制止武斗的四条协议’的决定”。

九月十日，再签定“关于限期交还一切枪支、弹药和军用装备的决定”。

所有这些“协议”、“决定”的文件签名，都是旗派在前，总派在后。

九月十五日，周恩来、黄永胜、王首道、吴法宪、戚本禹等接见两派代表。这次接见的气氛，对总派最为不利。周一开始讲话就斥责“郊贫联”、“地总”冲进军区大院静坐。他说：“你们要答应十二点以前要撤出，如果这次做好了，证明你们还有希望成为一个群众组织。否则，我完全有权利宣布解散你们的组织。我一宣布，群众也会退出你们的组织。” 总派代表几次讲话都被周截断。如“红海员”代表要发言，周说：?你总是指责别人，总没听见你责备自己，你不要讲了。”地总代表又说：“东风战士委托我向总理汇报‘九．一一’事件经过。”周说：“不要汇报了，把材料交给我吧。不要讲了，双方都有一笔账。现在我不是审案子，要审案子，我就搬到广州去了。”

事隔十二天之后，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黄永胜又接见两派代表。这次陪同接见的有广州军方头目刘兴元、孔石泉、温玉成、陈德。而王首道、陈郁、赵卓云则不见出场。这次接见的气氛与十五日大不相同。周不但再没有斥责总派，而且处处为总派开脱，并对旗派训导有加。

周说："最近，伟大领袖毛主席回到北京告诉我们，要求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凡是应该联合的都要联合起来。在什么基础上联合起来？主席说了四个字，一个是'批修'，就是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是'斗私'。为什么许多革命组织，就是造反派，旗派内部矛盾也是重重？……就是没有很好斗私。……就算过去两派组织，你们旗派造反精神强些，地总、红总造反精神差一些，如果他们能赶上来了，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批修，你们就有义务和他们联合起来。不管你们造反早，功劳大，人数多，不一定要以我为核心。人家后造反的，功劳少的，也有权利批修嘛！只要批修，也就可以联合起来。"

"七月底、八月初，我们宣传工作有错误，提'揪军内一小撮'，已经给你们讲了，你们不要揪广老谭，矛头不对嘛，矛头指错了嘛！给地总抓住了。并不是说造反派就是金牌子，响当当的，有了这个金牌子就保证不会犯错误。……你们不但把矛头指向军区，还把矛头指向对方组织，说地总、红总、主义兵、郊贫联等有一小撮坏头头，是反革命，是小凑合。这个不对嘛！怎么能够把内部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呢？"

"地总、红总、春雷、郊贫联接近军区，军区有些错误，有些问题他们受了影响，可以改嘛！就是头头错了也可以改……要搞清敌我友。我们是同志关系，不是敌我关系，大联合工人阶级首先带头。""在批修、斗私中更好的破私立公，树立毛泽东思想，把派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思想都抛掉。"

九月二十七日 的 接见，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毛中央对文革的派别斗争有了新的处理模式。"武汉模式"被放弃，而代之两派对等的联合。广州红旗派从此绝对地失去了击倒总派的可能，并无可避免地走向最终的败亡，尽管目前它声势甚壮。

十月十九日周在黄永胜等的陪同下接见红旗派五名代表：朱鹏云、邓元贵、周焱、高翔、武传斌。内容是初步涉及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干部人选问题，并对旗派略作抚慰，以弥补九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对旗派有过多的训斥。

十一月一日，周等人接见广州铁路分局的两派代表，表达了对总体上占弱势的"广铁总司"的支持意向。其后，十一月三日、八日、十四日，周等人连续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十一月三日只接见旗派代表）主要内容涉及如何保证开好"广交会"和具体落实"省革筹"的组建工作。

文革中，保守、造反两派激烈互斗，前者是尽力维护原有的社会秩序，因为他们是这个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者。反之后者则希求打破这个秩序。这正是后者较前者所具有的进步性。但是在打破这个秩序后，该继续怎么做呢？上海造反民众曾设想仿照巴黎公社的政治原则，建立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权力机构。但这立即被毛否决。与军方早春镇反的同时，毛下达了他的“三结合”政治结构模式。造反者想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梦想就此破灭，尽管以他们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也不可能提出真正具有社会民主内容的政治构思。这也就是多年来，许多在七、八十年代投身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极力否定文革造反派的活动带有民主斗争色彩的理由之一。

在那个时代，一切违抗毛旨意的行动都只会自取灭亡。广州红旗派在反政治迫害的斗争中已获得了批“资反线”，“暮春平反”和武力自卫的三个回合的胜利，取得了生存的政治权利后，再也不敢像半年前的上海造反者作瑰丽的政治设想。他们只能面对现实，在毛关于“新的权力机构”的框架内去施展他们的拳脚。但毛的“三结合”实质上是原有社会秩序的重建。此时，造反者们唯一可做的事情也就只能是在这个“重建”中为自己争得有利一点的地形，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具体内容无非是两项，一是在未来的权力机构中为本派多争取一些席位，二是力求多一些对本派较为友善的地方干部进入权力机构。然而第一项已被毛中央否决。因为它强调两派对等原则，即两派占有相同的席位。于是，只能在第二项上下功夫了。

中共地方干部与造反民众本来绝对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在昔日的社会结构、政治秩序里他们之间隔着鸿沟，只是在文化大革命这非常时期，鸿沟上架起了座脆弱的小桥。

毛下达“三结合”的旨意后，“一月革命”以来靠边站了的当权派明白，若要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重新进入权力机构，必须通过两个途径，一．与军方关系良好。二．受到居主导地位的某派群众组织的拥戴。其一往往来自历史渊源或旧有的人事关系等，在这纷乱的时势中难以有新近的作为。其二就完全不同了。群众组织的存在及其有权推荐干部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鲜事物”，它给有志于进入新的权力机构的干部们带来了新的设想和新的活动空间。

“七．二?”后，形势急剧变化。“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响遍全国。再加上在八月暴力狂潮中，红旗派以巨大的牺牲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又以武装自卫争得了存在的权利。一些地方干部揣测，红旗派会在这场斗争中取胜。总派将式微，军区也有部份改组的可能。如果在这关键的时刻表态支持旗派，赢得其好感，会大有益于今后的仕途。于是这就产生了由原省委干部黄施民、戈枫等人起草的“关于‘八．二?’事件的声明”，即所谓“八．二一”大字报事件。声明的内容表面上呼吁制止武斗，但实质上是表达其倾向旗派的态度。“声明”拟毕，抄成大字报张贴于省委大院，后获得原省直机关九十名厅、处级干部的签名。文稿也几经修改。由于旗派赴京代表传回毛中央否决“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草稿中的这些语句遂被删去。八月二十七日，此声明广为印刷张贴散发，造成相当的政治影响。这可看成是一次地方干部的集体表态，大大加强了旗派的政治声威。

然而，这批地方干部下错了赌注，押错了宝。八月底以后，形势再次剧变。总派没有瓦解，军区地位巩固。这张大字报深受军方和总派的嫉恨。其介入者大都弄巧成拙，自食其果。

十月间，旗派推荐戈枫参加省革筹工作，但很快被否决。至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赴京两派代表时对旗派说："要防止坏分子挑动。如你们曾受戈枫、黄施民的挑动，这两个人很坏……他们搞什么八月文件（黄永胜插话：是"八．二一"声明）不是把你们往好的方面引导，而是挑动你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和群众……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思潮，实质是右。斗争中促进大家觉悟，不让坏人浑水摸鱼，不能叫尹林平兴风作浪，不能受戈枫这些人的操纵。戈枫和三反分子王匡有关系。不能让他们搞破坏活动。"

除了介入"八．二一"声明这班地方干部的倒运使旗派的声威蒙上阴霾外，赵卓云和林李明两人的升降也很能说明问题。原副省长赵卓云老谋深算，处事稳重，虽对旗派较友善，但决不似黄、戈等人动作剧烈。旗派欲拥戴其参加"省革筹小组"，初时其地位似乎巩固。九月一日，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两派代表时，他都陪同。十月中旬，周恩来对旗派推荐赵不置可否。十一月三日则表示："你们提出赵卓云同志……我们再看一下历史档案，审查一下，弄清楚了就行了。"至十一月八日，周进一步改变腔调对旗派代表说："你们提到一个赵卓云，他们提了一个马甫，一方推了一个，双方都不接受，都还要考察一下嘛。"其后在讲话中又对总派代表说："他们提赵卓云有他们的道理，你们提马甫通不过，既然双方不能通过，只好都不参加。"

林李明一贯明确支持总派。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主义兵"到暨南大学肆意行凶打人。一些暨大学生愤然到省府告状。林李明竟说："好得很，好得很。什么时候见过我们的革命后代如此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九月"主义兵"举行成立大会时，林李明前往参加祝贺。旗派十分憎恶林。在总派提出林参加"省革筹小组"时，旗派力表反对。十月十九日，旗派代表得到周恩来单方接见时说："林李明这个人很不好，他要参加省革筹小组会大大降低省革筹小组的威望。"周答："林李明这个人参加省革筹是不行的，可以在训练班里边揭边批他嘛！"但林最终于六八年二月就任了省革委常委。

综观六七年金秋季节，红旗派所取得的优势说到底是表面的、虚浮的。在干部问题这个关键性的项目上，旗派一筹莫展。军方支旗派势态并未持久，十月间从"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所谓"一碗水端平"，旗派的政治优势也就仅仅只体现于签名居先这类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旗派在宣传舆论上的优势也将渐渐减弱。

当十一月的寒露风从塞外直驱南粤，收割了的田野不再有金黄色的瑰丽。在当时中国大陆这块贫瘠的政治土地上，红旗派注定不会获得丰硕的收成。金秋既过，寒冬将至，天空常呈铅幕，原野失去丰彩。广州的文革运动进入一段相对平和乃至枯燥的时期。然而也常有气流冲裂铅幕，地火突破泥层，形成踫撞激荡。广州红旗派遂进入其思想最分歧活跃的时期。

第三节、总派稳住了阵脚

六七年的夏日，对于广州总派并不美好。尽管它首先使用暴力，在“七．二一”、“七．二三”、“八．一三”、“八．二?”等一系列大型暴力行动中给予旗派巨大杀伤。但不料旗派并未被慑，反而在武力对抗中有愈战愈勇的迹象。进入九月秋季，情况更为不妙，广州军方宣布支持旗派，承认过去曾犯方向、路线性错误，并称有些群众组织受到他们的影响。总派赴北京的谈判代表受到周恩来等的冷遇，九月十五日的接见会上周对他们多有责备，甚至威胁要解散他们的组织。

总派为对抗各旗派工人组织联合而成的“广州市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决定也成立一个由“地总”、“红总”联合而成的“广州地区工人革命委员会”。九月十一日，成立大会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广州军方的头目们都不参加，情景相当冷落。会后，总派队伍欲进入市区游行，受到市民们自发的起哄阻挠。“地总”和“主义兵”恼羞成怒，向人群开枪扫射，致使十几名市民死亡，百多人受伤。此事传到北京，周恩来在责备了旗派一句“太没度量了，他们要开会就让他们开嘛，为什么要去阻挠？”接着就把总派训斥了一顿。在这一连串的挫折下，总派的军心产生了动摇。

在有的分部和成员产生悲观情绪的同时，有些人却格外亢奋起来。九月间，某些“地总”分部竟贴出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地总”和“郊贫联”曾组织队伍冲进军区大院静坐示威。有些工厂的总派组织围攻驻厂军代表，责问他为何转向支持政治大杂烩的旗派。无论是悲观还是亢奋，都是极不利的偏向。可庆幸的是，这两种偏向都未得到蔓延。然而真正挽救总派命运的“恩人”是武汉的“百万雄师”。如果说陈再道的翻船使广州军方受益，那么“百万雄师”的翻船则使广州总派受益。

说到底，对于毛来说，处罚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是迫不得已的。为了摆平武汉局势，毛竟秘密赴汉，在陈再道连周恩来的话都不听之后，只得亲自接见陈。陈至此还不肯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毛笑着抚慰他：“这有什么要紧呀，现在他们（指造反派），一说就是方向路线错误……我会向他们做工作，一直做到他们不但不要打倒你，还会拥护你。”说来，天威无上的毛做到这一步也算仁至义尽了。然而竟还是发生了“七．二?”暴乱（当然并不是陈亲自指挥）。王力被狂乱者抓走的居所就在毛下榻庭院的近旁。这不能不使毛震惊恼怒。而且谢、王两人的遭遇又激起中央文革派的强烈反弹。陈再道与“百万雄师”的翻船无可避免。

毛实际上并没有惩办陈再道，只是把他调入京城，削其兵权，让其在高层内接受批判，免受愤怒造反民众的冲击。而对于“百万雄师”，毛就爱莫能助了。他能做到的就是在“武汉部队机关检查错误的公告”上批示：“……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在内）只要他们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谅解之后，仍可站出来参加革命行列……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可见毛已

预见到，他的中央一表态，“百万雄师”立即瓦解，其头头、骨干的命运堪虞，而“百万雄师”并未反他啊！并且，岂止不反他，还会是他的坚决拥护者和信徒。眼睁睁看着他们去受罪，心里也怪难过。毛决计不让这种情形重演了。一方面他设法调和各地军方和造反派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提出了解决群众组织派别斗争新的模式，那就是所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后所发出的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表明毛要对两派采取平衡原则，不允许一派压一派。假如这个原则是颁布于三月，那会有利于旗派，而今是颁布于九月下旬，那就是有利于总派了。毛提出新模式的思想脉络没有公诸于报刊，但在内部讲话中他一再作了这样的分析：“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和党团骨干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工农兵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各个时期，他们全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的工农是具体的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在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就算了嘛，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工农兵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直接接触，又加上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打着中央指示旗号下去的，加之广大工农兵及党团骨干又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所以他们容易受蒙蔽。”如果说毛的许多讲话都是东拉西扯、言不及义，那么这些关于保守派形成的分析在共产党的语言系统内，倒是相当正确的。并且也反映出深居宫阙的毛也远非对世事一无所知，他很清楚地了解保守组织中党团员骨干所占比率高这一关键事实。

“百万雄师”的翻船导致毛要构想新模式。新模式不但挽救了广州总派，此后全国再也没有哪个组织被宣布为保守组织了。九月中旬，周恩来曾对总派大加训斥，而到九月二十七号的接见会上，周对总派态度明显和缓，倒是对旗派克了一番。总派安然渡过了这不到一个月的危险期并组织一些反击。它拉下了旗派保举的干部赵卓云和戈枫，甚至敢把戈枫抓去批斗。这些做法十分合乎军方的胃口，军方恨透了搞“八．二一”声明的那班地方干部，但又不便亲自下手。现总派为之代劳，当暗中赞许之至。军方与总派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不可割断的。毛对保守派的政治评估也与军方的思维吻合，而且军方有更真切的体会。因为许多军队干部的亲属子女就是总派组织里的头头骨干。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军方与总派同属一社会营垒；从人事上来看，军方与总派有亲缘关系；从实际事务上来看，军方与总派已有近一年的结盟斗争的经历。八月下旬，广州军方不得已表态“支旗”。九月下旬毛转了向，他们跟进极快。支持旗派的调门立即抛到九霄云外，“支左不支派”的新曲奏起。十一月八日周恩来接见两派代表时说了：“过去提以左派为核心，现在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以左派为核心没有错，但不是以哪一派为核心，以哪一派为核心都不行……具体地说，今天是左派，明天不一定是左派。”“革命群众组织是要搞大联合的。”

十月二十七日，旗派、总派还有中间派实则总派观点的工交红旗三方在京代表签字通过“关于成立‘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方案记要”。十一月九日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正式宣布“工人联筹”成立。其组织机构由十名委员组成。工革联四名，工革会四名，工交红旗两名。至此总派在政治上获得了与旗派同等的地位，稳住了自己的阵脚。

第八章 六七年冬——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一节红旗派的分化（1）

产生紧跟派的政治原因

广州军区通过一纸检查缓和了红旗派的对抗情绪，获得了毛中央授予其主政广东的权柄，的确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它洞悉毛的意向是要结束纷乱的社会局面，恢复中共的统治秩序，其具体程序是两派群众基本以平等地位实行“大联合”，消弭两派纷争。接着，成立“三结合”的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和各单位领导机构。“三结合”中的三方——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军队干部，以后者占主导地位。为全面主持“大联合”、“三结合”工作，军方必须派出大量的干部前往各地各单位任军代表，这些军代表今后大多也将就任该地该单位“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职务。而他们离开军营后，所形成的职位空缺又给军方自身带来大量的军内升迁机会。这对于军方真是一个喜讯。其实早在六七年春，毛就有通过“大联合”、“三结合”以重建中共政治秩序的设计，只是由于军方搞了个“早春镇压”，使毛不得不暂放下其设想，用“暮春平反”来否定军方的“早春镇压”。不料藉此从“早春镇压”中爬起来的造反民众向军方猛扑过去，形成造反派与军方和保守派联合势力之间的一场恶斗。兜了一个大弯，至此才走上“正轨”。

军方挥舞着毛的“最新指示”，以主导者的姿态，通过各种方式，推进“大联合”、“三结合”。在这种情势下，红旗派产生了动荡、涣散、分化。其中一部份对此表示拥护、服从；另一部份表现出疑虑和抗拒；更多的人则动摇在这两端反应之间。如果说从造反派批“资反线”，反军方镇压的行动中已可窥见民众对中共统治的积怨，那么深入分析红旗派在此新形势下的表现则更可洞悉文革期间民众起来造反的种种社会潜因及社会深层矛盾。

首先，各人的政治背景对其态度具有相当的决定作用。在各造反组织的头头骨干层中，出身成份红或黑的人往往都成为新形势的紧跟派。这是一个颇有趣的现象。一般看来，“红五类”出身和“黑五类”出身这两类人不是应该对同一政治态势取截然相反的态度才符合逻辑吗？

文革期间，造反组织中出身成份红的人往往被推举为头头，其中有党员招牌者更会如此。这些人投身造反行列往往带有某些较特殊的因素。复杂的社会现实并不能保证每个人在其生活圈内都可得到他本应有的待遇。某些红出身的人或党员有时也会在切身处境中感受到压抑，这促使他们在文革大波中投向造反行列。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往往有一种潜意识，那就是他

们自诩的造反动机纯粹性。他们往往把自己的“造反”区别于那些出身黑类或平日调皮捣蛋的人的“造反”。他们自感是在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反修”、“防修”、“确保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为此，他们在六六年六月间已起而揭露本单位领导”“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言行；六六年秋批判当权派执行迫害群众的“资反线”；六七年一月夺本地区、本单位走资派的权；六七年春夏参加反抗军方和保守派镇压的行列。他们自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如今毛主席又号召实行“大联合”、“三结合”，并且党中央又已宣布广州军区是革命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得过的，那么又有什么理由不在军区领导的带领下去“为人民立新功”呢？故此，他们能自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新的战略部署”，并听从军方的指导。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还有一种更深的潜意识。他们隐约感到，在将要建立的新的权力机构中，自己有可能占一席之地。尽管保守派的“血统论”应受到批判，但反对歧视迫害“黑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回事，信用“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当这些青年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红旗派中出身红，牌子硬的成员有双重的优越感。对于“黑五类”出身者，他们有家庭出身的社会等级优越感；对于保守派中的“红五类”者，他们有一向站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治觉悟优越感。这双重优越感促使他们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成为红旗派中的紧跟派。

红旗派中出身黑类者也表现“紧跟”态度，其成因则是与出身红类者殊途同归。有人以为造反派大多由出身不好的人组成，这是一大战狻 3 鍪碎谖孱悬娜嗽谏鏵　险己苌戥怠 H 绻旆磁芍饔　伤麄兘 M 成，何以能形成那么庞大的队伍？出身黑五类的人经历了文革前历次运动的折磨和文革初期的“第二次反右”和“红色恐怖”运动的迫害，大多已遍体鳞伤、心有余悸。虽则后来有批“资反线”浪潮将其解脱，但多次的痛苦经历使之对世事仍持谨慎的态度。若身处于保守势力占优势的单位，他们大多做逍遥派或违心地参加保守派做个随大流的一般成员。在造反派有一定势力的单位，他们亦有可能参加造反派，但很少会成为骨干、头头，因此对于他们也无所谓紧跟不紧跟的问题。只有在职员（机关干部）和大、中学生中才会有出身黑类者当了红旗派的骨干、头头。这是因为职员相对于工人处于社会上层，他们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政治敏感性和消息来源。他们觉察到这次运动与以往的迥然不同，故敢于采取造反态势。学生则是由于年少气盛，除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恐怖”外还未领尝过更多的政治压迫。这使他们敢于在运动中冲锋陷阵，成为出头露面的人物。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在中央汇报工作会议上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好，难道我们的出身都很好吗？”透过毛的这句话可以推测是当时有许多中共高官向毛中央投诉有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以造反为名攻击党。毛用这句话去反驳他们。毛的意思是，既然从前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可以通过参加共产党的革命而成为高官，那么当今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什么不可以响应我的号召投身文化大革命呢？毛的逻辑很有道理，并且在其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法则，学生出身 好不好并不至关紧要，关键的是按我的旨意去做。董仲舒有“天人感应”之说。在此毛可为“天”，职员与学生中某些出身不好的旗派头头、骨干为“人”。两者之间似有感应。毛的法则通过无形的思维传递到他们的脑际，使他们明白，若要保持革命的身份，少冒政治风险，不至在今后的风云变幻中成为牺牲品，就必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如果说出身红类者去“紧跟”是出于潜在的政治优越感那么出身黑类者去“紧跟”就是出于潜在的政治自卑感。由此可见，共产党的统治伦理具有极为强大的政治威慑力。即使在文革的翻云覆雨中，经历了几次较量，至此已从一默默无闻者成为颇有号召力的人物，但仍消除不了潜藏于他们内心的虚弱和恐惧。

相对于上述两类人群，出身非红非黑类者，尤其是其中大多数没有党证的人，取“紧跟”态度者的比率就大为减低。很明显，这是就政治背景因素而言，他们既没有优越感，也没有自卑感。他们在这新的政治形势下的行为取向大多决定于其实际社会处境。非红非黑类出身的人群在文革大波中往往发生了相当大的作用，尤其在广州地区，因为他们数量很大。文革运动主要在城市进行。中国工人阶级资历不长。六十年代的城市工人，其父辈甚少也是工人。故血统工人成份者不多。广州地区在当时较少重工业，工厂规模有限，其工人多为市区居民，甚少像武汉地区那样从郊县农民中招收工人，以致工人中有相当数量的贫、下中农出身。同样道理，在学生中工人、贫下中农出身者也不多。这就形成了工人和学生的家庭出身以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者、小手工业主、城市贫民（无固定职业）、自由职业者、职员、教师、文艺界人士、专业技术人士等为多数的社会现实。出身于这些社会阶层的人，大多并不但没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优待，而且还会经历过种种压抑和不平。这使他们对原有社会秩序采取反抗态势。而他们又不像出身黑类者有沉重的精神压力。故在文革大波中敢于有所作为，这就形成了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里造反势力往往能占优势。像在广西，尽管广西王韦国清（全国唯一未倒的原省委第一书记）指示军队直接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民众，南宁、桂林、柳州、梧州的造反民众都有力量进行顽强的抵抗。

如果说，在新形势下某个人取紧跟或抗拒态度与其政治背景、社会处境、社会地位有关，那么某个组织的态度取向又跟什么因素有关呢？或者说在广州红旗派中没有哪个组织的紧跟意识最明显，正统意识最强呢？有，这个组织就是“省直红旗”。“红旗工人”一向被认为较缓进，但是“佛山会议”之后，很多工厂的红旗工人分部都抨击《佛山会议纪要》，因为他们在本单位一如既往处于受压地位，故此时偏向了激进的营垒。可见昔日的反“省革联”系并非真的右倾保守。同属“三司”系统的“省直红旗”与“红旗工人”则大异其趣。这个职员（机关干部）的红旗派组织成立于红旗派已占优势的六七年“暮春平反”之后，这与“红旗工人”成立于六六年冬造反派的草创时期甚有不同。“省直红旗”的言行一向以稳健著称，倘若深入了解这个组织的细胞构成，就不难明了它“稳健”之来由，也可了解六七年冬红旗派内部斗争的实质内容。

“省直红旗”的参加者并不只是省直属机关的职员，许多市级机关、市各工业主管局的组织也参加其中。这些组织在本单位其实是保守派。市无线电局里的情况就相当典型。由过去当权派的红人、“高政治质量”者所成立的组织本会加入总派。但出于机关干部的政治敏感性和投机性，他们在旗派占优势的情形下参加进来。他们体认到这样做可以更有效地与本单位的造反派抗衡。并且，心有灵犀一点通。许多机关的保守派都选定“省直红旗”为舟车，使之成为红旗派中保守一翼的大本营，以致在许多机关里的两派斗争不是存在于旗派与总派之间，而是发生在旗派内部——“省直红旗”所属组织与“机关红司”所属组织的对立。如果认为这是造反派的内斗，那就大谬不然。这其实仍是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只不过前者也打着社会上造反组织的旗号而已。

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远非严格意义上的党派。各组织的头头为壮大自身的声势，增加其政治筹码，大多都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即使有的参加者被指为有保守倾向或保皇经历，头头也会为之解脱：革命不分先后，从前保守过，是受蒙蔽，现在觉悟了，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边来了，我们就应表示欢迎云云。于是乎这样一类由许多保守细胞组织构成的联合体只

须在表面上宣称赞同红旗派的基本观点就可得到整个造反派的认同和接纳。而“省直红旗”一类组织在宣传妥协观点，执行紧跟路线，涣散、瓦解造反派的斗志，分化、裂解其队伍等方面往往起有官方和保守派起不到的作用。

在广州文革大波中，“省直红旗”这类组织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因面临军方和保守派的强大压力，始终未能掌握权力的红旗派客观上保持了一种临战的反抗姿态，使妥协路线不能成为主流。但假如总派垮台，红旗派当道的话，情况将会有很大不同。清华“井岗山四．一四”的言论活动就是例证。可见把一些造反派当权的省、市里造反组织之间的斗争全都解释为“政治野心”、“权力争夺”、“意气用事”、“山头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恐不够全面，应进一步深入剖析其中是否还存在对旧有政治秩序持不同态度而引发斗争的因素。须知，在保守派垮台的地方，其成员并未消失，除最著名的头头无回转余地外，其它人都有“反戈一击”、改换门庭，变更旗号、以屈求伸的可能。而且只要中共政权的本质不变，这些人的社会坐标不变，那终究会有由他们起来重振纲纪的日子。

有必要顺便指出的是，偶尔也会有单位内的典型造反派组织阴差阳错地投入到社会上的保守派里。这大多是由于该组织成立很早，而当时“地总”的保守面目还未完全暴露，其后由于人事关系或种种原因又未及时退出，及至六八年夏大镇压时，这间厂里受清算的就会不是旗派而是总派。但并没有人为之申诉。如果有的话，当权者也会振振有词地说：“红旗派、东风派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但两派之中都混有坏人，有坏人就应清理。现在并不是搞一派压一派。‘地总’的成员有错误当然也应受到审查处理。”这些“地总”成员的政治鲜血正可用来点缀当局的秉正公平。可见文革中派性压制说到底是维护原有社会秩序的社会群体对反抗这个秩序的社会群体的压制。只不过通常前者大多参加了保守派（在广州就是总派），后者参加了造反派（在广州就是旗派）而已。

第二节、红旗派的分化（2?）

产生抗拒派的现实因素

具体的社会处境会决定某个人或某个社会群体在新形势下的行为，这导致了红旗派的动荡和分化。反抗原有社会秩序是红旗派的共同特征，但红旗派由许多个在原社会结构中具有不同社会坐标的阶层或社会集团构成。它们之间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造反动机，也有不同的反抗层次、程度。在面对军方和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乃至暴力杀戮时，它们都暂时搁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团结起来向镇压势力抗争。一旦压力基本消除，取得生存权利后，各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差异便会浮上台面。

红旗派的社会构成大致是工人、职员、大中学生。工人中则还可分为国营工厂正式工人、合同工、临时工、街道集体所有制工人。此外还有广州上山下乡支农青年、农场持证工人。红旗派中最先对新形势采取抗拒姿态而遭受压制的就是支农青年和持证工人。

当今许多人以为中国的“知识青年”阶层，简称“知青”，是文革的产物。他们大多知道由六八年秋高、初中三届毕业生（所谓老三届）及至七七年的各届中学毕业生组成了庞大的“知青”队伍。他们不了解文革前，从六二年到六五年已有一定数量的城镇青年被驱往农村。由于工业萎缩、经济不振，城市就业不足，中共遂办了许多农场，把一些城市的失学失业青少年安排到那里做农场工人。农场大多种植经济作物，农场劳动者吃商品粮，领固定工资，故以工人论（但已属农村户口）。当时为便于动员城市青年前往，广州地方官订了户口保留规定。即去农场四年后可回城另行安排工作，并发有户口保留卡，故他们被称之为持证工人。当时著名的有珠江农场，光明农场，九佛农场，横岗农场等，安排了许多高、初中毕业生。后来农场爆满，官方便把城市青年直接驱往农村插队落户，所谓与贫下中农“三同”。在这期间，中共为欺骗广大青少年，在下乡务农的城市青年中树了几个“光辉典型”如北京的侯隽，广州的陈国基，江西的董加耕，河北的邢燕子。由于那时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中高中生较少，多为失学失业经年的初中，小学毕业生。故官方尚未把他们称为“知识青年”而称为“支农青年”，简称“支青”。“支青”与“知青”同音。后来人们往往把它们混淆了。有必要讲明的是广州文革期间红旗派里的是“支青”，不是“知青”。

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有两批青年处境最为凄凉。一批是农村里土生土长的地、富子女，另一批是被从城市驱赶到农村的“支青”。当然若将此两者相比，前者还要悲惨很多。七十年代末伤痕文学兴起。作家们大为某些中共高官的命运嘘唏鸣冤，甚为文化人的遭遇忿忿不平，也略为“知青”的处境伤感诉情，但从不把笔头触向地富子女和“支青”的苦难。这究竟是由于对社会生活缺乏了解，还是势利心作怪？或许两者都兼而有之吧。

在六七年春夏，广州红旗派对“支青”和“持证工人”这两支自己冒出来的同盟军当然持欢迎态度。从集会游行、刷大标语、贴大字报到拿起武器自卫还击都有他们参与，确实助了一臂之力。在文革大波中非学生的社会群体里，凡是对自己的切身处境不满，而且有改变它的强烈愿望的人只会去参加造反派。他们希图在打破了旧的社会秩序后，自己的境遇能随之有所改善。“支青”和“持证工人”希望能结束异乡蹉跎、艰辛苦熬的岁月，回到自己的家乡广州，即使做最底层的劳工也好。然而他们微薄的希望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在局势被军方控制后，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便是他们。

十一月三日周恩来在接见广州红旗派代表时就说：“你们也和‘ 湘江风雷’一样，面临一个严重问题。湖南支农青年，过去支持了‘湘江风雷’现在不回去……这股风可不能传到广州去。上山下乡是主席的思想，怎么是刘邓路线呢？”

十一月八日，周在接见双方代表时又说：“上山下乡是大方向，是主席提出来的，你们要联合发表声明，叫他们回农村去。”

十一月十四日再说：“广州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好。首先是支农青年，不光你们广州有，上海、南京、长沙、武汉……都有。他们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这是错误的，是

站不住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主席的号召，城市的青年要到农村去，城市的不能都在城市，要消灭三大差别嘛！农村有广阔的天地。农村需要大批的知识青年，有利于消灭工农差别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主席的思想。为什么上山下乡呢？首先是支农青年的思想问题。有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还有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不习惯农村的。特别是广州搞了个保留户口，这是陶铸搞的，这是不对的。他们回来还要户口、粮食、工 作。说'黑指示'本身就是不愿下农村。这是陶、赵的影响和毒害。有些是当地安排不当，这要当地解决。另外一个原因，你们在武斗的时候，他们帮了你们的忙，你们管他们的吃住，他们就来了。现在成了你们的包袱。现在他们对中央关于上山下乡的指示挑三挑四，甚至有人说是'黑指示'，这是错误的，文件是主席批的，讲这个话的人，起码是立场问题！原来有三万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市，后来十月八日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减少了，现在还有一万多，还有部份人十五日准备到交易会静坐，这影响很坏。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有意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吗？有意见，可到军区去谈谈嘛！如果这里面有坏人挑动，这事就不简单了！这不是走资派就是坏人或香港来的特务，烂仔。"

周的调门愈来愈高，措辞愈来愈严厉，已隐约露出杀机。红旗派为了保持自己的名份，很快就硬着心肠向"支青"和"持证工人"下逐客令，要他们回到农村、农场去就地闹革命。在双重压力下，他们大多数都在严冬苦寒时节陆续离穗，临走时留下一句满腔悲愤的话："中学的书呆子们，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但仍有少数顽强者坚持下来。至六八年春夏之间，"持证工人"竟实行了一个极勇敢的行动，占领粮食局，提出口粮和保障基本生活的要求，并在粮食局门前摆了两口棺材，派两名荷枪实弹的勇敢者轮班守卫，表达了他们不惜为此死战的决心。当然，在强大的共产党镇压机器面前，这只会是以卵击石。他们在稍后的夏季大镇压中，遭到严酷的处置。

"支青"和"持证工人"的造反甚具典型性。他们要求并不高，丝毫不触动中共政权的根本，仅仅是希望改变自己极恶劣的生存条件，争回一份起码的工作、生活权利，本不带政治成份，与民主诉求挂不上钩。它比六七年春红旗派的平反斗争低了一个档次。然而在文革的造反波涛中，他们当然不会只就事论事地向中共官员请愿恳求，让他们回到广州的父母亲人身边，给他们一个糊口的机会，而会把他们的要求涂上政治色彩。他们说把他们从城市驱赶到乡下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广东省、广州市一批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下的黑指示。他们要造这些走资派的反，要回城工作。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上山下乡是毛的旨意呢？但是他们能够明说吗？把矛头指向毛，那就一丝一毫的活动空间也没有了，得到的只会是行刑子弹。说来，陶铸等一班地方高官毕竟不像毛那样深居皇宫，他们多少知晓一点民间疾苦，故订了个户口四年保留的政策，也算是一点仁政。但民众起而造反时，却倒把怒火喷向他们。于是后世有评论家藉此认定文革造反全是狂乱行动，是只反清官不反贪官，毫无正义可言。那么怎样才算正义呢？是否应严辞直斥毛治国方略倒行逆施，弄得工业萎缩，经济凋蔽，就业不足？是否应赞扬陶铸等制订的户口保留政策是正确的并要求军方去执行呢？这样做可能吗？脱离了当时当地的现实去作评论真如痴人说梦。

职员、学生、工人这三个社会阶层、群体对新形势的态度有明显不同的取向。在此三者中都产生紧跟派和抗拒派，但比率不同。紧跟派以职员里最高，学生次之，工人最少。抗拒派则刚好反之。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职员”，即机关干部，相对于工农民众来说他们都是“官”。属于干部——行政官员的编制。在管理上也截然不同。工人属劳动工资科管，干部属各级党委的组织部（或科）管理。工人得以去做干部叫“提拔”（后来还有所谓“以工代干”）。干部去做工人只会在犯了严重错误后，叫作“开除干部队伍，降为职工。”可见中共所称“工人阶级为领导”纯属欺人之谈。不过“职员”这类“官”和真正握有权柄的领导干部——文革期间所称的“当权派”又有显著不同。作为下层公务员，他们没有行政权力，只是完成上司交下来的一项项具体工作。会计科的科员们在算一笔笔的账，税务局的征税员们在一单单地向企业收税，这都类似工人们在完成厂方下达的一项项生产计划。因此“职员”具有亦官亦民的特质。这对于他们在新形势下的行为取向有相当大的左右作用。

职员的造反有些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反抗原有社会秩序。我当年在广州郊区税务局的所闻所见正是这类。此外，还有许多造反则带有明显的投机性。尤以较高层机关，如省、市各直属部、委、厅、局里的情形是如此。那里的机关干部绝不轻言造反。只有当他们较清晰地明了这次运动与以往的迥然不同，而且在某些上司们看来是必倒无疑时，他们才起而“造反”。对社会上的纷争他们并不轻易表态。在六七年夏秋，红旗派已占优势之时，他们才公开倒向旗派，并且大多加入属于旗派右翼的“省直红旗”，而绝不加入左翼的“机关红司”。这些“造反”者在昔日并无明显受过压制的经历，他们并不迫切反抗原有社会秩序，而之所以造反，是觉得这样会比投入保守派阵营能得到更多的收获。他们一向身处中共机关，了解中共政治运作，洞悉其中许多奥妙，懂得顺应潮流，识时务方可做俊杰的真谛。在这新的形势下，他们很自然地成了紧跟派的中坚，深知这样可取悦于军方，保持正统的地位，增加日后权力再分配中的有效筹码。

中南局的情况与省、市机关又有不同。因各大区已裁定为撤消机关。原有的等级秩序将行解体，这不但对中南局机关干部们的造反少了一分羁绊，还产生促使他们为今后出路作一番奋斗的动力。故此，中南局里的造反势力一向强大。其组织就是有名的“中南局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部”，获闵、车、张等一干中南局高干的支持。不过由于该组织的胃口太大，有整垮广州军区，主持广东政局的欲望，故与军方结怨。在军方当道的新形势下，他们就表现得比较游移，既不那么紧跟，也不敢公开抗拒。他们对今后深怀忧虑，因一旦军方全面主政后，必定会清算他们昔日挑战军方的罪责，但抗拒也没有成功的希望。

学生不算一个阶层，只是一个社会群体，因其在社会结构中尚未有基本确定的坐标。没有参与社会生产或管理，也没有取得社会给予的劳动报酬。他们并没有自己的政经诉求。而其之所以极热忱地投入造反大多是基于青少年的政治热情，所谓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召，和对文革初期的“血统论”的强烈反弹，这当然是对于出身黑类或非红非黑的学生而言。出身红类，以“反修”、“防修”的政治热情投入造反行列的学生或出身黑类的学生基于少担政治风险的目的，他们大都会成为紧跟派。非红非黑类出身的学生态度常常模糊不清。弯转得太急了，他们似难跟上。前不久还与“狡蠢大地主”（这是旗派对总派的贬称。“狡”为“郊贫联”，“蠢”为“广铁春雷派”，“大”为“省直大联总”，“地”为“地总”，“主”为“主义兵”。合写成意会为又狡滑又愚蠢的大地主）斗得你死我活，怎么这会就要与之言和

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方压力一步步地加剧，学生的反弹趋向强烈，抗拒派有加强的趋势，并在其中产生了新思潮派。

抗拒派主要存在何处？存在于红旗派的工人组织中。这是因为只有工厂企业里才最典型地体现着中共政权的统治秩序。在亦官亦民的机关干部工作的机关里，和在社会结构中尚未定位的学生们读书的学校里都不能典型地体现中共的统治秩序。故此，工人群众的造反较机关干部和学生带有更明显的反旧有社会秩序的色彩。

工厂企业里百分之八十几都是工人，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属于干部编制，而且其中大部份是技术科、生产计划科、供销科、财会科等专业部门里的工作人员。故此真正对工人实行统治的，只是厂长、书记、各车间主任、工会主席及保卫、政工、人事等要害部门的干事，这些人通常只占全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一间国营厂，哪怕小得只有两、三百人，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党政工团妇、保卫、组织政工，一切机构完备，对民众实施着全面的统治。故此毛才有把握说“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中共专制政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秩序也就在这个“落实”中体现出来了。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共专制政权又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这是中共的统治秘诀之一，并且运用得十分成功。首先，它把属于干部编制的人都纳入统治阶层，再把工人中的党员、生产班、组长、工会小组长、先进工作者、学毛着积极分子、党员发展对像等一大批本质上也是受着经济剥削、政治压制的人都拉进去，这样一来统治阶层就可突增至百分之四十左右，形成百分之四十对百分之六十的统治。

表面看来百分之四十仍是少数，但别忘了，这百分之四十是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指挥之下，而那百分之六十是分散的、各不相属甚至互不相识的。假如有几个，顶多十几个工人能因工作关系或其它原因互相联系、团结起来向领导挑战，那他们也只占全厂人数的百分之几以下，而且立即会受到百分之四十有组织群体的巨大压力。中共专制政权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诀窍正在于此。 只有文化革命那个非常时期，这个诀窍才一度失灵。因为那时百分之六十不再相互隔离成一盘散沙，而是有机会得以部份结集起来。至于那百分之四十则由于党组织的暂时瘫痪而呈某种程度的涣散状态。

工人们造反不像“支青”、“持证工人”那样有一个很具体的利益诉求。但他们的模糊诉求却更为广泛深刻。他们希望通过文革改变工厂里原有的权力结构；希望罢掉一些往日欺压群众，运动中又迫害过造反者的官；希望自己的组织能在本厂占优势，自己的人能进入未来的厂领导机构，掌握一定的权力以保障自己的权益，起码免受“秋后算帐”的迫害。然而，他们面对的现实使之十分忧虑。在许多工厂里，造反派仍然是少数。虽然保守派里真正起作用的头头骨干人数也有限，其一般成员暗地里都同情造反派，但是保守派的头头、骨干们大都是有根底的人。他们不但本身已握有一定的权力，是车间主任、工段长、武装干事、劳资科干部等，而且厂的当权派就站在他们身后。即使是某些造反派人数占优势的工厂里也改变不了这一普遍存在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大联合”、“三结合”，自己肯定被吃掉。造

反工人们原先总寄望于文革会较大幅度地撤换原来的厂当权派。文革前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估计了三分之一以上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革命者手里。但此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却说："对待干部必须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心，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就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造反工人惶然了。这么说是不是那些执行过"资反线"，迫害过群众的领导都可官复原职呢？在这一巨大问号的压力下，不少工人造反组织迅速涣散。许多人看清形势走向，知道不但白忙一场，还会后患无穷，不如趁早洗手不干。但另一些感到无退路可寻的人却格外亢奋起来，他们要以斗争求生存。在社会上他们维护红旗派的大旗，用造反派在社会上的声威支撑他们在厂内的脆弱处境。在厂内他们尽力拖延"三结合"机构的建立，极力搜集当权派的材料，力图把他打成"走资派"，将其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中除名，以消除这个最终会对他们实施打击报复的最大隐患。

毛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论断完全错了。民众在中共的统治下已被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社会群体。依附于中共官僚阶级的先进分子和受到压制的落后分子。当然在它两者之间还有中间地带。文革大波使这两个群体的矛盾公开化、激烈化，已不可调和，其结果只能是一个群体压制另一个群体。当然，只要中共的政治统治继续存在，先进分子压制落后分子是必然规律。

六七年秋，毛也没有估计到工人群众会对他的最新指示会有如此的抗拒，他以为抗拒主要来自知识分子和学生。他说："告诉革命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着，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毛不但表达了对青年学生的失望，而且把前一阶段的反复归罪于他们。毛说："一月风暴以后，广大工农兵虽然促进了一下大联合，当时中央也想迅速大联合，但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泛滥出来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却破坏这个形势，各个阶级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既然阶级斗争规律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捏不成个联合的，捏成的联合很快就分裂，不再捏了，步子不得不放慢些。"

对比毛前不久对"革命小将" 的赞许，可以发觉他腔调的大变。这预兆了毛已有了抛弃造反派平民红卫兵的心思。这实际是文化大革命最后以大镇压为结局的基因

第三节 、关于《佛山会议纪要》的争论?

六七年十二月中旬，广州红旗派各组织的头头在佛山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是为有名的"佛山会议"。参加的组织甚众，有"工革联"、"广铁总司"、"海员总司"、"红司"、"三司"、"新一司"、"机关红司"、"省直红旗"、"中南局联络总部"、"红旗贫下中农"等等。

会议开了十天，无非是读文件，讨论，谈认识。其间，十二月十二日，与会者还参加了省革筹举行的形势报告会，听取黄永胜所作的形势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佛山会议纪要》，并作为文件发到各组织的下属分部，要求进行学习、领会、贯彻。

佛山会议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气氛，表明许多旗派的头头仍陶醉在北京谈判时形式上的胜利和表面的政治优势而缺乏对现实的洞悉力。或许他们之中某些人的造反目的本来就只是为拓展个人的仕途，而这已显端倪了。为什么不应该高兴呢？在这种喜滋滋的心情下，一些基层单位造反者的艰难处境已在他们视线之外。

《纪要》的腔调几乎是紧跟派的语言。诸如“以黄永胜同志为首的省革筹小组的成立，宣告了陶铸及其死党的彻底垮台。”“大局已定、大权在握。‘定’是定在经历了一年来的艰苦斗争，运动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定’是定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掌握大权，”旗派头头们还就自己以前对军方的态度作自我批评，承认对军区“提过一些错误的口号，采取了偏激的做法。”这显然是想讨好军方，化解从前的积怨。

《纪要》的下达立刻在红旗派内掀起轩然大波。紧跟派与抗拒派的矛盾在社会上公开暴露出来。

前文曾谈及各人在新形势下的态度取向与其政治背景和社会处境有关。这里就涉及到第三个因素：社会地位。各旗派组织的头头，尤其是大头头接近上层，较容易感受到上层的压力与利诱当局了解，若要使整个红旗派就范，首先就是要这些头头听话，令其做带头羊。私下的交流说项往往能比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的谈判更能有收获。军方着力在这方面做工作。许多旗派头头为了保持自己的正统身份，在未来的权力分配中有所收益，选择做紧跟派，起码在表面言论上做紧跟派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说抗拒派原来只是在私下议论、发牢骚，那么这下可好了，他们找到一个发泄的借口，他们抓住《纪要》大加伐挞。抗拒派不能容忍紧跟派头头对军方讨好的态度，不同意他们“大局已定、大权在握”的说法。一时间批判《纪要》的大字报、大标语涌上街头，措辞十分尖锐。如：“佛山会议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根本原则”、“佛山会议抹杀两条路线斗争，把一切归为派性”、“佛山会议鼓动大权在握是麻痹斗志，取消斗争”、“佛山会议是慕尼黑会议”。

有趣的是一向以激进、红旗派左翼形象出现的“中大红旗”并不十分热心批判《纪要》。究其原因是“中大红旗”在校内占了压倒性优势。对于他们来说大局似乎已定；“中大革造会”翻不起来，权也将握在他们手中。而其它一些情况相反的学校就不同了。如一中的“七一造反队”就对《纪要》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这与他们在校内的处境有关。“七一造反队”

尽管在中学造反派中资格最老，也很有名气。其头头李庆蜀亦就任中学红代会的头头，但因种种原因，他们未能在校内取得一统地位。故此，他们极不赞同“大局已定、大权在握”一说。

尤其能从思想理论上批判《纪要》的是《红司呐喊》。这个组织由一班大、中学生混合而成，专门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其头头是绰号“大皮鞋”的李正天——七四年“李一哲”的三人之一。这些当时被讥为“流寇”的青年理论家由于没有权力上的负担，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态，绝少保守思想，观察敏锐，笔触锋利，其炮制出来的宣传品甚具战斗力、感染力。

在一片抨击《纪要》的声浪中，还有一个生动的插曲。广州兵团属下的铁中红旗、七中红旗一班人，听说“红司”要铲平山头，向军区投降，以换取自己的官位，大怒。立即集合六七十人，分乘两辆大卡车，冲到建设大厦的“红司”总部，怒斥武传斌、黄意坚等在场的一班“红司”头头，并推翻桌椅，抢走“红司”的大印、大旗并一应文件。点着那班头头的鼻子斥道：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要铲“红 司”就先开除你们。“红司”大旗由我们来扛！言毕，高举大旗呼啸而去。“广州兵团”为“红司”中坚之一，“铁中红旗”、“七中红旗”又为“广州兵团”之中坚力量，诸头头面对他们，惊愕而尴尬。此事后由武、黄前往“铁路局大楼”（“铁中红旗”驻地）作出解释和保证得以平息。但也反映出红旗派中反《纪要》的力量之大。

红旗派的工人组织对《纪要》持批评态度最为普遍。这当然是由于绝大多数工厂里造反派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大权在握”对于他们真不知从何说起。他们看法是“大局未定、大权在争”。在他们看来，如果真的“大局已定”那就太糟了，因为保守派占了优势，“大局已定”，那他们岂不是连争的可能都没有了。有些工人造反派扎个草人，草人身上写着“佛山会议”，头上戴顶写有“改良主义”的高帽，放在街头示众，批判抨击之中，不失诙谐。

在一片激烈的气氛中，抗拒派干脆拉下脸皮把黄永胜也大骂一番。“黄永胜‘十二．十二’报告是政治瓦解造反派的大毒草”、“彻底批判黄永胜‘十二．十二’报告、粉碎改良主义思潮”一类标语贴满街头。还有一些颇具份量的大字报，如“分歧从何而来——论我们和黄永胜的分歧”、“一斥黄永胜”也相继出炉。

第四节、“文革新思潮”在广州的浪花

??“八．五”思潮

冬季的北风虽然寒冷，但竟也给人们吹来一丝振奋的信息，那就是湖南“省无联”的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虽然毛中央已明确 将它定为“极左”思潮，“形左实右”，“极右”，“反革命”，号召对其进行批判，但都禁止不了红旗派里的青年理论家们对它的兴趣和研究。一年多风吹雨打的锻炼使他们身上萌发了个性和自主的思索。广州的抗拒派迅速汇入在“极左”派之中。不过吸取湖南“省无联”的经验教训，广州的“极左”派们不再像它那么直取要害无回旋的余地，而退以针砭具体现实为主。

广州的“极左”思潮又称“八．五思潮”，它得名一张小报“八．五公社”。该小报由“粤海风暴”主办。这是个跨行业的旗派组织，人数少而精干，其实在湖南“省无联”纲领问世前它已存在，只是由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刺激使它的言论也更趋尖锐。批《佛山会议纪要》时它已是主将。六八年二月间“八．五思潮”推出了它最具份量的文章：《激战前的沉寂——论目前广州时局的若干问题”。文中说：“在一片锣鼓的喧闹声中，人们不难感觉到在珠江两岸笼罩着一股激战前政治沉寂的气氛。”“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中，在保守势力甚嚣尘土的情况下，所谓‘铲平山头’、‘无条件大联合’实际上是以和平的方式，用蚕食的政治手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守的社会势力向革命的造反势力、走资派向革命派垂死挣扎性的反扑。这是广州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形式“有些单位党委活跃起来了，什么政治处、人事处、保卫科、生产临指的整套旧体系原封不动地开始起动了。”“造反派正在往丧权的道路上走，向政治上和组织上瓦解的趋势发展。”“‘二月草人”‘三月黑风’又来 了，如果不去反抗，发展下去，造反派就会被扣上‘极左’而去坐牢。”

一个政治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最关键体现不是人而是具体的社会机构。因为人的去留并不影响制度的存在，正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而社会机构才是政治制度不可更改的外在表现，一旦崩溃，相应的政治制度也就不复存在。文革中民众的造反，无论是六六年秋冬的批“资反线”，还是六七年“一月夺权”，亦或六七年“暮春平反”，其矛头都是针对人，针对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其诉求的主旋律是反政治迫害。但“八．五”思潮突破了这个框框，它把矛头指向了“党委”、“政治处”、“人事处”、“保卫科”。这是一个质的跃进，完全挣脱了“批资反线”、“揪走资派”等 毛中央所倡导的、允许的造反范围。从“奉旨造反”、趁机造反发展为自觉造反。“政治处”、“保卫科”之类的社会机构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关键体现，毛从来没有说过要取消它们。文革期间，这些机构是保守派的大本营，文革后期重建中共社会秩序也是以它们为基础向全社会扩张。“八．五”思潮的言论已从被动的反政治迫害呼喊跃升为主动性的向旧有社会制度的进攻。它甚至敢于指责当时广东的主政当局（由军方控制的省革筹）“在造反派内贿买和扶植机会主义的暗流，自制各种各样抹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改良主义概念，”“用以保存他们反动腐朽的专政基础。”

“八．五”思潮还石破天惊地把矛头指向了中共的阶级成份论。如果说，政治处之类是中共专制的外在体现，那么阶级成份论就是它的政治伦理。它就是依靠阶级成份论来欺骗统治人民。这个政治伦理在民众中建立起二十世纪的政治种姓制度。让一部份低种姓的民众自惭形秽，受尽凌辱而不敢反抗，使另一部份本质上也受着思想钳制、经济剥削的民众陶醉在高种姓的虚荣中去拥护中共政权，乃至充当它的鹰犬爪牙去打击迫害任何敢于反抗中共政权的人。“八．五”思潮提出“现在需要重新划分阶级。”它不承认什么“地富反坏右”，不承认“红五类”的优越。它认为“现在的矛盾是在底层受苦最深的组劳人员、支农青年、合同工、临时工和那些爬上了权力宝座者之间的矛盾。”这一论点不啻是在思想理论上投下了一个重磅炸弹，真正触及了中共专制政权的阶级压迫的本质。

横行于六六年夏季的“血统论”其实与中共的阶级成份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一群横行霸道的“高衙内”把他们父辈制定、奉行的阶级成份论推向了极端而已。而毛中央之所

以允许批判它是由于这种赤裸裸的社会等级论不符合他们的统治策略，更主要的是“衙内”们的“血统论”干扰了毛中央的政治清洗。因一些“衙内”的父辈已属清洗对象。批“资反线”时期对“血统论”的批判基本没有超出毛中央的框架，（遇罗克除外）讲来讲去无非是说阶级性不是生理现象，不可遗传；社会上毛泽东思想占优势可以抵制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对出身不好的青少年的影响，只要他们注重思想改造，仍然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等等。在中共的框架下，非但对血统论的批判不彻底，而且在实际上成份论仍大行其道。六八年春，军队在广州各中学征兵，按政治标准，“主义兵”合格被挑中者甚多，而旗派学生寥寥，使“主义兵”趾高气扬，并洞悉天下道统未变。非红类出身的青年要想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远非易事。“八．五”思潮摒弃了共产党的思维体系，开辟了新的境界，从根本上否定中共的政治伦理，实属难得，故也成了中共眼中不折不扣的异端邪说。

“八．五”思潮不但把矛头指向官方，也把矛头指向红旗派内部，从抨击《佛山会议纪要》开始，措辞愈来愈尖锐。六八年元月“红司呐喊”、“美院 1126 战斗团”的“十大分歧——对当前广州改良主义的批判”可视为其代表作。并由此激化红旗派内部的思想斗争。它说：“从人民桥往南望下去，那么多的工厂你们能指出哪一间是‘大权在握’？”“‘大权在握’论是麻痹我们斗志的精神鸦片，必须批判！”它还尖锐指出某些旗派头头“为自己一点既得利益而背叛革命原则。”

红旗派由来已久的内部纷争发轫于“省革联”时期，此后以“红司”、“中大红旗”为首的“省革 联”系与以“三司”、“华工红旗”的反“省革联”系一直存有心结。六七年七月“批陶联”成立总算把这两个系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旗帜下。但一个月后，“红司”、“工联”、“广铁总司”、“八一战斗兵团”、和“工人红司”、“中教红司”、“机关红司”、“部队文体红司”……（从这些组织的名称就可看出都是在学生“红司”影响下的产物）一起成立“广州地区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把“三司”、“新一司”、“红旗工人”、“省直红旗”、“市机关红旗”等组织排除在外，从而被“三司”等指责为分裂主义。不过当时面对总派挑起暴力事件的强大压力，两系尚能同心协力去加以抵御，故并未产生实质性的摩擦。至九月份以后形势转变，两系的矛盾迅速淡化，代之而起的是紧跟派与抗拒派，或曰正统派与极左派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省革 联”系与反“省革联”系的冲突，正统派与极左派之间的斗争，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中大红旗”主导“省革联”夺权时，曾再三要求“华工红旗”参加，但都被拒绝。在冠冕堂皇的理由后面无非是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当然，如果主导者是“华工红旗”的话，“中大红旗”是否会以同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合作亦未可知。广州工人运动逊于学生运动，“工联”唯“中大红旗”之马首是瞻；“红旗工人”对“华工红旗”言听计从，两系阵容由此分明，再加上对公安“一．二五”总部看法的歧见，对“八一战斗兵团” 平反热心程度的差异，使之分歧更显。然而，这些摩擦纷争其实都没有深刻的政治内容，相比之下，六七年冬正统派与极左派之间的斗争就截然不同了。

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八．五”思潮当然带有它的历史印记。在它的行文中广泛存在共产党语汇，诸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资本主义的复辟暗流”之类，来自中共《九评》

谴责修正主义的典型名词“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也被广泛运用。但是，正如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宣传萌芽民主思想的文章《明夷待访录》、《噩梦》虽用文言文写成，并不掩盖其光彩一样，“八．五”思潮之中的共产党语汇、名词也遮不住它耀眼的光辉。在那些语汇、名词下存在着尖锐锋利的棱角。如果只因它用了那些语汇而贬低它的积极意义，就完全是脱离历史实际去考察问题，流入浮浅、空泛。“八．五”思潮与“极左”思潮的最高峰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相比有一段差距。后者更为激进。它直陈中国出现了由百分九十以上的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腐朽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它主 张“应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应推翻腐朽的阶级。”如果说，湖南“省无联”是极左思潮的先锋，那么武汉“北、决、杨”、广州“八．五公社”、山东“十月革命小组”、上海“反复辟学会”等就是它的后续部队。两者之间当然有差距。这差距使“八．五公社”、“粤海风暴”等组织未被立即打成“反革命”，而得以从事更多的工作。可见在政治斗争中先锋与后续部队会各有所长。“省无联”以它尖锐的纲领标志了“极左思潮”的峰颠，给人们的思想以极大的震动和启示。“八．五”言论则凝聚了红旗派中反抗旧有社会秩序的力量，并促使整个红旗派战至最后。

许多年后，人们对“极左思潮”的评价甚有歧见，甚至在民主运 动内部竟也如此。有人仅仅以“极左思潮”有“极左”的衔头就把它与“四人帮”挂上钩而加以蔑视；有人以它反周恩来，提出过“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而加以贬斥，这显然都是极片面的。

毛中央先称“省无联”思潮为“极左”，接着立即又指它为“形左实右”、“极右”。可见我们并不应以中共给它起的名字来确定对它如何评判。“极左思潮”在六七年冬已被毛中央判了政治死刑，那时四人帮正当道，若它们是一丘之貉，四人帮为何不对它网开一面？名称是由人去定的，我觉得应把“极左思潮”称为“文革新思潮”更为贴切些。

“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之说是”省无联“纲领的表层思维，“红色资本家阶级”论才是它的深层思维。表层思维是它的历史印记，或者是它的保护色。深层思维才是它的精髓。为什么在评价它时只着眼于它的表层思维而妄顾其深层思维呢？至于周恩来其人，如果说在文革三年间及至七四年还未能对他有清晰的了解，那么难道至今还未能扫开障眼烟云吗？

还有的人士鉴于“极左思潮”中援引了共产党的许多语汇名词，亦属于“打着红旗反红旗”之类。而“‘打着红旗反红旗’终究是反不掉‘红旗’的。”故不足为道。这里有两个疑问，难道在那个时代不打着红旗的政治活动能有丝毫的生存空间吗？杨曦光印发了《中国向何处去》后几个月才被抓，其后各地一些群众组织都以批判之名加以翻印，使其影响百倍扩展。而如果他写的是《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话，那就会马上被抓并且立即枪决，也绝无哪个组织敢去翻印了。第二个疑问是，从斗争策略上出发为什么不可以先把自己的旗帜藏起来，用“红旗”把红旗反掉了之后，再亮出自己真正的旗帜呢？

“文革新思潮”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文革造反派中最激进的一翼已开始觉醒，挣脱了“奉旨”造反的束缚走向了自主思考，独立探索。尽管它的理论还嫌粗糙、幼嫩，留有共产党文化的痕迹，但它那开拓性的离经叛道却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无愧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中国当代第一次民主运动当推五七年几十万“右派”中不足百分之一的勇敢者向中共政权发起的挑战。但鉴于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那次民主运动未能对广大民众有所启蒙，那股民主清泉消失在专制戈壁之中。而“文革新思潮”则不然，它一直流传下来，启迪着人们的思维，激厉着热血青年去探索。尽管具体内容思想深度有所不同，但冲击中共专制制度的思想核心未变。从“文革新思潮”到七四年“李一哲”大字报，再到七六年天安门运动，及至七九民运、八九民运，一波又一波的民主运动滚滚不息，而且其中不乏连跨两、三个民主浪潮的老战士。

第五节、杰出的人权战士——晓兵

六七年冬，红旗派激进一翼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战士——晓兵。人们大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但“晓兵”这个响亮的名字却一度为大众所熟知。

广州“极左思潮”的组织是“粤海风暴”，而“粤海风暴独立大队”实际上就是晓兵一人。晓兵在几份“八．五”思潮的小报上都发表过文章。其中甚有影响力，署名为“予红”的“激战前的沉寂——论目前广州时局的若干问题”就是晓兵所作。

从“晓兵”这个名字已可以窥见他深邃的心思。晓，破晓之意。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晨曦曙光之士兵，寓意极为深刻又充满诗情。而且晓、小在国语音系中同音。晓兵听起来是小兵，表达了他自勉作一名为社会公理而奋斗的小兵的高尚情操。

晓兵系文革前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分配到《羊城晚报》工作。他在文革中的活动体现了造反派中先知先觉者的卓绝斗争。

“晓兵”这个响亮的名字当时之所以为人们所熟悉，并不在于他发表过一些运载“八.五”思潮的文章，而是由于他几度以绝食的方式为民请命。在社会上掀起波澜。

前文已述及广州“支青”和“持证工人”的困苦处境和红旗派的头头们为保持自己的正统身份而对他们采取的冷漠态度。晓兵对此极为愤慨。他毅然站出来替他们讲话、呼吁。当这些作法都未能取得明显效果时，他勇敢地采取了非常手段——绝食斗争。

晓兵进行过几次绝食，地点在丰宁路的原《羊城晚报》社址门前。绝食前，他发表绝食声明，力陈“支青”、“持证工人”境况的凄苦，要求当局关心这些青年，给他们应有的生活工作的权利。晓兵席地而坐，身边放着纸、笔和绝食声明，他并号召人们签名支持他。围观

群众如堵，往往使附近的道路为之堵塞。绝食昏倒后，人们把他送往医院急救。经过一段时间，晓兵又以他坚强的意志，拖着孱弱的身子去进行下一次绝食。

对于晓兵的绝食斗争，社会上的反响是多方面的。总派当然严加指责。红旗派的反应则比较含糊。红旗派的成员议论纷纷，但众组织却没有公开表态。绝食斗争对于红旗派一点也不生疏。去年的“五．三”千人绝食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次晓兵单枪匹马地绝食其胆略固然可嘉，但其诉求却使红旗派颇感为难。一年多来，他们的抗争都是在政治领域内，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人身权利 和 物质利益奋斗。

红旗派的头头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对“支青”、“持证工人”伸出援助之手，但此时对晓兵的行动，即使不表支持，却再也不愿进行压制，因他们心中不乏对晓兵的同情，其实也就是对“支青”、“持证工人”的同情。红旗派的一般成员对晓兵的为民请命则十分支持赞赏。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家里或亲友之中就有人做了“支青”、或“持证工人”，因而相当了解这些青年的不幸。在向头头要求不得要领后，他们只好在街头以各种形式自行表达对晓兵的支持。有些人自动为晓兵轮班站岗，保护晓兵不受伤害；有些人在晓兵晕厥后，把他送去医院，或有时把晓兵“绑架”到餐馆，“强迫”他吃下可口的食品，滋补他虚弱的身体。

随着势态的发展，“新生红色政权”出面干预了。它说社会上有坏人在破坏大好形势，攻击社会主义，各群众组织应主动地认真清理混进自己队伍里的坏人，并直接点了晓兵的名。红旗派听了，绝大多数组织都充耳不闻，按兵不动，但也有个别“紧跟”意识较强的中学生提出应该禁止晓兵的行为。在一再催促得不到大组织首肯的情况下，他们自己调动人马把晓兵抓起来，送往警司。尽管这一行动引起许多红旗派成员的不满，但都无补晓兵从此身陷大狱的事实。这时已是六八年春。不久夏季大镇压至，一些旗派头头被捕入广州西村南京路八号的警司监狱。他们得以了解比他们早几个月关进监狱的晓兵的情况。

戴着一付近视眼镜，身体瘦削的晓兵有着无比坚强的意志。他认定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决不向当权者低头。当中共狱官要他认罪，狱警歧视虐待他时，他坚决反击，并又采取了绝食斗争。狱警殴打他，嘲笑他：“不吃饭，想饿死吗？像你这些坏蛋饿死了更好，国家可以节约粮食。”狱官先是要他吃饭，被拒绝后恼羞成怒地说：“什么晓兵，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解放军打败了八百万蒋匪军，还怕你这个晓兵？”终于有一天，晓兵单人监仓的门“砰”一声打开，人们从门缝里看见无声无息的晓兵被狱警抬走了。从此世间再也没有关于他的信息。

晓兵牺牲了，为了人间正义和公理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死在黑暗中，未能迎来黎明破晓，孤寂地在黑牢中咽下最后一口气，满怀悲愤地孑然走完了短促的人生。

晓兵的事迹可以说明许多问题。晓兵产生于红旗派的队伍中，表明了只有造反派里才存在反抗旧有社会秩序的土壤。对晓兵的绝食行动，旗派头头层的袖手旁观应该受到指责，但

比起总派的公开诅咒有极大的不同。

晓兵的为民请命已经完全超出了文革两派斗争的内容，摆脱了毛规定的运动框框，走上了自主的争民众人权的斗争道路。

晓兵的意志和勇气是极为令人赞叹的。从前许多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抓进监狱，虽则备受牢狱之苦，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大组织在外面坚持斗争，而且有胜利的前途。自己艰苦卓绝的斗争也终将得到颂扬和纪念。然而晓兵是单独的。他单独地被抓，单独地关押。在社会上孤军奋战时，他的理念和行动已得不到任何一个大组织的认同。入狱后，与世隔绝，再也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知晓、关心自己的命运，更遑论为解救自己而斗争了。一个瘦削的青年孤独地面对整个统治机器而作坚定不移的斗争，其意志之坚强比当年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更胜百倍。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有太多的悲哀。自古以来缺乏那种愿意牺牲个人的一切来奉献公众的人，这是第一重悲哀。而一旦有人作出了这样的壮举却又常常得不到公众应有的颂扬纪念；更有人吝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但当他人作出为公之举受到褒扬时，则骤生妒嫉，进而中伤抵毁，这是第二重悲哀。这种情况又会对某些准备为公众作贡献的人产生负反馈，使他们心灰意冷，踯躅却步，这是第三重悲哀。

晓兵是极为高尚的。但人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愿意奉献公众的人都达到他那样的思想境界。一个人在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去为社会公理作贡献时，他理应得到公众的褒扬。这褒扬不应看成是赞颂了个人，而应理解为对人间正气的颂扬并使之发扬光大。这才有助于激励社会上愈来愈多的人去为公众作出贡献。只有不仅仅是荆柯式的勇士在奋斗，而是有千千万万的“晓兵”在前赴后继，我们的民族才能恢复青春，我们的国家才有光明的前途。

六八年春，晓兵为民请命的绝食行动在社会上曾一度掀起波澜。但他一旦入狱，情形就很快沉寂下去，接踵而来的大镇压和反复清算，再加上贫瘠艰辛的生活，使许多红旗派的头头和广大民众都渐渐淡忘了这位战士的悲壮业绩。然而，天地有正气，苍劲且浩然。岁月的尘埃决不会使英雄事迹湮没，待到有一天东方破晓晨曦洒遍神州大地之时，人们一定要为晓兵树起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碑上刻着：“杰出的人权战士——晓兵永垂不朽！”

第六节、总派反扑与省、市革委会成立

广州的“总派”是全国各省市保守派中最老练、最成功的一支。全国各地于六六年内成立的保守组织大都垮台了，只剩下广东总派和广西“联指”。而总派比“联指”资格更老。如果说“联指”能屹立不倒的关键是其所保的韦国清巍然不动，那么总派呢？赵紫阳早就不在其位了。可见总派的成功，除了毛的九月改向外还在于它自身的造化。

广州的造反派系以学生组织为主导，而保守派则大异其趣。相对于红旗派的“红司”、“新一司”、“三司”、“广州兵团”、“红战团”，总派只有“红一司”、“主义兵”。“红一司”规模远不可与“红司”等匹敌。中学生的“主义兵”除从事暴力行动外，政治上并无建树，故此总派在政治层面上的运作便主要由其职员组织、工人组织操持了。总派的成熟与此不无关系。其工人组织有“地总”、“红总”，职员组织主要有“省直大联总”、“省委东方红”、“市委机关大联总”、“市委机关遵义公社”、“公安厅联总”。山头不及旗派多，这正反映了它内部较少意见分歧和摩擦。文革中典型的保守派并不特别期望在这场社会变动中得到什么，而主要致力于维护他们原有的一切。故此在缺乏进取性的同时也较少“私心杂念”深为军方所欣赏。

从年龄层上来看，红旗派是青年人的运动，总派是成年人的运动，故此，显得老练。实事求是地看，“主义兵”的嗜杀绝非总派活动的全部内容。

总派的成熟老练首先体现于它的洞察力和自信心。六七年夏秋之交，旗派声势甚炽。周恩来的训斥，军方的转向，形势一时确实十分不利。但它咬牙坚持下来。一方面制止了内部的躁动（写周的大字报，及到军区静坐），一方面坚决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力量。例如在“工革联”成立之后仅十天，总派就成立了“工革会”，以示分庭抗礼。

总派深知旗派宣传舆论上的优势并不能反映社会实际。旗派学生多，文化水平较高，更兼“停课闹革命”，当然可以泡制出比自己多得多的大字报、大标语。但是单位内的具体情况就与社会街头大相径庭。机关里中南局是旗派占优势，但省、市委机关就显然不同。至于工厂里，尤其是大、中型工厂，总派的力量远比旗派强。单位里的要害部门掌握在他们手里，大多数的工人群众不管其内心真实思想如何，起码在表面上都继续服从原有的社会秩序。只有少数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工和对领导心怀不满的家伙在闹腾。这些人在厂内并无根基，大多数工人并不跟他们走。别看他们在社会上咋咋呼呼，回到厂里可没有市场。在社会深层结构上，总派确信自己的潜能是旗派无可比拟的。他们并不急于与旗派表面上的声势争一日之长短。他们确信随着形势的发展，自己终究会占上风。这一预见在六七年秋已显端倪，六七年冬则已相当明朗了。

总派的老练成熟还表现在他们对待地方主义干部搞翻案的态度上。文革前夕，广东民间地方主义情绪全国第一。这在封《红卫报》事件中已有很清晰的表露。当时反封《红卫报》的人群，尤其是市民极为愤恨“北佬”要封掉《羊城日报》，在围攻殴打封派学生时，一些口号已表达为纯排外情绪。如“打死这‘捞松’”（粤语音译，意为北方佬），“他们是来广州捣乱的”，“捞松吃贵广州米”，“把榜松赶出广州”等等。

六七年初，随着陶铸的倒台，广东省委亦岌岌可危。这时候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七年广东两次反地方主义的肃整行动中受打击的原中南局、省、市委的粤籍干部起来为“地方主

义”翻案。这批人大都出身于东纵、珠纵、粤中纵队和琼崖纵队。代表人物有尹林平（非粤籍）、林锵云、吴有恒、饶彰风等。他们积极串联，四处活动，发表文章，如“陶铸是高饶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陶铸是迫害古大存同志的凶手”、“放下包袱、挺直腰杆、投入战斗，挖掉陶铸、赵紫阳在广东统治的黑根子”。一时间颇具声势。作为粤籍的机关干部和工人若从地方主义的情绪出发，本来会顺理成章地对这些受陶、赵多年的打击、排斥的粤籍地方干部持同情态度，支持他们讨回公道的行动。但恰恰相反，“地总”、“红总” 不但不予以同情、支持，反而采取打击的态度。倒是旗派里的某些学生组织表示了友善反响。究其原因，总派的组建虽与反《红卫报》有关，但那时它尚未正式形成。一旦具备了组织形态，在政治问题上它就不轻易表态，也不为深厚的地方主义情绪所左右。作为原有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省、市垮台以后，它有必要寻找新的，并且也是代表着原有社会秩序的靠山。失势的原地方主义分子显然不在选择之列，只有军方才可依托，而军方已在三月间明确表态反对地方主义翻案行动。故此，总派断然斩去地方主义情丝而投向军方，对地方主义的翻案行动大加伐挞，获得军方好感。四月中旬，周恩来到达广州接见两派代表，其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严防地方主义的翻案。过去陶铸以前的领导犯过地方主义错误。这个是中央讨论了的，定了案的……如果说地方主义要翻案，这就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资本主义复辟的两个暗流，一个是并没有被彻底批判的领导广东十五、六年的陶、赵这个暗流，另外一个就是地方主义复辟的暗流。这两股暗流都值得重视。”至此，总派在这个问题上漂漂亮亮地得了一分。并且它还死死地咬住旗派支持过地方主义翻案的痛脚不放，成为攻击旗派的有力武器。

总派在六七年冬最新近的行动上更显示出它们的谋略。面对新的有利形势，总派摆出了主动进取的姿态。它制定了一个“九字方针”，即所谓“批极左、揪黑手、乱中南”。迅速地结集组织，武装思想向旗派进行反扑，以此在筹建省、市革委会的斗争夺得更多的筹码。

《佛山会议纪要》出炉后引起了旗派内的轩然大波，支持和否定的意见激烈交锋。这本是旗派内部事务，但总派竟也插上一脚，煞有介事地扯起“维护‘佛山会议’精神”旗帜，加入反击“批判纪要”的行列。它力图扰乱旗派的阵线，离间其关系，分化其组织。至毛中央把湖南“省无联”的纲领定为“极左思潮”并予以镇压批判时，总派立即抓住这一时机向旗派发动反攻。它开动宣传机器大批极左，不但批湖南“省无联”的极左，更批旗派的极左。“八五”思潮的一些文章成为它们的靶子。上纲上线，反复攻击，那架式即使不把整个旗派都打成极左派，起码也要制造这样一种社会意识，即旗派极左思想严重，政治上很有问题。

如果说“批极左”主要还是体现在思想层面上，那么“揪黑手”、“乱中南”就是一些很具体的行动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此时以重建共产党的政治秩序为活动内容。重建的权力机构是“三结合”，即军方，地方干部，群众组织头头。军方代表由中央钦定，群众组织头头由本派内部酝酿产生，唯地方干部人选最具争议。两派都极力想把支持本派的地方干部塞进省、市革命委员会，并把支持对立派的打下去。运动演进成为这样的局面对于一些造反者来说是并不惬意的。

文化水平较低、并无深刻政治思想，主要因受过共干欺压起而造反的人们（主要是工人群众），政治上并无深谋远虑。对于上层，他们只是希望本派的头头能多些进入省、市革委

会，从而能较有力地支持基层单位里一直受压制的旗派成员。较有文化和思想的某些头头们则处于两类思想状态。造反动机以改变个人处境、提高个人社会际遇和地位的人对此并不感别扭，他们感到当务之急的就是尽力多争取一些地方干部的认同，并且也热心地去做工作。然而某些怀着理想主义的人们则颇感苦恼。当时他们响应号召起而造反除本身受过来自共干或"血统论"的压制外，还怀着一份朦胧的建立一个较合理社会制度的理想。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理想当然不会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而只是社会主义并且以马克思主义为图腾。他们曾经向往过巴黎公社，也设想过较大幅度更新干部队伍，而现实与理想大相径庭。但在苦恼之余他们又感到后无退路，造反派此时就像一个失身之女必须有一个大丈夫肯与之婚配方具名份。即使目前所做的、到处设法争取干部的事情已违初衷，已与自己的理想不符，但也只得勉为其难，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心境是不无苍凉的。

然而，对于当时的总派来说，他们是没有必要也没有那个认识水平去对旗派头头进行这样的剖析和区分。他们所要干的就是尽力打击倾向旗派的地方干部，使旗派在省、市革委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为此，他们大搞"揪黑手"、"乱中南"。

"揪黑手"就是把支持旗派的干部打为黑手，进行揪斗，使之在省、市革委会的组建中出局。具体战术以"八．二一"大字报为突破口，对在"八．二一"大字报上签名的干部进行全面攻击。由于周恩来十一月十四日的讲话曾对旗派代表说："你们曾受戈枫、黄施民的挑动，这两个人很坏。"总派得此尚方宝剑，有恃无恐。他们把这批干部打成"戈黄集团"、"黑手"。九十五个签名者中三分之一都被总派揪斗甚至抄家，抓走。总派的"红一司"在这些战役中功绩卓著。它的"体育战报"提出"坚决击退戈黄之流新反扑"的口号，抛出大批关于戈黄等人的所谓"材料"，构成攻击的重磅炸弹。

所谓"乱中南"就是要打破中南局机关里旗派占优势的局面。"中南局联络总部"在旗派内部很具影响力，干部力量雄厚。尽管中南局里的职员造反派与工人造反派是有着多么大的不同，但总派都不会去加以区分。它所感兴趣的只是把这些曾与军区作对，支持旗派的干部打下去，既可尽量除去权力争夺中的敌人，也可取悦于军方。总派的"中大革造会"在"中大战报"上发表"八级的造反派——闵一帆"和"旧中南局必须大乱特乱"等文，吹响了向中南局攻击的号角。接着总派组织抄闵一帆、车学藻等人的家。攻击中南局是"阴暗角落"、"中南局联络总部的干部是乌七八糟的联防保"等口号鼓噪不休。随后军方也介入了行动，指责闵、车等人并对其进行压制（六八年大镇压时这批中南局干部全部下狱），军方至此总算报了六七年七、八月间闵、车等人为首策划成立"批陶联"，欲搞垮广州军区的一箭之仇。

省、市机关里倾向旗派的干部本来就有限，经过总派这番动作，旗派的上层建筑元气大伤，很难与总派在即将成立的省、市革委会中抗衡。相对总派，旗派确实是一筹莫展、一事无成。它想推举的干部上不去，它想拉倒的干部（最典型的如林李明，焦林义）下不来。当然总派的成功除与它的老练有关外，还与军方的幕后支持分不开。它对干部所进行的支持或打击都甚合军方胃口，两者之间配合十分默契。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其实支持旗派的干部绝不是认同红旗派中反抗原有社会秩序的主流意识。他们只不过想借用红旗派的声势来开拓自己的仕途罢了，并且对形势的发展作了失误的预测，把赌注错误地下在造反派身上。假如红旗派得胜（在其它一些省份这不是假设），这些支旗的干部得以入主省、市权力机构的话，他们终究也会与红旗派的头头们渐渐划清界线的。造反派只不过是敲门砖，过河桥，用完就可弃之。而且某些造反派的头头想保住名份，也会来番脱胎换骨，自我切削得适合新的，其实是复旧的社会架构，否则其下场可想而知。然而这一切在广州没有发生，不久红旗派惨败了。下错赌注的干部们结局相当悲惨。军方头目们决不顾念他们都是共产党一母所生的同根之情，下起手来狠毒异常。说来这也不足为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自古亦然。西汉七王之争、西晋八王之乱、唐玄武门之变、明靖难之役、清雍正之诛……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法西斯政权自不会例外。在权力和利益的综合诱惑下所引发的暴戾相残，是封建制度下的生理血缘和政治血缘所无可消弭的。

在旗派涣散、分歧和总派团结进取的形势下省、市革委会于二月二十一日成立了。省革委主任黄永胜，第一副主任孔石泉，另有副主任七人，其中军头三名，地方干部两名，群众代表两人（红旗工人头头刘继发为其中之一）。九名正、副主任中，军人占五名，且据正主任、及第一副主任之要职，可见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无非是个军人政权。旗派能分摊到的副主任之职，这无疑是毛中央在其中起作用。一方面是前一阶段运动的政治惯性所至，同时也是想就此安抚一下躁动不安的旗派。

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广州“警司”司令员），副主任五名，其中军头两名，地方干部一名系原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焦林义。群众组织代表两名，其一为农民“郊贫联”成员，另一名为工人，系“地总”成员。由于省革委会的组成毛中央予以过问，故旗派在其中的处境尚不太差。而市革委会的组成由省革委会审批，中央不再干预，故其形势就截然不同。军头固然全都与旗派有隙，焦林义一向支持总派，为旗派所激烈反对。两名群众组织代表均为总派头头，可见旗派在市革委会里居绝对弱势。

省、市革委会的成立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被毛中央认可的以军人为主导的“新生红色政权”业已产生。共产党的社会秩序正走向全面恢复。红旗派今后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必须服从“新生红色政权”的号令，否则就有反“新生红色政权”之嫌，那样，旗派的对立面将不再仅仅是一个总派了。

第九章 六八年春——最后的搏斗

第一节、总派对红旗派的全面政治反攻

六七年初冬，总派就以介入旗派内部关于《佛山会议记要》的争执和批湖南省“省无联”

极左思潮来向旗派反扑。至六八年春，这一反扑已发展为全面的政治反攻。总派的重要宣传阵地“东风评论”发表题为“林杰、戈枫的辩护士”一文吹响反攻号角，直取旗派的要害，力图从政治上把旗派彻底打垮。

旗派的政治要害在哪里？在与中央文革派已倒台人物的关系上。这甚至不仅仅是广州旗派的，也是全国造反派的政治要害。中央文革明显分成两部份，其一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有相当资历的人物；其二是关锋、王力、戚本禹、林杰等后起秀才。虽然中央文革对各地造反派的行动常予以导向和支持，但前者决不与造反派组织直接联系，而后者则会作具体干预。如广州学生造反派中最具号召力的“中大红旗”与林杰的关系就相当密切。广州机关职员旗派组织中产生最早、实力雄厚的“中南局联络总部”就是在中央文革派员策动下成立的。并且在其后的活动中与王、关、戚等保持联系，汇报广州的情况，听取指示意见。广州旗派组织的最大联合体——合了当初的“省革联”派和反“省革联”派的?广州批陶联”也是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成立的。其具体联系脉络是关、王、戚、林授意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吴传启、潘梓年组织“首都批陶联”。吴等人则通过“首都批陶联驻穗办事处”策动“中南局联络总部”为核心去组织“广州批陶联”。而“广州批陶联 ”的反军区行动则种下它与军方无可解除的仇结。

显而易见，旗派的广大基层群众对其上层分子与中央文革的联系并不了解也没有兴趣去了解。虽然都同属旗派营垒，但其上层和下层在造反动机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大相径庭。出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都不可能对社会的政治结构提出根本性的改革。其下层多以反抗中共基层官僚的压迫、欺侮为动因，上层中的一部分则介入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并希求从中有所收益，拓展自己的仕途。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内涵在某一期间内都会体现为反对原有的政治秩序。但前者的反对会是单向的不归路，后者则是双向的，到了某一时期，当它获得了权力之后，又会为恢复原有政治秩序而努力，不过现实并没给予他们这个表现的机会。

总派没有兴致去分旗派的上层和下层。它所关切的只是旗派反对原有政治秩序的整体倾向，为此，它也只须对旗派作整体性的抨击。不但纯粹以反抗者姿态出现的旗派广大基层群众无可见容于原有政治秩序的维护者，即使是原政治体制内的权力争夺者也一样不被其饶恕。

总派整理了许多旗派组织或人员与王、关、戚、林的材料，陆续在街头大字报上和小报中抛出。它力图在社会上营造这样一个意识：旗派背后有黑手，是受王关戚林集团操纵的。总派射出的这支箭十分有力。前阶段它已攻击旗派被戈黄集团操纵。而戈黄集团只是广州“土产”，给其定罪者只是广州军方，故罪名并不具摧毁性。现它的这一指责就十分强劲。因关王戚林是由毛中央定的罪，旗派既与之联系密切，如何能洗脱政治上的污点？

总派从这里在旗派的政治防线上打开一个大缺口后，便乘胜追击向纵深发展。它把反攻的攻击点上溯到六七年初。总派翻出旗派冲军区的旧账大作文章，重批“省革联”夺权，大弹“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绩辉煌”的老调。总派此时也来批判“二月逆流”，它所指的“二月逆流”是旗派于二月间对军区的数度冲击。并且，总派还巧妙地把旗派的“二月逆流”与

旗派的八月“揪广谭”、“揪军内一小撮”联系起来，指明旗派一贯反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反军派，并自称拥军派。

在总派的一片甚嚣尘土的批判声浪中，广州的某些军方头目也出来帮腔说，看来旗派的确有许多问题。广州军方从六七年八、九月的支旗到十月以后的“支左不支派”，“一碗水端平”，再到六八年春明显表示对旗派的憎恶，已经转了一百八十度，重新回到原本支“总”压“旗”的立场上。广州军区作战部一位副部长在公开谈话中唱出与总派完全一致的调子：“‘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绩辉煌’就是辉煌嘛！”

时过境迁，红旗派曾经在宣传舆论上占尽优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面对总派的一连串指控，它深感穷于应付。如果说在“省革联”问题和三月军管的评判上，旗派还可作点辩驳的话，那么它决无能力解释关王戚林的倒台及撇清自己与他们的关系。这一只痛脚是牢牢地被总派抓定了。总派用力捏一捏，它即便痛彻入心也无从声张回骂。

总派从政治大反攻中获得了无尽的胜利喜悦。从前他们总是被抨击、被指责，现在轮到他们当抨击者、指责者了，真是喜气洋洋、踌躇满志。保守派的帽子压了他们一年多，现在他们反过来把保守派的帽子回扣在旗派的头上，理由是旗派保了“戈黄集团?，保了“关王戚林”。当然这一罪名份量有限，关键还是把旗派打成受黑手控制的反军派。总派叫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拥军派必胜，反军派必败！”

六八年春末夏初，旗派发动“反四右”，作被荡平前的最后挣扎。而这一行动又被总派抨击为“反三红”，即反新生的红色政权、红色军队、红色司令部。六八年不同于六七年，红旗派在政治上愈来愈处于劣势。

当年造反派的这一政治要害不但使二十八年前的广州红旗派无法抵御总派的攻击，也使二十八年来，直至当今造反派仍遭到某些人的严厉谴责。这些人士脑际运行着这样一个思维逻辑：毛发动祸国殃民的文革浩劫是错盏模　醒胛母铺敲　丨动文革的帮凶，当然是死有余辜的；而造反派是中央文革支持的，是听命于中央文革的，故也是十恶不赦的。一场极其复杂的社会大波就被这些社会贤达、知识精英作了如此简单的诠释。

第二节、“新生红色政权”　对红旗派的组织瓦解

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顺理成章的就是要组建地区、县、区各级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学校、机关部门的革委会。在组建各地、县革委会时，一般没有什么阻力。因一离开广州市，几乎就是总派的天下。只有在肇庆、汕头、韶关几个中等城市里旗派还有点力量，其它地方几近空白。由此可以洞悉文革造反，即使有毛的号召，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在省会级的大城市里由于市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远高于小城镇和乡村，更关键的是有初生牛犊的学生为先锋，文革大波才掀得起来。省会的“城墙”之外，原有的政治秩序极为稳固，愚民政策和高

压措施早使民众成为驯服羔羊，极少数的胆大妄为者形成不了派别，在迅即被惩治后，再无反抗能力。故此，在大多数的地、县里成立“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只不过是把旧有的政权机构换过名称而已。在少数旗派有点势力的地、县则用高压乃至暴力手段来催生“新生红色政权”。如汕头市镇压“二．七”派（旗派观点）最凶悍的原副专员孙某当上专区革委会副主任。支持“二．七”派的干部全扣上“黑手”、“走资派”的罪名抓走入狱。阳江县的驻军头目于凤江在对县内旗派组织进行了突袭式的镇压后，成立了只有总派代表的县革委会。海南特别行政区的革委会八十名委员之中，旗派只有五名，常委中则无旗派踪影，这实际上已是单派革委会。

广州市里的情形与地县大不相同。虽然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消蚀，旗派已呈涣散，社会舆论上的优势也已消失，但旗派在整体上仍具相当的能量。在多数的大、中学校里旗派占组织优势，军训团强调对等原则，即革委会的领导机构里旗派和“主义兵”据以相等席位，对此旗派大多予以接受，遂成立了革委会。然而工厂里形势又是另外一番景况。多数工厂里旗派不占组织优势，总派抵制对等原则，不给予旗派代表以相等席位，旗派当然不服，双方争执不休，革委会遂于难产之中。即使有少数工厂里旗派占了组织优势，但由于对干部审查的歧见，也使革委会的成立一拖再拖。通常的情况是十七年旧官僚大多不与造反派合作，造反派便极力搜集整理他们的材料，阻止他们进入革委会，以防止们他重握权柄后对造反者施加打击报复。也有少数情况是有的旧官僚支持了旗派便被总派打成“黑手”，揪斗不休。

为了加速各单位革委会的成立，省市“新生红色政权”感到有必要从组织上瓦解旗派，使之没有力量抗衡当局的旨意。这具体的瓦解措施就是号召围剿派性和铲山头。

在六七年秋末冬初，周恩来等数次接见广州两派代表时，都三番四次地提出两派要尽快实行大联合。但他同时又说：“主席讲了，联合不等于倒旗。”“工人阶级联合了，不等于马上取消组织。”“大联合后，各组织的旗帜不要倒。这派要把那一派消灭了，这种想法是派性。”然而约半年的形势丕变，今非昔比。当时旗派声威甚炽，要它倒旗，实属操之过急。而今旗派每况愈下，广州主政者认为可以对它下手了。

省、市革委会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要求群众组织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实行大联合铲平山头。它宣称：“敌人利用派性，派性保护敌人。” 故派性山头一定要予以铲除。省市革委会的这一论调除有对旗派施加政治压力的意味外，也是它真实观点的流露，它始终把造反者视为敌人。

总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宣布解散自己的派性组织，回到本单位车间班组里执行以毛中央关于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大联合的指示。总派铲了山头，你旗派铲不铲？不铲就是死抱着派性山头不放，就是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总派高叫：“先铲先忠，后铲后忠，不铲不忠。”而它率先铲了山头当然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了。旗派组织此时真是进退维谷。不铲则为形势所迫，若铲则后果不堪设想。保守派的头头骨干们大多任有一定的职务，车间主任、科室干部、工段长、班组长，或是积极分子，先进人物。

他们身后又站着厂当权派。他们并不特别需要总派这个山头，因为他们还有个更大更有力的真正山头，那就是共产党及其人事网络。这个山头保障了他们的地位和利益。而总派组织只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专为对抗造反者而产生。如果现实是他们率先铲掉总派山头，有助于迫使造反者也铲掉山头的话，那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解散自己的组织。他们铲掉总派山头后仍具有地位和能量，无后顾之忧，而造反派大多是一般工人群众，一旦失去了旗派组织，他们就只是某个生产班组里孤立无援的工人，根本无力与原保守派人员抗衡，无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在某些工厂里，旗派组织承受不住压力，铲了山头，迅即被总派势力吞没，厂革委会也得以迅速成立，并且当然是旧有社会秩序的原班人马掌权。有些工厂里旗派组织则顽强地保持自己山头，任由总派叫骂也坚决不铲，从而使厂革委会成立不起来。

为了达到从组织上瓦解造反派的目的，省、市革委会想了个办法，就是大办所谓“学习班”。毛曾有个最新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新生红色政权”加以运用了，它办了一期又一期不同级别的学习班，从两派的大头头到中、小头头都轮流召进学习班里脱产学习，集中住宿。总派参加学习班是陪衬，旗派人员才是主攻目标。学习班里无非是学文件，谈体会，讲看法，而最主要的是搞所谓“一帮一、一对红”的把戏，即派某个老干部与某个旗派头头固定作思想交流，谈心得体会，似交上朋友一般。组织间的谈判往往剑拔弩张，会议上的发言也会义正辞严，但个人间的私下聊谈，却难以撕破脸皮恶言相向。这个攻心战术是会有一定的作用。一旦离开了自己的组织群体，在一个孤立的环境中又有个身居某一职位的共干对你笑脸相迎，神情友善，那么即使他讲的话你并不赞同，也难以直率反驳，甚至会在潜移默化中渐渐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当局利用这种方法软化旗派头头们的反抗意念；或对他们进行收买许诺；或陈以利害，令其慑于坚持“派性”的罪名而就范。

“新生红色政权”瓦解红旗派组织的措施虽有一定的成效，但并不太理想。红旗派社会上的组织联合体仍然存在，一些工厂里的旗派基层组织亦在活动。这使当局感到还应构想出其它办法来向红旗派施加压力。成立工人纠察队就是当局的另一办法。

第三节、新生红色政权的镇压工具

??工人纠察队的成立

六八年春，毛有一句最新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这句话成为省、市革委会组建“群众专政”武装的理论根据。并且，省、市革委会还声言，成立“群众专政”武装力量有现实上的需要，因为“社会上的流氓阿飞、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都在猖狂地进行破坏活动。”省革委会的机关报《南方日报》发表社论，传达省革委“刮十二级台风”的号召，向一切暗藏的敌人发起总攻。同时，省革委会也发布“关于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秩序”的通令。一时间，气氛骤然紧张。在这种情形下，省革委会下达立即组建“工人纠察队”的指示。

“工人纠察队”（以下简称“工纠”）如何组成？按省革委会的指示是：必须经过本单位革委会或实现大联合的机构和驻军代表的充分协商，必须有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参加，经广州市有关部门批准。

六八年春季，凡能成立革委会的工厂，几乎都是总派占优势。而未能成立革委会的则必定是厂里的旗派组织仍有一定的力量予以杯 葛。不过旗派当不占主导地位。驻厂军代表也大多厌恶他们。握有实权的厂保卫部门的干部则从来都是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通过“工纠”的组建很能揭示一些社会实质。在中学里能过政审关（主要是家庭政治等级）被吸收参军的“主义兵”人数大大超过旗派学生，即使在旗派占绝对优势的中学里也不例外。这使旗派组织颜面大失，也促使其中一些人作更深层的思索。而“主义兵”则重新发现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闪光的价值。他们兴高采烈地走出了昔日的困惑和迷茫，悟出天空中的乌云很快将消失。骄人的社会等级使他们终究会拥有蔚蓝色的万里晴空。

如果说征兵几乎是单看家庭出身，那么加入“工纠”就是凭综合政治指数，即除占主要的出身成份外，还看政治表现，即虽成份一般，但若一向紧跟共产党体系的人也有可能成为威风十足的“工纠”队员。“工纠”的组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息：共产党原有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秩序已在迅速地恢复和重建。

基本由总派人员组成，听命于新生红色政权的“工纠”顺理成章地成为它的武装力量。“工纠”的标志是头戴藤帽（后发展为钢盔），臂戴袖章，手执漆有红、白、黄三色的棍棒。他们耀武扬威地列队在街上巡逻经常以打击流氓、阿飞、投机倒把分子为名，恐吓殴打无辜民众和旗派成员，更经常的是以围剿派性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撕毁宣传旗派观点的大字报、大标语。若有旗派成员敢提出抗议或阻止，他们便打出省、市革委会的旗号进行压制并仗人多势众用暴力对待抗议者。

“工纠”的出现使旗派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总派在舆论上的政治大反攻虽然凌厉，但并不具体危及旗派的组织。革委会的指责也只表现在文字语言上，而“工纠”的行动则是实实在在地打击压制了旗派的组织。旗派与总派之间发生冲突，可以解释为派性冲突。而旗派成员与“工纠”的冲突就会被解释为旗派反对“新生红色政权”，因为表面上来看，“工纠”不是派性组织，而是革委会领导下的实施“群众专政”的力量。并且在具体对抗时，未经严格组织的旗派成员根本不是有严密组织的“工纠”的对手。旗派成员与之交锋，只会吃亏。?

在许多工厂，由保守派控制的革委会或大联合机构要想对某些特别顽强的旗派成员进行打击时，常由革委会去罗织罪名，再交由“工纠”去执行。“工纠”得令箭后便去抓人抄家。“工纠”甚至对学生组织也敢动粗。如四月底，广州重型机器厂的“工纠”就曾殴打华南师院的学生宣传队。广钢“工纠”砸了冶金学校的旗派总部。情势已经发展到“工纠”不但打压旗派的组织，而且迫害旗派成员的人身。

至六八年夏季大镇压时，“工纠”配合军队大举踏平了旗派，并且其行动比军队更为持久。在大镇压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连串反复清算、迫害曾经有过造反行动的人的运动中，“工纠”都充当了打手的角色。抄家、搜捕、关押、抓人游街、喷气式批斗、刑讯殴打无所不为，确实是穷凶极恶。以至当时广州民间有许多人

在恐吓吵闹不休的幼儿时会说“工纠来了，工纠来了，你还吵？”幼儿听了竟也吓得大气不敢出，收声不闹了。

第四节、第五个回合、“反四右”

??红旗派最后的抗争

六七年秋冬红旗派分化出了紧跟派和抗拒派，发展为正统派和激进派。激进派一部份还发展为极左派。其实在这两派之间还有个中间派。中间派在基层成员中体现为旗派内的逍遥派，在头头中体现为现实派。逍遥派本是指不参加任何组织的人，不卷入派别斗争，轻松自在，故谓逍遥。其实逍遥派内心还是有观点倾向的，并且大都是倾向造反派。持有保守派观点的人不必作逍遥，加入保守派既安全又有获利的可能，何乐而不为。但参加造反派风险大，故不少人虽赞同它的观点也不加入其组织。

旗派内的逍遥派是六七年秋冬以后的“新生事物”，主要存在于工厂。不少民众以为此次运动既是整当权派，那当可以把那些专横跋扈的厂长书记拉下马，也让那些当权派的红人吃瘪。然而形势的变化使他们看出这并无可能，当权派必将官复原职，红人们也风光依旧，想想白忙一场，失望之感油然而生，遂转向消极，也逍遥起来。

在旗派头头层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对形势的变化感到迷惑和失望。他们不愿违心地去紧跟，不愿做由衷的正统派。但鉴于本身所处的位置，又不能作抗拒姿态，不能发出激进的语言，只能面对现实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如在封枪运动中，抗拒派的代表人物“红司呐喊”诸成员可以大声疾呼：“多少造反派出生入死才换回这批枪支……我们的武器，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谁交出去，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谁就是陈独秀。”但在中央调查团日夜催促和笑脸包围下的一些头头却不能这样慷慨陈辞。他们所能做的是一方面把大宗重武器、长枪交出，一方面把少量轻武器、手枪转移或收藏。现实派由此发端。

在六七年冬正统派与极左派的论战中，现实派们基本作壁上观。他们内心深处不赞同正统派，甚至有些倾向极左派，但他们不作明确表示。文革初期他们之中有的人怀着朦胧的民主斗争理想投身这场社会大波；有的人则以为红旗派会继上海、武汉的造反派获胜掌权而亢奋激越。但现实的发展与当初的设想渐行渐远。他们不再作不切实际的期望，只祈求当局给他们一个公平的待遇，起码不致压制乃至清算他们。只要能达到这一点，他们也就满足而不作异动了。然而六七年冬、六八年春的社会局势使他们愤懑之情日增。总派政治舆论上的攻击，省、市革委会不断施加的压力，“工纠”明目张胆的挑衅，这些都使他们难以熟视无睹。就如旗派的基层群众希望社会上有旗派的联合体存在以作他们的后盾一样，旗派的头头也明白这样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广大的旗派成员是他们的社会基础。一旦旗派的基层组织全被瓦解，或基层组织的头头骨干被排斥在基层单位革委会之外，那他们席位下的基础就被掏空。目前还对着他们皮笑肉不笑的军头、官僚们完全会一夜之间变脸把他们的座席压下去。他们的力量来自于基层。如果还不愿甘当一个政治木偶、权力摆设任人操纵的话，就不应目睹基层组织的瓦解而无动于衷。愤懑的积累使现实派拉开了反击之弓，情势的丕变也使正统派敛

声屏息。现在只差一支箭，已与去年底的激进派合流的现实派就可正式展开反击了。这支箭终于出现，那就是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登载于《人民日报》上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即使不看内容，只望一望这个题目，也就如给红旗派广大成员打了一支强心针。半年多来“派性”的帽子一直盘旋在他们头上，“围剿派系”、“铲平派性山头”是当局企图瓦解其组织的犀利武器。现在来自中央的声音提出要对派性作阶级分析，真是苦旱逢甘露。文章里还说：“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这些语句很合红旗派的胃口，遂把它反复引用宣扬。

四月份对于红旗派是个美好的月份。一年前的四月他们得以翻身，掀去“早春镇反”的高压，并开拓出一段辉煌的岁月。今年四月他们又试图反击。去年的故事是否能重演呢？文革时期，造反民众之可以冲击共产党的政治秩序系有赖于毛的庇护。而毛的庇护民众的真实动机只不过是为了动员他们为其政治清洗火中取栗。六八年四月大不同于六七年四月。对于像广东这类已成立省革委会的地区，毛中央并不乐见那里再发生动荡。尽管六八年春北京又发生了一些情况，但毛中央并没有由此再来个全国大反复的意向。然而广州红旗派不了解，或许是不愿了解这一点。

有利于红旗派反击的消息陆续传来，北京揪出了“杨、余、傅”集团，杨还被指为关王戚林的后台。不久又有外交部九十一名司级干部联名的旨在保陈毅的大字报，此大字报受到周恩来的斥责。还有二十一人和四十八人上书毛的事件。上书主谋为聂荣臻等一批军方元老。他们反对林做毛的接班人，要求限制江青的权力和立即结束文化大革命，而这些行动都被毛否决并指责为替“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

陈伯达有段讲话也广为流传。他说文化大革命至今已进行了五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打倒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是击溃“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揪出刘邓陶的小爪牙关王戚林。第五个回合就是揭露了杨余傅。

红旗派立即接过陈的讲话，吹起发动第五个回合斗争的号角，并将其内容演化为反“四右”，即所谓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右倾翻案、右倾复辟，指责省革委会和广州军区犯了“四右”的错误。按照陈的说法，第五个回合已经斗完，而红旗派则把它巧妙地改制为刚刚开始，方兴未艾。

面对高压，红旗派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昔日“省革联”派和反“省革联”派的摩擦心结已完全消弭。四月间红旗派组建了统一的组织“广州红旗”，是为联合指挥部。四月二十二日，“中大红旗”举行反击“右倾翻案风”誓师大会，并发动游行示威。这一行动得到“三司”、“新一司”、“广医红旗”等组织的热烈响应，一时间十分壮观。

五月初，“中大红旗”的头头之一黄意坚完成北京之行归来，他不负众望，带回来了许多爆炸性的小道消息，经过他的描绘，人们感到一场大搏斗已经到来。中央有人要为“二月逆流”翻案，广州军方和总派则要为“三月镇反”翻案，两者同出一辙。既然前者已受到毛的斥责，那么我们反击为“三月镇反”翻案的妖风也一定会得到中央的支持。红旗派的头头们在忐忑不安的心绪中又对第五个回合的决斗抱以莫大的希望。

五月十一日，“红司”在中山大学造反大楼举行为期三天的会议。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旗派（“红司”系统）头头都踊跃赴会，大家都渴望在这风诡云谲的时刻能从司令部那里得到有助于坚定自己信心的东西。

黄意坚、武传斌、陈家吉都作了发言。犹以黄、武两人的发言甚具煽动性。黄系统地介绍他的北京之行。武则具体描述了省革委会里造反派代表受压的情况。他几乎指责了除陈郁以外的所有高官，以一系列事实力证孔石泉、王首道、邱国光、黄荣海、阎仲川全都是支保悍将。武得出一个结论，第五个回合是最后的斗争。五月十三号，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中大红旗”接到“广州警备区司令部”的通辑令，指黄意坚散布谣言，攻击省革委会领导，要将其拘留。红旗派闻讯大哗，群情汹涌。中大“八．三一”立即作出强硬的反弹，发表题为“中大‘八．三一’反警司对黄意坚通辑令”的五点声明。并又以“广州红代会红卫兵纠察队‘中大八．三一’战斗团警备连”的名义向“广州警司”发出命令。限令其在二十七小时内撤消对黄意坚的拘捕令，否则将从严处理。并严厉指控“广州警司”的头头是一贯破坏文化大革命，压制革命造反派，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

“五．一三”事件后，红旗派与省、市革委会和军方的矛盾急剧公开化、尖锐化。旗派干脆把矛头直指孔石泉、刘兴元。说孔是杨成武派来的，孔是广州的杨成武，并发动揪“广老杨”。

不但大学生，中学生也展开了行动，五月间中学旗派组织在一中、二十一中等校不断召开会议。曾经在一年前“五．三”绝食中建立功勋并在此后的斗争以激进、坚决姿态出现的“革命钢杆”的各校最活跃分子的联合组织又频繁展开行动。一中“七一造反队”主编的《红色造反者》连续发表几篇火药味甚浓的文章。如“两种根本不同的‘联合’、‘分裂观’”、“对‘紧跟’要进行阶级分析”。他们反对联合中的对等原则，强调应以造反派为核心。“革命钢杆”的观点比《红色造反者》更为激进。他们回顾了一年多来的风云变幻，试图从中洞悉某些本质性的东西，并极力想领会毛那些最新指示的实质精髓。鉴于造反派一再受压，又曾受前不久征兵风波的刺激，他们进行了“阶级分析”的新探索。他们认为，既然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那么派别斗争的结果就会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就应以各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来重新划定成份。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铁杆保皇分子，屠杀造反派的刽子手应与地富反坏属同一类别，而造反派则应定位红色成份。显然这种思维十分幼稚，而且保留了共产党阶级歧视的内容，但是其核心却不无悲怆。它是想通过这种重新划分成份来使造反派免遭政治迫害。相比之下，“八．五”思潮的“阶级关系变动论”则正确得多、彻底得多。不过当年

这些未真正生活在共产党社会秩序之下的十几、二十岁的小青年们肯作此探索也相当可贵。起码它就像一群身处黑暗隧道里的迷路者左冲右突之间却怀着正确的动机：如何寻觅一个反政治迫害的出口。

此外他们还认同湖南“省无联”的观点，并可惜它太偏激，直指周恩来为红色资本家阶级的代表而遭镇压。同时认定清华井岗山的“四．一四”思潮实则为否定造反派的保守观点，应予以警惕和驳斥。六年以后，“李一哲”大字报风潮中的几名主将李正天、王希哲、陈一阳，此时都是旗派学生中的思想活跃者。

五月下旬，广州十间大厂的工革联分部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到长城非好汉——关于目前广州运动的若干看法”的文章。其篇幅相当大，表达了红旗派中的工人队伍也参与“反四右”，与当局一拼到底的决心。

文章说：“我们同时也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大批过去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不经群众审查批判，就进入了‘三结合’的机构。有人甚至把扩大教育面的口号歪曲为‘扩大结合面’，把旧机构的原班干部全部塞进革委会。这种‘不批就保’和‘包揽全收’的做法，就是右倾投降的表现。”“当前我们要警惕有人企图以‘反对在干部问题上怀疑一切’为幌子，来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干部路线。”

红旗派发动“反四右”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或许他们想迫使军方改变敌视他们的态度。然而军方对造反派的这种态度既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也已于六七年初定型，六七年夏秋的暂时转向只是权宜之计，很快就回复到原来的面目。向军方施加压力，只会适得其反，增加军方敌视的程度。或许他们想藉此改变他们在省、市革委会中的弱势地位。省、市革委会既已得中央认可，当不会推倒重来。红旗派弱势地位之形成首先来自主控省、市革委会的军方头目的敌视，同时也根本寻觅不到任何一个强势地方干部的支持，故改变弱势地位的欲求只是幻想。或许对于红旗派中广大的基层成员来说，“反四右”是想改变旧有社会秩序正走向全面复辟，使之会遭到报复清算的局面。“四右”中的右倾翻案、右倾复辟对他们具有莫大的威胁。运动初期执行“资反线”把无辜群众打成“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在批“资反线”中受到造反民众批判冲击的当权派纷纷都变成了“好和比较好的”干部，重回他们的权力宝座。所谓“走资派”一说变成空谈。在工厂和基层单位里，根本没有一个敌视红旗派的领导会被定为“走资派”。官复原职当或迟或早，势所必然。面对这种现实，极为惶恐的造反民众寄希望于反“四右”的浪潮能遏止，起码是减弱这一趋势，让他们的来日不致过于艰难。

可见，无论是旗派的头头层还是广大基层民众，“反四右”都是一种以进攻姿态出现的自卫行动，它旨在反对一种潜在的并必将出现的政治迫害。这是贯穿红旗派运动的主旋律。从六七年“早春镇反”至此它都一直奋斗在反政治迫害的旋律之中。然而只要稍加冷静的分析，红旗派上上下下的这一努力都必将一无所获。军方的敌视态度不会减轻；省、市革委会里的弱势地位不会改变，旧有社会秩序复辟的步伐不会停止。红旗派在作一场注定要失败的

抗争。他们没有作深思熟虑，只凭血气之勇就开上战场。他们的思想状态是抗争、抗争，而没有精确地分析预测这场反“四右”有几成胜算。只要冷静地思考，就可悟出，在当时的情势下，随和顺从或许能获几分苟安，激烈抗争只会招至更严厉的压制，然而主要由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人组成的红旗派有青年人的执着和冲劲，却缺乏成年人的变通和圆滑。不过成年人的老谋深算固然令人可敬可畏，而青年人的诚挚率直却更令人感到可爱可亲。青年人的冲劲出现了霍去病，成年人的变通产生了李陵。青年执着的汪精卫“高歌过燕市”，成年圆滑的汪精卫发出了投日“艳电”。

红旗派在反“四右”的第五个回合的高潮中，对官方最带攻击性的观点是“二次革命论”。他们说省、市革委会的成立，只是“二月革命”，有必要再进行一次“十月革命”，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些熟读俄共革命史的青少年们把苏俄两次革命的经历拿来模拟。恰恰省、市革委会又是成立于二月。幼稚之中也有巧妙。此说给官方以极大的刺激，强化了官方将其除之而后快的决心。

跋 掩卷后的余思

一

“新生红色政权”的履带碾碎红旗派组织的大业已于六八年盛夏完成，而继续清算其成员的“清理阶级队伍”则持续到六八年秋冬。揪斗、关押、抄家等一系列暴行陆续上演不衰。根本没有参加过红旗派的“黑五类”和红旗派中出身“黑类”的人首当其冲，受尽虐待凌辱。出身非“黑类”或出身“红类”的人除有些亦受此待遇外，余者至少也被强令反省悔过。主持“清理阶级队伍”的“工纠”、“工宣队” “项目组”当然由前保守派人士及一直站在他们身后的政工、人事、保卫、武装等共产党政权要害部门的大员们组成。偶尔，个别红旗派中识时务的俊杰在“反戈一击”之后也会荣居其中。

如果说以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为由在全国实行的镇压，可以理解为是毛为了结束文革动荡局面，而施行的铁腕手段，那么为何还要再来个“清理阶级队伍”呢？探究之下，可以悟出六八年初由中央文革提出的“清队”有双重作用，它一方面是毛中央用以遏止造反民众中异端思潮的手段，并震慑造反派中非“红类”出身者，令其不再敢桀骜不驯，另一方面把批判走资派的火力转向“黑类”经典“阶级敌人”的身上。这双重的作用传递了一个信息，毛要着手结束运动了。但不料“反四右”异峰又起，许多省市斗争再呈激烈。毛中央不得不下达针对广西的“七．三”和针对陕西的“七．二四”布告。这两个布告并未说要全国参照执行，但一些省市的军方均以执行它为由，来对本地区的造反民众大举镇压。毛中央对于他们的行动听之任之。大镇压后再按中央部署进行“清队”，于是广州旗派就遭受了双重打击。至于像武汉那类造反派获胜的地方，造反派 虽在六八年盛夏的大镇压狂潮中安然无恙，但仍逃不过六九年“清队”的修理。

考虑到这些因素，虽然六八年盛夏之后，群众组织已不复存在，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点还是应从六八年盛夏大镇压、延至六八年秋冬以至六九年春中共的“九大”召开。当然在那约半年的时间里在广东、广州再没有红旗派的故事（关于笔者所持的三年文革论，将另有专文谈及）。

二

说来，讲述红旗派的故事根本轮不到我。文革大波中，我只是红旗派中一个热心的成员，不是头头。造反派如果获胜，我将摊不上一丁点官职。结果是造反派失败了，我亦只受到点名批判，尚未被关入牛栏。然而我却有强烈的红旗派情结。因为从宏观上，我知道就整体而言，红旗派没有蜕化，是全国造反派中最优良的一支。从微观上，我所直接了解到的一些工厂基层单位里，其造反派的骨干成员都是明显受过中共政权压制迫害过的人，他们的造反带有鲜明的冲击旧有社会秩序，反抗政治迫害的性质。他们的具体行动也很有节制分寸。绝无胡作非为。而更重要的是我在文革后期接受了“文革新思潮”，并发展为坚定的民主理念，促使我在整个七十年代以临战的姿态面对中共政权，并作过一些秘密工作和准备，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率 先在广州举起七九民运的旗帜。时至今日，虽岁月消逝，精力渐衰，但仍执着为民主阵营里一忠诚士兵，而这一切的思想起点就是二十九年前投身了红旗派的造反行列。

三

七六年十月事变后，中共复旧秩序派讯速控制了政局。这些在文革大波中呛了几口水的中共高官们对文革造反怀有刻骨的仇恨。为了不致再有类似的社会大波卷起，他们除了把文革大波中的冲浪者定为“三种人”，从政治上死死压住外，就是全力营造一种憎恨、贬责文革造反派的社会舆论。在彻底搞臭文革造反派后就既可使当年的造反派心虚理亏，自惭形愧，不敢在此后再起的社会波涛中有所动作，还可使后来者循规蹈矩，恭谨谦和。否则，只要向他们大喝一声，“你们又想搞从前文革造反那一套？”他们就会惶恐羞赧、诺诺而退了。而且这些后来者也早已与文革造反派划清了界线，可别让你们身上的臭气污染我们纯洁之身！

为建设这一理想境界，中共令其喉舌、御用文人变造历史。他们略去了“资反线”的第二次反右，略去了六七年早春镇反，略去了六八年大镇压，略去了高军干子女们的“红色恐怖”运动，略去了中共旧官僚在文革中的一切暴行，而大书特书刘邓等一批中共高官和某些文化名人的被虐遭遇。刘少奇虽遭造反派红卫兵揪斗，而置其于死地的是中共官僚阶级内部的毒手，但被说成是遭造反派迫害至死。文化名人确遭荼毒，那绝大多数发生在“红色恐怖时期”。中共享政治经济收买的办法促使那些文化名人不去指证真凶——早期高军干子女红卫兵，却把唾沫吐到造反派身上。中共还极力渲染文革的混乱和恐怖，停水、停电、停产、杀人、吊尸、吃人，然后把这些劣迹暴行一股脑推到造反派身上。于是被杀者成了杀人者，被吃者成了吃人者。世事颠倒，黑白混淆，莫过于此！

关于中共的这类技俩，细说起来，可作专论，篇幅有限，就此打住。

如果社会上只有中共的喉舌、御用文人在那里弹唱，我会并不以为意。然而现实远非如此。在人民群众里，甚至在民主营垒中，詈骂斥责，全盘否定文革造反派的论调相当盛行。这就使我不能安之若素了。我不希望文革造反派被自己的阶级兄弟战狻K　惺芳闷鹬泄颤h军的枪弹、刺刀，却承受不起阶级兄弟的石头、唾沫。故此，我不顾身单力薄，大声疾呼，期盼消除误会，还给当年那班热血青年一个公正的评价，不料竟因此遭到某些人的斥责。个人被斥，当无所介怀，然历史事实之大是大非，决不可含糊，并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承前启后，积累经验计，遂动笔写下“广州红旗派的兴亡”。

作为全国造反派中的一支——广州红旗派，他也必具造反派的共性，当然也有自己的特点。文革造反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从广州红旗派一年半左右的政治历程来看，是一场以反政治迫害为主旋律的民主运动。几次反政治迫害的斗争事实，《兴亡》中均已载明，勿庸置疑。问题是这算不算得上民主运动？我已知晓不少人持否定意见。理由有以下一些。一．文革造反派“奉旨”造反，不是民众自发行动，岂有在独裁者恩准支持下的民主运动？二．造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只反为暴君所嫉恨的好官，实为助纣为虐，岂有民主运动的光彩？三．文革造反即使有反抗中共压迫的成份，但它乃是一种泄愤报复的行动，格调低下，根本谈不上是民主斗争。四．造反派迫害知识分子，是一场反智运动。五．文革造反顶多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整个意识形态仍在共产党框框之内，与民主理念沾不上边。六．造反派质素低下，根本不能担当民主运动之大任。七．造反派造反是为了做官，不是为民主。八．“造反派其实比红卫兵还可悲！还低劣！……”。凡此种种，不胜罗列。若要与这些观点一一商榷，那当又必需另撰专论，篇幅颇大，非此书后之“跋”可以容纳。然而，我仍想敬请持否定意见的朋友们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耐着性子，浏览一下拙作《兴亡》，或许小有触动。起码，我希望他们在未作深入调查研究之前，别再轻率地向造反民众扔石头，吐唾沫。

民主运动有许多不同的层次，以实现议会政治、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为诉求的行动当然是民主运动，但反抗专制统治者的政治迫害，争取人权的斗争又何尝不带有民主斗争的色彩呢？

七四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其思想体系仍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字里行间亦流露了对中共务实派（后来证明实则是复旧派）的好感，但它毫无疑问是一场民主运动。七六年丙辰清明，人们都公认它也是一场民主运动，而其内容只是用对周恩来的追悼颂扬，曲折地表达了对毛及其体系的不满和厌恶。八九民运，场面极为壮观，举世震动，其诉求也只是反贪污、反官倒和要求与官方对话，要求新闻自由等。七九民运的政治诉求应是五七年以后历次民主运动中最高的，但也未提出多党议会政治等诉求，只是希望真正实现党政分离，政企分立，打破官僚体系，反对个人独裁等。

民主运动的不同层次既取决于参加者的思想水平，也有赖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政治环境，更还要作策略上的考虑。七九民运时期，我想有些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已对中共一党专政持否定态度，并对较完善的民主制度已十分向往。但囿于当时的政治条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我们都降低了自己的政治诉求。经历了六八年大镇压、六九年“清队”、七零年“一打三反”、七一年清查“五．一六”，我甚至谨慎得对七九民运的同志们也绝不暴露自己的真实

思想。但我们进行的难道不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吗？

在六十年代末，个人迷信极为盛行，中共的意识形态仍主控社会的条件下，像广州红旗派那样反抗来自官方和官方爪牙的政治迫害的斗争，当带有明显的民主运动色彩。

当然，这场民主运动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对此，我的体会是极为深刻的。六八年大镇压后，红旗派瓦解了。其头头人物固然在反复的清算中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其广大成员也都完全放弃对复旧社会秩序的反抗姿态。甚至有些人还“反戈一击”出卖、诬陷昔日的战友，以求得自己在政治上的重生。接受了“文革新思潮”后，我不但坚持初衷，而且更为激烈。因此，昔日的朋友们都逐渐与我划清界线，甚至向当权派打我的小报告。至七八年底，我挥动广州七九民运的旗帜时，那陆续集聚起来的人群中，竟没有一个是当年的工人、职员造反派。由此，我感到六七年的革命造反和七九的政治诉求确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然而尽管如此，红旗派反政治迫害的声响仍然是那个时代人民群众可以喊出的最强音

四

星移斗转，寒去暑来，三十个春秋过去了。世事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当年的“红旗战士”们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路途。有些识时务的俊杰早在七十年代中已洗面革心，痛改前非，得到当权者的谅解、接纳，重新拓出一片锦绣的前程。这些人大多是红类出身者。亦有些人迟至八十代中才时来运转。当权者突然对他们相当友善，给予优厚待遇，甚至委以官职。这些人都有较高学历。在共产党与知识阶层的联姻中，他们被选中宠幸。权力荣耀和物质利益使上述两批人大都与中共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毫无疑问这些人对自己曾参加文革造反一事讳莫如深。他们十分忌讳提及当年的往事，以免影响他们优雅的形像和广阔的仕途。

还有一些人虽终被排斥在中共政权的体制之外，但却在蹇促困顿多年之后于八十年代后期的经济大潮中获得生机，他们天生聪慧敏锐，一下便捕捉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其骄健的身手，冲浪于大潮之中，不久便甚有所获。如果说公安局里掌握他们档案的中共警官对他们的致富不无嫉妒眼红的话，那么中共高层对此却颇为洒脱。让那些家伙们去赚钱挥霍吧，总比在那里胡思乱想要好。这些人回忆起自己文革中的造反经历，常报以含义多重的哂笑。是自嘲当年的少不更事，轻举妄动；还是怀念昔日青春热血、慷慨激昂；抑或叹息人生的风云多变、诡谲莫测？或许都兼而有之吧。

当然更多的人是一直处于艰难坎坷之中。文革档案，政治歧视像鬼影一样跟随着他们，既被压在社会底层，又无经济细胞去一弄“大潮”。经济拮据、生计无着，更兼年岁渐老，精力日衰，谋生重担尚乏力支撑，有何余兴去回味，二、三十年前之陈年旧事？

对第一类人，我知晓他们已在中共的体系之中尝尽甜头，乐不思蜀。对心肝被权势和利益熏黑了的人我只能说声永远的“拜拜　”。

对后两类人，我则要发出诚挚的呼吁。朋友！请从生财的嘻笑和拮据的烦恼中超脱出来。二十八年前那段我们行进在红旗派里的岁月毕竟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辉。尽管那时我们年轻、狂热，心智上曾受蒙骗愚弄，但我们是站在受压制受迫害的民众一边，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发出的反政治迫害的呼喊是正义的。我们无愧于社会和人生。而今岁月东流，韶华已逝。虽两鬓飞霜，但额上的皱纹里当藏有更深刻的思索；虽饱经风霜的眼珠不再漂亮，但却更能洞察世事的潜质。在这有人要涂改历史误导后人，美化行凶者，诬陷受难人之时，你们不应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你们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后代，要揭露说谎者的真正居心。二十八年思想的沉淀，应该有更深刻的结晶。要想在中国大地上永远杜绝政治迫害的悲剧，只有建立完备的民主政治。今后如有社会改革的波澜兴起，我们应以赞许的眼光目送我们的后代投入其中。

有位“李一哲”大字报运动中的主将之一，也曾是“红司呐喊”的头头和“八．五”思潮的战士曾慷慨陈辞：“我们一定要记住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牺牲的烈士，我们要在他们的纪念碑上写上‘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在往后的岁月中，我获悉这位中共政治黑名单上的人物以其精湛的美术造诣和勤勉的劳作获得了丰硕的经济收益，我为他高兴，同时也想问问他，还记得那句慷慨言辞吗？我十分主张建造一座文革纪念碑。不过碑名应是“文化大革命中遭中共政治迫害的死难者和反抗中共政治迫害的牺牲者纪念碑。”

昔日的仇恨可以淡化，但历史的事实不可涂改。我预期，回忆二十八年前广州红旗派的故事所激发的感情和思索，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民主斗争中更加坚定和理智。

公元一九九六年于纽约

备注：本文原收集在 1996 年出版的文集《封杀不了的历史》中。现作者将其单行重印，并汇集于《人民文革丛书》之中。

附录：

摒除体制内伪文革史、澄清体制外偏颇观点，重建真实的文革史

——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上的书面发言

一、共产党御用文人伪文革史之针砭

文革之发动是 40 年前的事。若按十年论是结束于 30 年前；若按我所持的三年论（三个年头，实为两年左右）则结束于 38 年前。经过这么长的岁月沉淀，按说事情总该水落石出。可是情况却相反。为何如此，关键在于共产党为其政治目的制造了铺天盖地的谎言，而且这谎言已产生了戈培尔效应。

共产党谎言的体现之一是它的御用文人所泡制的伪文革史。其代表作是党校教授金春明所著名《文化大革命简史》和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所著《大动乱的年代》这两部各有数十万字的文革史著竟对文革进程中许多全局性的大过程、大事件略去不讲。

例如在文革最初期，1966 年 6 至 7 月刘少奇、邓小平把毛泽东燎起的火往群众身上烧，搞了一场不但在学校中，而且在所有基层单位里抓右派分子的政治迫害运动（我将它称之为第二次反右运动）我的母亲就因为她曾就读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并在该校集体加入国民党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第二次反右的规模比第一次还要大得多。其一是被迫害者数量是第一次的数倍，其二是被迫害者从第一次的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群众。另一个不同点是第一次反右“胜利”结束，而第二次反右则半途而废了。因为毛泽东周游南方回到北京后说刘少奇、邓小平搞错了，说这次运动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不是整群众。尽管第二次反右半途而废，但是许多人都已经无辜饱受迫害。1966 年底和 1967 年初的报纸和好些群众组织的小报中都报导了许多迫害事实和被迫害至死、至伤的人数。那时我的母亲因自己连累全家就曾想自杀。幸亏我父亲力阻。我父亲说：自杀叫对抗运动，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你自杀了，我和孩子们更受连累。除父亲力阻外，还由于第二次反右搞了两个月就中止，否则我母亲的情况还很难说。因为两年多后，我母亲在 1968 年秋季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再次打成阶级异己分子，遂跳珠江自杀。

对这样一个全局性的第二次反右，金春明、王年一的大作中竟都绝口不提，这算什么文革史？吃邓小平饭，而且不是一般的饭，是佳肴美食、琼浆玉汁，故这些御用文人都在为尊者讳。

既绝口不提刘邓的第二次反右，当然也就要略去 1966 年 11 月制 1967 年初全国如火如荼的批“资反线”运动——“人民文革”的第一波。

批“资反线”运动是中共建政后乾坤倒转的极大事件，当然也是全国性的文革大过程。毛为借助群众力量搞他的高层政治清洗，故允许群众把前阶段秉承刘邓指示大搞第二次反右的各级党领导推上被质问、被批评的地位。而且这质问和批评（很快发展为批判、批斗）很快越出了毛划定的框框，变成了对各级领导，尤其是基层单位领导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群众的大清算。

更为惊人的是，在批判“资反线”群众得到发言权的基础上，积压群众心中已久的、对自身应有经济利益被剥夺的愤怒，突然如火山爆发。于 1966 年底到 1967 年初全国如暴风骤雨卷起了被毛中央定名为“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特大波涛——“人民文革”第二波。毫无疑问，对此，共产党的御用文人们顾左右而言他。

金春明、王年一之流最津津乐道、不厌其烦讲述的是“二月逆流”。他们把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官僚们描述为对中央文革进行斗争的正义化身。在我看来共产党内的毛派、刘邓派、周派、林派、江张派都是一丘之貉。我写文革史，对“二月逆流”中的共产党内讧当然也会据实表述，但绝不会象金王那样躺倒在共产党某一派怀里去着力咒骂另一派。而且我一定会写“二月逆流”对全国性的 1967 年“早春镇反”的催化作用。

1967 年 2-3 月，全国除很少数省市外，大多数的军方都对本地区的造反派实施压制乃至镇压。其中最极端、最残酷的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开枪扫射，打死三百多名造反派，其中许多是十四五岁的女中学生。内蒙军区则以从背后开枪打死正在作演讲，劝说群众绝对不要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学生韩何，成为早春镇反中全国军方杀人的第一枪。

对这样全国性的大镇压、大屠杀，金、王之流或装聋作哑、或丧心病狂地予以肯定。为什么？因为邓小平为青海赵永夫大屠杀平反。邓小平说赵杀得好。邓小平褫夺了韩何被周恩来主持授予的“烈士”称号。唆使其爪牙平毁韩何的坟墓。并恢复枪杀韩何的凶手柳青的党籍、军籍、级别。和赵永夫等许许多多文革中大量屠杀民众的军队干部那样享受优厚离休待遇，颐养天年。

由于毛的政治清洗目标在那时尚未完成，故对军方的镇压行动不予认可。但是，尽管军方对民众镇压残酷的程度超过刘邓“资反线”百倍，但毛只是审慎地婉言批评他们。可是，尽管毛对军方的批评十分温和，但从血泊中爬起来的造反派群众却向军方猛扑过去。要求军方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平反，释放所抓捕的民众。1967 年 4-6 月间各地造反派群众举行集会、发动游行示威、集体绝食，甚至冲击军区大院，在广州就有数千人集体绝食、数万人到场声援的烈士陵园广场的“五三大绝食”。这是全国性“人民文革”的第三波

毫无疑问，对民众的这些正义斗争，金王之流要么是讳莫如深；要么是歪曲描述。写历史写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史德可言？中国古代史官为直书事实而甘冒杀身之祸的高风亮节在共产党的史官身上已丝毫无存。共产党的御用文人要写文革史，得先把他们那被功名利禄熏黑了的心肝洗干净以后再来写，否则写出的也只能是伪文革史。

二、体制外偏颇观点之澄清

前面第一点中我已粗略讲了三波“人民文革”。而“人民文革”最尖锐的内容是“极左”思潮。其代表作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的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它说“现在百分之九十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它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益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

广州的极左思潮刊物《八．五思潮》提出“现在需要重新划分阶级。”它不承认什么“地富反坏右”，不承认“红五类”的优越。它认为“现在的矛盾是在底层受苦最深的组劳人员、支农青年、合同工、临时工和那些爬上了权力宝座者之间的矛盾。”

这些观点不啻是在思想理论上投下了一个重磅炸弹，真正触及了中共专制政权的阶级压迫的本质。故毛中央又立即把极左思潮再定性为形左实右、极右，并对其代表人物立即予以逮捕、判处重刑。那时还是在 1968 年初。

经过数年来“人民文革”学派的据理力争、据实力争，对文革中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维护自身应有权益的斗争事实，稍有良知和稍有实事求是精神的人都不会再去矢口否认。但是一些人还是在尽力贬低它。我不想探究他们这样做的、灵魂深处的动机，只作台面上的道理探讨。

在今年五月柏林举行的一个会议上，一位与会者指责“人民文革”论是“伪理论、伪结论”。因为文革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众乘机起来的反抗运动”。会议主持者给了我就此 10 分钟的答辩。为了让听众听得清楚明白，我的演讲一般都力求用中速。但这次我不得不用快速。因为 10 分钟里要讲那么多事实实在困难。

然而这仅仅 10 分钟的事实陈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位与会者此后发言中的说法改变为：“文革是个大圈圈，民众反抗运动只是大圈圈里的小圈圈。现在刘国凯要把这个小圈圈从大圈圈里拿出来另外命名为‘人民文革’仍然是错误的。”

这个比喻是完全不贴切的。较贴切的比喻是：全版文革是一大盆污水里有个婴儿。污水是毛泽东的政治清洗、共产党国家机器及其延伸物搞的政治歧视、政治迫害、镇压、屠杀，以及中学生“破四旧”的胡闹、群众组织间的某些无原则斗争等等。婴儿是“人民文革”。我们当然要把那盆污水倒掉，但同时应把婴儿抱回来。对于体制外否定“人民文革”的观点我作如下澄清，以实现抱回婴儿的心愿。

体制外对“人民文革”的否定集中表现为以下九个观点。

1、“人民文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没有意义”。这种观点还有另一个语言表述是：“反官僚不反体制毫无意义”

其实文革前共产党里也没多少贪官，但却有大量恶官、凶官。因严密的计划经济使官们要贪也只能小贪。1957 年“反右”把反单位里的一个领导、甚至一个党员都可上纲为反党，予以严厉惩罚。这促使此后基层单位领导飞扬跋扈的作风登峰造极。故在文革中民众乘机起来反这些凶官、恶官。照上面那种“没有意义论”的逻辑，在只能反贪官不能反皇帝的情况下，应该连贪官都不要去反了。否则是毫无意义的。于是当今中国的维权运动也毫无意义，因为它也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反官僚不反体制”。

那些持“反官僚不反体制毫无意义”论者，我要问问他们的年纪。如果你们现今是五十七、八岁以上的人，请问你们当时反了共产党的体制吗？如果没有，你们凭什么指责别人只敢反官僚不敢反体制？如果你们是五十七、八以下的人，没赶上参加那场社会大波，甚至年纪更小，对当时情况不了解。我向你们解释，不要超越历史局限性去苛求前人。反贪官不反皇帝总比什么都不反要好，更比保贪官要好。莫说四十年前，即使是十七年前的八九民主运动和当今风起云涌的维权斗争也没有直接反共产党体制，那难道该否定八九民主运动和当今维权斗争吗？

2、“文革造反依靠毛的恩准去反政治迫害无正义”

对此可以打个比方。有一伙抢劫集团，其第一号头目与第二号头目发生矛盾。第一号头目欲将第二号头目及其势力铲除，於是他对被抢劫的人们说，这次你们可以反抗他们，并把反抗的棍子递给被抢劫者。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被抢劫的人们应不应该乘此机会，接过第一号头目递过来的棍子去进行反抗？我认为当然应该。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反抗，即使反抗了也无正义性。对于这种“束手待抢”才算有意义论我不想与之争论，让世人和后代去评说吧。

3、“文革造反虽打击了一些共产党官僚但却帮毛巩固了地位”。

这种观点流入肤浅。第一号头目与第二号头目其实都是一丘之貉。第一号头目此举虽然冠冕堂皇地铲除了第二号头目及其亲信，但是，整个抢劫团伙的元气亦因此而大伤。从长远来看，被抢劫者的反抗行动不但直接打击了第二号头目，也间接地打击了第一号头目和整个抢劫团伙。毛是所有共产党官僚的首领。打击共产党官僚当然也就打击了毛的统治机器、打击了毛体制的基础。说文革造反虽打击了一些共产党官僚但却帮毛巩固了地位，这无疑是极为荒谬的把共产党官僚放到与毛泽东对立的地位。

不妨看看史实。1969 年 3 月九大上，毛的清洗对象都被逐出了权力圈，毛的地位似乎巩固了。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和暂时的现象。政治连续剧不是速食快餐，必须经过一定的发酵过程，效果才会显露出来。毛林反目、毛泽东骤老、欲除掉周又嘎然而止，想交权给江张集团却迫不得已让邓复出，尔后再肃整邓，方寸大乱，最后只能在病榻上哀叹“只好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毛的地位巩固了什么？毛神圣光环的暗淡，不正始于文革造反运动冲击了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吗？

4、“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较好的干部。”

毛把他的这场政治清洗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那只是给他的政治清洗穿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而已。文革前共产党内哪有什么高干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行修正主义？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是比毛泽东的人民公社要务实，但那也不是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别忘了刘少奇、邓小平不但是 1957 年第一次反右的极力主张者，还是 1966 年 6、7 月第二次反右的主导者。毛死后，邓小平实行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但在政治上却坚决复旧，坚决强化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不要说已皈依宪政民主的伯恩斯坦老修正主义，即使是跟还在共产党框架里面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相比，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也差得太远。而且 1989 年，他们整体上都主张血腥镇压，就说明了他们从来不是修正主义者。至于说到赵紫阳，他当然是修正主义者。但他是八十年代才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很可能，他之所以成为修正主义者，正是由于他深刻认识了文革中的群众反抗运动。

文革期间的群众造反运动根本没有首先去区分哪个官是走社会主义的官，哪个官是走资本主义的官。除非毛中央直接插手说明，否则造反群众是一律予以冲击的。那种认为文革造反首先甄别了哪些是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官，再加重予以打击之完全是根据毛泽东虚夸文字而产生的滑稽臆想。

其实在文革中受到民众打击较重的倒是那些平时对群众较凶的恶官。在一般情况下，打击量和恶官的恶量是成正比的。当然也有单位里恶官拥有庞大的保皇派，使之不受或少受冲击。至于大官，象河南吴芝圃、四川李井泉都因其饿死数百万农民的恶行遭到造反派民众的揭露和冲击。

5、文革造反“打砸抢”。

文革造反砸什么了？抢什么了？砸了商店、抢了银行吗？共产党为妖魔化文革造反派制

造了那么多谎言都还不敢说造反派抢银行商店。文革造反的"砸枪"主要是发生在 1966 年底的"批资反线"时期。那时毛已否决了刘少奇、邓小平搞的第二次反右，指示在前阶段运动中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档案材料应予一律销毁。但是许多地区、许多单位的领导仍幻想着以后还可以去"秋后算帐"，故都设法转移这些档案材料。这个情况被造反派获知后，就冲击"保卫科"等机要部门，打烂保险柜，抢出黑材料。事态的发展还使有些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人乘机去冲击机要部门，抢出一些秘密文件来看。文革时期得以暴露许多共产党的内幕，盖源于此。故此共产党对此切齿痛恨。但是，这种"砸抢"不是砸烂得好，和抢得有理吗？别忘了，1956 年匈牙利事件时，造反的人们也是大搞此类"砸抢"的。共产党秘密警察部门（各单位保卫科均属此体系）的黑档案制度是最阴森、最可恨的。

至于"打"，文革初期打死打伤"黑五类"和出身"不好"的老师同学和文艺界人士是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暴行，与造反派丝毫无关。而且许多后来成为造反派的人那时也不同程度遭到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欺侮。后来在大武斗时期，所有发生在保皇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武斗都是保皇派挑起的。因为在思想软件上，保皇派自恃根正苗红对造反派有政治歧视感，甚至把造反派视为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他们把自己与造反派的矛盾视为敌我矛盾，在思想上就有以暴力镇压阶级敌人的强烈意识。在实体硬件上，保皇派先有省市党委的支持，后有军方的支持。军区甚至暗中提供枪支武装他们。造反派则相反，他们的潜意识中不得不面对保皇派出身成分"好"、牌子硬这个事实，因此他们只能说保皇派是受"资反线"或"走资派"蒙蔽的阶级兄弟，要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实际斗争中，造反派先有省市领导的压制，后更有军方的严酷镇压。造反派在保皇派的突然袭击下损失惨重。后来他们奋起自卫还击。没有枪支就去军械库去抢。广西造反派最勇敢。在保皇派和军队大军压境之时，武器不足，连援助越南的军列都抢了。从策略上来看，抢军列令毛中央恼火，是导致毛中央放手让国清血腥屠杀十几万广西造反派的原因之一。从原则上来看造反派"抢"武器，抢得有理、抢得勇敢。文功武卫符合正当防卫的原则，它不会因为出自江青之口就失去其正确性。

在某些保皇派失势的省份，如四川、湖北，掌权的造反派（暂短的、虚表的掌权）分裂互斗，甚至使用暴力。这是造反派的最大污点。但这不是全局性的。很多省市的造反派并没有或基本没有发生此类情况。造反派分裂互斗不属"人民文革"的范畴。

6、"所谓'人民文革'的反抗都失败了，有什么意义？"

"人民文革"的反抗是失败了。可是失败了就没有意义吗？七九民运、八九民运都失败了，它们都没有意义吗？

7、"'人民文革'在文革中不是主流。"

我肯定"人民文革"并不涉及它是否文革主流的看法。但是如果硬要扯上这个话题，那么可以这样看，若以文革十年分期论，"人民文革"所占份量当然很少，但是若取文革两年

分期论，“人民文革”就占了很大比重。尤其是其中某些时段，如 1966 年 11 月到 1967 年初；1967 年 4 月到 7 月，人民乘机而起的反抗运动就是社会的主流。

8、“‘人民文革’ 改变不了文革的性质。”（至第 9 点阙，待补）

三、“人民文革”命名质疑之解释

文革这一词从文化革命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演变，其内容与名称起初是符合的。六四、六五年间批判“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文化专制主义可以是“文化革命”的反向理解。（正向理解则是文化领域里的除旧布新）但是在 1966 年 8 月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称和内容就完全分离了。这其实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却又被大多数人忽视的问题。

1996 年，文革三十周年时，我写了一篇题为“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的文章，发表在《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上。顺便说一句，十年前共产党对海外中文报纸的渗透程度还有限，故我的文章还能得到发表。如果是象今天文革四十周年那样，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当时我把文革分期定为三年。即 1966、67、68，三个年头，并把文革解析为官方线索和人民线索。当时已有王希哲和郑义各自提出了“人民文革”的说法。我对他们说：“还是用我的‘人民线索’ 吧。‘人民文革’ 容易引起误解，或被挑剔歪曲。”十年过去，倒是我改变了，采用了他们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我仍然认为“人民线索”的说法在学术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然而我更认为当前更为迫切的不是学术讨论，而是政治论战。共产党几十年来制造的世界大谎言已产生了戈培尔效应。许多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中年、青年两代人都听信了共产党的欺骗宣传。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也因种种原因而集体噤声失语。共产党的世纪大谎言是把文革中共产党国家机器极其延伸物的种种罪行都移植到文革造反民众的身上。这样，既可使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及其延伸物在文革中犯下的种种罪行得以隐去，不受谴责，又可妖魔化民众的反抗，使当今中国民众不敢有类似行为，否则就是“搞文革造反派”那一套。在这种社会情势下，对于一个反对专制向往民主几十年的人来说，研究文革已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斗争的问题。我想我不应为了四平八稳；不应为了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不应担心被他人挑剔歪曲就继续用政治触角钝软的“人民线索”论，而不敢采用政治触角尖锐的“人民文革”论。

在“人民文革”学派进行深入的事实和道理阐述，一些人士无法否定文革中存在民众的反抗斗争后，便在“人民文革”一词的命名上质疑不休。他们认为，即使文革中确实有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抗行动，但也不能称之为“人民文革”。

其实提出这个疑问的朋友应该去问毛泽东为什么把他发动的这场旨在清洗高层官员的政治运动起了这样一个古怪的名称。这场政治清洗远远超出了文化专制主义的范畴。根本不能以文化大革命来概括、诠译它的内容。如果毛泽东干脆地、名符其实地把他搞的这场社会大波澜称之"高层清洗"、"高层肃整"之类，那我绝对不会把这场社会大波涛中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抗斗争称之为"人民高层清洗"和"人民高层肃整"。然而事实是毛泽东起了这么一个名不符实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的本身究其汉语词汇的本意来说并非贬义（文化革命难道不可以解释为文化领域内除旧布新的积极运动吗？）因此，我把这场社会大波澜中民众的反抗行动顺着表称习惯谓之为"人民文革"又有什么值得置喙不休的呢？

有体制外人士反驳说：德国的纳粹运动中也有民众参与，那是否可以说有一个"人民纳粹"呢？我想这里要分清的是，德国纳粹是一个政治实体，即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可是，文革是一个政权、一个政党吗？当然不是。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参与德国纳粹运动中的德国民众是在反对纳粹政权的许多高官吗？是在冲击德国纳粹的统治秩序吗？当然也不是呀！既然如此，还要把德国纳粹运动与中国文革强拉硬扯地绑在一起岂不是荒谬绝伦吗？

还有人说，反右运动中民众也有起来写"右派"大字报的。那是否也有个"人民反右"？如果说这是个一般人的质疑那还罢了，可是这是出自一位有理论家之称的人士之口，我真是有点啼笑皆非。反右运动中写"右派分子"的大字报是冲击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是维护巩固共产党的统治秩序。1957 年反右运动中积极写"右派"大字报的人在 1966 年 6、7 月的第二次反右中又积极了一次。这些人是共产党的保皇派。他们在反右中写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百分之百是保共产党之皇。在文革波澜中他们的典型行为也是保共产党之皇，先是保省市党委，后是保军区和本单位党委。如果要类比，反右运动中的群众积极分子和文革保皇派才真正可类比为德国纳粹运动中的民众参加者。而文革中造反民众的典型行为是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这与反右积极分子、文革保皇派和平民纳粹分子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两者是互相冲突对立的。怎么把文革中的造反民众等同于"反右"中的积极分子呢？

虽然我对文革有着这些清醒的看法，但是在几十年共产党垄断文革评论公共话语空间的情况下也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如我把文革解析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再把"官方文革"解析为毛泽东的文革清洗；和毛泽东与军方和地方官僚分别搞的和勾结搞的文革镇压。"人民文革"则有时又表述为文革反抗。其实，这样的表述本身就与我的深层思想不符，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文革就是一个政权、一个政党，总之象是一个实体。因为文革清洗、文革镇压、文革反抗是主谓结构的词组。即文革在搞清洗、文革在搞镇压、文革在搞反抗。当然，我的意思是文革时期所发生的清洗、镇压、反抗。"文革"在此只是等同一个时间状语。讲更精确些，是在那个名不符实的被称之为文革的一场社会大波澜中所发生的清洗、镇压、反抗。可是，这样的表述十分繁复。一方面是为了简化表述，另一方面也是不知不觉中受到共产党话语体系的影响，使我使用了文革清洗、文革镇压、文革反抗的说法。这种情况也使我意识到，对一些体制外人士对"人民文革"一词的质疑不要反感，应给予理解。

另外还可以预见的是，当有一天被共产党文革垄断话语体系蒙蔽的，听到“文革”这个词就习惯性联想，以为“文革”就只是造反派杀人放火，并充耳不听我们耐心解释澄清的人们都离开这个世界，就不再会有人只对“人民文革”的命名纠缠不休了。而我放弃“人民线索”采用“人民文革”所激起的质疑乃至激辩未尝不是把（）尘封在角落，并被泼满污水的文革中民众的正义反抗行动提升到明亮台面上来，把真假善恶、是非曲直辩个水落石出的有效办法。因此，我坚定婉拒某些好心的朋友建议我用回“人民线索”一词的建议，坚决继续使用“人民文革”一词。

文革中 1966 年 11 月至 1968 年 7 月这一年又九个月的时间里，民众乘机而起的、非暴力的、以集会、游行示威、集体绝食为手段的、旨在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维护应有权益的斗争——“人民文革”——是正义的，是最初级的民主斗争。它那种暂时不突破共产党框架的斗争策略和非暴力的斗争形式完全可以作为当今维权斗争和民主斗争的借鉴。

把文革时期毛泽东和共产党国家机器（党委、工作组、军队、革委会、专案组等）及其延伸物（高干子弟红卫兵、保皇派、工宣队、群众专政队、贫下中农特别法庭等）所犯的种种暴行都移花接木到造反派民众身上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冤案。抹杀、诋毁、妖魔化文革中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维护应有权益的反抗斗争是当代中国莫大的不公。不平反这个冤案，不推倒这个不公根本谈不上修编文革史。换言之，平反这个冤案；推倒这个不公是重建真实文革史的重要内容。

过入境关的思虑与对策

——赴香港出席文革 40 周年座谈会集锦(之一)

2004 年，刘英杰、张月凤到纽约旅游光临寒舍。言谈之间，我提到后年就是文革 40 周年。由于共产党垄断了话语权，再加上无良文人的配合，文革评判已弄到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地步。为了留下真实的历史给民族后代；为伸张社会正义；为除却当今民众维权街头运动的紧箍咒，我都要竭尽全力。

刘英杰、张月凤问我具体有些什么打算。我说初步设想要出一套文革评判的丛书。把我这些年来重要的文章都汇集起来，还要增添新的内容，就是讲述文革中自己的直接经历。另外我还要举行演讲会，尽力传播我的文革史观。刘、张问我，想到香港去讲吗？我说当然想。但这就要靠你们去张罗了。

刘英杰、张月凤是我二十几年的老朋友。但年纪比我小十几岁。

1978 年 12 月，我创办了广州第一份油印民刊《人民之声》，拉开广州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的战幕。1979 年陆续有香港的在校大学生、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广州与我联络，把各期《人民之声》和我收集到的其他城市的民刊带回香港，使外界得以知晓内地民刊、民主墙运动的具体情况。他们还从香港带来一些内地买不到的书籍，给我们参阅。在这些来来往往的学生中，只有来往得最多的才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如张永祥、刘英杰、刘山青、刘子廉、张月凤、林昭寰等。其中第一位来广州的是张永祥，但后来失去联系，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而三刘、月凤、昭寰等则一直联络着，尤其是英杰、月凤。月凤的姐姐早年移民纽约。月凤、英杰常来探望姐姐，也同时光临寒舍。

时光荏苒，不觉就到了 2006 年。刘英杰、张月凤真是我的好朋友。前年我的一句话他俩就记在了心中。今年春末夏初他俩就开始联络刘山青、刘子廉、林昭寰和梁国雄（长毛）等着手筹办邀请我到香港演讲的各项工作。

事务工作固然要花许多精力，而尤其令人多费思量的是，我是否能顺利过入境事务处的关进入香港？鉴于我的政治背景，香港的朋友们都担心我会被拒绝进入香港。为此我和朋友们在越洋电话中进行过多次商讨。

由于我至今仍持中国护照和美国绿卡，我颇有信心地对刘英杰说：香港已“回归”，持中国护照应毋须签证就可进入香港。

刘英杰查阅有关法律规定后回复我说：“情况并不这样。香港虽已回归，但它是特别行政区，持中国护照者进入香港要事先获得签证。”

我说：“那就有麻烦，当局可能不给我签证。怎么办呢？”

刘英杰再深入研究了有关条文后说：“办法还是有的。有关入境规定是，过境者可免签证在香港停留七天。”问题是何渭过境？我们商讨后得出的认知是，所购的飞机票终点站不是香港，而又在香港转机者，谓之过境。于是我买了一张纽约到广州的机票，但不是直达，是在香港转机。

但是，尽管这样也不能高枕无忧。刘山青打电话来对我说：“如果当局不遵守它自定的规定，仍不给予你七天免签证进入香港的正常待遇，你怎么办？”

我说：“那我就要求按原机票转机到广州。”

刘山青问：“你有没有考虑到这样会有危险？”

我说：“不怕！一是我一向主张和平民主转型，共产党无以对我扣上恐怖主义的帽子。二是我与台湾没有任何联系，也无从对我罗织间谍的罪名。”

刘山青说：“但是你们的组织在国内有成员，你不能不考虑到当局会以此做文章。”

我说：“对此我预测最大可能性是当局不让我入境，其次是在我入境后全程对我进行严密监控。，如果我与国内成员接触，就会立即予以抓捕。但是，我就算进去了也不会去接触国内组织成员。只一天的时间，我顶多到故居处转转看看，然后就按时搭机回程。如果当局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抓捕我，也好。他们把我抓起来，无形中对提高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知名度有作用。这样，个人遭些磨难也值得。”

刘山青说：“好！你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好！就这样办。如果当局抓了你，我们就全力在外搞事!”

我说：“行!”

后来刘山青又打电话来与我商讨，在我入境时，香港朋友们如何判定我被入境事务处留置。刘山青想了个办法。他说：“你落机后在步行到入境关卡前，设法打个电话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已确切到达香港机场。如果此后几个钟头都不见你出来，我们就判定你被入境事务处留置。这时我们就要行动，立即招各报记者来，谴责当局违反法律的作法。”

我说：“很好!”

10 月 13 号晨 7 点 40 分，班机按时到达香港。我也按原约定在入境事务处前打电话与刘山青等取得联络。8 点多，我顺利出关，刘山青、刘英杰、张月凤、梁国雄（长毛）等一班朋友已在接机厅守候迎接。大家在一番辛劳、忐忑之后顺利相见，有说不尽的欣喜愉快。这是去国十几年后重回故国，虽不是祖籍或生长之域，但终是华夏文化之地，望望满街华人面孔，再也难觅昨日触目皆是的高鼻深目或曲发黑肤，不由感叹当地科技之神奇。一觉睡来，已飞越万里重洋抵达彼岸。

至于为什么刘英杰等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此次香港之行十分低调。

事前刘英杰他们并没广作宣传。由于经费有限更没有在报纸上作广告。而我也是在将要出发之际才把自己的行程告诉海外的一些朋友。共产党特务机关并不万能，其政治神经的反应需要时间。1999 年 4 月 25 日法轮功学员中南海墙外的万人聚集早在网络上联络，而共产党特务机关却一无所知，这足以说明其政治神经亦有迟钝之时。

此文于 2006 年 12 月 06 日做了修改

民间电台里的声波和见闻

——赴香港出席文革 40 周年座谈会集锦(之二)

13 号下午，刘山青对我说："按预先给你安排的日程表，今晚你是去曾健成的民间电台作演讲。但是现在有个新的情况，不知你是否还愿意继续去？"

我问："什么情况？"

刘山青说："曾健成打电话来告诉我，他已收到风，电讯管理局会同警方作好了准备，只要他的民间电台一开播，就马上来取缔。从电讯管理局开车到民间电台只需几分钟。"

"怎么取缔法？"我问。

"大概不外是禁止播音继续进行，在场人员就地或带往差馆问话之类。"

"问话之类要进行多久？"

"大概几个钟头吧。"

有位朋友问刘山青："会不会拉到差馆里过夜？"

"应该不会，但由于没有先例，谁也不能打保票。"说着，刘山青问我："老刘，你自己意见怎样？你会是当事人。"

"去！"我说："就算拉到差馆里过一夜也不会妨碍明天的演讲。"我心里还真想趁此机

会见识一下已基本建立了民主法制的香港是如何执法的。

民间电台设在一间废旧的工业大楼里。电台负责人曾健成和他的助手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简短的寒喧后立即进入正题。曾健成先生带我们进入播音室，开始进行广播。

曾健成先生说："各位听众朋友，香港民间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我们香港民间广播电台自设立以来，为推进香港的民主架构，和争取香港底层民众的种种权益发出一波又一波的呼声。我们的呼声得到许多香港市民的正面回应。但是香港有关当局企图以含混的法律条文来阻止我们的正义行动，我们不予认可。我们将继续发出我们的呼声。今天，我们邀请到从纽约来港的文革史论家刘国凯先生来给我们谈谈他对文革的评判。"

我说："各位听众：晚上好！文革 40 周年了。民间电台的曾健成先生要我向大家讲讲我对文革的评判。由于时间有限，我不能系统全面地讲，只能跳跃地、选择性地讲几点看法。"

我首先指出文革是一场极为复杂的社会动荡。它系由毛泽东的政治清洗引发。毛泽东要清洗共产党高层领导中不合他心水（粤语用词）的高官，但他不运用从前常用的党内斗争方式，而是发动群众起来冲击各级官员，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其中有官方对民众的镇压和利用，有民众在响应毛号召的旗号下，带着自身的感受和要求投入运动，给共产党的统治秩序予以极大冲击和打击，有毛泽东在感到被他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已越轨失控，而与复职官僚和军方联手对群众造反运动的彻底镇压。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官僚、军方在文革期间对民众的镇压、蒙骗要予以揭露。对民众乘机而起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维护自身应有权益的斗争则应予以正面评价。我把这些斗争称之为"人民文革"。

接着我指出人民文革与当今的维权斗争有着共同之处。其一是它们都以非暴力的街头行动为表征。游行示威、集会、集体绝食等。其二是它们都运行在现存政治结构的框架之内，并没有提出革除中共专制政权的诉求。

使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反抗，且不涉及政权根本，既是当年人民文革的局限性，也是它能一度形成声势的原因。同样，当今维权斗争呈这样的形态也是它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和当局不便立即以极度暴力予以镇压的原因。

当然，当今维权斗争比当年的人民文革有着明显的升华。这表现于当年的"人民文革"系由毛泽东的文革清洗引发，而当今的维权斗争则纯属民众自发。

我继而还指出，共产党是绝对不会自动放弃其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特权。光以文字语言抨击也远不足以迫使其专制链条放松，只有大规模非暴力的街头政治的压力，才有可能迫

使共产党逐步失守其专制阵地。现在共产党也不敢把民众的维权斗争说出是反革命行动，但却蛊惑人心地把民众的街头斗争诬为搞文革动乱。而民众中也的确有人因此而缩手缩脚。故此，我们现在极有必要正面地、直言不讳地为人民文革正名，这样才不至在共产党的诬蔑不实之词面前乱了阵脚。

我的讲话乘着电波飞过山山水水，传向四方，反馈也随之而来。荧光屏上不断显示有听众的来言。例如一位广州的听众说，刘国凯先生的讲话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文革中民众的反抗斗争被共产党诬蔑了这么多年，现在是要恢复其真相的时候了。

这时，曾健成先生向我发问："从文革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九十年代以来共产党又高叫改革。你认为共产党的性质有没有改变？"

我说："究其专制本质而言，没有改变。"

曾健成先生说："我要补充你的意见。共产党既没有变，也有变。现在的共产党已不单是个专制政权，它还是个利益集团；是个中国历史上最无耻、最粗胆的贪污腐化集团。它已完全没有政治理论，只有捞取利益。中国目前的贫富悬殊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为什么那么多民众那么穷，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官僚们太富……"

曾健成先生不愧是民间电台的主办人和首席广播员。他不用讲稿、不用准备就滔滔不绝地出口成章。后来刘山青也在话筒上阐述了类似曾健成先生的看法。

我们讲了大约半个小时即行离去。走到门口，已有几名电讯管理局的人员在玻璃门外守候着。门锁着。他们没有强行开门，而是等着曾健成先生去开门。门打开，电讯管理局的人员鱼贯而入，后面跟着警察。曾健成先生见状立即返身进入播音室，关上室门继续进行广播。隔着玻璃我隐约听见曾健成先生是向听众报告即时发生的事情，并对电讯管理局的这种做法表示质疑和抗议。表示他为争取扩大香港民众的言论权、反对倒退、坚持推进香港民主政治的决心绝不动摇。

电讯管理局的人员没有强行进入播音室，而是一再要求曾健成先生停止广播，说他们持有搜查令，有权提出此要求。后来曾健成先生出来了，警方和电讯管理局人员向曾健成先生、刘山青和我登记个人资料。曾健成先生是区议员，刘山青杰出的政治履历亦是众所周知，登记他们的个人资料纯属官样程序。只有我这个外来人的个人资料才是他们原无所知的。过程中，警方人员基本无话，为主的电讯管理局人员则态度谦和，一再向曾健成先生表示他们只是履行公事而已。

事后我得知，曾健成先生的民间广播电台已向香港电讯管理局申请执照。电讯管理局没有明确法律条文可资拒绝，只能以其电台的波段会妨碍其他有执照电台为由而搁置其申请。故曾健成先生认为他们继续开播有理，并揭露香港有关当局故意不对民间广播电台的申请作明确法律规定是为了便于取缔民间电台，压制民间的民主呼声。

对香港的有关法律我不了解，不便作结论性评判。不过，我倾向曾健成先生的评论。另外对香港警务人员的沉着举止和电讯管理局人员的谦和态度，我还是感到初步建立了民主架构的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巨大差别。大陆警察和公务人员居高临下、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态度是香港警务、公务人员难以望其背项的。

华叔和林昭寰意见的分歧以及我的见解

——赴香港出席文革 40 周年座谈会集锦(之三)

文革座谈会如期于 14 号下午二时在香港教师工会会议室举行。主讲人是司徒华先生、澳门大学教授程惕洁和我。

程惕洁教授发言的轴线以他和高树华先生合著的《内蒙文革风云》展开。其中心内容是以大量历史事实来证明文革造反派绝不是中共当局几十年来抹黑的那样。造反派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固然不是没有做过错事。在那个大动荡的时期里，谁都不可能完全正确、一直正确。但是，就他们内蒙造反派而言，则一直是以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姿态出现。即使是在内蒙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滕海清大搞清“内人党”时，内蒙造反派都是消极应付乃至抵制。但是，后来有人却把迫害“内人党”的罪孽移植到内蒙造反派的头上。

程惕洁教授还讲了一个很具典型性的事例。他说全国第一个被打死的平民造反派红卫兵是他们内蒙师大的韩徊。1967 年 2 月某日韩徊对造反派集会队伍作演讲。演讲内容是叫集会队伍要注意政策和战略，切不可一时冲动冲击军事机关。这时共产党军官柳青从背后开枪把韩徊打死。据后来得到的消息是，内蒙军区就是想以打死韩徊，刺激造反派冲击军区。军区大院内已架好机关枪，准备造反派一冲进军区大院就予以扫射屠杀。1967 年 5 月韩徊被周恩来定为烈士，发给烈士证书。柳青被捕判刑。1976 年十月政变后，韩徊被褫夺烈士称号，坟墓被平毁。而柳青则平反出狱，恢复党籍官职。程惕洁教授沉痛地说，这就是血的历史。但它已被中共政权颠倒了黑白。

司徒华先生的发言主要涉及文革期间的香港暴动。司徒华先生认为在大陆造反浪潮的影响下，香港中资机构的负责人为防止员工造他们的反而先发制人，动员其员工去造港英当局的反，从而引发一场社会动乱。司徒华先生还指出这种做法其实在共产党最高层内都是不获认可的。周恩来批评了这个做法。

林昭寰的发言赞同司徒华先生分析，但作了个重要的补充。就是在暴动中有“人民文革”的成分。

由于时间有限，我的发言直接切入主题。我指出文革中到底有没有民众的反抗运动（人民文革），这首先是一个事实判断。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再来作价值判断。对于事实，我作了这样的陈述。

作为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其第一波是批判“资反线”。刘少奇、邓小平在 1966 年 6-7 月主导了第二次反右。把各单位出身“不好”、有政历问题的人、与领导关系紧张的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尽管毛对这些人遭政治迫害是毫不痛惜的，（这从稍后毛默许、纵容“红色恐怖运动”，和于 1969 年主导与刘、邓第二次反右类似的“清理阶级队伍”得到印证）但是那次毛却不允许刘、邓所为。因为毛发动文革是要清洗党内高层的异己势力。刘、邓搞矛头向下的第二次反右完全偏离了毛的政治意图。故此毛把刘、邓的第二次反右定名为“资反线”，并允许群众起来批判之。

切莫以为毛的一句话、民众就可以大行其道。批判“资反线”其实是经过了一段过程才得以推展的。因为各地党委还在一段期间里掌控着局面。如果说某些省市级的高官会由于被毛中央点名而失势，那么，各单位的领导则大不不同。他们大多在本单位里有得力的保皇派拱卫着。故此群众起来冲击他们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行。实际上在许多单位里，尤其是大型国营工厂企业里，保皇势力一直占有优势。

批“资反线”的热潮是文革时期群众乘机而起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第一波。这一波并不只限制在批判各地各单位领导执行刘邓“资反线”把群众打成右派，而且对领导平时各种欺压群众、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河南、四川的造反民众揭发了省委领导在 1960 年倒行逆施，致使数百万农民沦为饿殍的罪行。有些地方还提出要为在“四清”运动中被整的人平反，甚至提出五七年反右也是刘邓的“资反线”。当然这些政治诉求都被毛共压制下去。

在批判“资反线”致使共产党统治秩序部分崩塌的情况下，1966 年 12 月一场纯粹发自工人群众自身的维权运动拔地而起，瞬时席卷全国。这就是被毛共中央斥之为“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轩然大潮。工人群众提出过去许多隐忍不敢提出的正当要求。工厂领导克扣加班费、保健费、工种补贴，合同工、临时工长期不予转正，削减乃至剥夺他们劳保福利被的行为都被造反民众揭露出来，予以批判，并要求经济补偿。毛共中央起初还假惺惺对工人表示同情，后来觉得不对其味道，立即转向予以压制和镇压。“全国红色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团”的头头们都被逮捕并判以重刑。

1967 年 2-3 月，各地军方大搞“镇反运动”。其中最血腥的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开枪打

死打伤三百二十多名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其中许多是十几岁的女中学生)。造反派面临瓦解。

此时毛的政治清洗尚未完成。毛还需要造反派群众为之火中取栗。于是批评了军方的做法。各地造反派乘机而起，要求军区释放被其逮捕的民众，要求军方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和个人平反。

亦是切莫以为此系轻而易举的事情;切莫以为有了毛对军方的批评民众就可以通行无阻。军方不是毛的清洗对象。毛对军方的批评相当温和。军方的威势是省市地方干部无可望其项背的。何况军方与保皇派结成了联盟。从前保省市党委的共产党保皇势力现在转而投靠军方、与造反派为敌，并在军方的支持下对造反派发动暴力袭击。造反派民众在要求并迫使军方不得不释放被捕民众、和在抗击保皇派发动的暴力袭击中取得了胜利。这里面除了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因素而至外，造反派民众的斗争反抗精神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上这三波“人民文革”是全局性的。除极少数地方（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除此之外，各地还有许多地区性的反政治歧视、维护争取应有权益的斗争。如在广州就发生“持证工人”和原技校学生要求返回广州居住工作的维权斗争。

从六二年到六五年由于工业萎缩、经济不振，城市就业不足，中共遂办了许多农场，把一些城市的失学失业青少年安排到那里做农场工人。农场大多种植经济作物，农场劳动者吃商品粮，领固定工资，故以工人论（但已属农村户口）。当时为便于动员城市青年前往，广州地方官订了户口保留规定。即去农场四年后可回城另行安排工作，并发有户口保留卡，故他们被称之为持证工人。1967 年许多 1962、1963 年去农场的持证工人都回到广州，提出回城生活工作的要求。

在广州造反派中有一个组织叫“工读 600”。这个组织是由广州的一批下乡支农青年组成。他们与其他支农青年的明显区别是，他们在下乡之前不是没有考上高中、中专、中技的初中毕业生和没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抑或其他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而是在校生。他们读的是 1964-1965 年开办的好几间半工半读的技工学校。毕业后的分配定向为技工。这些学生在初中时学习成绩都比较好，但家庭又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在政治空气已很浓的 64、65 年，他们出于对自己家庭政治等级的清醒估计都不去投考高中——因为将来绝无“考”入大学的可能——而选择投考最低等的技校，以日后能有一份技工职业为满足。当然还有少数是投考中专因家庭政治原因或分数不够被拨到技校里来的。

文化革命前夕广州市委认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政治质量太差，连留在广州市做技术工人的资格都没有，应该都下乡去做支农青年，于是下令关闭了这些学校。学生全部下乡务农。这批学生的数量有 600 名左右。

1966 年底，在批判“资反线”的高潮中他们大多回到广州。1967 年夏求之后他们四处申诉自己所受到的政治歧视和政治迫害，他们要求复学，要求读书的权利和毕业后做工的权利。他们串连起来组织了一个“造反”组织。名称就是“工读 600”。尽管并不是当时被赶出校园的 600 名左右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的名称则是极其鲜明地表明了他们的构成和诉求。

象这类地区性的“人民文革”其实各地都有发生，只是时间不象那三波“人民文革”那样具有高度的同时性。

在作了这样的事实陈述后，我继而对“人民文革”作出价值判断。我指出“人民文革”是属于在没有突破共产党政治框架的、具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初级层次的民主斗争。它和当今的维权斗争的相似之处是都没有突破共产党的政治框架，和都以集会、游行示威、绝食等非暴力的形式进行。两者的区别是当今维权斗争是纯属民众自发，而“人民文革”是藉着共产党的内斗乘机发生。

司徒华先生说，即使文革中有民众的乘机反抗运动，但也远不是文革的主流。我的看法是；如果按中共的文革十年论，“人民文革”当然不是主流。但是，如果考察从 1966 年 11 月到 1967 年 8 月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人民文革”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就是主流。而在广州这种较特殊的地区，“人民文革”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是从 1966 年 11 月到 1968 年 7 月。广州造反派的体制外性（原省市委的领导干部没有一个支持造反派，而且其大多数都支持保皇派）、被迫害性、坚持反抗性，使之一年另八个月的历史成为一部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主斗争史诗。

至于在 1968 年 8 月以后造反派或被屠杀镇压；或被取缔强令解散，“人民文革”岂止不是主流，而且是彻底完结。那么主流是什么？是对造反派民众连续三年的反复清算。（1969 年“清理阶级队伍”、1970 年“一打三反”、1971 年“清查五一六”） 和后来六年里共产党文革窜升派和老官僚集团的争权夺利。

在这段发言中我还反驳了造反派“反贪官、不反皇帝”论；“依靠毛的支持反政治迫害无正义论”。我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当今中国民众的维权运动也没有提出终结中共一党专政的诉求，你能说它没有进步意义吗？如果不能，又如何能以“人民文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否定它？把“人民文革”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比较，其参照物应是保皇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总比什么都不反要好！更比保皇派保贪官、保皇帝要好得多。至于要求军方释放被逮捕的民众；要求军方承认前阶段镇压的错误，并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这无论如何都是正义的。如果认为这是靠了毛的恩准就无正义性，那么要问，什么是正义？难道军方的镇压屠杀是正义的？难道让被打成反革命的民众继续关在监狱里、牛栏里，才是正义？民众利用了毛的“恩准”是斗争的策略性。这个策略性绝不否定它的正义性。

我在“人民文革”价值判断中着重反驳了“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较好的干部”的荒谬推断。

我指出，毛把他的这场政治清洗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那只是给他的政治清洗穿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而已。文革前共产党内哪有什么高干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行修正主义？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是比毛泽东的人民公社要务实，但那也不是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别忘了刘少奇、邓小平不但是 1957 年第一次反右的极力主张者，还是 1966 年 6、7 月第二次反右的主导者。毛死后，邓小平实行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但在政治上却坚决复旧，坚决强化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不要说已皈依宪政民主的伯恩斯坦老修正主义，即使是跟还在共产党框架里面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相比，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也差得太远。而且 1989 年，他们整体上都主张血腥镇压，就说明了他们从来不是修正主义者。至于说到赵紫阳，他当然是修正主义者。但他是八十年代才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很可能，他之所以成为修正主义者，正是由于他深刻认识了文革中的群众反抗运动。

文革期间的群众造反运动根本没有首先去区分哪个官是走社会主义的官，哪个官是走资本主义的官，再考虑冲击与否。除非毛中央直接插手说明，否则造反群众是一律予以冲击的。那种认为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好官，这首先是误以为文革前共产党里真有这样的好官。接着是凭空臆想造反群众会甄别出这样的好官再特别加以冲击。

实际上在民众造反运动中受冲击较多的正是共产党里的坏官。那些平时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官遭到更多的冲击。1960 年河南吴芝圃、四川李井泉倒行逆施造成数百万农民沦为饿殍的坏官在批“资反线”时期就因其此项罪孽遭到造反民众的揭发、批斗。故此那种认为“文革造反主要打击了共产党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行修正主义的较好的干部。”的观点，纯属以文字为依据的主观臆想。

“人民文革”论在我 1979 年结识的青年朋友中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这样才有了林昭寰在华叔发言之后，提出不同的看法。林昭寰认为不能全盘否定香港六七暴动，他指出里面有“人民文革”的成分。即有民众因不满港英当局的殖民统治漠视底层民众的疾苦，乘机起来冲击之的成分。不能把这一成分与中资“左仔”的反英行动绑在一起予以否定。我完全赞成林昭寰的看法。

与“长毛”同台作街头演讲

——赴香港出席文革 40 周年座谈会集锦(之四)

15 日下午，朋友们安排我与梁国雄（长毛）同台在九龙旺角举行街头演讲。旺角那一代的街道划为步行街。街道两边商店林立，行人摩肩擦背、如电影院刚散场。对举行街头演讲我是很感兴趣的。我深信政治是大众之事。政治理论再好，若不走出书斋，不为普罗大众所理解接受，那就永远只是纸上的东西，不能产生物质力量。1998 年印尼虐华，我和一般志同道合者就是一连几个星期天在纽约华阜街头举行短促而高频的演讲鼓动，才聚合了数千人抗议印尼虐华暴行的集会示威。

不过，我对在香港举行街头演讲却有顾虑。因为我对香港事务并不熟悉，讲不出令香港市民关切的内容。而香港市民对大陆事务却总有些隔膜。我讲大陆的事情是否能提得起他们的兴趣，亦有疑问。朋友们劝我不必顾虑。他们说，这里的行人半数是到香港来“自由行”的大陆旅客。你无论讲大陆话题还是香港话题，都会有听众的。何况还有‘长毛’ 与你同台，他在香港有许多拥趸，有长毛在，不会冷场的。

那条马路约 40 英尺宽，其中一半划为会场。会场顺着马路布置。讲台是一张桌子，对面摆了四、五十张椅子。音响话筒一概俱全。刘山青带我按时到达。“长毛”作开场白向听众作了对我的介绍后，就由我演讲。

我首先表达对香港市民诚挚的敬意。我说每年六四看到香港有那么多市民走上街头，看到维多利亚公园如繁星密布的烛光，我内心就激动不已、钦佩不已。这么多年过去，香港市民对“六四”依然那么记忆犹新、依然那么执着投入。这真使一些身处海外自由环境中奉行实用主义而渐行消沉的民主人士相形见绌。

香港市民推进香港民主政治的热忱也使我敬佩万分。共产党惧怕香港成为一个民主橱窗，对大陆产生极大的示范作用，故极力阻止香港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共产党在大陆一直在扼制民主选举。二十几年了，民众都还只能选举村长。属于官员阶层中最低一级的乡镇行政长官都要由共产党任命。现在香港市民要求直选特首和立法院议员，不能不使共产党既仇恨又害怕，故他们要极力予以扼制。然而，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看到，香港市民没有屈服、没有放弃。你们一次又一次集合起来走上街头，表达你们要求直选的决心。这种既执着又理性的行动将作为一个耀眼的正义亮点载入史册。

我说，我在大洋彼岸还注意到香港有人在向共产党妥协。他们是些大商贾名流。共产党的高官要人到港，从不接触香港普通民众和代表普通民众的社会团体，而只是与大商家名人把酒言欢。这些大商家名流附和、认同共产党对香港民主发展的扼制。还有些没有骨气的香港文化报业界人士在共产党的专制尚未“君临”就开始“自律”。我说民主政治的精髓在于政治权利的平等。无论你是腰缠万贯的巨商大户，还是家道清贫的升斗小民，手上都只握有一张选票。香港的民众在努力使这张选票的含金量提高，我对这个努力抱以极大的敬意。

面前的几十张凳子基本坐满，其中小部分是我的香港朋友。两边和后面也渐渐积聚起人墙。坐着的站着的人群占了马路三分之二的宽度。剩下三分之一是通道。人群的构成呈缓慢的"吐故纳新"，但也有些人一直"粘"在那里。我的演讲的内容从香港议题转向大陆议题。

我说朋友们别为大陆东南沿海一些城市里新盖的高楼林立所迷惑，那里可是一个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官僚贪污腐化都居世界前列的畸形社会。你只要稍微深入到农村，就可以发现大陆许多地方依然是多么贫瘠。我有个朋友前不久回乡探亲旅游。他回来后告诉我，家乡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他读过的小学和中学都更破败了。学校的围墙垮了。教室里桌子椅子破旧不堪。孩子们明显都营养不良。虽然他们不会象我们这一代几乎在童年时代饿死于 1960 的饥荒岁月。但拿当今城市里共产党官僚和大款们挥金如土、骄奢淫侈的生活作参照物，他们确实生活在极度贫穷之中。

"长毛"不愧是街头演说家、鼓动家。我虽然敢于街头演说并向往街头演说，但缺乏街头演说的经验。我的演说偏重说理，而且语言节奏也掌握欠佳。在几次听众有流失迹象或我的演说内容转换时，"长毛"会接过我的话筒来一段即兴演说。"长毛"语言生动、妙趣横生，常把深刻的政治道理寓意在比喻笑谈之中。使本已有流失迹象的人群又聚集粘稠起来。海外异议阵营中缺乏象"长毛"这样水准的街头演说家、鼓动家是它的欠缺。

演讲中我留意到有好几位背着背囊，模样似外省人的中年汉子一直站在座椅的后面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听得懂广州话吗？一丝疑问曾掠过我的脑际，但当我发现他们会在"长毛"抨击当局横蛮而颟顸的行为时与其他听众一起发出由衷的笑声，就推断他们基本能听懂，而且思想感情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这使我想起张月凤对我所说：现在香港有许多大陆的自由行旅客，他们常常是街头演讲的听众，通过他们可以把香港的信息带到大陆。

经过这次实地感受，我深感香港民主派的朋友们经常举行这样的街头演说确实是一大创举，是把香港作为民主政治桥头堡，向大陆共产党专制政权发射民主导弹的坚强阵地。无怪乎共产党要如此处心积虑地掣肘香港完善民主政治的步伐，不遗余力地打击香港民主派。因为如果香港一旦实现特首和立法局议员全部直选，民主派将会完全左右香港政治走向，届时对大陆将会产生更强大的示范作用。香港的民主派也更有力量对大陆民主进程予以更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拜访刘慧卿

——赴香港出席文革 40 周年座谈会集锦(之五)

赴港前，刘山青曾在电邮中问我，你到香港后除演讲外还希望见什么人？我列出了一份名单，其中有刘慧卿。

我与刘慧卿从无联络，刘慧卿与整个海外民运也没有联系，我为什么想见见她呢？

在纽约华文报章的香港新闻版上我经常看到关于刘慧卿的报导。我了解的情况之一是，刘慧卿所属的组织，或曰刘慧卿所领导的组织“前线”是香港民主派中的坚定派。在对香港保皇派（保中共派、或曰亲中共派、投靠中共派、看中共眼色行事派等等）的语言文字交锋中，“前线”不愧是前线，总是走在斗争的前列。不但如此，“前线”也是敢于、善于走上街头进行公开抗争的团体。我在纽约华文报纸上多次看到这类场景的照片。

我知晓的情况之二是，香港的中共爪牙对刘慧卿恨之入骨。他们在台面上不能封杀刘慧卿便搞一些极其卑鄙下作的勾当来恐吓她。如写恐吓信给刘慧卿；在刘慧卿的办公室的门上泼汽油，扬言要烧死她。甚至在刘慧卿办公室门外泼屎泼尿。亲共分子的行径已完全类同黑社会和地痞流氓。

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和刘慧卿都没有丝毫的动摇和退缩。无论在立法院的殿堂上还是在闹市街头，“前线”和刘慧卿照样是一支战斗在民主阵线的前列劲旅。这些都令我感到格外钦佩。有时在报章上还看到刘慧卿的照片，不大清晰，隐约是颇为秀丽。这更使我暗自称奇。

刘山青告诉我，刘慧卿很忙，事务极多。与她约见常常要轮候。现在你来香港，一说要见她就立即安排，很好了。我笑笑说：“大概都是刘氏宗亲之故吧！”

十五号中午，刘山青带我到九龙新界的一家相当规模的餐馆。我们坐落后不久刘慧卿就赶到了。礼貌性地客套几句后就转上正题。我首先向刘慧卿讲到我在纽约华文报章中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对她和“前线”的民主斗争精神深表钦佩。接着我告诉刘慧卿这种情况不是孤立的。亲共分子到处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真理就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我举出这样一些实例。

1997 年 10 月 1 号，纽约的中共保皇派游行，庆祝中共国庆。民运人士则举行小型集会表达另一种理念。不料中共保皇派们竟冲过来将民运人士重重包围，仗着他们人多势众对民运人士横加辱骂。“反华”、“叛徒”、“汉奸、卖国贼”、“美帝国主义走狗”等骂语如连珠炮，甚至还要动手殴打民运人士赵品璐。幸得美国警察闻讯及时赶来，才把赵品璐等救出重围。

2000 年江泽民访美。纽约亲共侨团在林肯剧院举行盛大欢迎音乐会。八位购票入场的

民运人士于中间休息时在自己的座位上举起预先制作的纸质分体标语"终结中共一党专政"。中共保皇分子发现后冲过来疯狂谩骂并出手殴打。坐在边位的黄景贤被殴打得尤其严重，肝部收到损伤。

2003 年中共国庆。纽约亲共分子在唐人街银宫大酒楼举行庆祝餐会。若干法轮功学员在附近街道上举行抗议中共暴行的小型集会。中共保皇党发现后竟冲出来殴打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跑开走避，亲共分子竟还要追打，气焰极为嚣张。

2001 年旧金山一批民运人士在花园角举行演讲会。亲共分子跑来闹场甚至殴打民运人士。林牧晨先生额头被打出血。

根据这些实例，我对刘慧卿说：无论是香港的亲共分子还是海外的亲共分子，他们之所以这么猖狂，敢于对民主志士使用暴力，关键在于他们有大陆共产党专制政权这个大后台。这就提示了我们，香港与大陆息息相关。一个大陆的专制政权一定会对香港民主政治虎视眈眈。香港的民主志士不但要为完善香港的民主政治而奋斗，也要支持大陆的民主事业。因为大陆实现民主化，是香港民主政治不受干扰的保证。

拜访刘慧卿前刘山青曾对我说，刘慧卿对推进香港民主政治非常坚决，但对大陆关心不够。有人批评她文化和思想都相当洋化。我讲那些话虽或有呼应刘山青的意思，但绝不是批评刘慧卿，而只是谈谈自己的感受而已。刘慧卿表示绝对不会在亲共分子的暴力行为和暴力威胁面前退缩。她还很爽快地表示赞同我的意见。她说：当然！我们都会关注大陆的各种情况，我们当然应该支持大陆民众对民主的要求。

刘慧卿还谈到亲共分子以暴力相威胁甚至使用暴力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她说更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香港亲共派正在秉承北京意图，竭力拖延香港完善民主政治的步伐。在立法院里亲共派倒是能步调一致，而我们泛民主派却往往意见分歧甚至互相指责。刘慧卿直言不讳地向刘山青提出一个意见。她说你们社会民主连线不应该公开地、更不应该在立法院里攻击（某某——泛民主派成员，立场较软弱。）这样会让亲共派在旁边看笑话，会让他们有机可乘，说我们民主派闹内讧。我认为我们的矛头几时都应指向亲共保皇势力。你宁愿去骂曾荫权都不要去骂某某。对某某有意见应内部提。

我表示赞同刘慧卿的意见。我对刘山青说：多年的政治活动经验使我发觉民主派往往会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以为实行民主便是口无遮拦地提意见。其实民主是一个原则。原则之下还有策略。策略之一就是在面对专制势力的压力时，对民主派内部的歧见应内部解决、求大同存小异。如果把民主派内部的歧见公开化，甚至互相攻讦，那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民主阵营的内耗必然会削弱了民主力量，客观上增强专制势力，加大了民主事业的难度。

刘山青虽性格执着，但其实很明事理。他很爽快的表示会认真考虑刘慧卿的意见，并说要把这个意见带到社会民主连线里去，而且还会向连线建议，主动找那位泛民主派的朋友联络沟通，交流意见看法，以求最大程度地协同运作。

刘慧卿事务的确很多。午餐后她就要赶到某社区的民众自治委员会的创办式上剪彩，于是与我们告辞。在谈话间，刘山青称刘慧卿为卿姐。刘山青四十几岁，称刘慧卿卿姐，不知是出于尊重还是刘慧卿的确年长于他。中青年女性的年纪是颇难猜测的，而且猜测她们的年纪本身就是愚蠢的、不礼貌的作法。然而，刘慧卿的容貌的确给我留下印象。毫无疑问，刘慧卿相当美丽，但又总觉得她区别于港式女星的美丽。港式女星如蔡少芬、邱淑芬等，虽美，但总给人以内涵不足的感觉，而刘慧卿美丽的容颜线条中嵌有智慧、学识与正义。突然我还想起，在海外民主阵营中亦不乏象刘慧卿这样的杰出女性。如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北明，能同时承担采编、撰写和广播。我听过她一篇有关朝鲜战争的系列评说，其深度广度不亚于一篇博士论文。再由她极富感染力的音质广播出来，给人以知识美、正义美和声乐美的感受，而在话筒后面还有容颜美。旅居加拿大的盛雪又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极富戏剧才能，却选择了投身民主事业。当我得知她的数十万字的“远华案黑幕”竟是在几个月中成书的，确实惊讶不已。那如泉的文思和敏捷的笔触当令我等须眉写手望尘莫及。在得知盛雪的妙笔后再看到她的模样，才华、正义与美丽融合一体的赞叹将会不由自主地跳现在你的脑际。

我还悟及共产党的营垒中能有这样的杰出女性吗？共产党里当然不乏貌美女子。可是手中无真理，靠层层青睐提携上去的女共产党员，即使有美丽的容颜，却绝对与正义绝缘。而且就算她们本小有才气，但智慧已消耗于攀龙附凤的周旋算计之中。即使有点才学也被铜臭与官腥熏污殆尽。只有在为社会最大的公益事业——民主事业奋斗的群体中才会出现集美丽、智慧、正义于一身的杰出女性。

此文于 2006 年 12 月 11 日做了修改

从“革马盟”到“社会民主连线”

——赴香港出席文革 40 周年座谈会集锦(之六)

这次在香港几天的行程均由刘山青联络安排。经过此行我才了解，刘山青不但在理念追求上坚定执着，而且操办具体事务也极讲效率和恪守时约。每天离开时他会再向我重复一次明天的活动内容，并明确明天来旅店接我的时间。次日，刘山青绝对会在预约的时间里打电话到旅店的房间里，然后在旅店楼下接我前往预定要去的地方。他把今年的假期都用于陪我作香港之行。

刘山青现时在社会福利机构中供职。这与他大学时所学的物理专业风马牛不相及。刘山

青在 1976 考上香港大学。这是香港数屈一指的高等学府。只有中学毕业生中为数极有限的佼佼者才有可能考上它。出身平民家庭、学习条件相当不优裕的刘山青能考上香港大学说明他的资质甚高。香港大学的毕业生前途相当灿烂。大多会进入政府机构任职，或被大公司聘请担任主管职务。

1979 年刘山青毕业于香港大学。此时正逢大陆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在勃兴之中。刘山青不急于找薪资丰厚的工作，而把全副精力都投入支持大陆民主运动的活动中。他频繁地来到广州，与我、王希哲等广州的七九民运参加者交流思想和信息。把大陆的民运刊物带到香港，让外界得以了解国内的情况。共产党政治警察密切跟踪着刘山青等。1981 年春，邓小平终于下重手镇压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为了解镇压的具体情况，刘山青毅然冒险再来广州。出境时被共产党抓捕，说他犯了反革命煽动罪。

刘山青不认罪。他对大陆公安说："所谓煽动是在大街上对许多人说，我只是到他们家里对他们单个说话，怎么是煽动呢？而且我说话的内容只是问问他们近来的一些情况而已。根本没有煽动他们去做什么。"共产党政治警察对刘山青说："你居然如此顽固地拒不认罪。告诉你。如果你承认犯了反革命煽动罪，写悔过书，不再重犯，我们可以考虑从轻处罚，否则将严厉惩办。"刘山青不为所动，坚持自己无罪要认、无过要悔，于是被中共判处 10 年重刑。刘山青以甘愿背负如此沉重的十字架也不弯腰的事实向世人说明，并非燕赵才有慷慨悲歌之士，南越边陲之地一样会出铮铮铁骨男儿。1991 年刘山青坐满 10 年大狱后始得出狱回港。

七十年代中，刘山青在香港参加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此组织属于共产党体系的别支"第四国际"。其创始人系鼎鼎大名的托罗茨基。"第四国际"与列宁、斯大林相继主持的"第三国际"并无本质不同，都是要以革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工人政权。只是由于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与托罗茨基水火不能相容，而托罗茨基斗败，出走国外，另召集他在各国的信仰者组织"第四国际"。托罗茨基指责斯大林体系的共产党已经官僚化。只有他才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致力于建立无官僚制度的工人阶级政权。

刘山青出身于工人家庭。对奉行典型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社会有着深刻批判意识。尤其在七十年代，港英当局政治上实行着阉割民主的殖民统治，经济上漠视底层民众的疾苦，各种社会福利制度阙如。因此，无论从经济视角还是从政治视角，刘山青服膺革命马克思主义都有着顺理成章的理由。

香港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的领导人名叫吴仲贤。1980 年他也去国内跟一些七九民运的参加者联络交流。出境时被共产党政治警察抓捕。吴仲贤的处事风格与刘山青有所不同。他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对付共产党的政治警察，遂得以脱身返回香港。

刘山青十年的大好青春都被共产党糟蹋在黑狱之中。出狱回到香港，刘山青已难以香港

大学的学历和专业去寻找对口的职业。在勤勉工作得以维持生活之后，刘山青重新投入香港新一轮的民主浪潮。

九十年代的香港已与七十年代大异其趣。港英当局权力式微乃至退出，共产党入主香港。社会福利制度虽有所建立，但民主政治仍在蹒跚之中。青春岁月的逝去并没有使刘山青终止追求民主的步伐。只是在他的思绪与情怀中多了层稳健。

2000 年我们一班朋友成立中国社会民主党时，刘山青也风尘仆仆地从香港赶来与会。虽然后来可能基于香港基本法的考虑或其他原因，他没有参加到中国社会民主党之中，但从中我已领悟到他思想的变迁发展。

刘山青执着的情怀依旧，但现实主义精神已经成长。已初步建立民主架构的香港类似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改变它不再需要革命手段。扩展民主的覆盖面可通过议会斗争的途径。增进社会底层民众的福利保障也不必诉诸激烈的阶级斗争。单纯的工人阶级政权极易为政治野心家所操纵把持而质变为专制政体，只有让所有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都有挥洒的空间，才能缔造一个多元化的、各阶级各政治力量互相制衡的合力网络，以建立一个相对公正平衡的社会。这些道理在刘山青心中萌动成长，并与原有的思绪较量。

去年，我在报章上看到刘山青与梁国雄等一批香港民主志士组建了香港社会民主连线。我内心欣喜非常。刘山青们终于把“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帷幕拉上，开启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篇章。从“革马盟”到“社会民主连线”是思想和组织的二维升华。这决非轻而易举的事情。放弃青年时期先入为主的理想该要经过多么艰难的心理挣扎。青年时代“革命马克思主义”为成年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取代。这无疑是政治成熟的表现。我深信，刘山青们会在香港高举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给香港的民主营垒注入新的活力，为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巩固作出卓著的贡献。

空手而归与满载而归

——赴香港出席文革 40 周年座谈会集锦(之七)

在香港的几天里日程得十分紧凑。刘山青安排我会见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些是刘山青有意图让我有机会向那些朋友募集捐款。我向刘山青说：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募捐，我实在不知怎么开口。刘山青说：并不是为你个人生活募捐，而是捐助你出书，或捐助你从事的工作。我想，那就试试吧。

中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以来，一切活动都是自力更生。所需经费都是来自同志们的工薪奉

献。党的成员都是薪资有限的人士，靠工薪奉献的确使党的活动能量难以大幅度扩张。更何况有人加入民运组织非但没有作奉献的思想准备，而且是希企从中得到利益。有位朋友曾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们中国社会民主党总是那么穷，谁会加入进去呀？"还有一位颇有名声的民运人士很直接了当问我："你们中国社会民主党靠什么作凝聚力？靠经济利益还是出名？"我说："中国社会民主党又不是一个企业，哪来经济利益？出名也难。都是草根阶层的人士，没有什么名望。"那位人士说："这样，别人凭什么要去加入你们的社会民主党？"我听了无言以对。我内心一直认为，在民主诉求被现政权列为非法活动之时仍然要执着于它，这除了理念的凝聚力还能有其他什么呢？那位名士的话令我极感意外和悲哀。

我当然希望能得到资助。我也听说过九十年代初海外民运曾得到过许多捐款、资助。但是我亦了解近十年、八年来，海外民运获得资助愈来愈困难。一些民运名人想得到资助都远非易事，遑论我辈？这使我断绝了获取资助的任何念头。这次到香港原也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没想到山青会有这方面的建议和安排。真有这个可能性吗？我将信将疑。

十五号的文革座谈会上来了个热心的听众，他名叫张家敏。二十六年前他还是香港大学的学生。在支援大陆七九民运的热潮中他和林昭寰一起来广州会见我们。只是他来的次数没有林昭寰那么多。我只记住了林昭寰等几位，其他都淡忘了。刘山青得知他来到，便与之再约定了个时间交流一下。山青对我说：张家敏与林昭寰走着不同的道路。林昭寰毕业后到大学任教。张家敏则进入实业界，很有成绩，后来被中共统战位居政协，但他的思想还是倾向民主的。你不妨与他多谈谈，适时向他提出募集捐款的事宜。

十六号下午，山青带我在一间餐厅与张家敏见面，共进午餐。张家敏带来了他百万字的巨著《建国以来》送给我。这是中国 1949 年至 1997 年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当代史。张家敏很坦率地谈及他对大陆政局走向的感觉。他认为尽管民主是不可抗拒的世界历史潮流，但目前尚难以预期民主何时才能在大陆完全确立。他的感觉是共产党在尽力延续其体制。其手法并非都是笨拙的，其中有些甚至是相当有成效的。张家敏说，通过直接接触，他了解到共产党的官员队伍中尽管贪官很多，但也有些很有能力的人。这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正在不遗余力地支撑、维持这个政权。

张家敏的观点与我在海外民运圈中听到的流行说法大相径庭。但我完全不以为忤，因为我与张家敏有类似看法。只是我还有另一些支持这个看法的根据，那就是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共产党与昔日的确已大异其趣。它已竭力使中国已变成一个有自由无民主的社会。相对于七十年代以前出去旅行都需要单位证明才能成行，现在中国人已有了接受高度教育、迁徙、择业、结婚离婚等很多从前不拥有的自由。这些自由都是有助于释放社会成员为个人奋斗的能量。它可诱导社会成员不关注或少关注社会弊端而埋头经营个人的园地。对于那些有可能对共产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体制造成威胁的自由，如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共产党便全力予以扼杀。在这双重的作用下，许多拥有高学历和热门专业技能的人都表现出认同目前体制的倾向。这些人远比底层民众拥有发言权，在他们话语中对共产党体制小骂大帮忙、乃至涂脂抹粉是主流。共产党正是这样利用甚至激活了中国人特别

强烈的私心来维持其违背历史潮流的专制体制。民主不可抗拒。中国不可能就那么例外竟永远没有民主。可是民主旭日何时能在中国大地上升起则确实难以预测，起码不是近期的事情。

午餐后张家敏还有事务安排，不便久留。老朋友握手道别。走出餐厅后山青问我：怎么没有向家敏提出募捐之事。我说：嗨！我都不知怎样把话题转向那个方面。山青说：其实张家敏这个人不错，很慷慨，而且经济实力也相当可观。十万港元对于他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我听得出来，山青是为我惋惜，失去了一个获得资助的机会。我很感谢山青的热心，但对失去这个机会心情却很平常。因为在我的潜意识中，得不到资助是常态，得到资助才是意外。

十七号早晨山青还安排我在一家专门经营早餐的餐厅与香港房地产名商施永清会面。山青曾对我谈及施永清青年时代原是左仔。但后来看穿了中共的虚伪和残暴，便转而投入民主阵营。后涉足房地产开发，做得很成功，积累了很大的经济实力。他虽然不在民主第一线，但很愿意为民主事业捐款。我亦在一旁听到“长毛”与山青议论说：“这次能否请施永清资助老刘十万港元呢？”

施永清先生身高约一米八，戴着一副造型儒雅的眼镜。相貌十分和善。与其说是长袖巨商，毋宁说是宁静学者。他得知我的社会民主党身份，并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关注面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后，便谈到他对改善工薪阶层处境的看法。他说企业应尽量提高员工的待遇。只要企业有赢利，就应以各种形式多给员工报酬。他说，在他的公司里就是这样做的。

我对施永清先生说：这固然是方法之一，但我们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更关注的是，从整体上、全局上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为此，在民主诉求的基础上必须附以许多经济杠杆，来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物质生活水平。施先生对此表示赞同。只是各自所占角度的不同而至着眼点不同罢了。

接着施先生谈到他所了解到的大陆房地产开发中极其严重的贪污腐败情况。那的确是触目惊心。当然，有关这些，我们从海外的华文报纸中已知晓了不少。只是通过施先生的讲述则感受更加具体。

直至告辞，我们都是在问题和观点的探讨之中。我始终没有向他提及募款之事。这次会见之后山青没有再问我为何不出声了。大概他已知晓了我不具备把话题引向那方面的技巧和能力。在这方面我也的确是“扶不起的阿斗”。在乘此难得的机会募集资助的事宜上，我是一再坐失良机、一筹莫展、一无所成，两手空空地离开香港。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气馁，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我此行的目的。而我此行的目的则圆满达到。

来香港参加文革 40 周年座谈会固然是目的，但我更企望的是会见许多朋友。除三刘、月凤、昭寰等许多老朋友外，我还想见其它许多新老朋友。跟他们叙旧，跟他们探讨交流。山青、英杰、月凤极其热心地替我张罗联络，使我的心愿得到实现。

这次香港之行会见的新朋友除前面专文叙及的梁国雄、曾健成、刘慧卿等之外，还有何俊仁、黄毓民、劳永乐、凌文秀、陈健成、吴太平、孙斌、龙纬文等。山青、英杰还替我通知香港的一批长期坚持参加海外民运的朋友与我会面。十五号晚上，杨铮、李伯特、钟堂、黄钟、伍国雄、刘泰、楼宝庆、雷达、陈元华等许多民运朋友在英杰的学联会议室与我座谈。大家坦诚友善地交流着各种看法、和对民运及中国前途的预测展望。谈话进行得非常轻松愉快融洽。直至深夜才紧紧握手惜别。匆忙中没有通知到的老朋友陈诗先生和杨小炎先生也在十六号上午抽空来与我见面聚谈。对海外民主运动的健康开展他们都对我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使我尤其感动的是十四号晚上前哨杂志总编刘达文先生风尘仆仆地从远离香港市中心的干诺道赶来与我见面，并请我和当晚在场的朋友们在黄毓民太太开的餐馆里共进晚餐。晚餐后，刘达文先生又继续请我和山青的太太唐婉清到另一家甜品店饮甜点畅谈。

刘达文先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坚持社会正义公理的气慨令我深感钦佩。他几乎是白手起家创办了杂志《前哨》。《前哨》除满载着民主精神外，还纵横捭阖、内容极为丰富，且印制精致，致使在平面杂志如林的香港打出一片天地。其影响力日益扩大，发行量为香港同类杂志之冠。刘达文先生的奋斗精神给我以极大启发和鼓舞。我深感应以刘达文先生的事迹为榜样，在目前艰难草创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事业中锲而不舍地坚持跋涉。

十六号晚，刘子廉作东，请我和当年曾到广州支持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的老朋友们共进晚餐，为我饯行。当晚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如杜松等。朋友们忆旧阅新、纵横聊谈、十分愉快。而尤其可贵的是，老朋友们并非只是聚餐才来。他们都不仅热忱参加了十四号的文革研讨会，而且都为会议的圆满举行出策出力。文革研讨会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而在此之中凝结中朋友们的集体努力。

十七号中午，刘山青、刘英杰、张月凤送我到机场。一路上山青象几天前来接我的机那样不停地向我介绍沿途的景点，这使我蓦然产生一种留念情愫。这两位恰巧也姓刘的香港青年在二十七年前从香港来到广州，就与我结下终生友谊。我把他们视为小弟弟。只是自然规律无可抗拒，他们如今也人到中年了。几天被安排得满满的时间表里，二刘一张几乎时时与我在一起，比通常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多。现在一下要离他们远去，心中还真有点不舍。四、五天的时间似乎过得太快了。在候机室里他们二刘一张轮流与我合影留念，我意念深处则在祈祷时间凝固，可是班机终于腾空而起了。

当班机昂首直刺蓝天；当香港的高楼大厦迅速从机翼侧下方掠过时，我心中不知为何泛

起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是对离别的不舍，还是对理念追求的未竟？好像都不全是。细细检索自己的神经末梢，豁然明白了。那是我此行之中丰收了朋友们的深厚情谊。这份情谊如金子般沉甸。关于募捐资助我是空手而归，而领受友谊我是满载而归。

此文于 2006 年 12 月 31 日做了修改